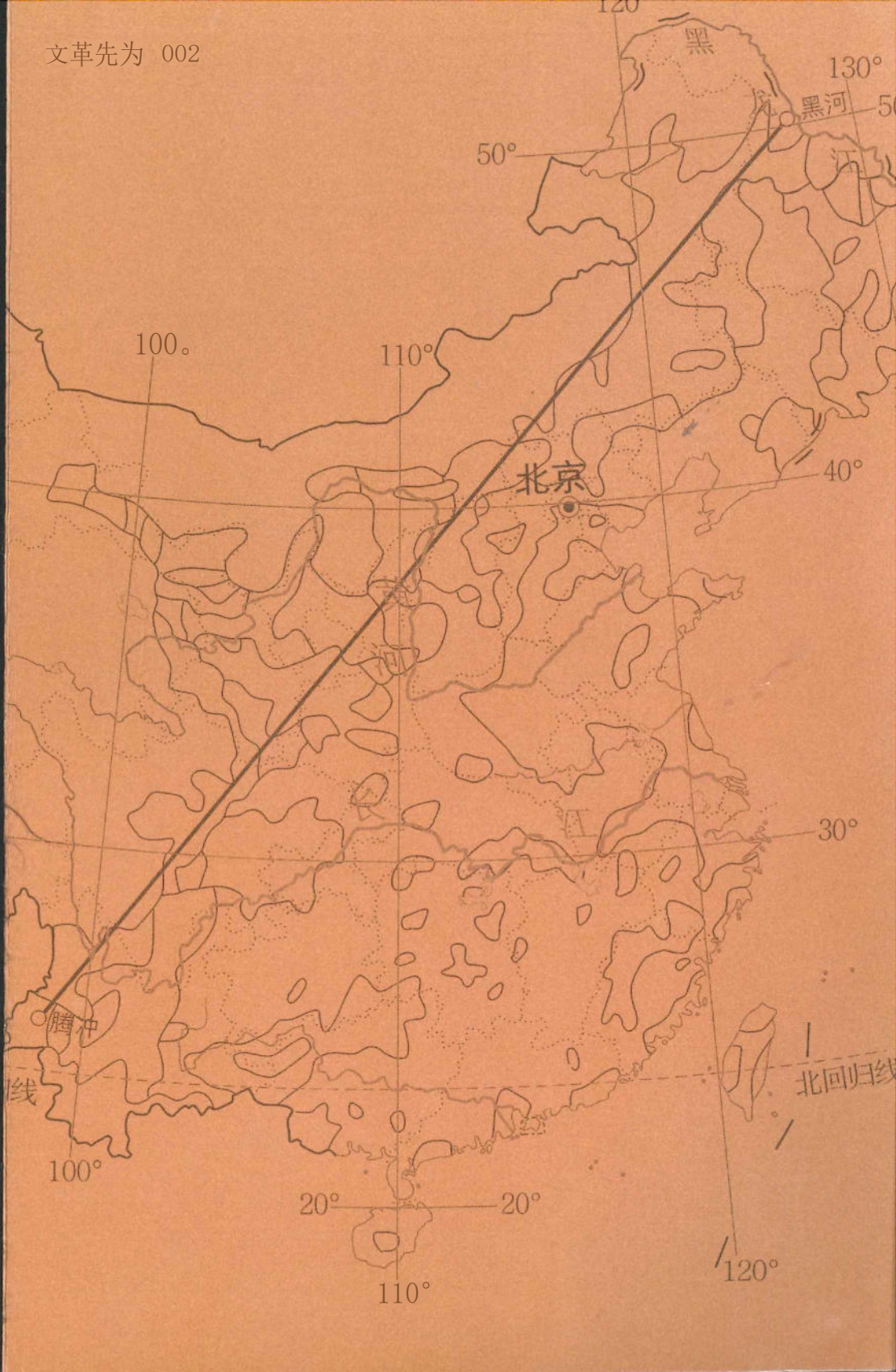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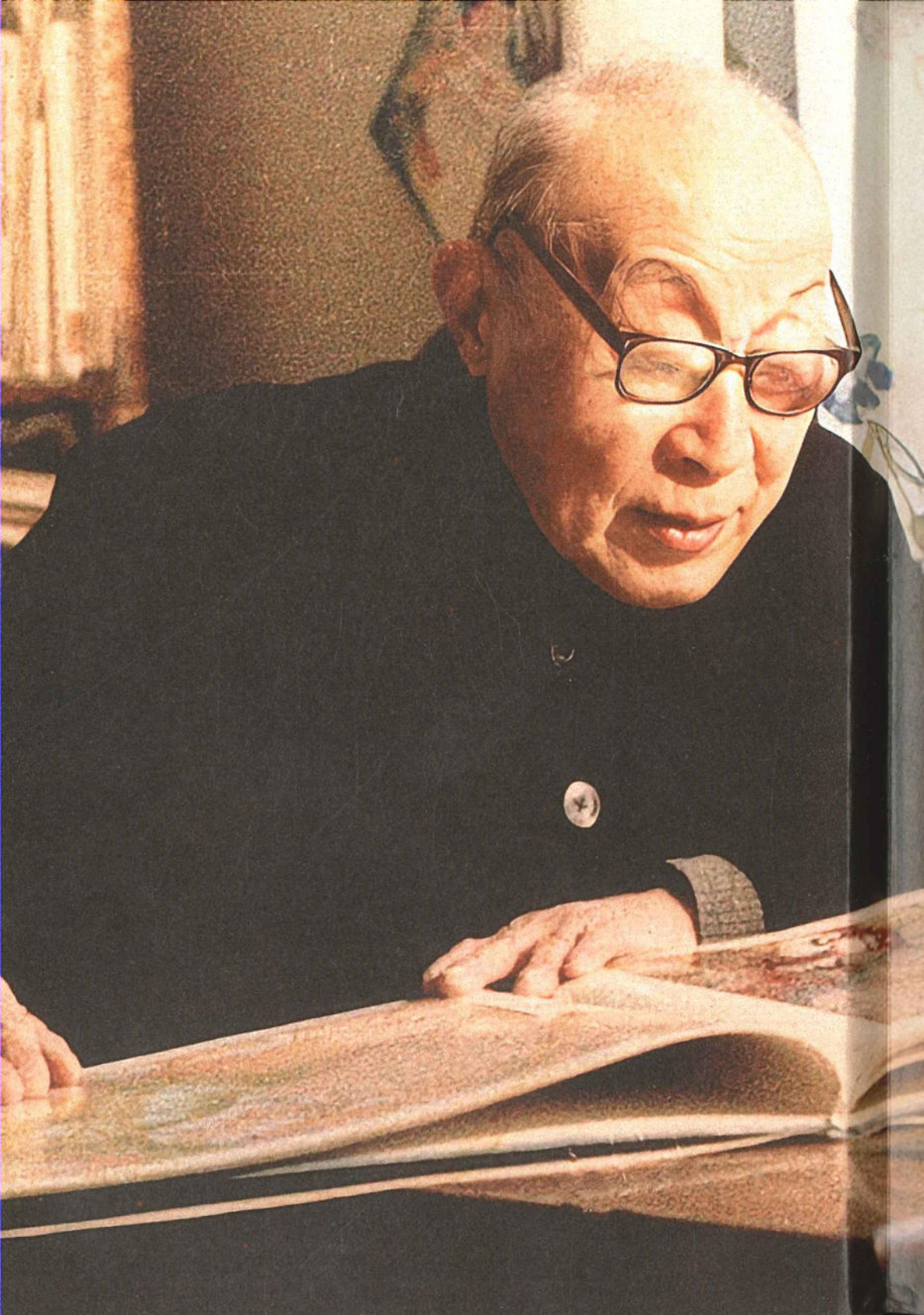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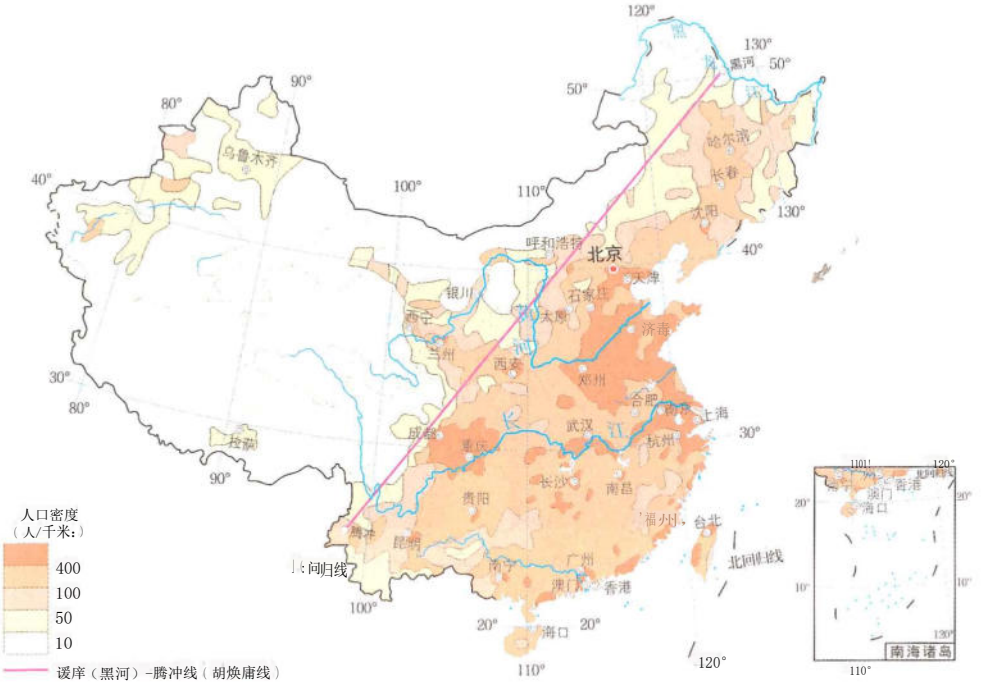

120°
黑
130°
黑河
50°
100°
110°
北京
40°
30°
腾冲
北回归线
100°
20°
20°
110°
120°





01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

图片来源：湖南地图出版社，2025年

中®地理感V編M

比理擘家

第二卷第二期　民g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中@人口之分布

胡煥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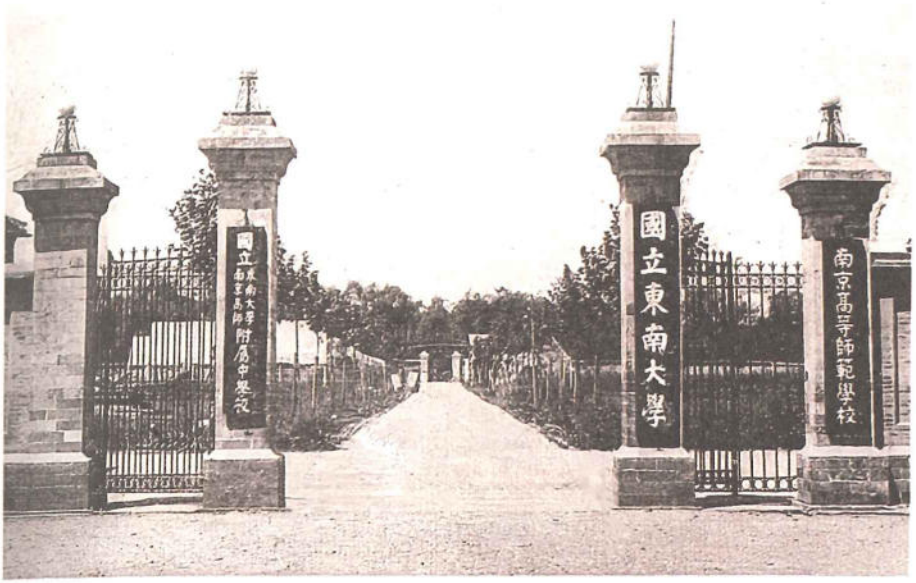
——附统料表典密度圈——

■、引言

年来中外季者，研究中园人口网题者，日兑其多，中國人，是否谩工，国境内，是否向有大景移民之可能，此，寨常令版?f解答之皿题，各方封此之意兄，甚窗a歧；或则都Iq'la AM，:已通剩，此可由就fr生此获M，失未$愿破重，以及海外儒民之多可以'ra之；或W1SR乍人口，It未遇剩，以全国面积除全成人u，sr算其密度，敕之陋西aS阿，假不及is我，阈境西北部，地嘴而人稀，招来宣大有移民之可能，雨方之意见，相距十分逼逮，吾人如欲封此冏题，求得一公平之批判典逾:;之解答，是必於增人口分布之现M，先有一础切之了解。

漫去研究中国人n回题者，大多偏远於触棒数字之推求，Va少注意於地理背境，研究其分布之稀密者，要知各區地理情况不同，JW其所能容纳人口之取诉，B有趣大之差别，以通常情形而，大抵山地人口，不如平原人口之密，避牧国人口，不如般耕區人口之密，同康十震渠社曾矣，然旱林區域，不如稻作一曲域人n之粮，一熟画城，不如二熟三族国域人口之密；吾园最富裕之地域，如盘江三角洲每方公里人口密度，可逢五百以上，然如蒙古新疆西藏各地，面秋维旗，大都Jr盛而雅

A



03

02　《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封面和《中国人口之分布》首页（1935 年）
1935 年 6 月，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首次提出以黑龙江省瑷理（今黑河市）至云南省腾冲一线为界，将中国人口分布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该分界线最初被命名为“璟理—腾冲线”，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称其为“胡焕庸线”。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03　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3 年）与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 年）校名曾并列存在。
图片来源：东南大学校史室

04

04　1923 年 4 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第一级毕业合影（1923 年）
一排（左起）：阮真、缪凤林、张其昀、盛奎修、罗会澧、何惟科、高国栋、范希曾、王学素、陆鸿图、诸葛麒、唐兆祥、诸晋生、景昌极
二排（左起）：田耀章、王锡睿、杨楷、徐启铭、陈训慈、王庸、夏崇璞、刘文翩、徐震瑞、钱些新、方培智、孙土梅
三排（左起）：黄英玮、徐景锋、王玉章、胡焕庸、张廷休、姜子润、周光倬、仇良虎
图片来源：东南大学校史室

05　东南大学校友在巴黎（1927 年）
一排（左起）：吴骐、邰爽秋、严济慈、刘凯钟、张宗鑫
二排（左起）：章昭煌、凌纯声、胡焕庸
图片来源：东南大学校史室

05

06

06
胡焕庸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系主任，时年29岁。（1930年）（图片有部分处理）
图片来源：胡焕庸南京高师同学陈训慈珍藏

07

08

09

jq”多双，鼠和中大奥籍教段
上岬运向4嗤山善东，拉「竺峰分串
”，d山，由费教授摄下此都：它
抗也战起，叫大的史，坤用与二电山主汉访
途中用祸去忙．工化大事台中，华仲及于7吁
彳山枣．自先敖撰中宁77与立德国去丝历人！
打）魅/苦达·R4之内

07　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成立周年纪念（1931 年）
二排（左三起）：王勤增、沈思屿、胡焕庸、黄国璋、张其啊
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室

08　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在洪泽湖大堤南端，左二为胡焕庸。（1934 年）
（图片有部分处理）
图片来源：南京大学地理和海洋科学学院藏

09　胡焕庸和竺可桢全家在安徽黄山（1936 年）
1936 年夏，我和中大奥籍教授费师孟同在黄山考察，适逢竺师全家也到黄山，由费教授摄下此影。次年，抗日战起，浙大内迁，师母与二世兄在江西途中因病去世。“文化大革命”中，竺师也于 74 年仙逝，后费教授也于 77 年在德国去世。痛哉！　胡焕庸志，80 年 2 月
图片背面文字为胡焕庸于 1980 年 2 月补记。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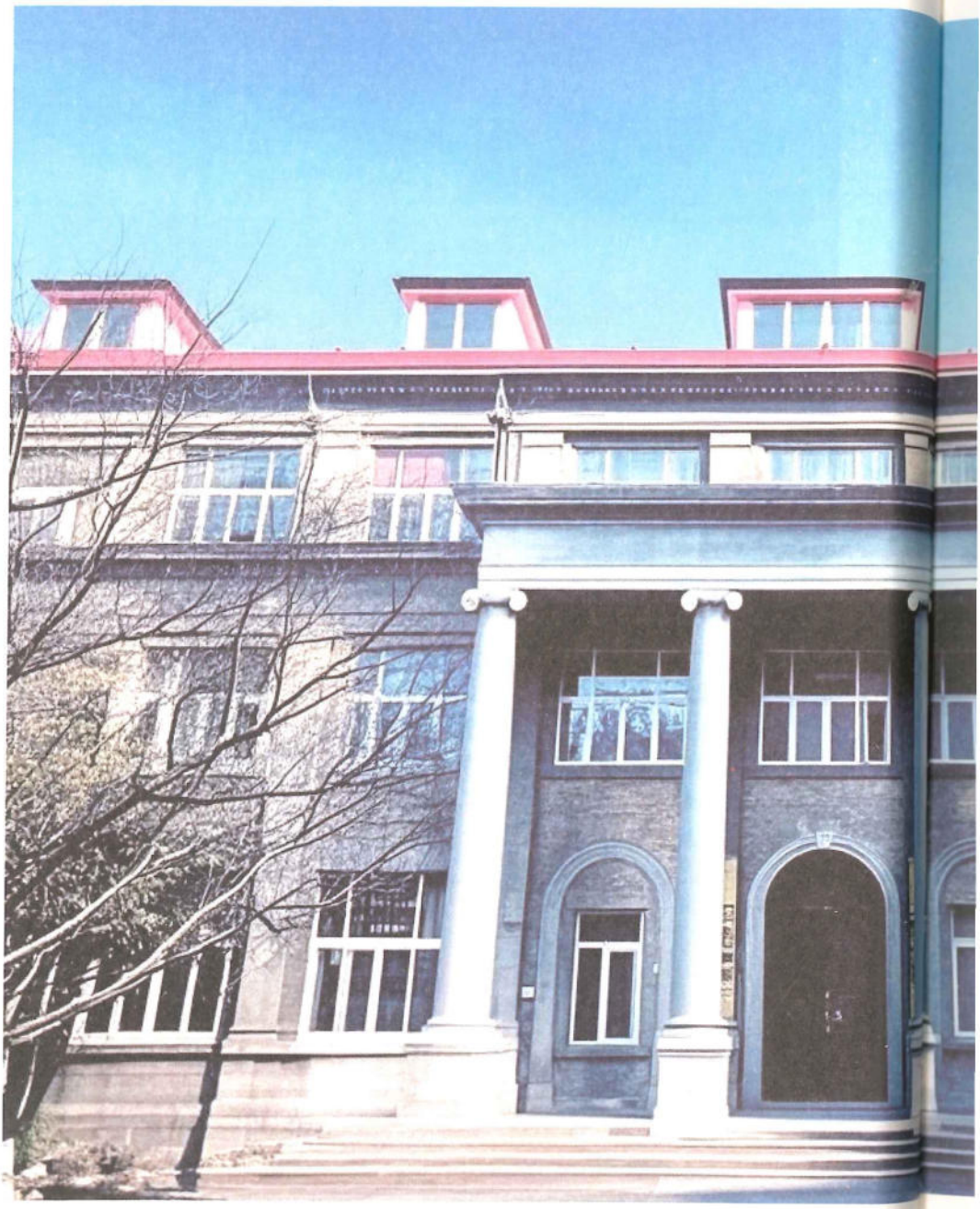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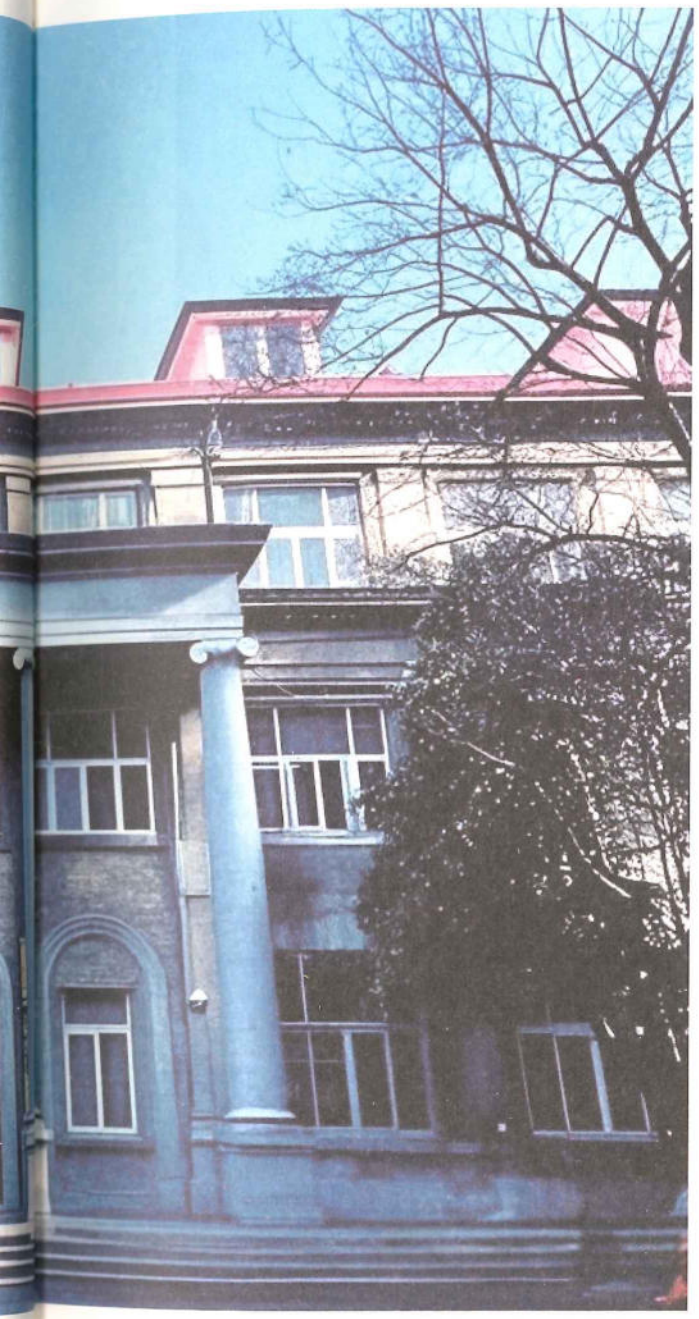
12

10　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1937 年）
竺可桢（一排右七）、胡焕庸（一排右三）、张其昀（一排右五）等与会会员在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门前
图片来源：《地理学报》第 4 卷

11　京滇公路周览团第二队同车团员在南京出发时的合影（1937 年）
（图片有部分处理）
前排（左起）：卫挺生、严德一、 史维新
后排（左起）：秦墨哂、胡士锋、 杨焜、何遂、王曾善、 伍无畏、徐兆镭、裴鑑、曾世荣、胡焕庸
图片来源：何遂先生之孙何迪提供

12　胡焕庸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迎接竺可桢（1938 年）
左起：胡焕庸、竺可桢、吕炯、程纯枢、涂长望
图片背面黑色部分为胡焕庸手迹，蓝色部分为徐近之手迹。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13
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一层左侧为地理系用房，其中左侧第一扇窗处为地理系系主任胡焕庸的办公室。(1930—1937年)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14

14　胡焕庸与地理系师生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校园（1940 年）
左起：金祖孟、王庭芳、夏开儒、胡豁咸、胡焕庸、沈汝生、张德熙、李春芬、陈尔寿、单树模等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15　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研究教授（1946 年）
左起：O.E. Baker（佩克）、胡焕庸、胡乔如、李旭旦
佩克教授曾任马里兰大学地理系系主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长。
图片来源：《梅花香自苦寒来》，2010 年

17

16　胡焕庸与地理系师生在南京四牌楼国立中央大学校园（1948年）
胡焕庸（二排左五）、李旭旦（一排右二）、任美锷（一排右一）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17　胡焕庸、胡世泽、胡适、胡先骕、胡定安在南京（1948年）
图片来源：《胡先啸全集》，2023年

18

18　在中国地理学会会议期间，胡焕庸与早年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留影（1980 年）
第一排（左起）：李春芬、鲍觉民、胡焕庸、朱炳海、李旭旦、周淑贞
第二排（左起）：徐成龙、严重敏、吴传钧、陈尔寿、金祖孟、严钦尚、胡豁咸、邓静中、瞿宁淑
第三排（左起）：单数模、张同铸、程潞、葛以德、宋家泰、刘振中、景才瑞
图片来源：《梅花香自苦寒来》，2010 年

国情分界线

3 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

胡焕庸 等著
胡复孙 彦扁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情分界线：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 / 胡焕庸等著；胡复孙编.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25.4.

ISBN 978-7-5207-4209-2

I. K825.89-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12AW31 号

审图号：GS 京（2025）0493 号

国情分界线：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

GUOQING FENJIEXIAN: HUHUANYONGXIAN JI HU HUANYONG QIREN

作　　者：胡焕庸等

编　　者：胡复孙

策　　划：姚　恋

责任编辑：杨　磊

装帧设计：张　军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010

印　　刷：鑫汇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2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 x 960 毫米　1/16

印　　张：30.5

字　　数：4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4209-2

定　　价：98.00 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编者说明

2025年，是地理科学家胡焕庸教授发表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简称“瑷群—腾冲线”或“胡焕庸线”）90周年。我编印了这本书，敬献给祖父的在天之灵，也献给所有敬重胡焕庸，关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朋友。

本书选取了胡焕庸的弟子、德高望重的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回忆先生的文章为代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也为本书专文作序。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编：胡焕庸线——中国国情分界线。本编主要介绍“瑷辉—腾冲线”（胡焕庸线），收录了胡焕庸于1935年发表的关于“暖辉—腾冲线”的名篇《中国人口之分布》原文，另有七篇胡焕庸和他人关于胡焕庸线、人口地理方面的重要文章。读者可通过阅读原作及这些相关文献，深入了解“胡线”的研究经过与数据来源。

第二编：胡焕庸其人。本编选取了多位学者及胡焕庸早年任职机构的负责人对其工作的回忆，全面回顾了他的主要贡献。我也依据多年的研究，对其求学和长达六十多年职业生涯予以说明，介绍了这位

著名科学家艰苦学习、严谨治学、荣辱不惊的一生。

本编还收录了胡焕庸的学生及后辈对他的追忆与缅怀，他和同学张其啊与老师竺可桢的交往，以及汇总了胡焕庸辞世 20 多年来，社会各界举办的纪念活动，从多维度展示他的一生及其治学的深远影响与卓越贡献。

第三编：胡焕庸著述选录。本编选取了胡焕庸的若干短篇文献，包括他在政治地理、教育等方面的经典文章，也有他回忆亲身参与的地理学科历史及回忆老师刘伯明、柳诒徵、竺可桢和学生李旭旦、徐近之的文章。此外，我还从胡焕庸的历史文献中撷取了一部分经典段落，一并呈现给读者。

本编所选文献中，部分演讲记录为首次公开。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献，可以更深人地了解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价值。

本书附加的图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胡焕庸与老师、同学、同事、学生的部分历史照片、书信和手迹，其中一些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附录是胡焕庸的年表和著述目录，这个版本是经过多方考证后，较为精准的新版。

本书所辑录的胡焕庸文章，均直接引自原版文献及档案资料。为保留文献的历史原貌，对其中与当代用语及标点符号规范有所差异的部分，原则上未做改动。对于极少数无法辨识的文字，以“口”符号替代，编者也对个别表述进行了文字处理。

胡复孙

胡焕庸大网拨展中Site理学的贡献（代序）*

吴传钧

胡焕庸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是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业师，也是我毕生事业的导师。我长期接受他的教诲，他对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一个科学工作者和教师、如何创业、如何团结同行为发展中国地理事业而不懈努力等为人与治学之道，汲汲以教，循循诱导，我铭记在心，学之终身、行之终身，以期学有所得，行有所成，以报师恩。——作者按

奠定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思想

当1919年五四运动推动我国改革时，胡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习；1921年南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由适从美国学成归国的竺可桢先生创办地学系，并任主任；胡师在竺老的教导之下，初步掌握了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内容和作用，从此就把研究地理学作为

* 原载于《人文地理》第16卷第5期. 2001年10月。个别文字有改动。

他终生的事业。1926 年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后，去法国巴黎大学进修，随自然地理学家马东男（E. deMartonne）、经济地理学家德芒戎（A. Demangeon）学习，同时又到邻校法兰西学院旁听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J. Brunhes）讲课，课余系统自学法国人文地理大师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关于人地关系的学说，虽留法仅短短两年，却全面掌握了法国学派的理论要义，并为他的地理学思想打下基础。

法国人文地理学的特点在于：一、重在解释，这是新地理学有别于专于叙述旧地理学的地方；二、地理学研究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并非各自孤立，而有着相互联系存在于“地球一体”之中；三、地面上各种现象不仅为空间性有机体结合，而且为时间性有机体演化，无时不在演化之中，换言之，人文地理学乃是动的科学；四、人受地之影响，地也受人之影响，人之意志、智力与才能因时而不同，故地之利人与人之利地，亦因人、因时而异，要求双方适应。法国学派的这些论点，比先此而出现的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儿（F. Ratzel）所提出的环境决定论，无疑要进步得多。胡师在 1935 年为他的学生李旭旦、任美锷所译白吕纳著《人地学原理》一书写了一篇长序，即全面介绍了他对法国学派人地关系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心得。他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在理论上强调人地关系论，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总体。他体会到学习地理学不仅要懂得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尤其要研究最能集中体现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因此胡师终其一生以这两个领域作为他研究地理的主攻方向。

建立中国人口地理学

1935 年胡师在《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 发表开拓中国人口地理学的重要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并附有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

图。当时中国总人口估计有 4.75 亿，他以 1 点表示 2 万人，根据掌握实际情况将 2.375 万个点子落实到地图上，再以等值线法画舟人口密度图。该文指出中国人口分布存在着极端的地区不平衡，大致从黑龙江省的暖瑾到云南省的腾冲画一斜线，可以清楚标识以此线分出的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密度悬殊的情况，东南半壁虽只占土地面积的 36%，而人口却占 96%；西北半壁虽土地面积占 64%，而人口仅占 4%，这个现象主要是地理环境和农业基础的地区差异所造成的。这条东北一西南的斜线，可说是对中国人口地理基本情况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一直为外国学者所确认和引用，并被称为“胡焕庸线”。胡文发表后不久即被美国 Geographical Review 杂志全文翻译介绍，英、德地理刊物亦相继介绍，认为该文不仅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基础。该文内容不限于人口的数量研究，而着重探讨自然、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条件对人口增长和分布的影响。该文所揭示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差异至今仍然有着指导意义。根据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南和西北的人口比是 94.4：5.6,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又显示两个半壁的人口比是 94.2：5.8, 可见“胡焕庸线”确实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最基本地区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重视人口的调查研究，胡师于 1953 年从治淮委员会调入华东师大地理系，先以教授外国自然地理为主，其后逐渐恢复人口研究，1957 年该校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他率领师生到江苏省的南通、常熟、宜兴等地进行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报告，延续了 20 年前的人口地理研究。但曾几何时，北大马寅初教授发表了《新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不幸遭到不公正的政治批判，于是国内有关人口研究都难以为继，胡师不得已而转教自然地理。此后直到“文革”后的 1978 年中央拨乱

反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得到平反，人口问题再次受到人们重视。1982 年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胡师被中国人口学会聘为顾问，并接受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任务。华东师大不仅恢复了人口地理研究室，并扩建为人口研究所，聘胡师任所长，同时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委的资助，得以开展到全国各地调查和出版著作等相关工作，并招收人口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胡师先后发表了《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等论文和人口地图，荣获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又与张善余教授合编《世界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地理》等书，1990 年出版了《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选辑了他的代表性论文 29 篇。胡师研究人口地理的重点：一是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二是人口分布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始终把人口地理与农业地理加以有机结合。他曾主张：蒙新地区人口容量不宜超过 6000 万，青藏地区不宜超过 1000 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应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所有他晚期的累累著作推动了中国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重视地理研究为生产建设服务

胡师治学的另一研究重点是以农业地理为中心的经济地理。我国近代地理界开展农业区划研究，首推胡师 1934 年在《地理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江苏省之农业区域》一文，根据作物分布统计，联系气候、土壤和水利条件，划分江苏省为四个农业区（即苏北旱粮区、苏中釉稻区、沿海棉花区、苏南稻丝区）。次年又在《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阐明人口密度和自然条件与农业分布的关系，并划分安徽省为四个农业区。1936 年他进一步对全国作了农业区的划分研究，在《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了《中国之农业区域》一文，开创了全国农业地理与农业区

划的研究，与他两年前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为姊妹篇，互相呼应，显示了农业地理与人口地理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该文分析气候和地形条件与作物分布的关系，特别指出一些地形与气候界线对农作物分布的重要意义，如海拔3000米等高线为青藏高原的东界，年降水量300毫米等雨线为北方干旱区之东界，正月-6K等温线为冬小麦分布北界，正月10P等温线为双季稻分布北界等，从而划分全国为九个农业区，即东北松辽区、黄河下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昆陵区、西南高地区、黄土高原区、漠南草原区、蒙新宁干燥区、青康藏高原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农业区划方案，其发表先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J.L. Buck）教授《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对中国东中部划分为两个农业地带和八个农业区之方案。

胡师在华东师大设立人口地理研究室后，又继续其人口地理与农业地区相结合的研究，于1958年在华东师大《地理集刊》上发表《江苏省人口密度和农业区域》一文，在24年前发表的江苏农业区域基础上，又有所深化，指出全省可分为五个农业地理大区（淮北地区、淮南地区、西南丘陵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滨海地区），每一个大区又可细分为7~9个小区，对每一小区论述其自然环境特点，水利情况，主要农作物分布以及发展前景，远比1934年提出的方案细致。

除为农业服务以外，胡师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到苏北沿海地区考察废盐田垦耕和淮河流域水利情况，著有《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引起水利部门的注意。1950年初，淮河流域又发大水，治淮委员会特调胡师到该委任技术委员，再度到两淮考察，研究治淮之策，提出在苏北新开灌溉总渠，分引一部分淮水由此直接入海。此项建议被该委接受贯彻，胡师又先后写成《淮河》《淮河的改造》《淮河水道志》《祖国的水利》等书，体现了地理学家为水利服务的热情。

20世纪30年代末胡师受有关部门的委托，进行缩小省区研究，

作为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经济基础之策略，于 1940 年完成设计报告，开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之先河。

此外，胡师受法国学派影响，重视区域地理研究，认为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核心。他从 1935 年编著《江苏图志》开始，对区域地理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包括分省地理、中国地理、欧洲分国地志、世界地理以及分国经济地理等，发表了有关著作二三十种。

胡焕庸著作分类统计

分类 \ 口寸段	1924—1937	1937—1949	1949—1965	1979—1984	1985—1990	小计
人口地理	4	1	3	26	33	67
经济地理	2	4	1	4	7	18
农业与农业区域	4	1	2	1	—	8
气候、气象	6	3	—	2	—	11
水利	1	1	5	1	1	9
外国区域地理	5	4	2	—	—	11
本国区域地理	2	2	1	—	—	5
区域地理学	1	—	—	—	2	3
自然地理	—	—	4	3	—	7
地貌、地质	1	—	—	1	—	2
地图	1	—	—	—	—	1
外国地理学	7	—	1	—	—	8
政治地理	2	—	—	—	—	2
中国地理学发展史	—	—	—	—	4	4
中国地理学者	—	—	—	1	5	6
地理教育	3	—	—	—	—	3
其他	2	1	—	—	—	3
合计	41	17	19	39	52	168
年平均数	3.2	1.3	1.2	7.8	10.4	2.7

根据胡师子女 2001 年编《胡焕庸教授：简历、年表、著述》资料分析

成果丰硕、著作等身

胡师自 1924 年开始发表论文，迄至 1990 年搁笔，前后 66 年，共发表论文及专著约 170 种，平均每年 2.7 种。在最初阶段 1924-1937 年，平均每年发表 3.2 种，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区域地理共十多个分支学科，显示其治学基础之广博。抗日战争爆发以迄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阶段（1937—1949 年），由于环境不安，又缺乏发表条件，平均每年仅 1.3 种，内容以国内外区域地理为主，经济地理次之。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1949—1965 年），平均每年写 1.2 种，内容以治理淮河为主，并结合在华师大授课，以自然地理较多，并开始人口地理研究。“文革”前后的 12 年（1966—1978 年），全国动乱，科研工作瘫痪，不可能有任何成果。

1978 年中央拨乱反正，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胡师焕发革命的青春，他说：“别人的时间是以年计算的，我的时间只能以天计算，只要我的呼吸不停，我的工作也就一日不止，努力争取夺回我在十年内乱中白白浪费掉的宝贵光阴，为祖国的地理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余热。”当时他已年近 80 岁高龄而视力衰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书，而且右手发抖不能书写，竟学会了用左手写字，他这种为事业而奋斗的毅力，令人敬佩莫名。他凭此毅力辛勤工作，因而在 1978-1984 年间，平均每年发表论著 7.8 种之多，主攻人口地理，旁及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后因年事已高，他辞去人口所所长职务，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然笔耕不止，在 1985—1990 年间，平均每年发表成果 10.4 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竟然出现了他一生中最高产的奇迹，他以具体行动实践了对人民的诺言，走完了一个地理学大师的光辉历程。

学业并重、风范永垂

1945 年夏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考取公费将去英国留学，胡师为我

题“学业并重”四字作为临别勉词，意即做学问和创事业二者不可偏废。他本人毕生即以此立志自勉，在治学方面强学力行，推陈出新，开拓引路；在创业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创建研究机构，组织学术团体，主持专业刊物等，厥功尤伟。胡师自 1928 年从法国留学归国不久即任母校（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兼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又于 1953 年转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和人口所教授，在两校先后执教六十余载，培养了大批地理学和人口学专门人才，包括两名院士和上百名教授。胡师于 1928—1930 年协助竺可桢业师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1 年在中央大学研究生院创建地理学部，兼任部主任，开展研究工作，并培养地理专业硕士生；1957 年在华东师大创建人口地理研究室，1981 年扩建为人口研究室（所），任所长，1984 年增设博士后科研站；胡师于 1934 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并创办《地理学报》，先后任总干事和理事长，组织领导全国性的地理学术活动；1981 年胡师又应聘出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回顾胡师 70 年的学术生涯，对发展中国地理学和地理事业作出了重大的、卓越的贡献，无愧为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我在胡师的长期熏陶下，耳濡目染，步步紧随，以师道是从，除治学外，亦甘愿为发展中国地理事业而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亦先后参与中国地理学会的业务组织工作，主编《地理学报》；支持湖南经济地理所和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所的建立，以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创刊；为扩大中国在国际地理界的影响而承担联合国大学（UNU）顾问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的工作，以此来告慰业师对我的殷切属望。如今业师虽已谢世，但我仍然不忘“学业并重”的立身之道。我时常记得法国人文地理学界有两位大师，即白兰士和白吕纳，他俩的师生情谊感人至深，白吕纳在纪念老师白兰士时说：“恕我骄傲地声明：我是白兰士教导出来的学生，而且将永远是

他的学生。我的思想、我的感觉、我对人地关系的最初认识乃至我对地理学的爱好，莫不出于老师的教化。”这正是我对胡焕庸老师想永远表达的同样感情。

2001 年胡师诞辰 100 周年，于中关村

吴传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前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前理事长。

推荐序

葛剑雄

1983 年 3 月，我被谭其骧先生招收为博士研究生。不久，我向先生汇报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拟在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扩大为《西汉人口地理》，获得了他的同意。此前，我查阅过国内人口地理方面的论著，包括胡焕庸的论文以及他发现的瑷理（今黑龙江省黑河）一腾冲线，于是问先师：“胡焕庸先生还在世吗？”先师说：“怎么不在世？不久前我还跟他一起开过会。”说到这里，先师不禁感慨：“这样一位重要的地理学家，你们都不知道！不仅你们不知道，连一些比较年轻的地理学者也不知道。”1980 年在广州召开的“文革”后第一次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在选举时，胡焕庸的名字出现在理事候选人的名单上，结果竟然落选了。参会的代表大多数不知道胡焕庸，更不了解他的重大贡献。胡焕庸曾任中央大学的教务长，而蒋介石曾是中央大学的校长，解放后，这些以及其他莫须有的告发，让他不仅在学术界销声匿迹，更在“文革”中入狱多年。

我急于向胡先生求教，便拿了先师写的介绍信，前往华东师范大学的宿舍拜访他。当时胡先生已年过八十，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只是他的手因严重的关节炎已经变形，这或许与未能及时治疗有关。

看到先师的介绍信，他很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向我讲述了绘制这条线的背景。我向他请教如何绘制西汉的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他问我基本数据从哪里来，我呈上了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并汇报了通过《中国历史地图集》测量西汉政区面积的办法。他很高兴，说："有了这些数据，图就不难画了。"第二次去时，我呈上了已写出的部分章节，请求他在我的论文完成后担任评阅人。他表示，担任评阅人负担太重，而且他以前也没有研究过古代的人口地理，但他可以尽自己的能力给我的论文提一些意见。

尽管"胡焕庸线"早已是地理学界的常识，胡先生在1957年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人口地理研究室，1981年起又先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人口研究所所长，但"胡焕庸线"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直到近年，一位国家领导人问起，它才重新受到重视。

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人口分布》，并附有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地图。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焕庸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明显的界线，即从嫒瑾到腾冲一线，正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胡焕庸计算了谖瑞一腾冲线两侧的人口、土地及人口密度，此线东南部分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3.8%、总人口的94.1%，而西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56.2%，人口却只占5.9%。1986年，胡焕庸、伍理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将谖瑾—腾冲线准确地落实在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也许有人会认为，画人口分布图、人口密度图并不难，随便找个地理系本科生都能画。而只要将这两幅地图画出来，人口分布的这种差异性就一目了然。那为什么这项工作直到1935年才由胡先生完成，

并且被公认为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呢？因为这是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不久，胡先生是掌握这种方法的第一批人。绘制人口分布图和密度图需要准确的分区域人口统计数据，还需要相应的分区域土地面积数据。前者要搜集到清末至民国的全国性户籍、人口普查后，各级政府整理发表具体数据后才具备；后者必须依靠较大比例尺的精确地图，而这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可以说，胡先生是第一时间利用了这两项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态势也是在此前不久才形成的。因为在1860年清朝在东北全面开禁之前，今黑龙江、吉林两省和辽宁北部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发，到20世纪30年代，东三省才拥有3000万人口，谖辉（今黑河）以东南最后成为人口相对稠密地区，谖琉一腾冲线才最终形成。而胡先生的研究成果和这两幅地图最及时地显示了这一新的人口分布态势。

其实，胡先生不仅是人口地理学家，还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地理学教育家。只是出于历史的原因，他的成果和贡献长期被忽略和遮蔽了。现在，由胡复孙编辑出版的这本《国情分界线：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使我们得以了解胡先生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读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胡先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卓尔不群的思者、百折不挠的勇者、循循善诱的老师和蔼慈爱的长者。不无遗憾的是，本书文章的征集晚了些。如果胡先生的同辈人，如先师等还在世，肯定能写出更多、更具体、更生动的内容。

2025年元月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胡先生不仅是人口地理学家，还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地理学教育家。只是出于历史的原因，他的成果和贡献长期被忽略和遮蔽了。《国情分界线》这本书，不仅让我们得以了解胡先生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巨大贡献，更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卓尔不群的思者、百折不挠的勇者、循循善诱的老师、和蔼慈爱的长者。

——葛剑雄，复旦大学

胡焕庸线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前中国经济自然分布，对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演进极具启发意义。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

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没有人概括出来，就没有清醒的认识。谖腾线就是这样，把最重要的国情清晰表现、概括出来，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国情的认识。为什么是胡焕庸画出这一道“国情线”？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给出了清晰的回答。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

该文集呈现了一份尘封已久，却每每出现在多个学科研究中的“档案”。很多人耳熟能详“胡焕庸线”（又称“瑷瑾一腾冲线”），却对其发现人胡焕庸生平，鲜知一二。作为中国近现代（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以其深厚学养和喷薄激情，提出胡焕庸线，使之成为一把锋利工具，不仅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有效路径，而且为多个学科的研究（包括理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苏里，万圣书园主理人

胡焕庸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总干事，同时也是“学衡派”的后起之秀。他受柳诒徵史学、竺可桢地学的本土化学术训练，又得法国留学、美国访学的国际化见识，进而高筑其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的学术平台。他所提出的“瑷辉一腾冲线”，是百年来史地学最具学术发明的原创成果。

——沈卫威，南京大学

胡焕庸和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金字 log。，本书辑录的相关文献展示了胡焕庸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胡焕庸线深广的学术影响。

——丁金宏，华东师范大学

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从探源中国文明的角度品味“胡焕庸线”，可知其意义已远超现代人口分布线和国情分界线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它是破译“何以中国”谜题的一把钥匙。胡焕庸大师及他在 90 年前画出的那条神奇的线，应该被更多的人知晓。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

目录

编者说明 01
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代序）/ 吴传钧 03
推荐序/ 葛剑雄 12

第一编　胡焕庸线——中国国情分界线

第一章　胡焕庸画“瑷库一腾冲”线

中国人口之分布/ 胡焕庸 005
名词解释：爱理一腾冲线/ 胡焕庸 020
附：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 / 丁金宏等 022

第二章　胡焕庸谈人口地理

《人地学原理》胡序/ 胡焕庸 047
解放前五十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人口的概况 / 胡焕庸 057
五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八大区的人口经济发展 / 胡焕庸 065
我和人口地理学/ 胡焕庸 083
附：人口增长是他的担忧 088

第二编　胡焕庸其人

第三章　学者人生

胡焕庸：刻在“谖理一腾冲线”上的学者/ 胡复孙 ……095
胡焕庸教授地理工作六十年 / 金祖孟 ……122
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 胡复孙 ……132
胡焕庸先生与中国地理学会 / 张国友 ……147
胡焕庸先生的学术和教育功绩撷例/ 鹿化煜 ……154
山海风云——胡焕庸接掌省立苏州中学校长记事/ 丁云衍 ……162
记胡焕庸委员与治淮二三事 / 吴旭 ……171
二十世纪人口研究所发展回顾/ 桂世勋 ……182
第三次冲锋——访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 汤建中　姜素清 ……196

第四章　怀仁慕德

胡焕庸、张其的和老师竺可桢/ 胡复孙 ……207
“我不走，我不走！”掷地有如金石声——忆胡焕庸教授/ 高淑眉 ……222
谢觉民谈胡焕庸 / 于希贤 ……226
我所认识的胡焕庸先生 / 王铮 ……229
我们不会忘记胡先生的巨大贡献/ 刘君德 ……232
关于恩师胡焕庸的点滴回忆/ 朱宝树 ……235
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精彩到老——回忆恩师胡焕庸教授/ 汤建中 ……239
我记忆中的胡焕庸先生/ 印永清 ……241
我与胡焕庸先生的师生缘 / 丁金宏 ……246
爷爷精神，伴我前行 /胡海 ……250
华东师大同事和学生的回忆 ……257
有关胡焕庸和 ”胡焕庸线”的部分纪念活动/ 胡复孙 ……269

第三编　胡焕庸著述选录

第五章　看中国

钦天山观象台故址重建气象台记/ 胡焕庸 279
考察川西神秘之区经过 / 胡焕庸 282
战后我国国都问题 / 胡焕庸 286
中国青年与中国科学/ 胡焕庸 289
在国立中央大学西北建设研究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胡焕庸 292
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 / 胡焕庸 294
五十年来的地理学 / 胡焕庸 297
缩小省区问题——访问胡焕庸教授 305
胡焕庸著述摘编 309
附：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 杜德斌等 326

第六章　谈教育

南高精神/ 胡焕庸 349
高中普通科春季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号弁言 / 胡焕庸 351
中学地理教育的实施问题 / 胡焕庸 353
与青年谈读地学 / 胡焕庸 357
欢送毕业同学/ 胡焕庸 360
大学课程/ 胡焕庸 363
地学革命与地理教育 / 胡焕庸 367

第七章　忆师友

忆刘师伯明/ 胡焕庸 377
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 胡焕庸 379
怀念柳师翼谋先生 / 胡焕庸 390
徐近之教授的学术贡献 / 胡焕庸 394
痛悼李旭旦教授 / 胡焕庸 398
欢庆《地理学报》创刊五十周年——回忆学会早期历史/ 胡焕庸 402
我和商务印书馆 / 胡焕庸 405
回忆“中国科学社” / 胡焕庸 407

附录

胡焕庸年表 413
胡焕庸著述目录 421

后记 461

第一编 胡焕庸线——中国国情分界线

Chapter 01

第一章

胡焕庸画“谖辉一腾冲”线

中国人口之分布 *

胡焕庸

一、引言

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日见其多，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此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问题，各方对此之意见，甚为分歧；或则谓中国人口，实已过剩，此可由社会生计艰难，失业问题严重，以及海外侨民之多可以证之；或则谓中国人口，实未过剩，以全国面积除全国人口，计算其密度，较之欧西诸国，尚不及远甚，国境西北部，地广而人稀，将来实大有移民之可能；两方之意见，相距十分遥远，吾人如欲对此问题，求得一公平之批判与适当之解答，是必于中国人口分布之现状，先有一确切之了解。

过去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大多偏重于纯粹数字之推求，绝少注意于地理背景，研究其分布之稀密者，要知各区地理情况不同，则其所能容纳人口之数量，将有极大之差别。以通常情形而论，大抵山地

* 原载于《地理学报》1935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33—74 页。

人口，不如平原人口之密，游牧区人口，不如农耕区人口之密，同属于农业社会矣，然旱粮区域，不如稻作区域人口之密；一熟区域，不如二熟、三熟区域人口之密；吾国最富裕之区域，如长江三角洲每方公里人口密度，可达五百以上，然如蒙古新疆西藏各地，面积虽广，大都贫瘠而无人居，其每方公里之人口密度，大都在一人以下，此种人口稀、密不同之原因，绝非由于偶然分布之不平均，盖完全由于各地生产力之不同；如西藏人口虽稀，然即此仅有之居民，亦颇难维持其生活，因而盛行一妻多夫制，兄弟有二人，必以一人为喇嘛，凡此皆因地方生活艰难，特别用以限制人口繁殖之社会制度也。

普通推算人口之密度，大多根据政治单位之面积，如一国、一省、一县等是，此种方法，往往具有极大之错误；吾国面积辽阔，各地自然情况，颇多差别，如上述长江三角洲，乃极肥沃之冲积平原，而蒙古新疆西藏等，则多为甚高之高原，且其气候不属于沙漠，即属于寒漠，因此其人口密度，乃有如此悬殊者。

即以一省为例，四川之成都平原，其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在五百以上，然与之相距咫尺之邛崃山地，其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即不足一人；安徽省之沿江冲积地，其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在三百以上，然皖南黄山各地，其人口密度乃不足三十人。小之即以一县为例，其情形亦同，如江苏之句容其北边邻江冲积地，人口密度最高者每方公里达五百，然县境东部茅山区域，其人口密度乃不足十人，此种例证，多至不可胜数，凡利用政治单位，求取人口密度，除非其全境以内，具有同一之自然环境，否则若以各地疏密不同者，互相平均，其结果即与事实不符，而失却真实意义矣。

研究各地人口密度，最好能以自然环境约略相同之区，用作比较，即不然，至少亦当以面积相当之区，互相参证；通常有一极大之错误，即往往以我国全国人口密度，与欧洲小面积之国家，如英法德意

乃至比利时荷兰丹麦等，互相比较；我国面积，与欧洲全洲面积约相当，我国境内，有西藏大高原，其平均高度，在欧洲最高峰白山之上，计其面积，较英法德意四国之面积为尤广，然生活于此之人口，总数不过二百数十万（连西藏青海西康三省区合计），每方公里人口密度大都在一人以下；英国面积仅二十四万方公里，约当我国全国总面积之五十分之一；比利时之面积，仅三万方公里，约当我国总面积之三百七十二分之一，如以此等国家之人口密度，与我全国相较，直不啻有鸿毛泰山之别，求如西藏高原之荒漠，诸国境内固无有也，据此而曰我国人口，并不密于英国或比利时者，其人非狂即妄；反是如吾人以国内同面积之地，与英比相较，则如江苏安徽两省，其面积约略与英国相等，英国人口平均密度，每方公里一百九十人，而我江苏安徽两省之平均密度为二百十二人；江苏江南其面积与比利时约相当，比利时之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二百七十人，而江苏江南（连上海南京）之人口密度为五百三十三人，如此分别作比，则我国人口，固远较英比两国为更密矣。

过去根据地理区域，对我国人口分布，作科学研究者，为数不多，在国内有竺可桢翁文灏两先生，竺先生曾撰有《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分布》一文，对于一般研究人口分布之原则，以及江浙两省与世界人口稠密各区，比较异同之处，论列甚详；翁先生撰有《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一文，对于全国人口分布不平均之情形，阐发尤多；外人研究中国人口分布者，有洛克斯佩克莱西诸氏，洛克斯佩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之估计数字，曾草有《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然其内容殊简略；克莱西所根据者，系民国十四年之邮政统计，氏分中国为二十一个自然区，曾一一分别计算其密度，然以我国面积之大，二十一个自然区，殊不足以尽全国自然环境之复杂，今以广大之自然区，计算其平均密度，其缺点仍嫌过于简略与笼统。

研究人口分布之目的，虽在求取各种自然环境相异各处之人口密度，然普通用以统计人口之单位，则全数属于政治区域，如一国一省一县一乡等；作者年来研究国内各地人口之分布，其利用乡村单位之人口统计，以区辨一县以内人口分布之稀密者，有江苏省之江宁句容铜山各县，利用县区单位之人口统计，以区辨一省以内人口之稀密者，有安徽江苏广西各省；根据过去经验，深感研究我国人口分布，其最精密之方法，当利用以乡镇为单位之人口统计，以求取各县人口之稀密，因人口统计之地域愈小，则根据而作之人口分布地图或密度计算，当愈正确而精密；其次以县统计为单位，以绘制人口地图，其结果亦远较以整个省区或广大之自然区域为单位，计算其人口密度者为优，因在每个省区或广大之自然区域以内，其自然情况仍极复杂，而各地人口密度，亦大有差异也。

作者过去所作安徽广西两省人口分布地图，均以县单位之人口统计为根据，惟同时凡县区广大，境内自然环境有不甚相同者，亦颇以主观抉择，区别其疏密，因如此则较完全根据县区单位之统计，在同一县区以内，假定其为平均分布者，其结果当与事实较为相近也。

过去研究我国人口问题，而制有人口分布地图者，有若干人，如克莱西如薛洪诸氏，其所撰之中国地理，均附有人口地图；中华续行委办会所出版之《中华归主》，除全国人口分布总图以外，并有各省人口分布分图，其统计亦以县区为单位，方法尚属精密；惟上述各图，均仅应用绝对法或称点子法，即以点子代表定量人口，以示其分布之情形，从未有应用比较法或称等级法，以表示人口之密度者；作者除正搜集各县以乡镇为单位之人口统计，以制作各地之精密人口地图以外，现为表示全国人口分布之概况起见，因先利用县单位之人口统计，以作成一全国人口之分布与密度图，藉此作一全国人口分布之初步研究。

二、人口统计

为欲制作全国人口之分布与密度图起见，事前必先具有全国各县之人口统计，我国户籍行政，肇端虽古，然近代以来，反不若欧美各国，有定期举行之人口普查，因此我国全国人口，究有几何，至今尚无确切之答复，且常引起各方之争辩；如民国十九年，国际统计协会会议于日本东京（召开），美人韦尔柯克斯以为我国人口才 不过三万四千万，而我国代表陈长箭等则宣称我国现下人口，当为四万六千万，二数之相差，计达一万二千万，约当于美国一国之人口。二氏所提之数字，均凭估计或间接推算而来，因此均无法使对方为之折服。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政府统计全国人口为四万四千万，宣统二年（一九一O）民政部调查为三万三千万，较十年前少去一万一千万，惟同年邮政局估计全国人口约为四万四千万，于此足证当时民政部之报告必有漏列无疑；民国元年，内务部举行户口统计，其所得之数字，为三万五千七百万，然亦只有二十一省之统计，他如广东广西安徽等省区之人口，当时均未列入。

民国十一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出版之《中华归主》，其所估计民国七、八年间之全国人口为四万五千二百万零，洛克斯佩所作《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即根据其统计；民国十四年，邮政局估计全国人口为四万八千五百万余，克莱西氏于其所著《中国之地理基础》一书，即利用其统计，以作各自然区人口密度之计算。

民国十七年，内政部举行全国人口调查，发表数字为四万七千四百万，然其中亦仅有十二省之较新调查，其余均系估计数；陈长衡氏曾据此加以修正，假定民国十七年全国人口总数为四万四千一百万余。

近数年来，人口统计之需用，渐为各方所重视，各省县政府，多

有自办清查者，内政部于民国二十四年春，曾汇集最近数年间各省、县已有之人口数字，油印发表，惟内容亦仍极残缺，其各县数字均完备者，只得十四省。

作者为此问题，曾费数月之时间，并藉若干同学之助，于各种公报杂志中，搜取各省、各县之最近人口统计。结果尚属圆满；国内二十八省，各县统计全备者，计得二十三省，内十七省系各省省政府之报告数字，其他山西河北陕西宁夏新疆浙江六省，系用内政部报告数；所有此二十三省之统计，除山东一省，系民国十九年之统计外，其他均系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所调查；二十三省以外，仅四川一省，无最新之统计，青海与西康两省，则具有一部统计，尚缺一部；贵州省已有最新之人口统计，惟未能取得各县之数字，福建省亦有一部统计，惟县数不全，因此除青海西康采用一部估计外，四川贵州福建三省暂仍采用民国十四年邮政估计之数字。

青海人口，据青海省政府调查，系一百万零，内已设县治之十四县人口，计八十万，其他果洛族二十万，惟西南部藏族居民，或尚有遗漏，兹假定其为三十万，则全省计一百三十万零。

西康省人口，只有十四县之统计，计十五万零，此系西康考察专员冯云仙女士入康调查后所呈报之数字；其他二十县人口，未据呈报，究有几何，绝无调查；任乃强君估计全省人口为七十九万，而梅心如君则估计达三百八十万之多，陈长菊君估计为五十二万。兹从少估计，且以现有十四县作比例，假定每县平均一万，则其他二十县计二十万，全省合计为三十五万零。

四川省之人口，近数年来绝少统计，民国元年，统计全省人口为四千八百万，民国五年为五千万，兹据十四年邮政调查，计五千二百万，此乃现有最近之数字也。

贵州人口，据民国二十二年该省办理保甲后报告数为六百九十万

零，其各县数字，一部见该省所刊之《贵州自治月刊》，一部见内政部二十四年报告，惟均不全，无法采用；民国十四年之邮政调查，贵州全省人口计一千一百二十万，较省政府报告相差达四百余万之多，又依民元统计，贵州人口计九百万，该省人口究有几何，须待来日加以订正。

福建省之人口，据民国十四年之邮政调查，为一千四百万；民国十七年内政部之调查，四十七县二市之人口，计七百二十劳，惟缺其他十七县之统计；民国二十年，该省民政厅估计全省人口九百十万，惟缺七县之统计；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向福建省政府之调查，全省为九百八十万，各县县数虽全，惟均系估计之约数；民元统计，福建人口，曾达一千五百八十余万，现有人口究有几何，殊属无法决断，兹姑采用民国十四年之邮政调查，其数或嫌过高，容待日后再行订正。

江西省系采用民国二十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制之各县数字，见《江西经济旬刊》一卷十七期，该刊并附二十二年各县编组保甲后之报告数，惟县数不全；江西一省，年来频经兵燹，现下人口，必较数年前为减少无疑，正确数字，亦待将来校正。

察绥人口报告，俱限于已设县治或设治局之区域，惟盟旗境内，尚有汉蒙人为数亦不少，兹据马鹤天君估计数，假定内蒙盟旗人口总数为三十五万。

外蒙人口，据外蒙政府民国十五年之统计为六十八万四千，另加唐努乌梁海之人口六万五千，合计为七十四万九千。

西藏人口几何，素鲜调查，西人估计，又往往以西康青海并计于西藏之内，故不足凭信。兹从少估计，假定今西藏境内人口为八十万，惟确数究有几何，亦待来日加以订正。

我国现有行政区划，除二十八省及蒙古西藏两地方以外，尚有南

京上海青岛西京北平五直辖市（其他普通市或实验县均隶属于省区以内又天津直辖市现正在改制中）及威海卫与东省两特别行政区；又广州湾九龙旅大金州各租借地，以及上海天津等租界，亦均为我国之疆土，惟地方行政权暂时因受条约束缚，略受限制而已，过去统计全国人口者，对此等地均放弃不计，实属非是，此次一并加入计算，惟较小之租界人口过少者，暂未列入，现所列入者，仅上海汉口天津三处。

根据此次统计，我国全国人口为四万五千八百万零。民国十七年，内政部统计全国人口计四万七千四百万，又陈长斯氏曾将十七年之内政部统计，加以修正，定其数为四万四千一百万；内政部之统计，有报告之省份仅十二省，其余均用估计，陈君对于缺乏统计之省份，利用宣统年间之统计为基础，依平均增殖率加以修正，实际亦难正确；此次统计，则除西藏全部，及西康青海一部，系用主观估计外，其余均据各省县之报告，堪称近年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至于此各省、县报告之中，一部亦仍由估计而来，因此仍难免有不尽不实之处，是则非待全国均有精密详尽之人口普查以后，不能得其实情矣。

三、人口分布

此次所搜集之人口统计，均以县区为单位，根据而作之人口图，计有二纸，一分布图，二密度图；分布图以每点代表二万人，此在人口稠密之区，其代表数尚嫌过少，因此多有互相重叠之处，惟在人口稀少之区，则代表数殊嫌过大，如在蒙古新疆西藏各地，绝少有二万人密集于一处者。

密度图计分八级，其最高级每方公里在四百人以上，惟实则第一级之区域，其人口密度，竟有在六百左右者，如长江三角洲之江喇叭口与成都平原各部均是，此等区域，即使除去一部份（分）之都市居

民，其人口密度，亦在五百左右，此可为纯粹稻作平原密度之代表，作者利用更精密之方法，研究江苏江宁之人口，发现秦淮河谷稻作区域，其每方公里之密度，亦在五百左右。

自第一级降至第二级，每方公里之人口数，相差颇远，河北平原与豫东鲁西之黄河冲积平原，其人口密度约在三百左右。此区与大江三角洲虽同系冲积平原，惟北方气候干燥，普遍作物，以旱粮为主，田亩产量不若南方之丰，因而生活于斯之人口，遂亦较南方稻作平原为稀；作者利用较精密之方法，研究江苏铜山县之人口密度，发现栽植旱粮之平原地带，其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亦在三百左右，与全部华北平原所得之结果相同；第二级之人口，亦有属于南方之稻作河谷者，如长江中游与四川盆地内各河流域均是。

第三级代表自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之密度，局部平原或兼有丘陵式之区域属之，最著者如长江沿岸、赣江沿岸、湘江沿岸、汉水沿岸、渭水沿岸、汾水沿岸、西江沿岸各地均属之。淮河流域，虽属于平原地形，然与黄河下游之情形殊不同，其地系侵蚀平原，而非冲积平原，土层浅而较瘠，又因淮水失治之故，时有泛滥之患，因而与北部平原虽同属于旱粮区域，然而人口密度，较之北方，颇见逊色，普遍在二百左右，其尤低者乃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之间。

第四级密度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之间，此在南方已属于丘陵地带，如两广之间、赣湘之间、浙皖之间、豫鄂之间，以及四川盆地内各丘陵地均是；惟在北方，则松辽平原之人口，亦适与此相当，松辽平原气候寒冷，月平均温度在冰点下者达五个月以上，冬季作物几已绝迹，田亩年仅一熟，因此人口殊稀，较之河北平原以南之冬麦区与江南之稻作区，其人口密度之相差，固不可以道里计矣；草原带之桑乾河流域，亦属春麦带，其密度与松辽平原同。

第五级之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在五十至一百之间，长江流域以南

诸山地均属之，东起浙江之天台西迄云南高原之东边，旧所称为南岭山脉各地均属之；其在北方，则有泰山山地、晋豫间之黄河河谷，以及黄河河口之含碱三角洲等地，其密度均属于第五级。

第六第七级之人口，每方公里在五十人以下，多限于较高之山地与高原，如云南、如贵州、如广西、如福建、如山西、如陕西、如秦岭山地、如大巴山地、如千山长白，以及热河察哈尔之南部均属之。

第八级之人口，每方公里在一人以下，其分布之区域，甚为辽阔，西藏高原连西康青海在内，蒙古高原以及新疆均属之。今试自黑龙江之谖琦，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此西北半壁以内，其人口密度，多半在一人以下，其在一人以上者，惟西藏之雅鲁藏布江流域、新疆西南部、天山南北、与蒙古库伦附近各地，大都散布于荒漠之间。甘肃宁夏为东南人口密集区向西特延之处，其最西点达于甘州肃州之间；河套之北，人口分布，约成一带状，自绥远西延，至于河套之西，继折南下，沿贺兰山之东南，以接于甘肃，河套以内，为鄂尔多斯沙地，人口绝少，河套以北，则为蒙古戈壁之南境矣。

今试以中国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图作一比较，则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所有人口稀少之西北半壁俱属于高原，如蒙古新疆多数为一千公尺以上之高原，其在一千公尺以下者，则多为极干燥之沙漠，西藏西康青海之高原，则其高度俱在三千公尺以上，其尤高者，在五千公尺以上；东南半壁则除云贵高原以外鲜有一千公尺以上

之高地，东南半壁雨量最富者，达二千公厘①，最少者亦在五百公厘以上，惟在西北半壁则雨量多在五百公厘以下，其尤干燥者，乃在二百五十公厘以下，盖多为沙漠或半沙漠之区域矣。

此东南西北两人口区域之分垒，与全国种族之分布，亦殊相合，东南半壁为纯粹汉人之世界，惟西南山地，有少数异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除“甘肃孔道”及新疆境内有少数汉人以外，其余均为满蒙回藏各族之领域。此区以内，面积虽广，人口则少，境内各地，盖大部为不毛之沙漠，与积雪之寒漠，仅极少数之水草地，可供畜牧或耕种之用。

东南半壁之人口，其分布亦殊不一致，人口集中之地，仅限于少数区域，兹约举之如下：

1. 长江三角洲与之江喇叭口　人口平均密度，介于四百至五百之间，两地人口总数，约计达二千五百万左右（江苏江南自镇江以下约一千二百万，江北沿江自江都以东约五百万，浙江杭州湾两岸约八百万），是为全国人口最密之区。

2. 北部平原　北起河北平原，南经鲁西豫东以迄江苏之徐属，安徽之颍属，其人口平均密度约在三百左右，全区人口总数，约计共七千万，是为全国人口最多之区。

3. 四川盆地　位于四川中部，其四周地形，俱在一千公尺以上，中部盆地，则俱在一千公尺以下。盆地以内，人口总数约四千万，各地密度，颇不一致，最密者如成都平原，每方公里达六百左右，与长江三角洲人口最密各县，不相上下，其次各河河谷附近，人口密度在三百左右；盆地内之丘陵地带，则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之间，此为内地各省人口最多之区。

① 公厘：旧时计量长度单位，现称“毫米”。

4. 东南沿海各河三角洲　北起浙江三门湾，南迄广东珠江口，其间地形西高东下，河流短促而陡峻，惟河口三角洲，有极肥沃之平原，虽其面积不广，惟人口极密，浙闽粤三省内地，人口密度大多在五十至一百之间，福建西部，竟有低达五十人以下者，惟诸河河口小三角洲，则其密度多在四百以上，惟皆另星散布，不相连续耳。

5. 局部河谷平原　如长江中流以及汉水湘水赣水之江西江渭河汾河各局部平原，其人口密度约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之间，长江中流有高达三百左右者，惟面积并不过广。

东南半壁除上述各地以外，人口俱极稀少，如东北之松辽平原与南方之丘陵地，其人口密度俱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之间，南岭各山地，人口多在五十至一百之间（此区如作更精密之研究，则当分别为河谷地带与纯粹山地，前者之人口应较后者为密），云南高原山陕黄土高原阴山南坡以及东北之嫩江平原与吉东山地等其密度更多在二十五人以下，是为东南半壁人口最稀之区。

读者试参阅本文所附人口密度图，则于我国人口分布不匀之情形，不难一目了然，可以不劳辞费矣。

四、结论

我国人口分布概况，以及各地密度大小，约如上述，兹为明了我国人口是否过剩起见，试与世界各地略作比较如下：

欧洲全境，其面积与我国略等，计一千一百四十万方公里，境内无大高原，亦无沙漠，其总人口五万一千万，全洲人口平均密度每方公里四十四人强；今我国全境面积一千一百十万方公里，总人口四万五千八百万，全国人口平均密度每方公里四十一人强，较欧洲仅少三人；我国如除去西北半壁之大高原、大沙漠，仅以东南半壁与欧洲相

较，则东南半壁之面积四百万方公里，人口四万四千万，平均密度一百十人，计高于欧洲平均密度数二倍又半。

美国面积计七百八十万方公里，约当我国总面积之四分之三，其人口总数仅一万二千四百万，平均密度每方公里十六人，我全国平均之人口密度，计大于美国二倍半，东南半壁之人口密度，计大于美国达七倍之多。

我国西北半壁之情形，约略与澳洲相当，澳洲虽无类似西藏之高原，然境内除北东南三面沿海各地外，内陆之气候，殊为干燥，年平均雨量多数在五百公厘以下，与我蒙古新疆之气候略同，澳洲面积七百七十万方公里，较我西北半壁约大十分之一，惟其人口总数不过六百五十万，仅当我西北半壁人口总数之三分之一。

论世界人口最密之区，通常多以比利时与英格兰为例，比利时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仅二百七十人，我国江苏江南其面积与比利时相当，然其人口密度竟达每方公里五百三十三人，较密于比利时几达一倍之多；英格兰与威尔士平均密度，每方公里亦仅二百六十六人，与比利时相仿佛，亦仅当我江南人口密度之半数；我江南各县，除上海无锡少数都市以外，居民固大都以农为业，彼比英两国，乃世界有名之矿工区域，由此足见我国深耕式之稻作区域，其人口密度，较之矿工商区之比英诸国为尤高矣。

以吾国人口稠密之江苏江南，与西欧人口最密之比英两国相较既若此，以吾国人口较稀之西北半壁与性质相当之澳洲相较又若彼。而或者犹谓吾国人口不如某国、某地之稠密者，吾决不信矣！

根据目前吾国人口分布之情形，在吾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居之可能，抑或吾国现有人口，是否尚有重行分配之必要，此为当今急待解答之问题；多数不明地理事实之言论家，往往以为我国东南人口虽密，然西北各省，地广人稀，大有移殖开发之可能，不知此乃似

是而实非也；今西北各地，其现有相当人口之区域，如渭河流域、如河套附近、如宁夏东南、如甘肃中部，以及新疆各地，均属局部之平原或盆地，面积异常狭小，又加气候干燥，仅赖高山之雪水，人工之河渠，以及极深之水井等，聊资灌溉，勉有生产，然即此现有少数之居民，又复灾害频仍，饥荒时见，其现有之生活，尚且难以维持，此虽人事容有未尽，抑亦天工必然之限，此等处所，将来虽欲利用人力，再加经营，然其所能容纳之居民，至多亦不过数百万乃至千万而已，与全国总人口相比拟，固十分渺小之数字也。

我国过去，因图学不精，地理缺乏科学的研究，因此一般国民只知我国疆域之大，绝少知其地形之为高为低，与雨量之为多为少者，至于某地生产能否开发，某处人口能否增加，更为一般人所茫然；依翁文灏先生之计算，我国全境，其适于人生之平原区域，高度在五百公尺以下者，只不过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十五，其在一千公尺以上之高地，竟占全国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八；依作者估计，吾国雨量不足五百公厘之区域，其面积亦约当全国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左右，易言之，即与上文所称西北半壁之范围约相当；此高原而又干燥之西北半壁，决不能开发之使与东南半壁同其繁盛，再退一步言，即在此东南半壁之范围以内，其介于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间之丘陵山地，已足使其人口密度，降至极低限度，读者如批阅我国地形图，同时参照人口图，而承认惟二百公尺以下之平原地面，是为最适人居之处（少数内陆盆地除外），即不能不叹我国平原面积之过于缺少，且此等平原，多数已为人口密集之区，除此以外；欲求再有容纳大量移民之所，殊属不可多见也。

今试就国境以内，加以检讨，其犹有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雨量相当充分，而人口亦比较稀少者，殆惟满洲北部嫩江流域一带之地，此区现有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尚在二十五人以下，将来如开发之使与

辽河流域相当，至少尚可容纳居民一二千万，是为国内惟一可供移民之区；惜自暴日人侵以后，继有伪满之独立，其地处于他人治下者，迄今已三四年，强邻侵略，日进不已，白山黑水，不知何日方能重返故国，以供我华夏民族之移殖经营矣。

关于中国人口地图的说明：

一、1935年，本文发表时，附有四幅依据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疆界绘制的地图，具体为：

1.《中国人口分布图》（胡焕庸绘制）。图中以每一点代表两万人。

2.《中国人口密度图》（胡焕庸绘制）。该图将人口密度分为八个等级，每级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少于1人至400人以上不等。该图采用彩色印刷，以不同颜色区块展示各等级的人口密度分布。

3.《中国地形图》（申报馆民国新图）。

4.《中国雨量图》（根据竺可桢原图补充与修改）。

上述四图说明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人口分布”和“附注”。

原图检索指南：（1）查阅《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2）关注编者在公众号或他处发表的介绍胡焕庸线的相关文章。

二、1983年，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求，时任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胡焕庸，率领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的教师团队着手搜集相关数据，并且与同事伍理研究员合作，手工绘制了1986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这二图由中华地图学社组织了成果鉴定，1989年3月由地图出版社出版，ISBN：7-5031-0351-5/17。（编者）

名词解释

爱辉一腾冲线*

胡焕庸

胡焕庸教授在人口学上提出“爱辉一腾冲”这一概念之后，询问者甚多，本报特请胡先生作一简释。

——《文汇报》

全国人口分布的格局，明确地显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巨大差别。东北从黑龙江省的谖理（今爱瑾），向西南到云南省的腾冲画一条直线，根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在这条线的西北约有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但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在这条线的东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却居住着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

根据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位于这条线东南的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九；位于这条线西北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面积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一。经过五十年，东西人口的差别没有大的改变。东西两部分人口分布，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原因很多。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面积，

* 原载于《文汇报》1985年3月22日。

海拔都在三千至四千米以上，夏季都会发生霜冻。西北的蒙新等地区，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地处内陆，四周更有高山环绕，气候干燥，年降水量都在一百至三百毫米以下；广大的沙漠与戈壁，甚至终年不降滴雨。这些地区，从来都是少数民族所居住，交通困难，经济不发达，大多地区尚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就现在所知，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煤、石油、金属矿藏以及水力资源，都占全国重要位置。开发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4]

附

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

丁金宏　程晨　张伟佳　田阳

“胡焕庸线”，即“瑷辉一腾冲线”，是1935年胡焕庸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的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如今，该线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广泛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然而，关于这条线的产生背景、命名过程、功能属性、科学基础、学术衍生的适应领域以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能否突破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困惑与争论。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做概要梳理，并尝试作出一些学术回应，以求证于同行学者。

一、胡焕庸线的发现与命名

20世纪初期，国祚困厄，人心思治，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胡焕庸是中国人口地理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重要里程碑。

* 原载于《地理学报》第76卷第6期，2021年。

(一)中国人口地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中国笼罩在甲午败绩和庚子赔款的沮丧阴影中，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统治阶层都在寻找强国救民之路，除了反思制度之痼疾和文化之沉痛，宿命论者更将目光聚焦于国情之种种缺陷，当时庞大的人口数量难免成为"冤头债主"，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由是在中国表现出天然而强大的说服力。1904 年 5 月《警钟日报》刊文历数史实，将国家的治与乱直接对应到人口的寡与众。1907 年《申报》刊发了声调相类的《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对中国人口增长带来的国运危艰深为忧虑。吴景超按人口密度与职业分化的关系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中国属于最低一级的人口密集、农业主导的"第四种国家"，国民艰难挣扎在温饱与冻馁边缘，"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庞大人口数量……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董时进从耕地与人口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人多地少的本质，大声疾呼推行政府主导的节制生育。

有的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移植到人烟稀少的西北边区，以解决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08 年《东方杂志》发表影蓉的文章《徙民实边私议》，认为西北内陆地广人稀，可以从东部"募豪俊、来商旅、遣罪囚，……酌盈剂虚、裒多益寡"。"九一八事变"致东北失陷后，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咨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之策，其中备受重视者乃由柳民均起草，褚民谊、蔡元培等提议于国民大会的《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后张人鉴、马鹤天、安汉等积极倡导西北垦殖计划，兴办《开发西北》等杂志，一时间议论热火朝天，方案层出不穷。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却很少，多方呈请拟设之"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未能获准，除了战事频仍、国力不济等政治经济原因，还有来自翁文灏等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人地关系思维是这类意见的重要

依据，并由此酝酿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学。

中国人口地理的发端除了因应人口国情认知、移民实边计划等现实需求，还得力于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及其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展的不同来源人口数据的归集和甄别，1922 年该会出版的《中华归主》编制了一张覆盖东部和中部的中国人口分布图以及十四张分省人口分布图，为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并指出当年江苏省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 875 人（约合 338 人 / 平方千米），已超过比利时而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理单元，诚发人深省，为后续研究者所津津乐道。

1. 中国人口地理学初创

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热衷于对中国地理问题的研究，他于 1925 年在美国《地理评论》上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是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之作。作者在勾画中国自然地理区域的基础上，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资料及地图圈画出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浙闽沿海和江汉平原六个人口集聚区域，并分述了各自的人口经济特质，比如华北平原是人口过载的典型，长三角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向上海、无锡等工业中心转移。就于人口分布的政治意义而言，虽然中国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多样性，但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书面语言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是中国区域地理学的奠基者，他在沪江大学任职期间遍游列省，深入考察地文人文，编撰了 8力口优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讲义，并于 1934 年在美国出版，该书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农作物品种和熟制等将中国划分成十五个地理区域，对每个区域的人口、耕地、农产等要素进行了统计和估算，分析人口压力，比对区域差异，不失为人地关系探索之典范。该书 20 世纪 40 年代被拆译为《中国的地理基础》和《中国区域地理》，为中国人口地

理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

竺可桢鉴于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可靠性的地方差异，选择官方统计比较可靠的江浙两省，以县为单位制作高分辨率的人口分布地图，据以展开人口地理分析，并与欧洲的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比，指出了这一地区人口密度在世界范围的绝对领先性。竺可桢认为江浙两省虽有一些城邑，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能供养相当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所承担的人口压力可想而，其他地区经济条件远逊江浙，中国人地关系矛盾之尖锐可谓举世无匹。竺可桢特别强调人口地理分析中空间尺度的可比性和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警惕不论尺度、不论条件的盲目比对，为人口地理分析提出了一种学科规范，胡焕庸评价竺文“实立我国人口地理研究之始基”。

翁文灏检视了中国大地上可以而且已经容纳了较高密度人口的地区，并将其人口密度与地形、水系、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做了关联分析，刻画了中国人口地理之梗概。翁文灏在画出东部地区四个人口聚集区（白河黄河淮河平原、扬子江中下游平原、以上平原附近的丘陵地、浙闽粤三省为主的东南沿海区）的基础上，设想从北平至广西钦州画一条直线将上述四个区域包括在这条线的东部，开启了中国人口地理线性分界的传统，对胡焕庸后来拟画“暖瑶一腾冲线”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翁文灏也发现这条线并不完善，四川盆地显然是此线以西人口密度较高的例外。笔者认为，北平一钦州线的走向接近于新华夏构造系，更多反映了地形而相对忽略了气候因素的影响，且将河北、河南等比较完整一致的人口大省一分为二，对人地关系格局刻画的精准度是不够的。翁文灏对当时热议的西北开发和移民计划并不赞同，认为西北地区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因交通闭塞不利于工矿业发展，农业又受干旱、高山、荒漠、黄土等不利因素的严厉限制，接纳移民的容量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东北松辽平原无论是自然条件还

是可耕地面积都显著优于西北，是最具条件和容量的移民目的地。

罗士培、竺可桢和翁文徽完成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作为综合的地理学家，他们的后期研究重心并不落在人口地理领域，人口地理的接力棒历史性地传到了年轻的胡焕庸手中。

2.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

1934 年起胡焕庸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并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1935 年发表的《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皖中稻米区、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并以之解释人口分布。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焕庸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国人口及其分布研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民初以来中国人口的统计数据有四个主要版本，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整理的 1918-1919 年份省人口数据，1925 年邮政局调查统计的分县人口数据，1928 年内政部调查的各省市人口数据，1935 年内政部汇编的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1931—1934 年）的各省分县人口数据，每个版本都有省区缺漏，一省之内也常有县市数据缺失。胡焕庸尽量采用 1935 年内政部汇编的最新数据，除了沿用县级统计俱全的浙江、山西等六个省的数据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江苏、安徽等十七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工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人口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 1925 年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西藏地方的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蒙古地方的人口数据来自外蒙古的官方报告，此外还用了一些来自《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焕庸实现了

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不无自豪地宣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1939 年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特请胡焕庸编制了“重要城市及人口分布图”。今天我们重读论文、地图、所附数据及说明，仍然能感受到当年搜集处理数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胡焕庸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前者以每点代表两万人，后者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八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胡焕庸将人口密度等级与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区，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其下为丘陵、山地、高原等，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

3. 胡焕庸线的发现及其命名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焕庸敏感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谖辉一腾冲线”。这条“谖琦一腾冲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胡焕庸计算了“谖瑶一腾冲线”两侧的人口、土地及人口密度，但他并没有在文章附图上画出这条线，这多少有点让今天的读者感到意外。1989 年胡焕庸、伍理用 1982 年人口普查和 1985 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谖辉—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从篇幅上看，“谖辉一腾冲线”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但后来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

1956 年以地名用字生僻故，瓒辉县改为爱辉县，1980 年析县城及周边地区成立黑河市，故一度称此线为“黑河一腾冲线”；1993 年黑河市升格为地级市，所辖爱辉县改为爱辉区，2015 年爱辉区政府驻

地爱辉镇恢复瑷停旧名，“瑷辉—腾冲线”亦复归原名。1984 年 7 月，美籍华人人口学家田心源（H. Yuan Tien）教授来上海拜访胡焕庸时，认为“暖辉—腾冲线”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意味着此线诞生近 50 年后才被赋以发现者之名。不过以人命名在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颇不常见，据我们的搜索直到 1986 年胡焕庸线才见诸研究文献。

二、胡焕庸线稳定性的验证及解释

胡焕庸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及“瑷理—腾冲线”的发现逐渐引发中外学者的关注。据胡焕庸回忆，1945 年底赴美国考察时就发现他的论文“被美国地理学会全文翻译印出，随同他们发行的《地理学评论》分送各方”。1948 年美国学者 A加xander 在 AAAG 发表论文《战前中国人口：分布与密度》，系统介绍胡焕庸对中国人口分布所作的开创性研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的研究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地理学者孙敬之一度在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口过剩的言论主调之下，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角度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到了“暖辉—腾冲线”及其人口地理意义。1973 年田心源在他的关于“中国人口论争”的著作中提及胡焕庸 1949 年之前编制的人口地图，并视〞媛辉—腾冲线”为人所熟知的中国人口特征之一。

1953 年、1964 年中国开展过两次人口普查，然而并没有学者据此分析人口分布或验证胡焕庸线，原因是人口问题在当时属于学术禁区，加之县级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公开，人口地理研究缺乏可靠资料。尽管如此，在 1957—1958 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出台引发的短暂学术论争中，胡焕庸适时开展了江苏、福建等地方的人口地理研究，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反右

运动以及“文革”期间，研究室和胡焕庸本人的学术研究陷入中断。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及胡焕庸线的验证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1990 年胡焕庸本人用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核算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 96% 略减到 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 4% 上升到 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段成荣计算了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切分的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W 1933-1990 年东西部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 L8%。2015 年是胡焕庸线发现 80 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中国地理学会、中国人口学会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纪念胡焕庸线发现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丁金宏等学者运用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胡焕庸线稳定性，由于分辨精度的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西部人口的比重在 5.6%~6.3% 之间，比 1990 年略有上升，充分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或“顽健性”。

对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解释，学界有基本共识也存在认识差异。胡焕庸在阐释“谖辉一腾冲线”和中国人口地理分布格局时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特别是雨量，西北半壁多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或降雨量 500mm 以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而东南半壁则除了云贵高原等地之外，多为低山、丘陵和平原且雨量丰富。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西方的重农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学者中深入人心，胡焕庸的这一解释可谓得其旨趣。1990 年胡焕庸再次分析中国人口地理格局时将社会历史条件增作第三项解释因子，说明他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已经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向历史唯物主义拓展。

近年来学界对胡焕庸线稳定性的探讨应用了更多的统计数据和计量方法。通常认为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较为吻合，唯后者倾角大于 45 度达至 60 度左右；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

400mm 等降雨量线较为贴近，唯后者倾角小于 45 度，在 30 度左右，地形台阶线与 400mm 等降雨量线的混合平均位置方与胡焕庸线基本一致，说明关于地形及气候条件的显著作用是宏观准确的，也是综合叠加的。有的学者发现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王铮等进一步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即陆地生态系统原始生产力的分界线。葛剑雄认为胡焕庸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型的，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是历史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甚至永恒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更多的探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服务业成为继农业之后对人口分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东南沿海地区地势低平，水源充足，工业和城市发展条件好，交通网络密集，对外开放的途径也比西北部更为便捷，为沿海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西北地区则相形见绌，非农产业对人口的承载力也逊于东南地区。张锦宗等认为耕地资源对中国人口分布的贡献率从 1952 年的 87.8% 下降到 2013 年的 41.2%，意味着非农业经济的影响力显著上升。

社会文化及生态因素也逐渐被加入胡焕庸线及其稳定性的解释体系。高向东等验证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胡焕庸线的关系，不过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在胡焕庸线两端的云南和黑龙江二省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胡焕庸线的稳定性还表现在中国生态地理空间格局上，王铮等通过中国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地理模拟，发现胡焕庸线及其平行地带是生态脆弱带、地震多发带和水旱灾害过渡带。王静爱等分析了 18 世纪以来中国水灾的地理分布，发现胡焕庸线及其平行线构成的水旱灾害等级阶梯。郑小波、千家乐等通过遥感图片分析发现气溶胶浓度

及其成因的地域差异性也与胡焕庸线存在相关性，胡焕庸线附近是气溶胶的低浓度带。林允琦等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生态足迹空间递变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东南侧生态足迹赤字较低而西北侧为严重赤字，这与胡焕庸当年对西北地区人口容纳能力低的判断是一致的。张金萍等将经济发展的低碳模式进行分区分类分析，发现胡焕庸线沿线及其西北区域属于高碳发展区，揭示了胡焕庸线的生态分界意义。钟茂初将胡焕庸线界定为生态脆弱线，并按距胡焕庸线远近核算人口承载力，推演宗同地带的生态赤字，我们认为他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先验性。

三、对胡焕庸线的引申研究

因为胡焕庸线依托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基础，因此许多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现象都会与胡焕庸线产生或多或少的相关性，由此导致了纷繁复杂的引申探索。

（一）关于城镇化和流动人口格局与胡焕庸线的关系

陈明星等认为中国的城市群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马力阳等认为胡焕庸线区分了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宏观地域差异性，东南地区不仅城市化领先，农村发展水平也明显高于西部。白永平等发现中国人口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整体成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基本一致。李鹏飞等验证了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空间表现，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负相关，西北侧为正相关。关兴良等认为劳动力、技术、商品等要素流动对中国人口的空间流动和城镇化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导致胡焕庸线两侧城镇集聚程度的差异加大。尹德挺等认为胡焕庸线东侧重要城市群和核心城市的吸附力进一步增强，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人口协调性上升，人口吸引力在增强。

（二）胡焕庸线的广义引申

胡焕庸线是关于人口分布的界线，由它延伸到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等方面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将胡焕庸线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有些逻辑关系是清楚的，有些是有待于验证的，也有一些是近乎猎奇的过度引申。2014 年媒体曾发布中国 QQ 在线用户的空间分布大数据地图，发现其密度差异性一如胡焕庸线划定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反映了虚拟空间的人地关系与现实空间的对应性。曾毅认为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家庭规模演变的一条分界线，两侧家庭都在小型化过程中，但是西北部家庭规模收缩更快，其中隐含的社会地理意义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谢荻帆等模拟了中国各地失业率与胡焕庸线的关系，发现东南半壁生产总值与失业率成反比，西北半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失业率成反比，笔者认为把经济活动及失业率这样的快变量与胡焕庸线、人口分布等常量、慢变量直接关联起来，结论未必可靠。樊宝敏考察了中国森林资源的分布与胡焕庸线的相关性，认为东南半壁的森林和湿地对于西北半壁的降水具有重要作用。夏海斌等运用 GIS 方法发现胡焕庸线是中国县级区域交通便利性差异的重要界线。

盛磊分析了胡焕庸线两侧铁路、公路密度及财政能力的差异性，用以指导交通投融资模式选择。阮文奇等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发现胡焕庸线对中国入境旅游空间的分界意义，东南多热点，西北多冷点。李莉等以城市人口、经济规模及城市间距为要素构建了旅游流潜力模型，发现胡焕庸线对客源市场的区域类属有明确的区分作用。赵彪分析了 1954 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面积分布的演化，认为胡焕庸线以东行政区划的破碎度要高于以西地区；钱妡等研究了中国各省的官民比分布，发现胡焕庸线西北地区的官民比显著高于东南地区，这

两项研究都反映了人口密度与管理效率的关系以及胡焕庸线在其中的标志性意义。林钧跃研究了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与胡焕庸线的关系，认为胡焕庸线以东是商业信用高投放区域，以西是低投放区域，至于其中的逻辑机制并没有阐释清楚。丁剑等在电网脆弱性研究中借鉴了胡焕庸线研究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论机制，提出了基于二维平面拟合的电网脆弱性分析方法，这可以说是胡焕庸线意料之外的一种应用。任孝鹏等将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区域差异纳入到胡焕庸线、长城线和秦岭—淮河线的三线格局下进行分析，认为胡焕庸线以西的游牧地区集体主义最低，胡焕庸线以东由北向南集体主义依次提高，这是环境与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研究尝试，是否有环境决定论之嫌有待进一步探讨。

四、胡焕庸线的修正与变通

胡焕庸线虽然反映了中国人口密度的突变，但是也不是像刀切一样整齐，而是一个过渡地带，因此有些学者尝试对线的位置进行修改，也有的学者出于统计方便，将直线变通为行政区域边界连成的曲线。孙敬之提出了漠河—腾冲线，把胡焕庸线的东北端点从暖瑶向西北方向移动近 500km，并没有说明这样调整的必要性，推测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是漠河—腾冲线将国土面积分为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孙敬之指称两侧人口之比约为 90∶10；其二漠河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个县，视觉上更具有顶点意义。但是这样的修改对胡焕庸线的性质和位置影响甚微，从学术史意义上说，胡焕庸提出“暖辉—腾冲线”时，外蒙古还在版图，漠河的顶点意义及“漠河—腾冲线”的国土均分意义皆不成立，即以尊重历史而论，这样的调整似无必要，况且端点西移而西北侧的人口比重反而升至 10%，甚为粗疏可疑。周启昌采用了“漠河—

腾冲线”的提法，据他核算，东南与西北两部分的国土面积比约为48:52，人口比约为95:5，再一次说明这样的调整与“暖辉一腾冲线”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其后再无人提及和应用“漠河一腾冲线”。

尹文耀等提出了按省界拟合的″准胡焕庸线”，线的西北侧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六个省区，其他省份都属于东南半壁，东南与西北两侧的土地面积比为44.7：55.3，人口比为93：7，从方便研究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变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具备更高分辨率的数据和地图分析工具的今天，精确按照胡焕庸线研究人口分布问题变得越来越可行。黄贤金等针对东南地区人口密度的内在差异提出了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再作平行的“胡焕庸亚线”，展示东南地区人口分布的阶梯结构，可以说是对胡焕庸线的一种衍生。戚伟等基于胡焕庸线思想，提出青藏高原上的“祁吉线”，认为青藏高原人口空间分布也具有“东南密、西北疏”的特征。

五、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探讨

胡焕庸线的学术影响超越了人口地理学，它是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界线，线的两侧不仅人口密度差异巨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也差异悬殊，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深刻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2012年9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特别关注了胡焕庸线：“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有56个民族，如果都在这条线东南方发展，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2013

年 8 月，李克强总理在“新型城镇化”座谈会上以探讨的口气追问，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被喻为“总理三问”，足见他对此问题的关心之深切。2014 年 11 月 27 日，李克强总理在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第三次公开关注了胡焕庸线：“我国 94% 的人口居住在东部 43% 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2015 年 11 月1李克强总理在政协常委会作报告时第四次讲到破解胡焕庸线问题，表达了对突破胡焕庸线的期待。

作为大国总理，对一个本属于学术领域的话题反复发问，足以说明胡焕庸线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梳理一下总理三问：第一问“应不应该打破”，是个价值判断问题，显然在总理的心目中是应该打破的。第二问“能不能打破”，是科学依据问题，总理是小心寻问，希望答案能够打破，但也并不主观强求，拜托学者来回答。第三问“怎么破”，是方法路径问题，是在第二问成立前提下的追问，希望学者能找到破解之策。对于“总理三问”，人口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许多学者也随即参与了讨论，也有一些专文探讨。

对于总理之问，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的回答是不太一致的，地理学家分析区域发展问题时比较注重地方的资源环境条件、区域位置与交通可达性，而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通常倾向于保守，遵循地理条件论甚至是地理决定论。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者把发展视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投入的结果，在他们构建的生产函数中看不到具体地区的资源丰瘠、地形起伏、气候冷热、水量枯润、运距远近等地理条件因子，他们重视技术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超越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可以找到替代资源……总之，经济学家更像是技术决定论者、市场决定论者，因而往往是乐观主义者。具体到

胡焕庸线上，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胡焕庸线是该破的、可破的，而地理学家则多数比较保守地认为胡焕庸线作为地理条件和地理规律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殷德生认为突破胡焕庸线第一要借力于西部更高效率的城镇化，集中发展城市群；第二要借力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打造西部“出海口”。孟广文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对人类发展的限制在减弱，西北地区有可能在局部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给西北部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条件。罗国芬认为胡焕庸线如何打破的问题可能是个伪命题，更需要关注国内移民的可行方向。董晓峰提炼了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和优势条件，认为加快教育发展、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保护生态环境是改善西部发展条件的重要举措，在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领域的创新发展有可能成为西部开发的新动能。王铮认为信息化是打破胡焕庸线实现西部超前发展的一种可能途径。杜宏茹从新疆的绿洲城市发展经验出发，认为胡焕庸线稳定性将长期存在，但西北半壁的人口和产业在城镇化的驱动下，分布特征由“相对分散”逐步转化为向绿洲地区的“向心集聚”，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与东南半壁的差距将日益减小。刘盛和认为，胡焕庸线所依托的地形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主要影响农业生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这种影响力逐渐弱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西北半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了可能。李培林认为，突破胡焕庸线的关键途径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发展和投入的重心从沿海大城市地区转向城市郊区、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陆大道认为突破胡焕庸线在经济学上是十分有价值的，胡焕庸线稳定性虽然有充分的自然地理基础，但是如果加强西北地区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投人，提升人力资本，那么东西部的差异格局也是可以不断

得以改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种途径，只不过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原华荣认为胡焕庸线是人地关系决定论的明证，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有坚实的自然地理基础，只有当气候等自然条件发生显著变化，胡焕庸线才有可能随之变化或者被突破。封志明认为胡焕庸线是一种国家尺度的高度地理综合，它定义了中国人居环境的适宜性和限制性，胡焕庸线近侧是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适宜地区集中在东南半壁，不适宜地区主要在西北。曾刚认为胡焕庸线的科学性必须得到尊重，依靠重大地理工程改变人口分布格局是有风险的，但西北地区可以选择条件适宜的局部区域集聚人口。方创琳认为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差异格局不可逆转，东部发展是网络状的，西部开发是点状的，突破胡焕庸线是不大现实的。贾绍凤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出现足以反转东西部发展条件的技术革命，不要指望西北地区迁人大批人口，西北地区可以倡导集中城市化，但胡焕庸线不可能打破，也无须打破。方一平认为，城镇化是改变人口地理格局极为重要的驱动力，但西北地区城镇建设的潜在生态风险不容忽视，显著改变胡焕庸线大格局的人口图景恐难显现。突破胡焕庸线重在“质”，不在“量”，不是两侧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的破局，而是两侧发展水平、共享福利的相对均衡和缩差。邓祥征认为实现胡焕庸线突破是可能的，也是复杂的，实施产业政策引导、实现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和重组是突破胡焕庸线的先决条件。张华认为突破胡焕庸线并非不可能，但是会有较高的代价，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北地区集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同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促进西北发展的有效途径。马海涛认为西部地区应该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以牧兴商、以林兴业，同时注重文化产业和科教研究服务业，以产业结构进化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陈明星认为，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是客观规律，既没必要打破，更不能人为打破；但是总理之

问还是有解的，这个“解”并不是打破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悬殊差异，而是推进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让西部地区分享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吴瑞君等指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基本稳定，但人口非均衡分布变化呈现新特点：按东、中、西部三分法表现为“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按胡焕庸线两分法，却表现为“涓涓细水向西流”，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国人口净迁出不对称的“分水岭”。张梅等认为虽然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差异巨大，但西侧扩张速度明显快于东侧，胡焕庸线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尹德挺等认为单纯从人口空间分布上打破胡焕庸线这一规律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胡焕庸线两侧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胡焕庸线东侧的城市可以进一步探索“紧凑型城市”连片发展模式，而其西侧的城市则因自然环境等硬约束，应以点状聚集的发展模式为宜。

“总理三问”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东西部发展水平、发展能力和发展机遇悬殊差异的焦虑以及对缩小差距、促进均衡的追求。学术界当前针对“总理三问”的研究观点纷呈，但是似乎没有形成统一共识，有的学者重视地理环境的制约，按传统推理否定突破胡焕庸线的可能性；有的学者乐观期待技术进步，积极回应总理关切，认为胡焕庸线可以打破。总之关于“总理三问”的研究既要服从国家发展利益，也要遵从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从学术上作更深人的“小心求证”。

六、英文文献中的胡焕庸线

在 Alexander 和田心源早期关注之后，西方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很少提及胡焕庸线，近年随着西方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人口地理问题，研究和应用胡焕庸线的西文文献才陆续出现，且主要作者多为国内学

者。Xu 等运用中国地级区域人口数据核算了人口分布，向西方介绍中国人口地理的最新态势和胡焕庸线的稳定性。Yang 等在沙特的刊物上介绍 1950 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胡焕庸线的分界意义。Liu、Zhou 等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发现胡焕庸线沿线一带是贫困人口相对集聚地带。Gu 等以耕地密度分异为例研究中国地理本体的空间格局，证实了胡焕庸线与农牧交错地带的关联性。Li 等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异，发现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基尼系数比东部更大。Liu 等研究了地理标记农产品的分布密度，发现胡焕庸线是这一密度的明显分界线，东南部高于西北部。Jin 等研究了胡焕庸线对中国农业土地集约化程度地理差异的标记意义，东南地区集约化程度高于西北地区。Hu 等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地区城市发展与转型的特征及其内在差异性。Pan 等研究了中国不同地区电力消耗水平，发现胡焕庸线两边的差异显著。

关于胡焕庸线与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也是受到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Chen 等研究气候变化与胡焕庸线的关系，预测了胡焕庸线以西未来水灾的频率可能会提升。Wang 介绍了胡焕庸线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及当代中国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意义。Li 等研究了中国水环境污染中的 COD 分布，胡焕庸线两侧的高低分异十分明显。Huang 等研究了中国大气污染物 PM2.5 浓度的地理分布，胡焕庸线东南部的浓度要高于西北部，并且内部存在南北向差异，尤其以华北平原浓度为高。Su 等研究中国城市污水中抗生素含量的分布，发现胡焕庸线成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甚至在纯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也有学者参考胡焕庸线分析中国的生态格局，Ge 等在研究社鼠的进化扩散时发现其时空进程以胡焕庸线为分界，Tang 等研究了燕山地区放线菌群的环境控制问题，发现胡焕庸线在这样的中尺度区域也具有明确的分界意义，笔者对胡焕庸线是否具有超越人类的跨种群意义颇有疑问。

七、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国家地理分界是指较大规模国家的国内顶级区域分界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顶级地理区域有多种习惯分法，比如以长江或秦岭—淮河线划分的南方与北方，以长城线划分的塞内与塞外，以南北向联合省界划分的沿海与内地或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地形落差轮廓划分的高、中、低三大台阶等。

胡焕庸线形式上发端于人口密度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诸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于人类活动之下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综合而论，胡焕庸线东南地区自然条件的共性特征是地势低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生长期长，由此决定了农业的高产高效，对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起了很强的支撑作用，加之公路、铁路、水路运输条件优越，与国际市场的连接便利，形成了数量众多、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中心，凡此种种决定了东南地区的人口高密度。胡焕庸线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态本底、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及工商城市等与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总之，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

八、讨论与结论

（一）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缘起于近代人地关系的尖锐矛盾

纵观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明代以前大致属于人口从黄河流域

向东向南扩散的“殖民时期”，人口和耕地都是具有足够增长空间的“变量”，南宋至金元完成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人口南向扩散，进入明季东南沿海可以供养人口的土地资源已基本开发完毕，这意味着耕地由“变量”转化为“常量”，但人口还在缓慢上升，人地关系渐趋紧张。清代人口增长骤然加速，从清初的亿人左右增长到清末民初的四亿多人，被称为清代“人口奇迹”，人口“变量”与耕地“常量”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关注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从罗士培、竺可桢、翁文灏到胡焕庸，都把土地、农产与人口紧密关联起来，并把地形、气候作为人地关系的解释前提，对“地大物博人稠”的国情深表忧虑，反对脱离地理条件盲目推动西北开发和移民。

（二）胡焕庸线是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它的稳定性潜藏于人类生存基本的食物需求与就业逻辑

胡焕庸线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相并列的国家地理分界，它稳定存在的科学依据是潜在的食物与就业两大逻辑。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资源，在长期的农业社会尤其如此，食物主要来源于耕地，耕地产量又取决于自然条件，于是地、粟、人三者构成了如影随形的整体，食物成为关键的中间变量，即人地关系的逻辑枢纽。耕地是面状的、连续的，所以食物需求决定了人口分布的面状差异。现代社会食物虽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但是大规模、远距离、长时期的食物运输是不经济的，所以食物的生产能力依然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食物特别是粮食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地形和气候，地形是常量，气候是变量。食物逻辑意义上的人口分布是否变化主要取决于气候，气候不变，人口分布的格局也不会改变，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

工业文明的肇兴改变了人们对耕地的单纯依赖，缩短人际距离以

降低合作成本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手段，企业的规模经济、城市的外部经济无不促成就业机会的空间集聚，人们为了追求就业和发展机会不断向区域中心点上汇集，城、业、人形成了工业文明时代人口集聚分布的新逻辑。就业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关键中间变量，即人城关系的逻辑枢纽。城市是区位指向的点状要素，就业逻辑导致人口的点状集聚，而由于交通线路对城市区位有导引作用，就业逻辑会产生线状或者网络状的人口密集地带；这种点、线、网络并不破坏宏观的食物逻辑，因为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是城市发展青睐的区位，这正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的人地关系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胡焕庸线的突破应以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

胡焕庸著文时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人口只有 4.58 亿人，当时的地理学家已对中国遍地都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惊讶不已，2019 年中国人口已突破 14 亿人，90 年间又增长了两倍，而耕地面积仅增加 56%，凭着农药、化肥、品种等技术和国际市场我们解决了食物供给问题，但基本上是一种紧平衡，生态环境的压力也非常巨大，北方的缺水形势十分严峻。遵循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就必须设法缓解人地关系矛盾，当前中国已处于人口低增长状态，不久还会进入负增长阶段，虽然这会激化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人口总量减少对人地关系矛盾的缓解具有根本性的积极意义，是老一代人口学家所期待的，也是当今重视人地关系的学者所欢迎的。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这正是中央政府希望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因。胡焕庸线突破应该以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特别是加强对交通、教育以及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

投资环境，保障基本民生，消除绝对贫困，唯其如此才能让西部有更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因此，无论是从公平发展的社会伦理还是从帮助贫困的感情寄托的角度，都应该实施向西部倾斜的积极政策；如果听凭市场的安排，消极等待东南地区的机会溢出，那将是相当长周期、大尺度的经济循环，西北地区是等不起甚至是等不到的。胡焕庸线的突破，不能紧盯着人口数量的比重，对西北地区而言，增加人口和密度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目前占全国次口 6% 未必嫌少，顺其自然多点少点都没问题，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让生态稳定向好。

（四）胡焕庸线的学术衍生和应用研究应该围绕人地关系属性展开，避免对胡焕庸线进行过度引申和“学术消费”

胡焕庸线的本质是人地关系，在人与地两个维度上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近年日见繁盛的对胡焕庸线的引申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当下的研究可以多思考胡焕庸线与人口均衡发展的关系，西北地区如何增加发展机会、增进社会福利，胡焕庸线在后工业社会、大数据时代的新表现等人地关系新命题，让胡焕庸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情认知与国家建设事业。我们注意到有少量关于胡焕庸线的引申研究和应用属于穿凿附会的形式命题，是对胡焕庸线概念的一种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丁金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人口研究所前所长，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

Chapter 02

第一章

胡焕庸谈人口地理

《人地学原理》胡序*

胡焕庸

十九世纪为欧洲地学复兴时期，自洪波德（A. de Humboldt）、李戴尔（Karl Ritter）、雷次儿（F. Ratzel）先后辈出，德国遂为世界新地学之中心，各国均取材于此。法国自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以来，始建立“法国学派”，为世界地学家所推重。惟德国学者如雷次儿，著作等身，其所著《人类地理》《政治地理》，至今犹脍炙人口。白兰士仅草《法国地志》（为拉维司E. Lovisse主撰《法国史》首卷）一册。逝世后，始由其婿马东男（Emm. de Martoune）集其遗著，编为《人生地理学》（*Princ Jes* de Geographic Humaine）一册。著作分量，远不及雷次儿。惟白兰士之贡献，发于书面者少，见于教育者多。氏在巴黎大学及高等师范掌教多年，其弟子散布于全法大学，继承师说，发扬光大。前法国学院（College de France）人生地理学教授约翰·白吕纳（Jean Brunhes）其尤著者也。

白吕纳初受白兰士之教于巴黎高等师范。一九〇二年，提出博士论文于巴黎大学，题为《西班牙及北非洲之灌溉》，由自然状况气候

---

* 《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maine）为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J. Brunhes）1910年所著，中译本由李旭旦、任美锷合译，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出版。本文系胡焕庸为中译本所作序言。

干燥，研究及于灌溉组织，及灌溉对于政治社会经济所生之影响，详细阐明人地关系。我国历代讲地理者，多半注重水利。诚以我国以农立国，沟浊之利，自古重视，将来新地理复兴，水利地理将仍占重要部分，可无疑义。

一九一O年，白吕纳草《人地学原理》，法国学派露头角于世界者自此始。其书以房屋、道路、耕种、畜牧、伐林、采矿六目，分述人地关系之原理。更助以方志事实，用简单社会整个生活情形，叙述自然人事相互之影响。不久即由勒孔德译成英文，一九二五年原书发行第三版，内容略有修改之处。

一九二O年，发表《法国人生地理》（Geographic de Humaine de /a France）第一册，一九二一年，与万洛（C. Vallaux）合著《历史地理》(La Geographie de I'Histoire)。一九二六年，发表《法国人生地理》第二册。

其《历史地理》内容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社会地理四部，据白吕纳之意，历史地理与人生地理同属于广义的人生地理；广义的人生地理乃对自然地理而言。自然地理专研究地面自然现象之分布，如地形气候河海生物，不受人工影响者属之，如马东男之《自然地理学》（Traite de Geogaiphie Physique），即自然地理学之标准著作。人生地理研究各种人地相关，其范围颇广，历史地理以外之人生地理，是为基本的人生地理。（见 H. E. Barnes: The History m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白吕纳《人生地理学史章》）

白吕纳万洛合著之《历史地理》，重在政治地理，故其书之副题，称日“海陆和平战争之地理”。其内容初述政治地理之理论，如疆域、国界、道路、京都分区等。继述大战、和会、现代国际竞争之地理事实。此外于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发挥较少。

《法国人生地理》二卷，为杭纳督（G. Hanotaux）主撰《法国国民

史》之一部，《法国国民史》共十五卷，分述法国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经济、艺术、文学、科学各种专史，而以《法国人生地理》为之冠。

白兰土《法国地志》根据自然区，叙述各地地文状况，以示其影响于人生历史者何如。白吕纳《法国人生地理》则异是。第一卷为通论地理与区域地理，第二卷为政治地理与社会经济地理。通论地理根据主要流域，分述各地自然情形，此与白兰土根据自然区域者异。盖白吕纳之作，侧重人生，江河为交通要具，一河所经，每集若干自然区而会通之。近代地理，虽多以自然区为研究单位，而研究人生地理学则流域分区，仍有重大价值。通论地理篇，兼述法国人种及语言之历史与分布，白吕纳名之日“人文因素”(facteurhumain)。

区域地理篇，白吕纳标题日《区域人生地理之要则》，内分三部：第一部将法国全境分为吸引中心、交通重要区、旧政治中心、交通困难区、边境区、滨海区六大类，名日《地理区域类》(尸g加〃es geographiques)。第二部论法国行政区之变迁。第三部述各地房屋村落之种类与分布。

政治地理分京都、疆界、城市、道路、海道、海口六类。社会经济地理包林猎渔农牧工矿各类职业生活，人口与煤及石油。白吕纳并述于动力地理（Geographie de L’energie），盖法国人口不增，重视人工，因有此种分类也。

白吕纳氏生平重要著作及其内容大概，略尽于此，白氏研究人生地理学所根据之重要原则，约有下列数项：

一、解释原则　旧地理与新地理根本不同，旧地理专叙述，新地理重解释。叙述的地理，多为地名与数字所充塞，材料琐碎，缺一贯精神，如谓某地有某山，其高若何，某地有某水，其长若何，地理课本，遂成枯燥无味之字典，久为人所弃恶者在此。

新地理则反是，论山河有少年壮年老年之不同，论城市有活城死城姊妹城诸分类，不特人生地理，人地相关，处处当加解释，即纯粹自然地理各现象，亦多具有因果关系。如西欧气候，何以较其他同纬度地方温和，西伯利亚东北，何以为世界寒极。埃及居沙漠带，何来尼罗河，中央亚细亚有广大之平原，何以农业殊不发达。凡此种种，多有解释，且不解释亦无足以满足人性求知之欲望。人生地理研究人地相关，尤完全建设在解释精神上，如长江口有东亚巨港之上海，黄河口为何如。中国东南部人口稠密，西北部人口稀少，其自然环境，有何差异。凡此人之于地，地之于人，相互影响，相互依据，不加以解释，何以见其关系差别。故白吕纳谓“旧地理为地的叙述，新地理为地的科学”，不仅在叙述，并且在解释。

二、一体原则　地面上自然现象与人生现象，非各各孤立，实有相互关系。不特此一事与后一事相关，亦不特一事与一因一果相关。一事之生，有多数因，一事之终，有多数果。进而言之，凡一事与其余世间事，多有相关。如以气候言，各地有各地气候，各日有各日天气，然大气实整个而不可分，全球高低气压之分布，处处相通，息息相关。冬日大陆属高气压，海上即生低气压，夏日海上为高气压，陆上即属低气压。欧洲空气情形，不能不影响于亚洲，昨日天气状况，不能不影响于今日。正如投一石于太平洋，不特亚美两岸感其波动，世界各处，均受影响。自然现象如是，人生现象亦如是，自然与人生相合发生之现象亦莫不如是，如一地水旱，影响世界市场，一国治乱，关系各国产销。此所谓一体原则，水陆气三界一体，天地人三才一体。白吕纳称之日“相关原则”与“地球一体”（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十八面与第三十二面）。一体精神，乃发生有机体社会性之团结。由此可知世间无一事为偶成的，孤立的，处处有复杂的和谐，相互的维系。白吕纳亦称之日“自然团结”（Solidarity naturelle）。（见

《法国人生地理》第一卷第一O三面）

三、演化原则　研究地理，既处处以解释精神，找寻相互关系，无机体的地，已变为有机体的地，易言之，即死地已变为活地。地面上各种现象，不特为空间性有机体结合，并且为时间性有机体演化。美洲未发现以前，世界人口分布如何，美洲现发现以后，世界人口发生如何移动。四百五十年之美洲，与今日美洲呈何不同，苏夷（伊）土运河未通以前，世界商道如何，苏夷（伊）土运河既通以后，世界商道复如何。此其间人对于地，地对于人，无时无日不显其作用，呈其变迁。即纯粹的自然界，昼夜四季之交替，风雨冰雪之更迭；江河洋流之运行，陵谷山川之变迁，何尝稍有停歇间断。孔子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特流水为然，一切自然现象皆如是，皆继续演化不已。地形有老幼，河流有壮衰，岂地学家好为奇论，事实固如斯也。人生地理研究人地相关，更不可不注意于演化。故白吕纳谓："人生地理之事实，无时不在演化中，人生地理，非静的科学，乃动的科学"，（见《法国人生地理》第一卷第四面）又曰："地理者，乃地球现代生活之研究。"（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十八面）学者有比地理现象如活动影片者，足见其不似幻灯之仅为死景。

四、适应原则　前述三原则，为人生地理与自然地理所公有。人生地理有与自然地理不同者，人为有意志的动物，人间之关系，岂能如纯粹自然界现象，有一定不易之方式。数学上二加二必等于四，物理上万物皆有吸力，此种公式，无有例外。自然地理多半为物理性数学性的现象，故有绝对性定理，如研究气象，而能预告天气其证也。人生地理则不然，人受地之影响，地亦受人之影响，人之意志智力与才能，因时而不同，故地之利人与人之利地，亦因人因时而有异。人不能行于水上，故江河原为交通之阻，及人知制造舟舰，则涉重洋无难矣。今人能驾飞机航行空中，然以现状论，人未必能设城市建国家

于空中。航海航空，为人之主动适应。建城市国家于地上，而不能建城市国家于空中，乃人之被动适应。两种适应力之消长，则视历史进化而不同，故白吕纳谓：“自然地理有绝对的势力，人生地理仅为调和的领域。”（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八九三面）又曰：“地理学当采取人生合作之精神，以研究地理。”（见《历史地理》第七一面）盖深知“自然主宰”与“征服自然”之说，皆有未当也。

白吕纳研究人生地理学所应用之特殊方法，亦有下列数种：

一、分布与绘图法　人生地理既以阐明人地关系，研究自然与人生相互影响为职志。然如农民如何耕种土地，工人如何开凿运河，皆非地理也，前者属于农业，后者属于工艺。惟研究何处可以耕种，何处可以开河，或何处有农田，何处有运河，即属诸地理。地理者，乃地域性的研究。易言之，凡事物之有分布性者，方入地理范围。在何处，或至何处止，为地理学家常备之精神，亦即地理学家治学之方法，且为确定地理领域重要之原素。（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一O九及八三二面）表示事物分布之方法，莫善于绘图，故地学家重绘图法。

二、全景与摄影法　地理研究地面自然现象与人生现象之分布，其研究方法，多为概观的，而非个别的。如自然地理研究山脉，研究山脉全体之形状性质与分布，分析研究组成山脉之物质者，为岩石学或矿物学。研究水之成分性质，为化学家物理家，而研究水流全体，如江河湖海，则为地理学家事。如研究人之个别性者，有生理学或心理学，而研究人类全体之分布，或人类全体与自然相关系之处，则属之地学范围。凡此皆证明地学方法，为整个的研究，以地面全体为归宿。——如以地球全体为研究对象，即为地球物理学或更进为天文学。——如就方志地理论，研究一国一区之地理，即为一国一区地面上重要事项，如山岭河川城村田野等概观的研究。此种概观

（physiognomic）亦称全景（paysage），或称风光，研究概观或全景之方法，可称日摄影法，因摄影所得，多半属于事物之全景也。（参看《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二三、一三六、一三九、三五六、七九五各图）

三、汇集与举样法　地学家既不以叙述为满意，而注意于解释，则科学家分析与归纳之精神，自不可缺。易言之，即当有度量与分类。惟地理既为全景的研究，全景为多数分子之混合体，何能省严格的分类。如地理学上所谓草原带、沙漠带，乃代表雨量、湿度、土性、水流、动植、人生各种性质之总称，决不能以草与沙一端，代表两带之特性。且沙漠与草原带相邻，其间两带渐变处，普通或更以半沙漠带名之，然究竟带与带间，无有截然之分界。此种分类，与其他自然科学如动植矿理化等之分类，完全不同。如就人生地理言，人口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两种，究竟何为城市，何为乡村，其界限何在。乡村居民有集居，有散居，究竟何种数目属于集居，何种数目属于散居，地理学家无由答复。地学家所用方法，在汇集性质相近之现象，而举样以明之。此种初步的分类法，将来能否进步，得成更为严确之分类法，如其他自然科学然，诚属疑问，惟今之地理学家，利用举样法，已有相当之成功，此实研究复杂的地理全景入门之关键。（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一〇〇及五七五各图）白吕纳研究房屋村落城市以至地理区域，皆用举样法。

人生地理为新起之科学，自雷次儿《人生地理》第一册出版（一八八二），以至于今，甫四十五年。其性质内容，领域分界，至今未曾确定。甚至人生地理能否成为独立科学，尚多讨论。此诚为新科学成立必经之步骤，研究人生地理者，并不以此胆怯，摸索探究，前程系焉。

依白吕纳之意，人生地理分类有数种。地面为人类生活舞台，人

生基本需要，莫重于衣食住，故人生地理第一级分类当据此。食物地理于《历史地理》中，曾设专章述之。居住地理如房屋乡村城市，《人地学原理》及《法国人生地理》均论述甚详。惟衣服地理，白吕纳书中尚缺专章。其第二级分类日垦植地理，耕种地理，畜牧地理，工业地理属之。人不能单独生活，社会制度，如商业上之市场，农业上之田制，为社会现象，亦为地理现象。何处可建立市场，或临河，或滨海。何种土壤通行何种田制，何处多大地主，何处多小地主，皆社会的地理现象也，故人生地理第三级分类为社会地理。社会组织最富地理性者，莫过于国家，以其重要，独立为政治地理，属人生地理分类第四级，政治地理与社会地理合称历史地理，其余名之日基本人生地理，重分三纲六目。六目者，房屋、道路、耕种、畜牧、伐林、采矿，分属于不生产、生产、消竭三纲，称为“主要事项”。如总述人与主要事项相互之关系者，名日“地方经济”（economie Rggionale）或称〞生活方式〞（Genre de vie）。

以上各种分类，有互相侵犯者，有遗漏不入者。如人口地理，研究人口分布移动，为基本的人类地理现象，前述分类反不见，白吕纳于《历史地理》中述之。总之，人生本整个的，强为分类，诸多困难，惟方志地理集一地自然人生一切地理现象而述之，为综合的地理。

白吕纳撰著各书中所举重要新颖之问题可有下列数则：

一、人口地理　人口地理研究人口之分布与移动。人口分布疏密，多半视地方情形而定。如北极寒漠与缺雨之沙漠，土地生产力弱，居民稀少，或竟无有。热带林业，植物生产力过强，人类反复不能插足。世界人口最密之区，一为季风气候之亚洲东南部，一为海洋气候发达之欧洲，两地人口之和，几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而季风带之人口，复较欧洲几二倍之。

此种不平均分布，半由于自然，半亦由于人事。如欧洲人口最密

之区，多半为工业区，东亚人口最密之区，则为深耕农业区，自然原因而外，重加以人工经营，故两地人口益密。

人口移动，多半起于自然原因，如人口激增，地方渐尽，以及水旱天灾，皆足以引起移民，人为原因亦有之，如宗教压迫政治冲突等，惟势力还不及自然原因之雄厚。移民所取之道路，或为草原，或顺河流，或沿海岸，近世海上交通便利，而涉洋移民乃益见重要。

二、居处地理　与人口地理有联带关系者，为居处地域。居处地理分三部，一房屋，二村落，三城市。房屋研究分数种，就材料言，有木料石料砖料之分。就屋顶言，有平顶斜顶之分。更有就房屋构造研究者。《法国人生地理》设专章述各处房屋种类。惟屋顶平斜，不尽由于气候原因（如雨量多寡）。各种屋料，以交通发达，失其分布限制。房屋构造，则属于经济原因者多，关于地理原因者少。故房屋虽属地方“风光”重要原素，惟地理解释较薄弱。

村落有大小集散之分，就其地位言，或临河，或近泉，或面太阳（如在山阳或面南等），其大小集散，复与土壤农事有关。近年以来，国际地理会议特组织委员会研究之，主其事者为巴黎大学人生地理教授田曼乔氏。

三、城市研究、更饶兴趣。《法国人生地理》曾将法国城市详细分析，有所谓交通城、防卫城、工业城、矿业城、商业城、铁路城、年幼城、年老城、向荣城、笋发城，以及圆形城、长形城、姊妹城、双生城种种名称，兹不详。

四、生活方式　职业生活虽不能代表生活方式之全体，惟生活方式，多半可就职业分。《人地学原理》畜牧一部，白吕纳曾将游牧生活，详细分述。沙漠生活高山生活，则设专章述之。煤区生活，亦叙述甚详。《法国人生地理》第四部社会经济地理，就法国林猎渔农牧工矿各类职业生活，详细叙述，而于农业部分，尤多新颖有趣之材料。

如分析各处农业工作时期，绘图表示一年间闲忙分布状况。甚至乡间节场乡间游戏，以至服装俚曲音乐烹调，亦一一加以地理分析，考其分布情形。白吕纳倾向于人生研究，有如此者。

五、地名研究 《人地学原理》中白吕纳曾谓“语言地名故事可供史事之考证”（见《人地学原理》法文本第三版第八三九面）。《法国人生地理》特设专章，研究地名，标题日“人生地理之化石”。除于法国地名之字音字形变迁，有所考证外，其论地名起源，谓多半由于普通名词。如莱因 Rhin，为古色尔特语河流之意，此等例极多。自基督教传入法国，地名多用圣名，总计法国乡镇用圣名者，不下四千四百五十处。地名亦由史事变迁而更改，革命之后尤甚。至于由物产名变为地名，或由地名变为物产，亦往往有之。窃按欧洲各国，宗教势力极大，不特地名多用圣名，人名亦全取圣名。我国不特人名多有取义，地名亦多有取义，如安东、安西、绥远、宁夏及辽阳、湘阴、望江、东流等等，其间历史意义，何等丰富，地理性质何等明了。惟我国地名，间有以避帝王之讳而更改者，则是君主威权，殆不亚于欧洲之宗教势力欤。

昔余游学欧西，白吕纳先生正主讲于法国学院，因从之学，得快闻其言论；后余归国后不二年，先生即谢世，迄于今已六载矣。吾国兴地之学，发源甚古，惟从事于科学研究，犹为近数年间事，同学李君旭旦任君美铸努力于新地学推进之工作，近取白吕纳所著《人地学原理》译为国文，以便利一般之读者，书成，索序于余，因将白吕纳先生对于人生地理之著作思想言论方法，略为介绍，谅亦读者所乐闻欤。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于中央大学

解放前五十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人口的概况*

胡焕庸

在20世纪初期，国内学术界就开始研究中国人口。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经常刊登有关人口的文章。当年的第六期就发表《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认为“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历述每次朝代更替都由人口过多，人民生活困苦引起变乱，经过人口减少，新朝建立，达到一段安定时期。此种言论显然过于偏激，但历代人口增减起伏，同政治上的治、乱是有一定相关之处的。1906年同刊发表章宗元的《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主要是宣传马尔萨斯生存竞争的思想。1908年发表影蓉的《徙民实边私议》，主张移内地过多的人口充实边疆。

五十年中各方发表有关人口的文章为数很多，约略加以分类大致可分为社会学角度、经济学角度、人口学角度和地理学角度四大类。

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口

这一方面的文章为数最多，发表文章的人数也最多。著名社会学

* 原载于《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家如吴景超、潘光旦、柯象峰、费孝通、董时进、乔启明、孙本文、胡鉴民、言心哲等曾发表有关人口社会学的文章和专著。

吴景超发表有《中国人口问题》（《独立评论》，1936年）、《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独立评论》，1935年）、《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1933年）等文章。吴氏主张采取节制人口的政策，他认为：第一，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第二，中国人口的庞大是大多数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为救济一般产妇、婴儿及在经济压迫下的家长等起见，我们主张节制人口。我国的人口，号称四亿五千万。……我们如在农业技术上赶上美国，那么中国所有的耕地只用得了二千万人，别的实业就要用三千万人，结果便有一亿五千万人无法安排。

李景汉在《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一卷二期，1934年）中指出：“定县全县人口约计40万人，全县面积约3700km2，耕地160万亩，平均每人耕地四亩。人口的密度已达饱和点，即谓之过剩也无不可。人口数目已超过本县土地所能生产粮食可供给的限度。至少已觉人满为患。若定县人口继续的任其增加，则生活问题更加严重。免除人口过庶之压迫，不外三途：（1）增加田地之生产；（2）移民；（3）减低出生率。”“时至今日，吾人再不可以情感论事，当平心静气，根据实际需要，以理解谋民族之出路，减轻人口过密之苦痛。”

乔启明在《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1928年11月）中说：“在治标的方法中，可以调剂人口问题的，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移民问题。移民的方法，是将人口过密、田地过狭地方的人口，移到人口较疏、田地较广的地方。”“据1928年4月份《远东时报》所载一篇《去满洲谋生活》的论文中，估计本年到东三省去的人口，约从二百万至四百万之多。”“在治本方法中，作者认为可以调剂人口问题的，就是迟婚与节育。此外再没有较好的方法。”“同时政府更须实

行人口统计，每年或数年报告一次，作为学者的研究，所得结果，宣布社会，警告大众，如此或可收效于万一也。”

当时国内社会学家所组织的社会学社曾经编辑《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出版，1932年），由若干社会学家分别编写论文，从各方面讨论中国人口问题。胡鉴民所写《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一文中认为：“人口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决定社会组织的要素是人口、自然环境与文化……在一个社会之中，最有支配力的活的要素是人口……”，，无论哪一种社会现象要能影响及其他种社会现象，必定要经过人口的关键。由此看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人口变迁是一切社会变迁的枢纽。”

我国社会学者费孝通氏于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开弦弓村作过一次农村调查，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论文，题为《江村经济》，于1938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农村的典型调查。以后在1980年，作者又到原地再作调查，比较了从1936年到1980年四十五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费孝通氏的著作引起世界的重视，1981年伦敦经济学院给予费孝通氏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该年赫胥黎纪念奖章。费氏的原著是在1936年完成的。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同时，它又具有和其他农村不同的特殊性。通过这一农村的调查和记录，也就具有我国一般农村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典型特征。

二、从人口学角度研究人口

在解放前的五十年中，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真正从人口学角度研究中国人口的为数较少。但是也有几位学者对于中国人口作了较多的人口学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陈长蕾、许仕廉与陈达。

陈长册先生今年九十五岁，现任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早在1918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人口论》，到1926年就已发行七版。

陈氏于1926年6月在《清华学报》发表《中国劳动问题讨论》。根据1922年华洋义赈救济总会调查直、鲁、江、浙等省248村（直隶最多）共6482家之结果如下：（1）平均每家丁口为5.28人；（2）在江苏平均每家有地19.5亩；（3）在直隶无地之家数约占11%有奇；（4）农人借贷利率每月二分至五、六分不等；（5）江苏各村居民约有一半皆贫（按此尚为江、浙两次战争以前之状况），直隶约有80%皆贫。此虽调查各区之现象，不足以概其余，然全国农人之贫苦，亦可想见较诸上列标准实不如远甚。故我国人口问题实为今日之重大问题。调剂之法，除弭兵息争，移民实边，奖励开垦及振兴实业外，同时亦须注重生育限制。而贫苦与劳动阶级欲谋改良本身与子女之境遇，此层尤不可少。

1935年《地理学报》第二卷第四期，发表陈长衡《我国土地与人口问题之初步比较研究及国民经济建设之政策商榷》，陈氏根据当时金陵大学的农村人口调查、资源委员会的句容县人口农业普查，及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的估计等，认为“我国现时最大多数的人民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度，且农村人口亦占大多数，故生育率至少当与苏俄相近，死亡率则过之，自然增加率因此约为千分之十。……此项自然增加率如不减低，则在二十世纪之末，我国的人口可增加到九万万以上。……是以现代的人口学者多主张每个国家应该设法维持其最适当之人口。……为国自身计，欲力求自己解放，以期将来对于世界文明进化有更大之贡献，除努力各种建设之外，亦非限制天公移民入境不可”。

许仕廉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人口问题》一书，许氏在该书第一章中论述人口、土地与社会所发生的关系，他假定土地为

固定的，人口大小所发生的关系有下列几个法则：（1）如土地与人口比例适当，人口不多不少，则该人口的生活程度加高，而社会文化必充分发达；（2）在人口过多或人口过少情形之下，社会文明及生活程度减低；（3）在过剩人口情形之下，必发生社会罪恶及痛苦，如战争、饥荒、疾病、贫穷及刑犯等。

许氏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法，在治标办法之中有：（1）应用新农业方法，一面使农作物改良，一面增加每亩出产；（电）发展工商业；（3）将过剩人口移植人烟稀少的地方，如满、蒙、青海各处；（4）提倡职业教育，增加生产人口的百分率；（5）讲公共卫生，减低死亡率；（6）为改良人种起见，提倡优生运动。在治本方面：（1）世界各国合作，减少人口过剩之患；（2）提倡世界正义，使各国各地土地、人口得相当的分配。他又指出关于节制生育，第一是永久性的节育，即用科学手术，解除生育的机能；第二是暂时的避孕。

陈达于 1934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人口问题》，陈氏根据最低估计认为全国人口是 37,256 万，出生率 38‰，死亡率 33‰，自然增长率 5‰。我们尽可以减低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得到同样的自然增长率。根据陈氏估计，当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为 275‰。

陈氏重视人口质量。当时中国的中、小学生人数只有 900 万，美国总人数少于我国，中、小学学生数却有 2,000 多万。关于人民生活程度，陈氏也把中国工人的生活程度同美、日各国作出比较。

最后，陈氏认为限制人口的方法，美国采用移民政策及节育。我国既无大量的移民，所以人口的限制要靠出生率的降低。

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注意讨论中国人口

问题，他在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造》一书中就提道："生产率高者，其死亡率亦高，非人类之福也。某教授尝问一中国妇女子女几何，据答三人；复问生过几个，答称十一个，死去其八，即积极限制之例。"马氏在他《经济概论》一书中说："食物增加不敌人口增加迅速之一事，实为世上不可免之天然法则。救济方法，惟有用科学的方法，使土地生产能力增加，便利交通，而实行地理分工。甲地最宜产米则产米，乙地最宜种麦则种麦（欲实行地理的分工制，必先研究交通之便利）。同时并厉行生育的节制，盖非节制生育，恐仍无补于事也。"

董时进在1926年9月《东方杂志》发表《民食困难之解释与解决》中说："……经济问题与人口问题为一物之两面，食料问题为经济与人口两问题之症结；食料若不成问题，则经济问题与人口问题亦能成立矣。……所谓人满为患者，并非空间充塞，无插身之地，乃比例于食料而言之也。……故经济、人口两问题之关键，在于粮食。"董氏在1936年《东方杂志》第5号发表《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一文中说："在中国节制生育的问题，本不是'何以必须'，乃是'如何实行'。然而确有不少人仍然怀疑节制生育的必要。……去年10月无锡开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有人提出此问题，便有不少人起来反对。""……总之，我们不要忘记：人口增加是无止息的，食料的增加是越来越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开垦荒地、改良农业、增加生产，总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快。按人口普通增殖的速度，五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现在中国亟应进一步讲求如何大规模的进行节育，我们应该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限制婚姻与生育。"

四、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人口

翁文徽于 1932 年在《独立评论》第 3 号发表《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翁氏从中国地理的特点加以分析，指出全国土地平原占 10%，盆地占 16%，丘陵占 9%，高原山脉共占 65%。全国各省每人分得耕地的面积，直隶（河北）4 亩，山东 3 亩，江苏 2.5 亩，广东 1.5 亩，我国平均每个人大约只得 3 亩田地，世界上真不容易转得出比我们再穷的国民。所以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压迫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要减少这种压迫，第一是历史上常走的路，人口多了便起内乱；第二是将人口太密地方的人，有计划的移植于人口稀少的地区。但可惜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应在哪里，往往毫无研究。只是凭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谈，如何能有结果？这些具体问题都要经过实地调查，具体规划才可付诸实施。

张印堂于 1934 年在《地理学报》创刊号发表《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一文，指出："中国现在之已耕地亩约在 14 亿至 15 亿亩，全国每人分占不过三亩，中国当时的农产每年已有 1,330 亿斤，而全国人民所需粮食却达 1,692 亿斤，尚差 362 亿斤。1932 年我国进口的粮食总计为 61 亿斤，还不够国内所缺的需要。"张氏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治标的方法在于移民垦荒；治本的方法则在节制生育。

胡焕庸从 1934 年到 1935 年先后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三篇有关人口地理的文章：《江宁县的耕地与人口密度》（《地理学报》一卷二期，1934 年）、《安徽省的人口密度与农业区域》（《地理学报》二卷一期，1935 年）、《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二卷二期，1935 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胡氏创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当时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集》就列入了这张《人

口密度图》。美国地理学会也译出了《中国人口之分布》的全文和附图，附在他们出版的《地理学评论》里分发出去。英、德等国几种著名地理杂志也都对这篇论文和《人口密度图》作过介绍。

胡氏认为，我国全境，东南半壁多平原丘陵，有足够的降水和热量，农产富庶，工矿交通也发达；西北半壁多高山高原，气候比较干燥寒冷，经济开发不够。两个半壁的面积约略相等，但东南半壁却居住着占全国 96% 的人口，而西北半壁仅居住着占全国 4% 的人口，这种差别多年来很少改变。

就一个省、区来说，胡氏认为也有这种情况。如安徽全省 1933 年有 2,200 万人口，面积约 13.9 万 kmz，占全国面积的 1.44%，全省人口平均密度为 160 人 /kn?。但全省不同地区人口密度也是不同。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长江沿岸一带，属主要水稻产区，人口密度在 400 人 /kn? 左右，而皖北一带，都种旱粮，人口密度在 300 人 /kn? 左右。另外，皖西山地和皖南山地耕地面积较少，人口密度就不到 50 人 /kn?。

胡氏发表的这些文章，开创了中国研究人口地理的道路。

五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八大区的人口经济发展*

胡焕庸

1935年我曾收集1933年前后，我国各省各县的人口数字（主要根据户口登记数字），写成《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发表在《地理学报》1935年）。当时创制了两张人口图，一张是用点子（每点代表二万人）作代表的人口分布图，另一张是用八个不同彩色表示的人口密度图。人口密度图被当时申报馆出版的地图集所采用，全文和地图曾被美国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学评论》翻译刊行。自那时到今天已过了半个世纪，人口状况也有相当的变化。

一、五十年翻番

1933年全国总人口为4.63亿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8人，从1933年到1953年二十年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全国人口增长数字要比1953—1982年增长缓慢得多。1953年的解放后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为5.90亿；1953年比1933年总人口净增长27%，平均年增长率为1.20%。从1953到1982年的二十九年间，

* 原载于《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全国人口增长75%，平均年增长率为1.94%。这是由于解放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同时更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曾经提出计划生育方针，但没有能够认真执行。全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有一次生育高峰，从1970年起才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直线下降；要不然的话，全国人口早已超过10亿。

解放以来，各省、区、市人口增长情况很不相同。由于解放以来国内同国外之间的人口迁徙很少，我们可以假定全国平均年增长数是代表了全国的自然增长。在这二十九年中，那些省区年增长率高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的，就是这些省区有着显著的移入人口。在全国来说，北京、天津两直辖市，人口增长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在各个省区之中，人口有较大移入的，有黑龙江（平均年增长率为3.55%），吉林（2.42%），内蒙古（3.39%），新疆（3.47%），青海（2.94%），江西（2.38%），宁夏（2.44%），广西（2.54%）等，都是移入人口较多的省区。有些省区，年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数，显然是有人口移出的，主要有河南（1.81%），河北（1.31%），山东（1.45%），江苏（1.57%），四川（1.45%）等。

二、一条界线

全国人口分布的格局，明确地显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巨大差别。东北从黑龙江省的瑷辉（一度改称爱辉，现名黑河），向西南到云南省的腾冲画一条直线；根据1933年的统计，在这条线的西北，约有全国总面积的64%，但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4%；在这条线的东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却居住着全国总人口的96%（当时全中国的版图包括着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见彩图2）。

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位于黑河—腾冲线东南的人口占到全

国人口的94.4%，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42.9%；位于这条线西北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面积为57.1%（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抗日战争后正式独立）（见彩图8）。经过五十年，东西人口的差别没有大的改变。东西两部分人口分布，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原因很多。青藏高原的大部面积，海拔都在3000—4000米以上，夏季都会发生霜冻。西北的蒙新等地区，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地处内陆，四周更有高山环绕，气候干燥，年降水量都在100—300毫米以中；广大的沙漠与戈壁，甚至终年不降滴雨。这些地区，从来都是少数民族所居住，交通困难，经济尚不发达，大部地区尚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就现在所知，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还是十分丰富；煤、石油、金属矿藏以及水力资源，在全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在自然条件方面受到一些限制，这里未来开发前景还是十分广阔的。党和政府已经明确宣布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将列为二十一世纪的开发重点。

三、三个台阶

中国的国土东部低，西部高；从东到西显然形成三个台阶。东部沿海有广大平原，中部各省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广大高原，西南部则多在3000—5000米以上的高原和高山。东部有丰富的降水；西部就多广大的沙漠、戈壁和寒漠。东部滨海各省经济发达，西部内陆交通和经济较不发达。

人口是国民经济大系统的主体和主导因素，因为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围绕人类而展开。作者所划分的八个人口大区同三个台阶是符合的。在第一级台阶上是东部沿海的四个大区：辽吉黑区、黄河下游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在第二级台阶上是内地三个大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和蒙新区。第三级台阶上是西南的青藏区。这一科

学划分提供了一个发展我国未来经济的战略框架，其大致轮廓为：

在第一级台阶上，四个人口大区孕育了中国未来四大经济区。辽吉黑区内以中部平原为主体的大面积带状区域——松辽经济圈，是我国钢铁、机械、能源、林业、商品粮五大基地。东北经济区具有四大优势：一大优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二大优势有雄厚的固定资产，三大优势有发达的陆路交通运输网，四大优势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它是我国经济振兴的“龙头”之一。黄河下游区内孕育了渤海经济圈——天津牵头的半环状区域，包括北起辽东湾南至山东北部的沿渤海地区，这里拥有以化学工业和轻纺工业为主导的雄厚实力；未来更将以石油化工、海洋化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而称雄。核心经济圈以京津唐地区为主，又称首都经济圈。长江中下游区孕育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在上海、江苏鱼米之乡基础上九个大中城市的发达的科技文化基础和全面的先进能力，形成活力充沛的“九龙壁”。尤其将形成沿沪宁线的中国“硅谷”作为领头工业的电子工业基地，是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打人国际市场的最大窗口。东南沿海区孕育了“黄金海岸”经济圈——集结闽粤两省沿海与港口城市群。其中包括十三个市和四个经济特区的带状经济区域。具有唐宋以来与海外经济、文化、科技人员联系比国内其他地区都密切的外联基础，作为亚洲东部海运交通枢纽，未来将与港、澳、台联合构成面对世界市场的大商埠和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的最敏感地区，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先行基地。

在第二级台阶上，晋陕甘宁区孕育了山西能源重化工经济区。该区原煤年产 18,356 万吨，为全国绝对冠军，且有较早的近代采煤工业历史和居全国第三位的铁路运输网，国家已确定为能源基地，并编制了详细规划，通过了专家论证。川黔滇区孕育了以重庆市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川江段经济圈和贵州后方工业基地经济圈。重庆市经国务院批

准实行计划单列，具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力，摆脱了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束缚，运用其经济活动的有效影响半径，以得天独厚的长江航道为联系纽带，以开发利用长江航道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开发铁路运输和地方丰富资源为共同目标，联结长江上游川江段的宜宾、泸州、涪陵、万县等城市，形成一个条块结合、城乡结合的自然经济区，成为长江上游广大地区中最发达的经济区，从而促进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贵州的工业资源如煤、铝、磷/汞、锰等矿和水能储量在南方居首位，一旦和经济发达地区相互支援可建成具有四个特色的基地——能源、重工业、轻工业、林牧业基地。蒙新区孕育了作为中国未来最大的石油、煤炭基地的蒙新能源经济圈。新疆的煤炭远景储量为 16,000 亿吨，超过山西，为全国预测总储量的 37%，新疆石油远景地区集中在塔里木、准嘎尔两盆地，计 100 万平方公里，国际专家认为是“中东第二”。第三台阶上的青藏区孕育了作为中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即新能源）基地的青藏新能源经济区。它们是中国新能源两大基地：中国最大的热库西藏，西藏的太阳能和地热能均为世界第二，故西藏热库被称为世界第二大热库；中国最大的水力资源之一——黄河上游水力，位于青海境内，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水力资源位于西藏东部。

综观以上人口大区和经济圈布局，使我们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分布合理性问题。建立在八大区人口分布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区规划和实施，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振兴，产生深刻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表 1. 50 年来我国各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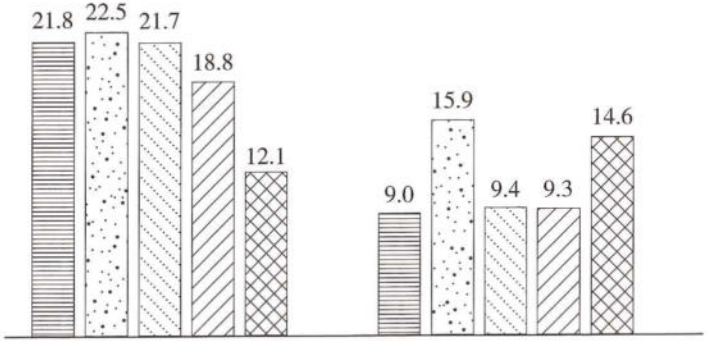
	省、自治区、直辖市	1933 年前后（百万人）	1933 年密度（人 / 平方公里）	1953 年（白万人）	1953 年密度（人 /平方公里）	1982 年（白万人）	1982 年密度（人 / 平方公里）	1933—1953 年（%）	1933—1953 年年均增长率（%）	1953—1982 年（%）	1953-1982 年年均增长率（%）
1	北京	2.06	122	4.14	246	9.23	549	200	3.53	223	2
2	天津	1.50	133	2.69	238	7.76	687	179	2.95	289	3.7
3	河北	25.0	139	36.14	200	53.00	282	144	1.84	146	
4	山东	37.53	245	48.88	319	74.41	486	130	1.32	152	1.45
5	河南	32.67	196	44.21	265	74.42	446	135	1.51	168	1.81
6	辽宁	16.46	113	20.56	141	35.72	245	125	1.12	174	1.93
7	吉林	8.00	43	11.29	60	22.56	120	141	1.73	200	2.42
8	黑龙江	4.66	10	11.9	25	32.66	69	255	4.79	275	3.55
9	山西	11.56	74	14.31	92	25.29	162	124	1.08	177	1.99
10	陕西	10.63	52	15.88	77	28.90	141	149	2.01	182	2.09
11	甘肃	5.62	12	11.59	26	19.57	43	206	3.68	169	1.83
12	宁夏	0.40	6	1.94	29	3.90	59	485	8.21	201	2.44
13	上海	5.00	806	8.5	1370	11.86	1913	170	2.69	231	3.02
14	江苏	30.00	300	38.4	384	60.5	590	128	1.24	157	1.57
15	安徽	22.43	161	30.66	220	49.67	356	137	1.59	162	1.68
16	江西	17.56	105	16.77	101	33.19	199	96	-0.20	198	2.38
17	湖北	26.55	141	27.79	148	47.80	255	105	0.24	172	1.89
18	湖南	30.23	144	33.23	158	54.01	257	110	0.48	163	1.70
19	浙江	20.54	201	22.87	225	38.89	382	111	0.54	170	1.85
20	福建	14.32	117	13.14	108	25.93	213	92	-0.43	197	2.37
21	台湾	5.00	139	7.59	211	18.27	508	152	2.11	241	3.08
22	广东	33.70	159	36.74	174	59.30	280	109	0.43	161	1.66
23	广西	11.77	51	17.59	76	36.42	158	149	2.01	207	2.54
24	四川	52.54	93	65.68	116	99.71	176	125	1.12	152	14
25	贵州	11.29	64	15.04	85	28.55	162	133	1.44	190	2.24
26	云南	11.79	30	17.47	45	32.55	83	148	1.98	186	2.16
27	内家古	4.50	4	7.33	7	19.27	16	163	2.47	263	3.39
28	新疆	2.57	2	4.87	3	13.08	8	189	3.23	269	3
29	青海	1.31	1.7	1.68	2.2	3.90	5	128	1.24	232	2.94
30	四藏	0.80	0.7	1.27	1.04	1.89	1.6	159	2.35	149	1.38
	全国	463.40	48.27	590.75	61	1031.88	107	127	1.20	174	1.93

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演变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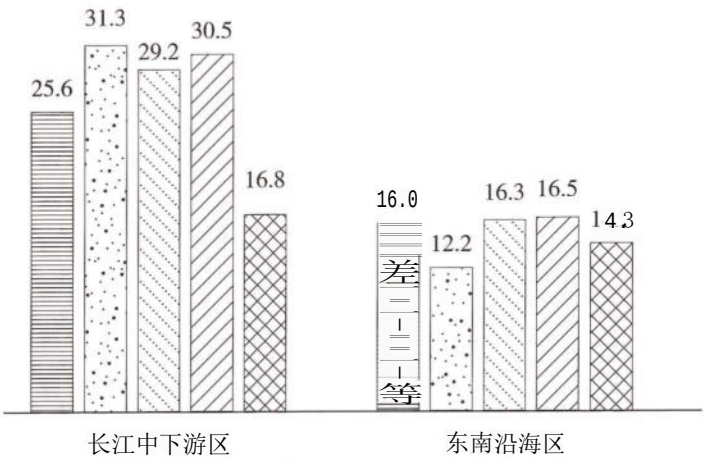
[983 年底总人口(万人)	1983 年粮产(亿斤)	1982 年耕地(万亩)	占全国面积(%)	1983 年占全国人口(%)	各分区面积(千平方公里)	各分区人口(百万人)	各分区密度(人/平方公里)	备注
飞34	40.3	635	黄河下游区 5.59	21.38	536	222.98	416	1. 各省区市面积都按 1982 年多区计算。 2. 各省，人口都按 1982 年政区面积计算。 3.1933 年人口数按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学报》 1935 年胡焕庸著《中国人口之分布》。 4.1953 年各省区市人口数，据当年人口普查数据 1982 年政区调算。 5.1982 年人口数根据 7 月 1 日普查数。 6.1982 年全国总人数包括港澳和解放军现役军人。 7. 各表数字由于四舍五入，尾数会有差异。 8. 八大区人口统计是 1983 年底数。
789	22.2	69						
5420	380.0	9961						
7564	540.0	10802						
7591	580.8	10663						
口629	297.0	5500	辽吉黑区 8.4	8.83	807.1	92.05	114	
2270	295.6	6074						
3306	309.8	13079						
2572	161.2	5820	晋陕甘宁区 9.19	7.56	882.3	78.89	89	
2931	1930	5663						
1988	107.9	5346						
398	290.4	1295						
1194	41.4	527	长江中下游区 8.47	25.04	812.7	261.13	321	
6135	610.4	6946						
5056	402.0	6656						
3384	292.1	3580						
4835	397.5	5577						
5509	530.8	5126						
3963	316.7	2726	东南沿海区 7.31	17.46	701.8	182.11	259	
2640	171.6	1926						
1800	104.0							
6075	392.1	4738						
3733	272.6	3946						
10076	801.7	9845	川黔滇区 11.82	15.62	1134.9	162.96	144	
2901	140.6	2854						
3319	190.9	4265						
1955	112.0	7664	蒙新区 28.37	3.14	2723.6	32.73	12	
1318	90.7	4779						
393	17.9	873	青藏区 20.85	0.56	2001.6	5.86	3	
193	7.4	341						
J04295	7745.5	147909	100.00	100.00				

表 2. 1982 年八大区人口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权重 (%)

目人口 [□工业总产值 目农业总产值 区粮食总产值 少人均粮食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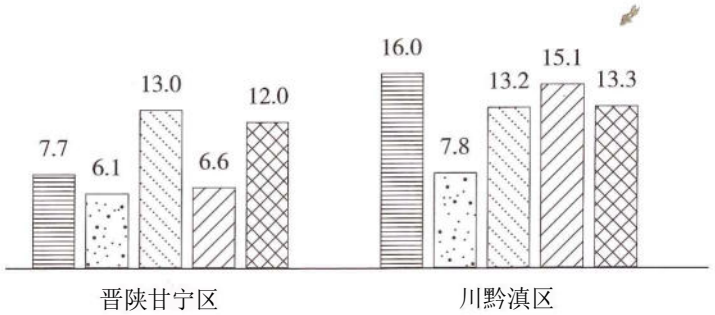


目人口 国工业总产值 E3 农业总产值 区 粮食总产值 O 人均粮食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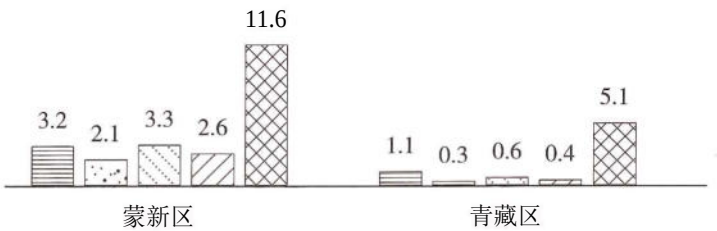


续表

目人口　巴工业总产值　国农业总产值　区粮食总产值　皆人均粮食产量



目人口　国工业总产值　日农业总产值　区粮食总产值　O人均粮食产量



四、八个大区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多样，人口和资源在国土上的分布极不平衡。从宏观上看，人口和经济的分布是东密西稀，能源和工业原料的分布是西密东稀，水资源的分布是东南密西北稀。由于人口以及同人口承载率息息相关的水、土、热、资源、能源、经济活动等各种因子，都以不均匀状态分布在这个辽阔的国土上；例如东南海洋性气候，多雨温暖；西北大陆性气候，干旱寒冷；又如重工业分布北部偏多；甚至旅游资源南北也不同，北方偏历史文物和古迹，南方偏山水自然风光；因此人口的大系统分析和国土经济的中观分析，对中国显得尤其切合国情。

对于中国人口分布这个大系统，本文作者很早就作出了第一级子系统划分，当时从国土、历史、生态、经济四个角度围绕人口这个中心综合考察，科学地将中国人口分布划分为八个人口大区：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青藏区。这八个大区的人口和人口发展都各具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各个大区的经济开发和经济圈建设应有不同的策略。下面拟对八个人口大区的人口分布特点、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对比及现状、人口与经济区规划特色作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分析。

1. 黄河下游区：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地居黄河下游，平原面积广大，全境河川纵横。早在先秦时代，就是我国文化发达之区；河南古称中州，是历代古都所在。在西汉时，全国人口 5700 多万，其中半数集居于黄河下游。

现今的黄河下游区，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5%；1983 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21%，共计 **2.2** 亿。全区土地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416 人；耕地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915 人，在八大人

口区中人口密度是最高的。在解放前的100年中，由于水旱灾难频繁，本区居民移往东北与内蒙的约计达二三千万，在全国八大人口区中是人口移出的最大中心。

全国耕地近15亿亩，22%位于本区，每人平均耕地仅1.5亩。1983年全国粮食总产7745亿斤，本区产量占20%，冀鲁豫三省合计，每人平均粮产701斤。河南、山东两省人口都在七千万以上，分居全国第二、三位。目前，冀鲁豫三省粮食已能自给；京、津两市粮食还靠外省接济。

黄河下游区的人口，1945年曾占全国总人口的23%，1982年占全国的21%。1949年农业总产值80亿元，工业总产值仅16亿元；到1982年农业总产值（为571亿元）增为1949年的7倍，工业总产值（1256亿元）增为1949年的79倍，工业总产值相当于农业的2.2倍。原煤、原油、发电量、职工人数、社会商品额等在八区中均占第二位。

2. 辽、吉、黑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居我国东北，面积占全国的8.25%，1983年人口占全国的8.83%，全区总人口9205万，平均人口密度114人/平方公里，稍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07人/平方公里之数。

从远古起，汉族居民即居住在辽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以冀省为中心的燕国，即在此设辽东、辽西两郡，东北的东部长期为东胡族人所居。公元17世纪，清兵入关以后，大部满族人口移居关内，东北显得空虚；沙俄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东北，从19世纪后期起，我国掀起了大规模移民东北的潮流。1851年，东北三省仅有人口290万。1891年还只有551万；到1911年，就增加到1841万；二十年间，增加2.3倍，计1300万，平均每年增加65万；这主要是由于冀、鲁、豫三省人口的移入。解放后1953年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东北人口已是4375万，四十年间又增加2500万。1983年东北三省人口更增加到9205万，三十年间又增加了48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1万；

这些都明显地显示出近百年来东北人口移入的过程。根据统计，辽、吉、黑三省的人口增长，分属于三个不同时期，这更具体说明：这种增长，主要由于人口移入，而不是单纯的自然增长。

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的面积比辽、吉两省合共面积还大二分之一，现今辽宁省的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49人，吉林省为121人，黑龙江省仅有70人，三省差别很大。辽宁的垦殖指数为25%，人均耕地仅1.6亩；而黑龙江的垦殖指数为18%，人均耕地4.1亩，两省开发情况显然不同。

黑龙江省现有耕地139万亩。1983年全省粮豆总产310亿斤，商品率高达38%，除部分供给本省城镇居民外，其余都调剂外省。

黑龙江省尚有可垦荒地7000万亩；其中约有3000万亩位于三江平原，现已列为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就全国各省来说，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移民的，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同黑龙江相比。

辽、吉、黑还是我国的粮食基地、木材基地、能源基地、钢铁基地和机械工业基地。1953年人口占全国的7.4%，1982年增为全国的9%。农业总产值1982年比1949年增长2.9倍，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1982年工业总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3.6倍。原油产量与铁路运量在八区中均居第一位，原煤产量、发电量与公路运量均居全国第三位。农工业都很发达。

3.长江中下游区：包括上海市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占全国面积的8.4%；1983年人口2.61亿，占全国人口的25%，是全国八大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本区人口超过美国，仅比苏联少一千万。境内丘陵面积较广，全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21人，仅次于黄河下游区。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为598人/平方公里，在全国各省中密度是最高的。

全区耕地总计2.29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5.5%；人均耕地

仅 0.9 亩。1983 年粮食总产 2274 亿斤，人均粮产 870 斤；有余粮可以支援外区。平原人口过于稠密；山地毁林造田，促使水土流失；洼地围湖造田，形成洪水泛滥，境内红壤丘陵，大半荒废；如能改良利用，可以增加生产。本区人口虽密，移出的人口不多，区内有部分移民，以江西为移入地区。

长江中下游区人口众多，为八区之首，1982 年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29.24%，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31.33%；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30.5%。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企业、社会产品销量、发电量、水运量、公路运量均占全国第一。高校在校学生和科技人员也居全国第一。

4. 东南沿海区：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五省区合共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7.31%；1983 年人口 L8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46%；全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59 人，次于黄河下游区与长江中下游区；居各区第三位。

就沿海四大区来说，东北区纬度位置较高，冬季有四五个月冰期，作物一年只有一熟，土地对于人口的承载量，应稍低一些。东南沿海各省，气候暖和湿润，作物一年可以三熟，可惜境内平原窄小，山地丘陵较多。五省区垦殖指数除台湾较高，为 24% 外，其余四省区都在 20% 以下；福建最少，只 10.5%。

五省区总耕地面积 1.46 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10%。人均耕地全区平均仅 0.8 亩，全区（不包括台湾省）粮食总产 1983 年为 1257 亿斤，人均粮产仅有 690 斤，勉可自给。台湾省的粮食现在要靠进口。

在解放以前，闽粤两省居民，大量移居国外；今东南亚两千万华侨和华裔居民，绝大多数是祖籍闽、粤，至今尚有大量侨汇支援祖国建设，政府在闽、粤两省建立经济特区，正是发挥这一特点。

东南沿海区耕地不多，人口稠密，1953 年全区人口 9793 万；1982 年已增加到 1.62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6%。1982 年农业总产值

427 亿元，占全国 16%，工业总产值 679 亿元，占全国 12%；工业总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 L5 倍。只有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居全国第一，原煤、原油产量均居全国第七位，在沿海四大区中，本区经济情况是最差的。现在为了开发经济，在本区专设几个经济特区，广泛吸收华侨和外商投资，引进新技术扩大对外贸易，目前已见成效，将为本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5. 晋陕甘宁区：大部位于黄土高原，气候已属半干旱性质，年降水量在 250　400 毫米之间。本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9. 19%；1983 年人口 7889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7. 56%，全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9 人，低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 107 人。渭河河谷、汾河河谷、汉水上游河谷以及宁夏黄河河套等局部地区，人口比较密集外，其他大部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都在 50 人以下。全区耕地仅 1.81 亿亩，平均垦殖指数仅 14%，人均耕地 2.29 亩。1983 年粮食总产量 491 亿斤，人均粮产 622 斤，粮食已可自给；但有些地区农业经营方法落后，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

本区山地原有森林，长期以来被采伐殆尽；坡地牧场，也被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耕作粗放，产量低下，亟须注意水土保持，重视植林植草，才能改善农业生态。

晋陕甘宁位于近西北内陆，已属半干旱气候区，水土流失强盛，经济很不发达，这里煤炭储藏十分丰富，石油也有储藏，还有丰富的金属、非金属矿藏，开发前景十分灿烂。

根据现在经济，只有山西一省已经开发有年，山西境内 35% 的土地都有煤层；全省煤藏，几占全国三分之一，目前年产 1.5 亿吨，居各省首位。以晋陕甘宁全区来说，1982 年计产原煤 1.8 亿吨，也居全国第一位。发电量 366 亿度，占全国 11%，居第四位。铁路运量占全国 6. 9%，居第三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6%，农业总产值占全国 13%，

粮食产量占全国 6.6%。从工矿业发展前途来说，是大有可为的。

6. 川黔滇区：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大部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适于作物生长。全区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11.8%。1983 年人口 1.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全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144 人，高于晋陕甘宁区；在八大区中，人口密度居第四位。

在三省中，四川人口特多，达 1 亿人，在全国各省区中人口之多居第一位；同日本全国人口数相近。四川东部是一盆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9500 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在 400 人以上；在全国中，形成一个面积广大的人口密集区。在省境的西部，有广大面积的高山高原，面积约 30 万平方公里，仅居住着全省人口的 5% 的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50 乃至 10 人以下。

贵州、云南两省，大部分是高于 1000 或 2000 米以上的高原和山地，但到处有地势低平的小块平原和坝地，是人口密集之处。两省平均人口密度，贵州为 165 人，云南为 84 人，四川以盆地和高山高原平均计算，全省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178 人，仅稍高于贵州。

三省耕地面积合计 16964 万亩，其中 9845 万亩在四川省；贵州 2854 万亩；云南 4265 万亩；三省垦殖指数分别为 11.7%、10.9%、6.3%。人均耕地四川、贵州各为 1.0 亩，云南为 1.3 亩。

1983 年三省粮食总产合计为 1133 亿斤；分别计算，四川为 801 亿斤，贵州为 140 亿斤，云南为 190 亿斤。四川人均粮产 724 斤，可有余粮；贵州、云南分别为 482 和 575 斤，粮食不能自给。

川黔滇区位居西南内陆，气候温暖湿润，农产十分丰富，矿产如煤、天然气、金属矿以及水力蕴藏量都很丰富。目前全区 1982 年农业总产值占全国 13%，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 7.78%。原煤产量占全国 10%，居第五位。发电量占全国 9%，居第六位。水运量占全国 5%，居第三位，川黔滇三省只有四川操长江航运之利，居经济领导地位。

7. 蒙新区：内蒙古与新疆两个自治区合计面积 272.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28.36%。1983 年人口 3273 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3.14%。整个蒙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 12 人，真可说是地广人稀，同东部各省相比十分悬殊。

内蒙古、新疆地处西北内陆，属干旱和半干旱性气候。内蒙古东南部年降水量尚有 400 毫米，内蒙古北部、新疆南部年降水量都在 100 毫米以下，其中半数地区终年不降滴雨，成为沙漠和戈壁，大部属于无人地区。

内蒙古从东南到西北可分为四个地带：最南为纯农地带，稍北为农牧地带，再北为纯牧地带，北边为戈壁地带。内蒙古全境 1983 年人口数为 1955 万，其中蒙古族人 200 多万，余为汉人。汉人多经营农业，蒙古族人多经营牧业。南部人口较密，北部人口极稀。

新疆以天山山脉中隔，分为北疆与南疆两部。北疆年降水量 200～400 毫米，大部（分地区）可供牧畜；南疆年降水量都在 100 毫米以下，而年蒸发量高达 3000 毫米，因此大部（分地区）是不毛之地。新疆全区耕地，多数分布在天山北麓与南麓以及昆仑山脉的北麓；高山所积冰雪，当夏季天热，融水下注，可供灌溉，形成小块绿洲；绿洲以外，无水即无田，无田即无人。绿洲之内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可达二三百人，最多的可高达七八百人。新疆人口分布主要沿着这三条山麓地带，形成联珠形式。

新疆全境现有耕地仅 4779 万亩，占全疆土地面积 2%。1983 年粮食总产 90 亿斤，人均粮产 688 斤，可以自给。

蒙新两个自治区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8.5%。1982 年，农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 3%，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 2%，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居全国第七位。但就自然资源来说，煤炭、石油、各种金属矿与非金属矿储量都很丰富，政府订定 21 世纪将以大西北为开发重点。

8. 青藏区：青海、西藏位于高原之上，地面高于海面平均达 4000 米，部分地区更高达 5000 米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寒地区。全区面积 200.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 21%；1983 年人口 586 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0.59%，全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有 3 人，在全国八大区中是人口最少的地区。

全区耕地面积仅有 1214 万亩，其中青海 873 万亩，垦殖指数为 0.8%；西藏耕地 341 万亩，垦殖指数仅有 0.2%。青海人均耕地 2.34 亩，西藏仅 L89 亩。1983 年粮食总产青海 17.9 亿斤，人均粮产仅 455 斤；西藏粮产 7.4 亿斤，人均粮产仅 383 斤；粮食都不能自给。西藏草原面积约 8 亿亩，共有牲畜 2500 万头，平均每人有 14 头，是当地居民饮食品的一部分。

据 1933 年估计，青海仅有人口 131 万人，西藏 80 万人。1953 年人口普查，青海有 168 万人，西藏 127 万人。1982 年人口普查，青海 390 万人，西藏 189 万人。从 1953 年到 1982 年，青海人口约增长 1.3 倍，其中部分是从外省移入；西藏人口增长一半，主要是靠自然增长。

在八大区中，从人口和经济来比，青藏区都处于末位，青藏区的面积在全国中占 20%，但人口只占全国的 0.56%；从全区农业总产值来说，只占全国的 0.57%，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 0.28%，现在全国三十个省区市中，只西藏还没有铁路可通。

青海全省只有东北部是人口密集区。柴达木盆地有煤、石油、湖盐、硼以及各种金属矿，现已有铁路贯通全盆地。南部高原海拔达 4000 米以上，多为藏族所居，从事放牧，可种小麦青棵。1983 年粮食产量 18 亿斤，大牧畜 63 万头，产猪牛羊肉 9 万吨。

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可种小麦青裸，东南部有些农业地区，其余牧畜。西藏的太阳辐射很强，地热很富，有各种金属矿藏还没有开采，将来青藏铁路铺通以后，就可大量开发建设。

五、展望未来

1982 年普查，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亿，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中国人口已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对此中国人民感到非常忧虑！

中国在进行 1982 年人口普查的同时，还进行了全国千分之一的生育率抽样调查，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填补了我国妇女生育史的空白。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 5.44，五十年代为 5.87，六十年代为 5.68，七十年代为 4.01，1980 年为 2.24，1981 年为 2.63，1983 年已降到 2.07。1981 年城市总和生育率为 1.39，乡村为 2.91，全中国 80% 为乡村居民。1982 年出生婴儿的一胎率为 61.21%，计划生育率为 69.70%，计划外生育率为 30.30%。

1963 年全国出生率高达 43.60%。，自然增长率高达 33.50%。。据最近发表的 1983 年数字，出生率为 18.6%。，自然增长率 11.5%。。最近我国政府修订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放宽二胎，坚决消灭多胎，2000 年的人口目标争取不超 12 亿。

由于青少年比例高（1982 年 30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62.16%），下一世纪的初期，我国人口还可能会有增长；在三十年代左右，有可能总人口会上升到 13 亿 14 亿，但无论如何，到下世纪中期以前，一定可以实现零增长率。

1983 年世界银行经专家研究，进行测算，认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中期都可能实现零增长率。到 2100 年全世界人口将为 111 亿；届时印度人口居第一位，达 17 亿；中国居第二位，计 14 亿；尼日利亚届时将跃居第三位，为 6 亿；日本居第十位，将不超过 1.34 亿。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测算。我很希望中国和世界各国，经过大家努力，都能不超过这次世界银行的测算！

我和人口地理学*

胡焕庸

《书林》编辑同志多次向我要稿，问我为什么年过八旬，眼花手抖，还要一股劲儿研究人口地理，写那么多有关人口的文章。这话不很容易回答，还得从头讲起。

我生于1901年，农历是辛丑年。上一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结果订立了《辛丑条约》，不仅丧权辱国，而且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

我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以教书为生，不幸在我出生才二十个月，他就因病逝世。我既无兄弟，又无姊妹，我母以缝纫为业，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一心盼望我继承父业，以后也当个教书先生。

当我在小学、中学读书的时候，史地教师经常讲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如何侵略我国，人民生活如何贫困等。在这样潜移默化之中，我深深爱上了地理这门学科。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我正是常州中学应届毕业班学生；为了响应全国，我们全校罢课，动员全市罢市、罢工，并组织了纠察队，日夜巡逻，帮助维持秩序。

---

* 原载于《书林》1982年第3期。编者对部分内容有修改。

同年夏，南京高等师范招生，我考入文史地部。次年竺可桢博士到校任教，南高扩建为东南大学，竺先生任地学系主任；我在竺师教导之下，稍稍懂得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内容和作用，就此把它定为我终生钻研的目标。

1926 年东南大学毕业后，我去法国巴黎大学进修，随教授德马东、德孟雄学习，同时也在法兰西学院听白吕纳教授讲课，课余更钻研已故法国地理学大师白兰士和德国著名学者拉茨尔等人的著作。我体会到学习地理学，不仅要懂得人地关系，尤其要研究人地关系最集中的人口地理。上述几位名师都是以极大精力研究人口地理的，使我感到各国各地社会经济情况都同人口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国全部疆土中，东南半壁多平原丘陵，有足够的降水，农业比较富庶，工矿交通也较发达；西北半壁多高山高原，气候比较干燥寒冷，经济开发不够。两个半壁面积约略相等，但东南半壁却居住着全国 96% 的人口，而西北半壁仅居住着全国 4% 的人口，这种差别多年来很少改变。

就一个省区来说，也有这种情况。如四川全省有将近 1 亿人口；面积约占全省 "3 的东部盆地，居住着全省 90% 的人口；而其他高原山地约占全省面积的 2/3，人口只有全省的 10%。我国许多省区和许多县区都有类似的情况。

1928 年我从法国回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32 年竺可桢先生等发起组织中国地理学会，1934 年创刊《地理学报》。从此我在学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文章。

首先，我研究江苏省的农业区划。江苏是一个平原省区，但由于境内降水、土壤、水利等情况的不同，农作物分布不同、人口的密度也有不同。北部的徐海地区以旱作为主，人口就不及南部稻作区的稠密。淮扬地区过去常有水灾，也不及苏南的富庶。沿海一带以盐垦为

主，人口最为稀疏（都指当时情况）。全省地区差别十分显著。

同样，我也研究了安徽省的人口密度与农业区域。当时淮北地区常有水、旱之灾，通常一季淹水、一季种麦，虽属平原，人口密度仍较低。沿江一带盛产水稻，人口密度最高。皖西、皖南山地较多，人口最稀。解放以来，治淮效果显著，苏北、皖北情况大有改变，两省人口大量增加，成为全国人口最密地区之一。

在研究省区人口的同时，我还对县区人口作了调查研筑 如江苏江宁县境分属两类地形，一是秦淮河谷的冲积平原，主种水稻，人口密集；其他是丘陵台地，只适旱粮，人口远较稀疏。对句容县的调查研究，也是同样结果，河谷平原的水稻区，人口稠密，丘陵岗地只能种旱粮，人口分布较稀。

在作了几个省区和几个县区的人口地理研究以后，就开始作全国人口地理的研究，第一步先收集全国各省、各县的人口数字，当然主要是估计数字，没有条件作过于严格的人口普查。第二步就全国具有省、县界线的地图，参考实测地形图，根据山地、平原、河谷的不同作出人口分布点子图，每点代表两万人。然后根据点子的密度，分别作出不同等级的全国人口密度图。这就是我国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当时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集》，就刊入我这张全国《人口密度图》。不久美国地理学会就译出我发表在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学报》1935 年第二期上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全文和附图，附在他们出版的《地理学评论》里分发了出去；英、德等国几种著名地理杂志也都对我这篇论文和《人口密度图》作过介绍。

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学校西迁重庆，由于各种困难，我的人口研究工作，几乎中断了十年。其间虽然写出了一本《四川地理》，但对人口研究的材料，分量是很少的。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终于战败投降，国际学术交流已经中断

了八年，我于是年冬去美国访问讲学。在 1946 年担任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期间，参加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在诺克斯维尔举行的年会，宣读了有关中国人口地理的论文，同时还写了《江苏北部地理》、《苏北东部棉花带》和《峨眉山气候简述》等论文分别发表在 1947 年的美国《地理学评论》、《经济地理》和《美国气象学杂志》等刊物上。

1949 年全国解放后，我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接着在治淮委员会任技术委员三年。1953 年调来华东师大任教。1956 年中央号召提倡计划生育，师大呈准教育部建立了“人口研究室”。在此期间，我写了多篇人口研究的文章，主要的有《江苏省的人口分布与农业区域》（《华东师大学报》，1958 年），《宜兴县的人口密度》（同上），《南通地区的人口分布》（《地理学报》，1958 年），《常熟县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地理学资料》，1958 年），以及《法国研究人口学的近况》（中国地理学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研究动向》，1964 年）等。1957—1958 年国内掀起一股“左”倾台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到严厉批判，我们这个人口研究室当然也在撤销之列。从此人口研究成了“禁区”，在二十年中全国人口盲目增长达三亿多。

在十年内乱中，我完全没有看业务书，完全没有作科研。更痛心的是我几十年收集的图书资料荡然无存。虚度十年光阴，更是不可补偿的损失！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研究更得到特别重视。教育部号召各大学积极发动人口研究，由于师大领导的关心，我校的人口研究室终于恢复了。今天的我年纪已过八十，由于视力衰退，借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读书；右手发抖不能书写，不得不学会用左手写字。学校领导还给我配备助手，帮我写作。就在最近三年之中，我写了六本书，约一百万字。其中两本是专讲人口的。人口论文方面，如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试谈我国人口问题》、《人口规划和经济规划的重要性》、《我国各省区人口五十年来演变和地区差异》、《我国人口和粮食》、《世界人口和世界粮食》（以上均见《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1 年出版），以及《中国人口地理概要》等。1981 年我还在西德《地学杂志》发表一篇《中国的人口》的论文。1982 年 9 月又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人口地理》一书。

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了国土整治的伟大规划，国土整治的会内容有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地区规划等，这是振兴中华的伟大蓝图。我愿以我的余生尽力于这方面的工作，特别人口地理将是我集中研究的项目。呼吸一日不停，工作一日不止，我要努力争取夺回我在十年内乱中白白浪费掉的宝贵光阴，为祖国的人口地理学研究贡献自己一份余热。

附

人口增长是他的担忧 *

五十年前，中国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在中国地图上从东北的黑龙江省嫒瑶县到西南的云南省腾冲县画了一条直线，将国土面积约分两半，发现全国 96% 的人口都分布在这条线的东部。这位教授就是胡焕庸。

五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依然如此。两个月以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来上海拜访画出这条分界线的作者——现年 84 岁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胡焕庸教授时，田心源将这条分界线称为“胡焕庸线”。

1935 年，胡焕庸首次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发表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地图。《申报》（一份创刊于上海的报纸，发行时间为 1872 年至 1949 年）印发了胡焕庸发表的地图，随后美国地理学会的《地理学评论》也看中了这张地图，并翻译了胡焕庸的这篇论文。

1983 年，胡焕庸建议将中国分为八个区域，根据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气候、历史和经济与社会因素采用相应的人口政策。他的建议

---

* 原文为英文，标题为 *Population growth is his worry*，载于《中国日报》 英文版）1984 年 9 月 12 日，由《中国日报》记者 Lin Jue 采写。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缪鑫博士翻译。

被国家采纳了。1983 年夏天，胡焕庸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上海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一等奖（1978—1983 年）。

从三十多岁到八十多岁，胡焕庸的人口研究曾一度因为社会动荡而困难重重。他的著作《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人口地理文集》收录了他的 13 篇主要论文，记录了这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旅程。

胡焕庸的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当他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离世了。胡焕庸回忆道："我的母亲以缝纫为生，抚养我长大。她希望我像我的父亲那样，成为一个小学老师。"

但后来，当胡焕庸遇到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Cochin Chu）先生时，他的兴趣开始聚焦于地理。在法国求学期间，胡焕庸深刻认识到人与地理关系的重要性。胡焕庸观察到："如果一个地理学家忽视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么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做不了。"

胡焕庸在年近三十之时回到中国，他目睹了同胞们在自然灾害中流离失所。由于黄河泛滥，成千上万的家庭不得不在路边风餐露宿。这些灾民的全部家当都装在肩上的包袱里。妇女们搀扶着初为人父母的同伴，饥饿的孩童哭喊着想要食物。这个画面深深地烙印在胡焕庸的记忆里。人如何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更好？胡焕庸选择了他的志业：研究地理和人口的关系。但当时的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份科学工作——这份工作也涉及政治。

陈果夫，蒋介石政权的"四大家族"之一，开办了所谓的"农民银行"来敛财，掌控了因淮河泛滥而筹集的资金。在实地走访之后，胡焕庸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揭露这个所谓的银行并未真正帮助灾民，而借机敛财，给贫苦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的书销售一空，愤怒的国民党政府偷偷地买了这些书并将其焚毁。

但 1949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了这本书的复印本，并且征求了胡焕庸的治理建议。在胡焕庸的治理下，淮河泛滥的问题现

在已经不再是人们的噩梦。

日本侵略中国一度打断了胡焕庸真正想做的人口研究，直到1957年他才有机会重启人口研究。那时，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研究项目，胡焕庸全身心投入县域层级的农村人口分布研究。一年内，他接连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科研文章。

然而，一场新的政治浪潮让这个项目不得不戛然而止。直到1981年，胡焕庸才得以重建人口研究所并牵头开展研究。他现在正忙着拟八个区域的具体人口政策。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如何改变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比例，也成为他脑海中萦绕的研究议题。

胡焕庸目前感到喜忧参半。他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充满忧虑，但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有机会表达这些忧虑。"中国现在有10亿人，"他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后评论道，"从现在到二十世纪末，将有两亿人结婚生子。如果人口增长完全失控，可能100年内又会出现100亿人。中国人口很难在2000年时控制在12亿以内。"随着人口的增长，可耕种的土地却因建设和土壤侵蚀而不断减少，而人又离不开粮食。

胡焕庸的视力在逐渐下降，他的右手也一直在抖，因此他改用左手写字，与助手们一同工作。

胡焕庸说："宋朝的范仲淹（989-1052）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最喜欢的人生格言。"

第二编胡焕庸其人

19

19　胡焕庸（二排左五）与早年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生欢聚留影（1983 年）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20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馆，胡焕庸曾经长期在此工作。（1953 年起）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21　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代表团访问华东师范大学（1985 年）
李春芬（一排左三）、袁运开校长（一排左四）、胡焕庸（一排左五）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22　胡焕庸和华师大人口研究所同事（20 世纪 80 年代初）
图片来源：《梅花香自苦寒来》，2010 年

23

23　胡焕庸与吴传钧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前（1990 年）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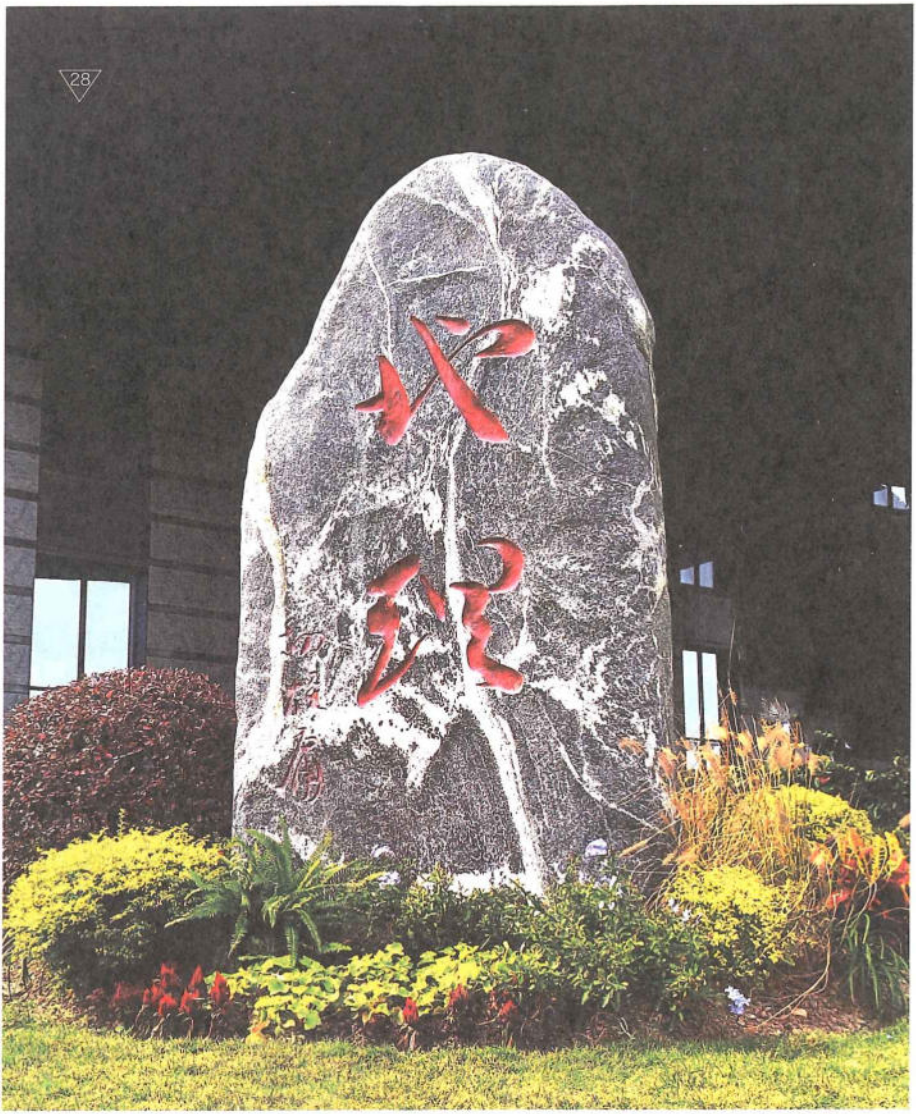
24　退休前的胡焕庸依然精神矍铄（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25　退休后的胡焕庸经常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散步（1991 年）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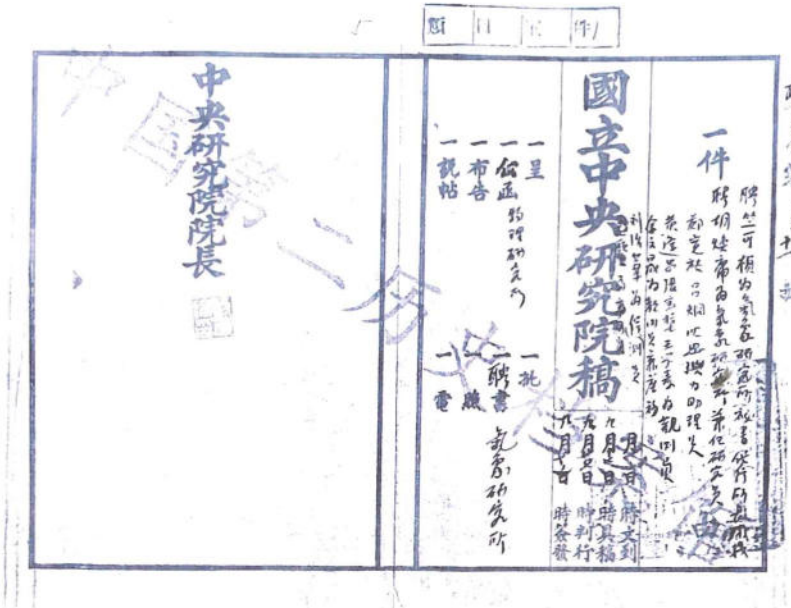
26　云南省腾冲市“腾冲—谖理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胡焕庸铜像（2017 年）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27　黑龙江省黑河市“谖理—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2020 年）（图片有部分处理）
图片来源：黑河市王殿杰提供



28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石，其“地理”二字系胡焕庸1939年手迹。（2020年）
图片来源：胡复孙提供

29　国立中央研究院文稿，聘竺可桢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权，聘胡焕庸为兼任研究员。（1928年）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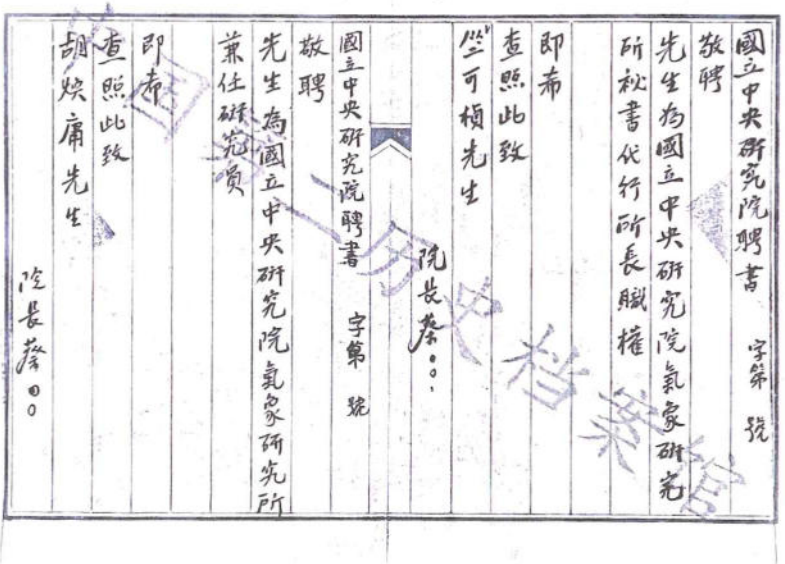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研究院稿

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件

一呈
一公函 一批
一聘書 氣象研究所
一布告 一職
一說帖 一電

九月廿日 時文到
九月廿日 時呈稿
九月廿日 時判行
時發



國立中央研究院聘書 字第 號

敬聘
先生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秘書代行所長職權

即希
查照此致
岱可楨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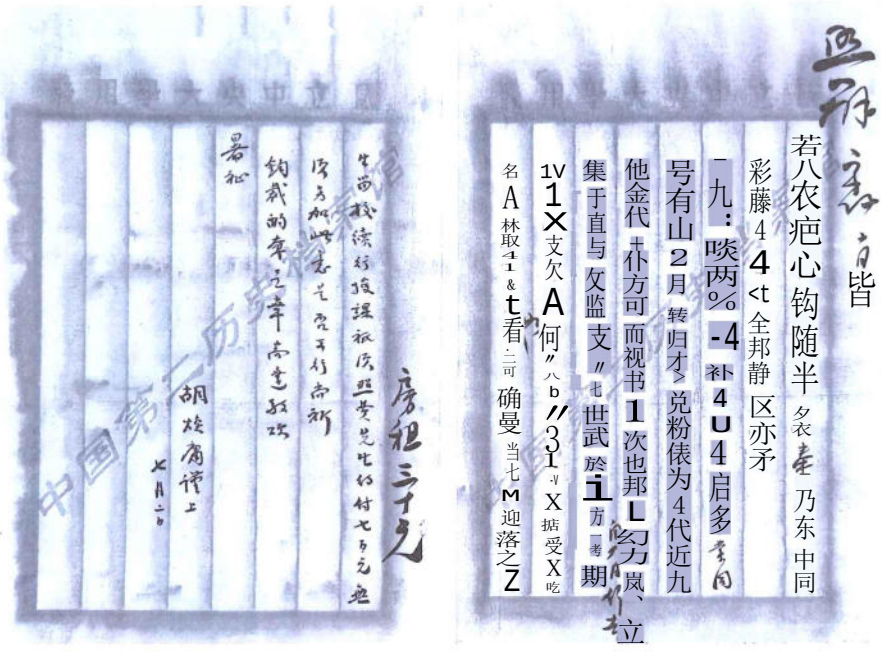
院長蔡○○

國立中央研究院聘書 字第 號

敬聘
先生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即希
查照此致
胡煥庸先生

院長蔡○○



30

30　胡焕庸致信校长罗家伦，要求毕业学生李旭旦留校任教。（1934年）

志希校长钧鉴，今晨奉到系中同仁聘书，业经分别转送。昨承俯允添聘助教一人，拟介绍本系毕业同学李旭旦君担任。李君成绩为全级冠，如能留校工作，当可有相当贡献也。郝克先生代课事项，与费师孟先生谈过。彼意：第一学期校中连费原薪可付八百元，易言之，即于费先生原薪外加一百元；第二学期费先生回欧，郝克先生留校续行授课，只须照费先生的付七百元，无须另加。此意是否可行，尚祈钧裁酌夺，是幸，常达敬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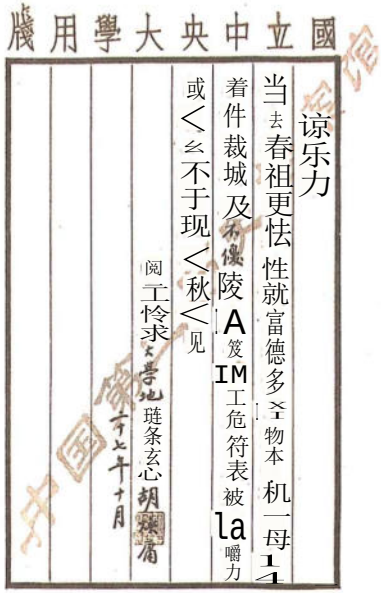
暑祉

胡焕庸谨上

七月二日

罗家伦校长批示：照办　家伦　七月六日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國立中央大學用箋
凉乐力
当去春祖更怯性就富德多文物本机一母
着件裁城及
陵A笈IM工危符表被la嚼力
或<幺不于现<秋<见
阅工怜求
琏条玄心胡
4聘帮俅4^^
手住月>$3两力
本年育起
一九X二

A

31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聘胡焕庸任中大地理系主任通知（1930 年）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32　香港中英文化协会设立了香港大学奖学金。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金祖孟参加保送选拔，系主任胡焕庸出具的证明书。（1938 年）

证明书
学生金祖孟赋性诚笃、治学尤勤，来校一学年，各科成绩无不优异，为全班之冠，将来继续努力，成绩必有可观，特为证明。
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胡焕庸
二十七年十月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该必方4手农 战同秘IM豫3芝修步U
考*勒摩
／用友1
人考来长644外 IM为jv北关此
传棒一、、加和图角力研甲资温
班用上备，假责族X 块滴WMIU
／枭向奢依节电ML
考级Al a 如嘉A中也公人义
血惧*

存加a方家福< 咛Y3法·南曾孤，可
勤出向区城龙：二修·监*概见：应
演培鸳破幺 君蛮我3人9〃3人父：人
收才·孽牝巨盘4^必於扁、一着包一彳
《因京而困见之央均·名今自知8次人
至343A.件汇侦方E1瓦供保4
VKX标心荤炼圣程不对伊闵
或曰：彳W

福4M4划 二14gIA 2人／>4人
二4"林东
人右左62众 NM际192功2头38双，
山1刀城眉色司，十速鸣氏了以右嚏融
对土小石5<»利同吁A现好黛1
加朴聆幻It JI
27加4 %一之以i号y：人
4戊叁±危幺1愎 ^
/方田£A石件 加噪4万4次巴各寺
、及A>日保族当挣好罚阵名我卫
<券，如圾1»由品M善工s不·高q
九彳九人以#-若>人多』&人58人
？》士学飞多先人？头H2工人学二纺
向潜a哥凡名石练支名有张南
全东/冶R五物2左点IHI4侪制一攵33
代tq

节模

阁

年来建设事业百端待举，每以人材缺乏难于积极推进。本校员生总数在四千人左右，平日弦诵忙迫，对于社会事业未能分身参加。然亦颇思利用暑假时期，对于社会、国家稍尽绵薄之力，如去年农学院员生参加四川增产工作即其显例。今年暑假除农学院大部员生将仍照去年成例参加四川增产工作，工学院员生将赴附近各工厂分任实习外，理学院地质、地理、生物各系、农学院森林系及农艺系病虫害组三年级学生，以及师范学院博物学系四年级学生，将组织一川西考察队，由教授率领作实地考察。四川为目前抗战建国之重要根据地，而川西一带尤有设为计划经济区域之拟议，一切建设为须先有实地调查以为设计之基础。此种调查工作如由政府机关组织，每感人材难集设备不足之苦。反之如委托学术机关担任，则人物两便有事半功倍之利。本校此次暑期川西考察计划，谅政府与事业机关必能乐为赞助善也。

考察办法

一、地质系

1、考察地点及工作　以乐山、犍为、峨眉、峨边、汉源一带为考察范围。因此区矿产丰富地质上亦至饶兴趣，其地位于川康两境乃将来开发建设，首先从事之区。

2、参加人数　教授三人、学生十五人，共十八人。

二、地理系

1、考察地点及工作　以川西南自贡峨眉叙府间为考察范围。此区为政府拟设之计划经济区域，应于全区经济地理尤其产业交通以及土地利用作一详细考察。

2、参加人数　教授三人、学生十七人，共二十人。

三、生物、博物系

1、考察地点及工作　以峨眉山至峨边一带为考察范围。此区地势高度自数百公尺至三千公尺，各种气候带之生物俱备，堪作比较研究并可采集标本以供经济建设之参考。

2 参加人数　教授三人、学生十七人，共二十人。

四、森林系

1、考察地点及工作　以理番、懋功、宝兴之巴郎山及峨眉马边间之大渡河流域为考察范围，对于原有森林之利用，以及现时荒山之植林特加注意。

2、参加人数　教授三人、学生七人，共十人。

五、农艺系病虫害组

1、考察地点及工作　以峨眉山至峨边为考察范围。除采集标本外特别注意昆虫生态之观察及峨山昆虫垂直分布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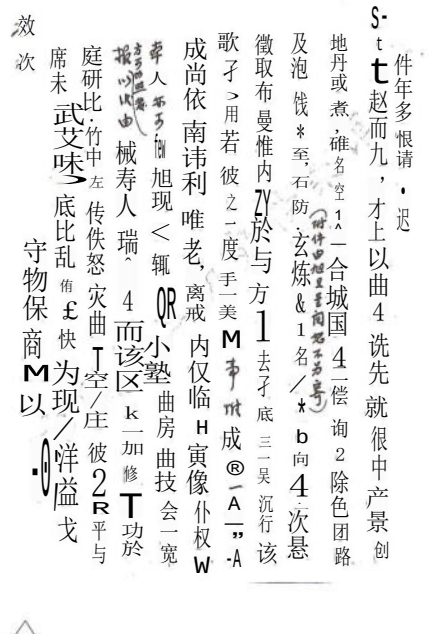
2、参加人数　教授二人、学生二人，共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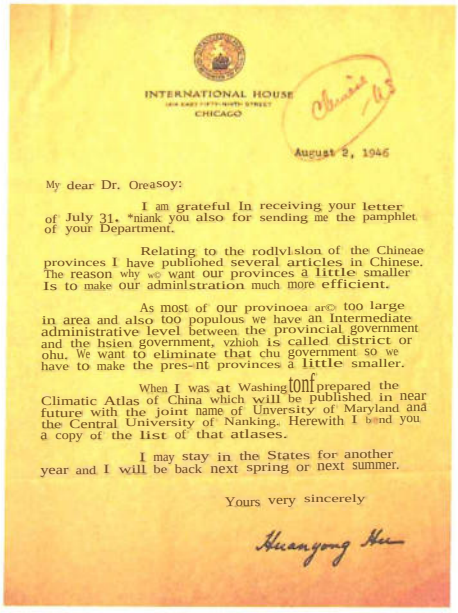
以上六系参加考察人数共计七十二人，考察时间假定为三个月。所有旅费食宿杂用每人每日以二十五元计算，全部经费约计十六万元。

详见概算书

附概算书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34 35

34 胡焕庸致信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孙光远，请中央大学为徐近之自美国返回中国借款提供担保。（1946 年）

佩金雪帆诸兄□此

正之光远两兄台鉴：上月底来诺克斯维参加美国地理学者联合会年会，被邀宣读论文联络国际友谊，结果至为满意（附件由旭旦呈阅恕不另寄）。徐近之君前虽已向英庚款领取旅费，惟此为数年前事，来美及在美求学该款早已用罄。彼虽一度在美做事，惟最近一年已久赋闲，经济情形确甚困难，如能请求官价外汇彼本人亦可负担。现使馆已允借垫，惟须由校来一电报方可照发，以后由彼本人请求外汇归还亦一办法（当初地理研究所曾允供给旅费两千美金，彼以已允中大聘未受其聘），请代设法免误行期为幸。常颂

教祺

一月二日

图片来源：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35 胡焕庸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B. Cressey）信，谈中国缩小省区和出版中国气候图集。（1946 年）

图片来源：香港岭南大学张雷提供

Chapter 03

第三章

学者人生

胡焕庸：刻在“瑷琿一腾冲线”上的学者

胡复孙

胡焕庸，字肖堂。江苏省宜兴人，出生于晚清的1901年，求学于民国时期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1928年8月回国，先后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国立中央大学[①]教授、地理学系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教务长，兼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1950年起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教务长，1953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80年后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等。他的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1998年4月以98岁高龄谢世。

胡焕庸一生著作甚丰，对中国现代地学的诸多学科均有重要贡献。他于1935年6月提出了中国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域的人口基本差异，并以黑龙江暖璀至云南腾冲一线为界，此线后被地学界誉为“胡焕庸线”。

① 国立中央大学最初于清末在南京创立，其间名称及沿革历经数次变更。1928年5月，该校定名国立中央大学，此名称一直沿用至1949年8月。1949年8月后，该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该校各学院分别独立建校办学。本书中提及的“国立中央大学”，均指1949年8月之前的该校。——编者注

童年与求学

江苏省宜兴县是人才辈出的“教授之乡”。胡焕庸出生不久，其父胡际堂，一位在宜兴扶风桥任私塾教师的当地秀才，便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此后，胡焕庸仅靠母亲黄毓文以缝纫加工为生供养其读书。他中学毕业于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19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为南京高师校长。郭校长勤于思考，又善于交流，提倡中西文化互补的科学态度。南京高师的教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曾留学欧美日，各科系均有一流的学术带头人，因此，南京高师名师济济，从此名满天下，进入了极盛时期。被后人誉为群贤荟萃的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一级，正是这一时期的学生群体。

1920 年 9 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先生来校任课，开设地学通论、气象学、气候学、世界地理等课程。胡焕庸与张其时等六位同学一同师从竺可桢教授，专攻地理和气候学。同年底，教育部确定将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竺先生任地学系系主任。当时建立的地学系包括地质矿物和地理气象两个专业，同时也建立气象气候站，出版《南京气候报告》，与世界各国气象台站进行资料交换。此外，地学系还先后出版了《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地理杂志》《方志月刊》等多种刊物。

1919 年 10 月，南京高师地学研究会成立，后更名为史地研究会。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养秋、白月恒、曾膺联、梁启超等 10 多人担任指导员，其中柳诒徵、徐养秋和竺可桢三位自第一届至第八届均担任了指导员。他们对研究会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史地学报》的创刊和持续出版，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学生的学业进步和终身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史地研究会期间，胡焕庸两度当选总干事。任职期间，“筹备会

刊则为本届最注力的事”。在会刊《史地学报》创刊号上，胡焕庸发表了《欧战大事记》。《史地学报》共刊载文章300余篇，其中胡焕庸发表20篇。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威尔逊总统顾问、地理科学家I.鲍曼（Isaiah Bowman）搜集了所有国际地理问题的资料，出版了*The* New World, 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yo勿一书。胡焕庸和张其昀、王学素等八位同学在竺可桢、任鸿隽等四位先生的指导下，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署名《战后新世界》作为毕业纪念。该书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1928年和1930年先后加印。

1923年夏，胡焕庸从南京高师毕业后，应聘前往扬州第八中学担任史地教员和训育主任，执教二年半。1926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足东南大学学分获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学习法国学派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在法国期间，胡焕庸深入了解了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广泛阅读了各种学派的论述，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视野。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学习地理科学不仅要了解人地关系，更要重视研究人地关系最为集中的人口地理学。胡焕庸的留学经历使他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任教中央大学的早年岁月

1928年5月，时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系主任的竺可桢，致信理学院院长胡刚复，要求聘任胡焕庸回校任教，张乃燕校长随即给尚在法国留学的胡焕庸邮寄聘书。8月，胡焕庸回到南京，任职中央大学地学系副教授，同时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气候和协助竺可桢筹办气象研究所。在1928年12月的第四届中国气象学会中，他担任总干事；在竺先生外出时，他

代理气象研究所所长主持工作。

1928年末，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竣工，在《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题签了书名并作序，胡焕庸写有《钦天山观象台故址重建气象台记》。

1929年9月，胡焕庸辞去气象研究所的兼职，回到中大地学系专任。

1930年2月，中大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分系独立，胡焕庸出任地理学系系主任。自此，中大地理系自成体系，不断发展。地理系成立初期，主要教学骨干为胡焕庸、黄国璋、张其的三位。胡焕庸主要讲授气候学、经济地理学和欧洲、亚洲自然地理，张其昀讲授中国地理，黄国璋讲授世界经济地理和美洲地理。另外，还有两位南京高师毕业的助教，沈思屿讲授气象学，王勤堵担任地理考察教师。胡焕庸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创始系主任，也是唯一一位在抗战期间随地理系西迁重庆八年，并在战后复员胜利还都南京的地理学者。许多在中国地理界和气象界有很大贡献的学者都是这一时期的学生。

1931年9月，胡焕庸应江苏省教育厅的多次邀请，兼任省立苏州中学校长一个月，主持开学工作。然而，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造成社会形势空前紧张，校长岗位无人肯接。在此严峻时刻，胡焕庸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选择与苏中师生在一起，忍痛“向中大恳辞”。但是中大地理系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校长朱家骅和理学院均不同意胡焕庸辞去地理系系主任，地理系同学会也强烈要求胡焕庸主任不能离开。于是，胡焕庸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南京、苏州两地奔波，每周在中央大学和苏州中学各三天主持工作。1932年9月新学年开始，胡焕庸在中央大学请了长假，专任苏州中学校长一年。

在苏州中学校长任内，胡焕庸屡次慷慨激昂地鼓励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教育学生国难当头更要努力学习，让自己更加强大，将来报效国家。他组织编制并完善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教学要求和教材，推行了“男女同校”政策，创办化工科、印刷科等职业课程，提倡“全人”教育，即“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当学生毕业时，他都亲往送行，并勉励毕业生发扬“治国之本在齐其家”“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之精神。1933 年江苏省高中会考，苏州中学考生成绩优异，不仅前十名中有六名是苏中学生，前三名也尽为苏中包揽，这段历史苏中至今仍引以为傲。至此，胡焕庸在苏州中学已工作两年。其间，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多次要求胡焕庸遂回中央大学工作。胡焕庸也按照此前的约定，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了辞任苏州中学校长的申请。

1933 年 8 月，胡焕庸回到中大地理系专任。此时地理系的主要班底为：胡焕庸教授、黄国璋教授、张其陶教授、王益厘教授、费师孟教授（奥地利籍）、刘恩兰教授（兼职）、饶美亚教授（奥地利籍、兼职）、沈思屿讲师、徐致勋助教、邓启东助教、严德一助教。1934 年以后，张其昀匀请假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门委员，同时在地理系兼任教授。经系主任胡焕庸提议，中大地理系毕业生李旭旦留校担任助教。

1933 年 7 月，法国宣布占领南海的安波岛、南伊岛、东北岛等九个岛屿。中国政府当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而早已觊觎南海的日本也“隐瞒事实，信口雌黄，谓其曾于西沙群岛开采磷矿，因此公然宣传谓西沙群岛，亦当属于日本”。妄称不仅南海九岛为其所有，而且西沙群岛均系日本所有。面对法日觊觎、侵占我国南海诸岛的恶劣行径，胡焕庸明确提出，应以“南沙群岛”之名命名此群岛。此后，胡焕庸长期坚持要求国民政府重视南海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领土问题。在其后他发表在各处的关于地缘政治和中国国防的文章、演讲中，一直坚持研究和呼吁重视中国的边疆安全和海疆安全问题。

1934 年 3 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胡焕庸和柳诒徵、翁文

濒、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王庸、向达、张其昀、谢家荣、叶良辅、洪级、黄国璋、刘恩兰、曾世英、顾颉刚、谭其骧等 40 位学者是学会的创始发起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当选理事长。翁文源、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王益度、张印堂、张星娘、董绍良等九人当选为理事。

中国地理学会指定张其昀兼任干事，胡焕庸兼任会计，此后他们连任三届。学会会址和《地理学报》编辑部均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地理学报》专载“会员考察研究所得之创作文字的内容精深，于推进学术裨补国防贡献甚多，又因附有西文摘要国际间极负声誉”。自此，中央大学地理系就成为全国地理学术活动的组织核心和地学研究中心、近代中国地理科学的发源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地理系系主任胡焕庸在中国地理学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1937 年 4 月，翁文灏连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胡焕庸当选总干事。1943 年 7 月，胡焕庸当选理事长。1947 年 8 月连任理事长，1950 年 8 月卸任。

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地理科学”发展成独立学科。而《地理学报》的创刊和坚持，为中外地理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这是中国地理界的仁人志士与其他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他们担当“科学救国”责任的具体体现。正是他们的可贵坚持，使地理科学不仅保证了战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也为战后建设地理科学打下必不可少的基础。

1934 年 7 月，胡焕庸率学生李旭旦、楼桐茂等五人组成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前往苏北考察淮河水利以及沿海地区废盐改垦情况，写成《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该书主张导淮应以江海分疏为原则，尽快推进淮河入海工程。淮水入海路线只能够由淮南低地另挖一条水道，选择直接引水人海，并同步主修三河坝等设施，以整理淮水入江

通道。由于该书批评了当时政府的导淮计划，近千册成书大部分被私下搜去销毁。

1934 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胡焕庸先后发表了 10 多篇有关人口地理的论文。他关于人口的研究，强调地理和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

1935 年 6 月，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他依据搜集的全国各省人口统计数据，将其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前者以每点代表两万人，后者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八个等级，直观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在该文中，胡焕庸以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综合思维，将中国地形图和雨量图与自己制作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比较，发现了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他依据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为基础，断定以黑龙江省暖琉至云南省腾冲的连线为界，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的基本格局。他在文中提出：

> 今试自黑龙江之谖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后，1939 年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特请胡焕庸编制了“重要城市及人口分布图”，并注明该图是“采用中央大学胡焕庸氏人口分布图”。此后出版的各种中国分省

地图都附有这张图，胡焕庸制作的人口密度图也同样被其他出版社采用。自此，“瑷璀一腾冲线”成为胡焕庸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标志。

1935 年冬，胡焕庸和张其啊等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胡焕庸担任会长。会员 200 余人，以大、中、小学地理教师为主，1936 年 4 月起，研究会开始出版《地理教育》月刊。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与《地理教育》月刊的登记地点和《地理学报》一样，均设在胡焕庸担任主任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地理教育》月刊“专以推进地理教育研究、中小学教法为宗旨”。出版以后风行全国各级学校，地理教师人手一编，于教育方面贡献甚大。在此期间，胡焕庸还为商务印书馆编绘了《中国地理挂图》和《世界地理挂图》两套共 24 幅，旨在用于中小学地理教育。后来图版毁于日军轰炸，未能出版。

1936 年 3 月，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了《中国之农业区域》一文。文中依据温度差别、雨量分布、农产分布、地形特征、粮产地域分布、人口密度等因素，特别是根据各种农产品的分布情况，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农业区域，即东北松辽区、黄河下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丘陵区、西南高地区、黄土高原区、漠南草地区、蒙新宁干燥区、青康藏高原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农业区划方案，也是此后中国长期大规模农业区划研究的学术起点。

1936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转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随后，张其昀、沈思屿等也相继前往浙江大学任教，黄国璋前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任职。中大地理系则陆续补充了丁骗、涂长望、徐近之、陈宗经、黄厦千、沙学浚、王维屏、袁著、朱炳海、李春芬等一批教师，长期保持着充实的教授阵容。

1936 年 10 月，胡焕庸主编的《黄河志》第一篇《气象》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黄河全流域的气候状况，对于治

理黄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7 年 4 月，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从云南至贵州的公路修筑完成，京滇公路全线打通。京滇公路起自南京，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贯通六省直达云南昆明，长 2974 公里，是当时中国东部与西南地区联络公路的唯一干线，于政治、国防、经济、文化和交通都有极重要的作用。4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出大型考察团 ——“京滇公路周览团”。周览团的成员大多是党政机关资深官员、沿途律省市政府代表、社会各界的精英，工商、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京沪各大报馆代表等，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助教严德一代表中央大学和中国地理学会参加。周览团从南京出发，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北九省，历时 25 天，于 4 月 29 日到达昆明。途中胡焕庸就所见河流水源、地层地貌及岩石种类等向同车团员多有介绍，也在贵州、昆明等地举办科普讲座和演讲。他还乘滇越米轨铁路直到越南河口。以后又从昆明再经贵州到重庆，再由重庆回到南京，全程 52 天，行程 11000 多公里。胡焕庸原意是要将这一段近两个月的行程作为一个工作项目继续研究，但是因为不久的抗战奋起，中大西迁，没有能够把这一研究课题完成出版。

障校西迁重庆

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决定将政府机关、经济机构、文化机构、兵工厂和国立学校等迁往西南大后方。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2 月 1 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大学的工作重心迅速转向部署西迁至大后方。9 月 23 日，罗家伦校长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时，中大将已经提前赶制完成的 2008 只坚固木箱（箱内钉有铁皮）及各种包装物，装

载上图书、仪器和各类物资资料，分三批运往下关码头，搭乘民生公司的货轮，沿长江向西南进发。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也随即分批经由汉口、宜昌、万县向重庆西迁。地理系系主任胡焕庸提着手提箱，带领着几位受家长嘱托的女学生一同前往重庆。至当年 10 月底，中央大学已全部搬迁至重庆。11 月 1 日，中央大学在所有迁往重庆的大学中率先复校开学。

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的沙坪坝以后，虽然面临诸多困难，教学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在胡焕庸的主持下，地理系仍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除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地理系新开设了与抗战形势相关的课程。胡焕庸讲授国际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和四川地理。“内容根据政治地理原则说明现时国际关系与纠纷，如日俄在亚洲东北之冲突，日美在太平洋上之争霸，不列颠帝国之经营，法德关系，地中海问题、中欧东欧各国际关系。就本国经济情形说明对于抗战之关系。”丁骕讲授苏联地理，黄厦千讲授航空气象，徐近之讲授康藏地理，朱炳海讲授高空气象。这些课程部分介绍西南和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状况，部分则从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角度解读抗战形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大学生发起的中华自然科学社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仍坚持召开年会、发表学术演讲、出版科学期刊、编辑国防科技丛书、组织科学考察、开展学术交流、发展中学理科教育等一系列的科学活动。其间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外曾设有 28 个分社，1947 年底社员总数达到 2000 人以上，社员的专业涵盖 11 个自然科学学科门类，在民国科学界中具有广泛代表性，成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综合科技社团。

胡焕庸作为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理事及社长，积极参与了自然科学社的筹款、科普、演讲、组织考察等活动。他呼吁政府重视科学理论、增加科学家生活补助，并号召科学界加强

中小学自然科学教育、增加大学的科学设备、充实现有的科学机构、培养训练研究人才、增设研究所、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奖励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积极投身“抗战建国”和“科学救国”的要求中去。在胡焕庸的持续呼吁下，国民政府和教育部也开始从战时重视应用科学研究，转向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通过提升高等教育层面的基础科学教育水平，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经济中心相继沦陷，战时的经济中心转向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军事压力和人口剧增迫使国民政府采取非常措施，以满足战区军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1938 年以后，由于生活物资短缺和投机行为严重，重庆物价飞涨，居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稳定中央大学的教师队伍，胡焕庸多次组织中大教授向教育部长陈立夫上书，要求增加教职员生活补贴。

沙坪坝作为文化区，聚集了中央大学等众多学校以及大量西迁居民，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在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吴朗西的倡议下，胡焕庸等人联合发起创立了股份制消费合作组织——重庆市沙坪坝消费合作社。胡焕庸邀请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以及部分政府机关要员加入，并以西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中学等大区的 139 名教职员作为社员主体。合作社理事会推举胡焕庸担任理事会主席，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光远担任监事主席，吴朗西担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工作。

胡焕庸提出组建合作社的目的“不仅为解决少数人经济问题物资问题，并且想以事实来证明合作功能的伟大”。他为沙坪坝消费合作社制定的宗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要求合作社的营业“旨在便利大众，而非牟利，因此货物定价应力求低廉”。合作社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规模宏大、组织完善、业务甚为发达”，向万余名

社员平价供应了米、面、油、煤、布匹等日用消费品，为平抑物价和改善社员生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胡焕庸对这个改善教职员民生的项目非常重视，“平时督导该社极严”。即使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工作极为忙碌，每逢星期日照常到社 "召集主要职员，查询毫不松懈”。

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积极评价，沙社是1941 年重庆市消费合作社中盈余最多的，也是在重庆市组织的消费合作社竞赛成绩得分最高的。1942 年 12 月，社会部合作管理局指定沙坪坝消费合作社为消费合作社示范社。

抗战期间，胡焕庸在重庆出版了《国防地理》一书，并多次发表演讲。在教育部发表的抗战演讲八集《地理与国防》中，胡焕庸多次分析到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在国防上的地位，呼吁读者和民众重视边疆建设，努力加强教育，注重人才培养，推行廉洁政治，实施经济开发。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泱泱大国，其国土面积接近于一个欧洲。省级行政区域面积过大、人口过多，是现行行政区划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历史上，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深感省区过于辽阔所带来的管理难题以及军阀割据的弊端，历来都有改革省制、缩小省区的呼声。

1939 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指定胡焕庸主持省制问题设计委员会。胡焕庸组织了 20 多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缩小省区研究方案。这份“胡氏分省方案”拟将“全国合计共为六十四省和两个地方（蒙古和西藏）。省长由文官担任，县长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则 ’操纵割据，势无可能’”。该研究方案被确定为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一。1947 年，国民政府在东北进行分省试点，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我国行宪后的第一件大事，即为缩小省区”。然而，由于内战扩大，国民政府再无力推行全国行政区划的变更，这个精心设计多年的治国大计终告夭折。

1941 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下设地理与气象两个组，专门承担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地理学研究生的研究机构。地理系系主任胡焕庸兼任地理学部主任，学部教授有胡焕庸、丁骕、李旭旦、黄厦千、涂长望和朱炳海。三四年间先后招收四批研究生，共 10 余人。他们主要从事四川省各地的小区域研究，当时获得硕士学位的有吴传钧、宋家泰、金祖孟等。地理研究部刊行了多种研究专刊和丛刊，专刊有《峨眉山之气候》《新疆之气候》，丛刊有《西文新疆书目》《河西新疆图集》等。中央大学地理系聚集和培养了许多地理学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地理学教育机构，在地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引领着中国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发展。

1941 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具体条件是：“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 10 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且声誉卓著；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备特殊贡献者”。部聘教授除从事讲学及研究外，经教育部委托“应担任其专长学科有关的辅导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对于该学科之教学与研究有关事项；与该学科有关之学术审议事项；承办专科视察巡视讲座及其所咨询事项等”，名额暂定 30 人。1942 年 8 月，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投票，中央大学地理学家胡焕庸、心理学家艾伟、社会学家孙本文、林学家梁希和生理学家蔡翘等 5 位知名教授首批人选。1943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部聘教授 15 人名单，其中中央大学有 7 位，分别是国文学家胡小石、语言学家楼光来、历史学家柳诒徵、教育学家常道直、法学家戴修瓒、化学家高济宇、艺术家徐悲鸿。部聘教授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规格最高的教授群体，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享有极高的学术荣誉。部聘教授的评聘和坚守岗位，对战时中国学术薪火的传承、教学标准的提升以及大学地位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焕庸对中国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异极为不安，多次向政府提出重视中国的边疆安全、海疆安全，加紧建设西部地区的意见。1942 年夏天，四川省政府和中央大学联合组成川西考察团。胡焕庸组织中大理学院地理系、地质系、生物系和师范学院博物系、农学院森林系、农艺系病虫害组等六个系（组）的教师、研究生和四年级学生 100 余人参加川西考察。考察团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担任名誉团长，胡焕庸担任团长，地质系系主任张更、农学院院长邹钟琳任副团长，李旭旦、张更、陈义、干铎、沈其益分别担任地理考察队、地质考察队、生物考察队、森林考察队和农艺考察队的队长。考察团 8 月初出发，先后从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到乐山、峨眉、雷波、屏山、峨边、马边等县，走进了大凉山彝族人生活区和临近云南的金沙江流域。此行除了搜集到大量矿物和生物标本外，还发现一处“藏量极丰、品质极佳”的铁矿，并编制《川西考察报告》供政府参考。

1943 年 2 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辞任，由蒋中正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蒋校长聘任前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任教育长、胡焕庸任教务长、周鸿经任训导长、江良规任总务长。胡焕庸在就任教务长之际，辞去了已担任 13 年的地理系系主任职务，并推荐李旭旦接任。时年 32 岁的李旭旦，4 年前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和剑桥大学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大“最年轻的教授”。

胡焕庸在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期间，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勉励学生珍惜学习机会，加强“做人”训练的全盘发展，加强基础训练，学好国文和英文，既不要死读书，也不能忽视文化基础的训练，过于注重“死活动”。他提出：“学问虽然重要，身体也需顾到；身体虽然要强健，学问也不能疏忽。做一个健全的人，学问、身体、才能、品行都要兼顾，都要完善。人是整个的，又是多面的，发展须力求平

均”，以期学生成为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

中央大学整建制西迁重庆的教职员和学生近 6000 人，各方名流学者云集于此，开具课程近千种，门类之齐全专业之广泛国内无可比拟。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办好这样一个规模的大学，教务长压力之大、困难之多难以想象。这充分展现了胡焕庸出色的行政团队管理能力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其间，教育部两次派员对中央大学进行视察，视察的意见除对体育及卫生设施要求改进、学生课程繁重、恐文能力较差外，其他方面均给予较好评价。

1942 年起，为配合盟军的对日作战，保证驼峰航线、滇缅公路、缅甸大反攻等大量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国民政府制订了 3000 人的译员培训计划，后增至 5000 人。其生源主要来自大学及专科学校男学生、在职编译人员和英文较好的知识分子。经过数周培训，由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和中国战区美军总部，依据培训成绩分配工作去向。

译员培训分别在重庆、昆明两地进行。重庆的军事委员会沙磁译员训练班，其办公处和训练点就设置在中央大学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兼任训练班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胡焕庸任副主任并实际负责训练工作，各科教官均由中大教员担任。

1944 年 3 月 17 日上午，除已经提前出发的 68 人外，其余 334 位应征同学全体齐集中大升旗台前，与母校告别。全校师生均前来欢送。中大教务长，军事委员会沙磁译员训练班副主任胡焕庸代表中大全体师生致欢送辞。致辞完毕后，在爆竹声和口号欢呼声中，全体应征同学高唱战歌，列队离校出发，徒步前往中央训练团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走向战场的抗日大学生途经沙坪坝和小龙坎等市区时，沿途居民夹道欢送，场面盛况空前。

1945 年 1 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胡焕庸在重庆出版《台湾与琉球》一书，书中大声疾呼：“台湾琉球，一日不能收复，则我海上活

动，一日不能越出黄海东海范围之外；台湾琉球，有如我国海上之外篱，南下而向南洋，必须经过台湾海峡，东向而出太平洋，必须经过琉球群岛；未有外户操之于人，而能立国于地球上者！20 世纪，乃为大洋交通之时代，未来新中国之发展，万勿再踏过去重视大陆轻视海洋之覆辙，而应以海陆并重为我国最高之国策，愿我国人，速起图之！"此后数年，胡焕庸在多篇文章和各种场合中不断呼吁，要毫不犹豫地收回琉球。遗憾的是，胡焕庸的呼吁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琉球群岛未能与台湾一同光复，为日后中日两国的东海争端埋下伏笔。

1941 年秋，胡焕庸兼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1942 年 8 月，当选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1943 年 3 月，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7 月，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加上同时期担任有 1200 多名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胡焕庸担任了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职务，并且成为地理学界的领军人。

在抗战期间，胡焕庸还担任过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学课程研究委员会委员、高初中史地应征课本评选委员会委员、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为推广抗战期间的国民教育工作，他积极参加了教育部的各种活动。他对民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稳定发展，对中国地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战时自然科学研究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科技界的重要力量，是有卓越贡献的。

抗战胜利后的三年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胜利，10 月，受教育部委派，胡焕庸以教育部部聘教授名义从驼峰航线，经印度加尔各答去美国，先后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考察研究。

胡焕庸首先在纽约拜访了美国地理学会，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地理学的发展情况。1946 年 1 月，他到华盛顿出席了美国地理学会战后第一次年会，并且在《地理学评论》《经济地理》《美国气象学会会刊》发表了论文。之后胡焕庸应马里兰大学之邀担任研究教授，讲授远东地理，同时按照中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合作计划，主编《中国气候图集》。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借用研究室看书研究，考察访问了哈佛、克拉克、俄亥俄、芝加哥、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等大学的地理系。1947 年 2 月，胡焕庸回到南京。通过对美国的考察，他深刻认识到在美国的社会制度中，地理学教育研究与社会进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他一再呼吁所有大学都要重视地理教育。

回国后，胡焕庸创办了《社会公论》政治评论杂志，刊登自己和其他学者在美国考察后的新见闻、新思想，以及政论和时事评论，内容涉及日本战后的处置、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战后国际关系以及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议等。他多次提出政府应尽快实行土地改革，“取消地主阶级的剥削，痛快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1948 年 3 月，行宪“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胡焕庸作为教员团体东区的“国大代表”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多次呼吁政府要尽快实行土改，提高公教人员待遇，重视民生，重视教育。

1948 年末，内战愈演愈烈。国民政府行政院开始部署机关和大学的迁移工作，并要求各大学安排南迁事宜。为了寻找南迁校址，中央大学派出三路人员去台湾、福建和广州选取新校址。胡焕庸去的福建，初步确定了利用厦门大学空余的校舍和空地，以及南普陀和集美、鼓浪屿等四处作为中大的新校舍。后因战事变化迅速，中大校务会议决定“以不迁校为原则”。

1949 年 1 月 31 日，因校长周鸿经和训导长沙学俊、总务长戈定邦等突然弃职离校，中大教授大会自发选举成立了“临时校务维持委

员会”负责校务，由常务委员梁希、郑集、胡小石主持校务工作。4月12日，中大教授会在大礼堂召开紧急大会，接受校维会总辞，并当场票选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教授会理事胡焕庸被推为改组后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和校维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同日，在中央大学教授会理监事会上，胡焕庸被推举为理事会常务理事。4月21日，教授会主席郑集教授赴美国讲学，行前致信胡焕庸、梁希、欧阳翥三位教授，将中大教授会的全部工作委托给他们三人。其间，国民政府为胡焕庸准备好了去台湾的机票。但是他没有去，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治理淮河的水利专家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新政府华东高教部通知胡焕庸等八位中大教授去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其间除了学习外，更多的是要求他们交代并反省自己的“反动”历史。胡焕庸从此被限制使用，历次政治运动无一幸免。

一年后，胡焕庸的审查学习结束，但他却遭到阻挠，无法回到已更名为南京大学的前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也不能在北京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这位地理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教授，一时间无人敢用，无处可去，几乎失业。

淮河发源于河南，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是中国的主要江河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区域之一。然而，淮河水系长期受到黄河泛滥夺淮的影响，遭受了巨大破坏，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1950年6月，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淮河平原几成大湖，几百里汪洋遍地，嚎哭其状凄惨至极，被淹田亩超过四千万亩”。政务院批准将胡焕庸调到治淮委员会工作。淮委专门设立了技术委员会并任命他为技术委员。

胡焕庸不负众望，和淮委工程部的技术人员一道，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在淮河上游山区多建山区水库、疏通旧有河道、开挖新河；在淮水的重要地段洪泽湖，建设控制水量的三河闸等调水设施，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苏的众多淮河中下游河道，修建堤防和二十多处水利设施，将部分淮水控制性引入长江入海；在苏北开挖新入海水道等一系列治淮意见。胡焕庸重点参加和指导的新开挖淮水入海通道“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工作，实现了他早年提出的治淮重要f•步。治淮工程是新政府的第一项国家重点工程，政府连续 3 年拿出水利经费的 60% 以上专项用于治淮，极大地提高了淮河沿线的防洪泄洪能力。

在淮委工作期间，胡焕庸还负责治淮工程陈列馆的设计和筹建，并兼任资料室主任。他收集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与淮河流域有关的地方县志约 250 部，用以研究淮河流域水灾成因，这些资料后来形成了淮河流域宝贵的文史宝库。参考各种资料，胡焕庸起草了《淮河水道志》，并先后写成《淮河》《淮河的改造》《祖国的水利》等书出版。

1952 年初，治淮委员会决定筹办正规学校培养技术干部。胡焕庸担任了“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建校筹备处主任，建校完成后亲任教务长兼水利工程专修科主任。1953 年 8 月，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部将他调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回归教育界，任教华东师范大学

1951 年组建完成的华东师范大学，其地理系的班底源自竺可桢主持多年的浙江大学地理系，该系自杭州迁来，其学术渊源还可追溯至中央大学地理系，部分学者曾是胡焕庸在中大地理系的学生。胡焕庸将家迁至上海，此后终身再未踏入南京一步。

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本是胡焕庸最熟悉的专业领域，时年 50 多岁

的他，正处于科学家的最佳工作年龄。担任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的胡焕庸深知，人文地理已遭受严厉批判，于是他远离这一禁区，另辟蹊径，专注于自然地理的研究，主要研究相对“安全”的欧洲地理和古地理学。

自 1956 年起，为满足本科生的学习需求，胡焕庸编印了一系列自然地理教材，包括《亚洲自然地理》《欧洲自然地理》《各洲自然地理参考资料》等，总计达 150 万字。其中部分用于本科学生教学，部分作为函授教材，供学校内部使用。

1957 年 9 月，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设立 18 个研究室，其中就包括由胡焕庸提议成立并担任主任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他以 1953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率领师生到江苏省的南通、常熟、宜兴等地进行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调查，很快整理出关于这些地区的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研究报告，延续了 20 年前的人口地理研究。不幸的是，在不久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因建议对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以控制，受到高层批判并被撤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也殃及人口研究的所有领域。胡焕庸与马寅初同为提倡“计划生育”的著名学者，随着“运动”的深入，已经取得初步成绩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也受到波及，被迫撤销。

1958 年 10 月，受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上海市河道工程局、江苏省农林局以及浙江省农业部门的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大部分青年教师和二、三年级学生共 330 人，历时两个多月，赴长江三角洲五万平方公里地区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综合调查。时年 58 岁的胡焕庸是地理系最年长的教师，他主动向系里提出要求，参加自然地理调查大队的南通扬州队，前往扬州、泰州、兴化等苏北里下河地区进行考察。

江苏北部的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历次淮河泛滥都会首先受到波及。20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治淮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开辟了苏北灌溉总渠，整修了洪泽湖、运河大堤和海堤之后，苏北里下河地区淮水泛滥得到了有效的疏导和控制。年近花甲的胡焕庸也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起，以步行为主，完成了这次考察。

1961年8月，胡焕庸和地理系系主任李春芬共同招收了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地理系6位本科毕业生人选。这6位优秀盘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批世界地理专业研究生，他们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工作。

在胡焕庸的教学生涯中，他讲课总是先摆明事实（特征）再讲清道理（原因），讲课重点突出、板书认真有序，并且与学生平等交流，深受学生欢迎。他常说："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是地理。"胡焕庸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运用各种国内外的地图。据学生们回忆，胡焕庸上课时使用的教学挂图是最多的，经常用到10多张，最多时甚至挂满了教室的三面墙面。从地形到气象挂图，色彩鲜明、过目不忘。他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特别是国外的参考书，看书时要先看书后记载的参考文献，再看目录，以便迅速地加深对全书的概略印象。他自己熟练掌握了英、法、德、日、俄等语言，很重视学生对外语的掌握。他不仅要求学生能够自行阅读国外出版的参考资料，还利用各种机会在课外辅导学生学习外语。即便是在"文革"中身陷囹圄，他也不忘自己的职业，利用这个时间教狱友法语，度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央领导指定华东师大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并要求首先从事法国的研究。胡焕庸早年在留学法国期间就考察过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并担任过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他广泛搜集资料，主要根据法国国家大

地图集和各项经济统计，选用和自制了包括 81 幅地图、78 张统计表和 4 万多字的文字说明，完成《法国地理图志》两册，该图志对于法国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全面而详尽的说明。但此书只供政府内部研究使用，未公开发行。完成此书后，胡焕庸便着手搜集有关英国和西德的资料，打算编写《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但是社会的巨变再次中断了胡焕庸的工作。年近七旬的他除了随时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扫马路和清扫厕所。1968 年 5 月，胡焕庸又被“拘留审查”，非法关押长达五年一个月之久。

平反冤案，回归学者生涯

“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对胡焕庸历经 13 年的“审查”结束，“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学校也补发了他的工资，并为他配备了助手。从此，已经是八旬高龄的胡焕庸，完全恢复了自己的名誉，重新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敬仰，在他有限的晚年时光里，步入了学者的至高境界。

1980 年元旦期间，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代表大会。此次会议被誉为“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胡焕庸也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地理界，和几代地理学者欢聚一堂。劫后余生的胡焕庸和中央大学时代的部分参会学生留下了“史无前例”的珍贵纪念合影。

1981 年 2 月，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时年百岁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当选为首届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胡焕庸受邀参会，并担任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顾问。胡焕庸是计划生育的长期倡导者，但他更主张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要提高人口质量，并根据人口密度分区研究制定不同的人口政策。

20 世纪 50 年代末，胡焕庸曾经数次开设“古地理”课程，着重分析全世界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为此，他广泛搜集关于造山造陆的

学说，并加以比较研究。恢复工作以后，他发现在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期间，国外已经完成了地学领域的一次大革命：板块构造、洋底扩张、大陆漂移与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经完全确立，而我国地理学界对此却重视不足。为此，胡焕庸阅读了大量文献，在“古地理”课程的基础上，为研究生开设了“世界海陆演化”课程，该课程教材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1年11月，教育部批准华东师大重建人口研究室，两年后该研究室扩大为拥有35人编制的人口研究所，直属校部，胡焕庸出任所长。对于这块失而复得的研究阵地，他是倍感珍惜。他率领中青年研究人员，从事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人口问题研究工作，迅速获得了各方的重视与支持。晚年的胡焕庸，因视力减退，右手颤抖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书写但是难以持久。此后，他的论文大多由他口述，助手记录整理，他再加以校订完成。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在获悉“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由世界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担任所长；该研究所是全国唯一重点研究人口地理的重要中心；师大地理系已具备制图、印图设备，可以配合人口所印制地图”等条件后，破例同意先期给予38万美元的资助，并后续给予了持续的资助。人口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中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重大课题，获得了高度评价。

1983年，胡焕庸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重大课题《中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组织了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教师团队搜集相关数据。以同事伍理为主，依然用手工方式，绘制了198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在这两张人口地图上，胡焕庸和伍理以细虚线形式标注并且用文字说明了从黑龙江省黑河（瑷辉）至云南省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在说明书中以“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三个经济地带、八大人口区”作为

“胡焕庸线”的新表述公开发表。

1984 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胡焕庸为博士生导师，并且在人口研究所设立博士后科研站，任命他为博士后指导教授。博士后科研站拥有正副教授 9 名，人口研究所也扩展至近 30 名在岗人员。在胡焕庸的带领下，团队完成了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的研究课题。胡焕庸还和同事合作出版了《世界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地理》，以及《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等。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研究，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取得的成就，都远超以往。

胡焕庸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和八大人口区，其观点在国家的人口政策中得到贯彻。他对我国今后的人口提出展望，指出：在最近 30—50 年内，我们的总人口不可避免要达到 14 亿水平。当前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是否有可能将人口降至 7 亿至 8 亿，或者将我国人口最大限度地控制在 10 亿至 12 亿水平，这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基本国策。他恢复工作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先后出版了一批重要著作，这些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作为人口地理研究的带头人，胡焕庸不仅创造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个辉煌，也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 年 9 月，因年事已高，胡焕庸辞去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职务，被学校聘为“人口研究所终身名誉所长”。

退休以后

1989 年 8 月，年近九旬的胡焕庸终于退休了。他陆续辞去了全部职务，但仍坚持指导研究生，并不断有著述问世。

1979 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区划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行政区划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性，民政部率先倡导并支持了对行政区划的研究。1990 年 3 月，民政部批复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50 年前就从事过缩小省区研究的胡焕庸受聘担任学术顾问，在退休以后又一次贡献了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资源。

1990 年 4 月，胡焕庸亲自选编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出版。该书收录了胡焕庸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 29 篇著作。在书中，他简要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和从教生涯，并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感以我的余生尽力于（国土整治）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人口地理将是我集中研究的项目。呼吸一日不停，工作一日不止，努力争取夺回我在十年内乱中白白浪费掉的宝贵光阴，为祖国的人口地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余热。”

1990 年 10 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人文地理学学术大会，会议宣布胡焕庸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

1994 年下半年，《地理学报》刊登了胡焕庸在该学报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发扬成绩，开拓前进——庆祝〈地理学报〉创刊 60 周年》。作为中国地理学会首届九位理事中唯一健在的成员，胡焕庸在文章结尾写道：发扬成绩，开拓前进，这是我对中国地理学界和《地理学报》的殷切期望。

德国地理科学家赫特纳曾说：“区域地理是地理科学的王冠。”胡焕庸 1928 年在法国期间就说过：“今日之地理，已非一种单纯科学，实为若干科学之总名，通常所称曰地理者，今当改称地理科学。”胡焕庸是一位“百科型”的地理科学家，他著作等身，在地理科学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据统计，从 1921 年到 1994 年，胡焕庸在 70 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主编、合著、翻译了 500 多篇（本）论文和著作，除了“文革”期间，几乎每年有新作问世。其研究领域涵盖人口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古代地理、历史地理、区域地理、政治地理、

气候气象、地貌地质、水利水情、农业区域、边疆安全、行政区划、抗战建国、战后政治、地理教育、能源经济、环境科学等，几乎包含了地理科学的所有方面。其学术时间之长，成果之多，在近代学者中极为罕见。

1998 年 4 月 30 日，胡焕庸在上海走完了他 98 年的生命旅程，安然辞世。中国科学界许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者和故旧、学生，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国外的部分友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哀悼。《人民日报》发文称胡焕庸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人口学家、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这位曾遭受 30 多年不公正对待的著名学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

20 世纪是胡焕庸人生的百年，也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变革的百年。在这个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千年帝制的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阶段。胡焕庸在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中历经政治运动磨难，但幸运的是，在其八旬晚年得以恢复名誉，重新著书立说培养后人。他的一生波澜起伏，但寿命绵长，晚年依然站在学术的前沿。他的“呼吸一日不停，工作一日不止”的誓言和实践，至今仍为许多同事和学生所铭记。

自“胡焕庸线”的论文发表以来，90 年过去了，胡线两侧人口密度的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胡焕庸在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中对此进行了解释：“暖辉—腾冲线”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自然、经济、历史的综合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只是在 1935 年才被第一次绘图阐明，并加以详细对比研究而已。

胡焕庸的地理科学研究深受法国人文地理学影响，尤其强调人地

关系。因此，他的主攻方向一直都是与之联系最密切的人口地理学和以农业地理为重点的经济地理学。他倡导“学业并重”的学风，主张做学问和创事业二者不可偏废。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执教 60 余年，培养了大批地理科学、气象科学和人口科学的专门人才，为发展中国的地理科学事业、人口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愧于中国地理科学界的一代宗师。胡焕庸最喜欢的格言是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脚踏泥土，心系天下，噬理科学家胡焕庸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

胡焕庸教授地理工作六十年*

金祖孟

胡焕庸，江苏省宜兴人，1901 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19 年，他毕业于江苏常州中学，同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该校文史地部的学生。1920 年，东南大学成立，竺可桢博士来校任教，并担任新成立的地学系的主任。自此，胡先生在竺可桢博士指导下，专攻地理学。一段时间以内，南高文史地部和东南大学地理系同时存在。1923 年夏，胡先生从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1926 年春，胡先生回东南大学补读学分，获得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

1926 年秋，胡先生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并曾游历英国和德国，于 1928 年取道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当时，竺先生既是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的后身）地学系的主任，又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所长。胡先生回国以后，在竺先生的领导下工作，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又是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

1930 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地质两系。自此，胡先生专

* 原载于《人文地理》1989 年第 3 期，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的地理系分地理、气象两组，教师阵容整齐，教学科研发展迅速。1934 年，竺可桢、翁文灏、张其昀、胡焕庸等发起组织中国地理学会，学会的会址和学报编辑部均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

1937 年 7 月，日军大举人侵我国，中大内迁重庆。从 1939 年起，重庆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学校和地理系处境艰难。然而，当时的中大地理系仍有所发展。1941 年，中大地理系成立研究部，招收首批研究生三人。1943 年，胡先生担任学校教务长。1944 年，气象组独立成系。在南京时，胡焕庸主要讲授自然地理。迁重庆后，由于工作需要，他还担任讲授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

1945 年 8 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当时，重庆教育部鉴于我国学术界与外部世界隔绝已达八年之久，决定派出一部分教授学者到英美等国进修考察，胡先生也在其中。他于当年冬季到达美国，并于 1946 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之聘为研究教授。在美期间，他参观访问了哈佛、克拉克、俄亥俄、芝加哥、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系，还参加了美国地理学者联合会的年会，并在《地理学评论》、《经济地理》和《美国气象学会会刊》上发表了论文。

1947 年夏，胡先生从美国归来。1949 年 4 月初，胡先生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选择。此后，他以学习俄语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在业务上重新学习的决心。胡先生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先在治淮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 1953 年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迄今已三十六年。1923 年，胡先生毕业于南京高师。从那时算起，他从事地理工作已六十六年。我们知道，他是在 1928 年从法国归来的。从那时算起，他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也已有六十多年。在以往的六十多年中，胡先生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世界海陆演化

20世纪50年代末期，胡先生曾几次开设“古地理”课程，着重分析全世界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为此，他广泛搜集地质地理学家关于造山造陆的学说，进行比较研究，但他仍觉得问题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在“文革”大动乱的后期，他有机会看到外文书刊，发现国外已完成一次地学大革命：板块构造、洋底扩张、大陆漂移与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完全确立，并取得全世界的承认。这一新学说虽然引起我国地质学界的重视，但我国地理学界对此显然认识不足。为此，胡先生发奋读书，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阅读相关文章和专著。他终于在“古地理”的基础上，为研究生开设“世界海陆演化”的课程。其讲授内容由陈业裕副教授记录整理，于1981年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外，他又约请康淞万副教授，为他的《欧洲自然地理》一书（商务印书馆，1982年）增加《地史构造和地形》一章，以反映崭新的学术观点。

世界科学界把这一次地学大革命，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提并论：当年的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从此得到完全确立，并得到了改进和提高。过去的研究“只讲大陆，而不讲大洋”，现在则海陆并重，此其一。过去的研究以为海陆永恒不变，现在则认为海陆相互转化，此其二。在此基础上，胡先生认为：非洲的大裂谷处于海洋的胚胎期；红海处于幼年期；大西洋处于壮年期；而太平洋处于晚年期。太平洋周围的裂谷、地震、火山和造山运动带，是地壳的活动带。一方面，板块在此俯冲、下沉和消亡；另一方面，大陆在此造山和增长。冈瓦纳古陆原来包括非洲、南极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印度，现在分开来了。南极洲本来位于中纬度，因而有煤炭和礁石的沉积，现在位于南极地区，几乎全部位于极地冰盖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地理问题，也是胡先生在《世界海陆演化》一书中所强调的。

二、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

胡先生师承竺可桢博士，曾协助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继承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所创建的地学系工作，后又担四新成立的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同时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的教学工作。他除了担任原来由竺可桢担任的“地学通论”“气候学”“世界气候”“地图投影”等课程外，还新开“天气预报”“世界地理”等课程。

在众多的气象工作中，胡焕庸主编的中国第一本《英汉气象学名词》于 1933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黄河志·气象篇》于 1936 年出版，《气候学》于 1938 年出版。其中的《气候学》是他在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教材，由李旭旦记录，他自己校阅定稿。当时，气候学水平以德国为最高。汉恩所著的《气候学教程》两巨册，质量极高；柯本的著作就更多了。除了迄今通行的世界气候分类法以外，他所主编的《世界气候丛书》，都是约请世界第一流气候学家编写的。胡先生的《气候学》就是根据这些著作编写的，是我国第一本气候学专著。

胡先生另一重要的气候学著作是《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此书是他 1980 年为研究生所开〞世界气候地理”课程的讲稿，由蔡吉记录，康淞万协助整理而成，于 1981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根据世界最新资料，论证南北半球不同纬度大陆的东、中、西三区的气候差异。作者认为，纬度地带性产生气温地带性，而大陆东、中、西三区的非地带性特性，更多地表现为降水量方面的差别。由于水热状况的差异，各地有不同的土壤、植被，因而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

三、区域地理著作

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本体，也是地理学的核心。在大小不等的空间区域内，在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之间，在各种自然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地区综合体。各种要素和各种因素，决不可孤立地、静止地加以研究。胡先生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相互关系。

在区域地理方面，胡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他就参加了鲍曼《战后新世界》的翻译工作。这是他研究世界政治地理的开端。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率领学生前往苏北考察两淮水利和垦殖情况，著《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这是他研究江苏地理的开始。在那以后，他先后发表《江苏省的农业区域》、《江苏图志》、《苏北地理概述》（美国《地理学评论》，1947 年）、《江苏省地理》（苏联《百科辞典》，1938 年）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胡先生在南京钟山书局出版了一系列分国地志，包括《英国地志》《法国地志》《德国地志》《苏俄地志》《南欧地志》。这些著作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得到修改并再版。同时，他所编写的《高中外国地理》教材，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期间风行全国，据说台湾钟山书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继续印行此教材。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胡先生还曾主编过《地理教育》月刊，并为商务印书馆编绘了中国地理挂图和世界地理挂图，共计二十四幅。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些珍贵的图版被毁，未能面世，实在令人惋惜。

在抗日战争期间，胡先生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内迁至重庆。他在入川之初，即写成《四川地理》一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发展，他先后编制了多种欧洲战场形势图。纳粹德国崩溃

后，日本侵略者已日暮途穷。这时，胡先生又先后编写了《日本地理》《朝鲜地理》《台湾和琉球》等著作，由重庆京华印书馆印行。为了战后建设的需要，胡先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仍在重庆坚持编绘《河西新疆图集》。

1949 年以后，胡先生主要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并担任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曾招收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和硕士研究生。为了本科生的学习需要，他亲自编写教材，这些教材包括《亚洲自然地理》《欧洲自然地理》《各洲自然地理参考资料》三个部分，共计 150 万字。这些教材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函授教材，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欧洲自然地理》一书，后经笔者约同严正元、康淞万两位同志补充、更新和修改，于 1982 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公开出版。

四、经济地理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地理系自身的需要，胡先生比较集中地进行经济地理的研究和写作。尽管当时所能获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他仍然在讲课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这些著作大都由其同事袁著承担记录整理工作，当时敌机频繁侵扰，袁著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在空袭警报声中完成的。然而遗憾的是，袁著在“文革”动乱中不幸在杭州大学含冤去世，每念及此，胡先生总是不胜感慨之至。

胡先生的《中国经济地理》一书，着重分析了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需关系，并推测未来形势。当时的四川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对外贸易十分困难。但四川的猪鬃居然能通过空运到香港，以换取战时急需的外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胡先生的《美国经济地理》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余缺状况，同时论述美国同各贸易伙伴的关系。胡先生曾于1945年底至1947年初生活在美国，他发现书中所述的现实情况与实际情况并无多大出入。

胡先生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寄予希望，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俄国地志》一书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感。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中央大学讲授"苏联经济地理"课程，并出版了《苏联经济地理》一书。此书大力搜集苏联的资料，详尽评述了苏联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对苏联的北部、东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开发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胡先生的《世界经济地理》一书，也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此书以世界各种重要商品为经，评述了这些商品在各国间的产、运、销情况，并最终归结到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关系。例如，书中详细论述了世界重要国家的粮食产销、纺织原料和纺织品的产销、主要能源的产销以及重要矿产的产销等情况。此书既讲商品，也讲国家，同时还讲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1949年以后，法国是西欧北美各国中最先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因此，中央领导指定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所，并要求首先从事法国的研究。胡先生接受了此项任务，广泛搜集资料。他主要根据法国国家大地图集和各项经济统计资料，首先用最简明的方式制作出各项统计表，然后绘成统计图，最后写成简要的说明，从而完成了《法国经济地理图志》两册。在此书中，法国的情况一目了然。当时，此书只上送给国家领导参考，并未公开发行。此书完成后，胡先生就开始搜集有关英国和西德的资料，打算编写《英国经济地理图志》和《西德经济地理图志》。然而，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这些计划只能付诸东流。

“文革”结束后，胡先生同助手们合作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并校订了多种法国地理的译作。

五、水利地理

我国黄淮流域水患频发，始终是水利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胡先生的水利地理研究亦聚焦于这一关键区域。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黄河志·气象篇》，便是黄河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的其他著作，则更多地聚焦于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与问题。

胡先生关于淮河的研究工作，是与江淮水灾紧密联系的。1931年，江淮流域发生大水灾。1934年，胡先生率领学生前往苏北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调查是盐垦和水利并重，其中水利的部分批评了当时导淮委员会提出的以淤黄河为淮河出海口的计划。由于这一观点与导淮当局相左，因此他的考察报告大部分被导淮当局所焚毁，在社会上流传的甚少。1947年，胡先生把其中关于淮河水利的部分，以《两淮水利》为题单独出版。

1950年，淮河又发生大水。为此，中央领导发出“根治淮河”的号召，并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水利部领导见到胡先生的《两淮水利》一书，十分重视他的真知灼见，特邀他参加治淮委员会的工作。胡先生慨然允诺担任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就在这段时间，他先后完成《淮河》和《祖国的水利》两部著作，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写了《淮河的改造》一书，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最近，治淮委员会印发了胡先生所写《淮河水道志》一书。该会还聘请胡先生担任《淮河志》编委会的顾问。此外，胡先生的学生徐近之教授生前也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从方志中搜集资料，写成了《黄淮各省水旱记录》多卷本，为淮河的治理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人口地理

在留学法国期间，胡先生曾聆听法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马东男、德孟雄和白吕纳的讲课，也曾认真研读白兰士关于人地关系和人口地理的著作，从而深得法国学派的理论精髓。胡先生认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可偏废；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表达人地关系的正确观点，胡先生先后发表了《约翰·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法国研究地理的近况》等文章。他还为任美锷、李旭旦所译白吕纳的名著《人地学原理》写了长篇序言，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作者的思想和观点。

在 1934—1936 年间，胡先生先后发表了 10 多篇有关人口地理的论文。这些论文一反前人只讲人口数字而忽视地理因素的做法，强调地理背景和农业生产对于人口分布的显著影响。其中，《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精神，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人口地理的经典之作。文章提出了一条重要的人口地理界线，即自黑龙江瑷瑾（今黑河）到云南腾冲的直线，此线把全国分成东南部和西北部两部分。前者面积占全国 36%，而人口占全国的 96%；后者面积占 64%，而人口仅占 4%。对此，胡先生说：“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这一界线迄今为中外学者所引用，并且被国外学者称为“胡焕庸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山河破碎，胡先生的人口地理研究，只能处于停顿状态。1949 年以后，百业振兴。胡先生重新提起人口地理与农业生产的研究工作，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华东师大地理系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但遗憾的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殃及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研究室。人口地理的研究，再度陷于停顿。

“文革”结束以后，人口问题重新受到重视。1981 年，华东师大成立人口研究室，并随后扩建为研究所，直接隶属于校部。对于这块失而复得的研究阵地，胡先生是爱护倍加。他率领中青年研究人员，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迅速得到了各方的重视和支持。1984 年，国家教委批准在该所建立博士后流动研究站，拥有正副教授九名。在胡先生领导下，完成了《我国人口分布、迁移和人口区划》《我国东中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等研究工作。此外，还出版了《世界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地理》，以及《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人口问题研究，在规模、声势和成就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往。

现在，胡先生即将进入他自己的 20 世纪 90 年代。但是他年事虽高，而思维锐敏，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和人口地理的研究工作，都是大有可为的。

金祖孟，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

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

胡复孙

辛亥革命后，为谋求全国文化教育相对均衡发展，民国政府教育部按片区建立了最早的六所高等师范学校，分别位于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和沈阳。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或南京高师）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办学业绩突出，并称“南北高师”。

胡焕庸于 1919 年考入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一级，与张其昀等六位同学师从竺可桢主修地学，1923 年毕业。在校期间，他除完成各项课程要求外，还多次担任级会干事和学生组织负责人，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学校活动，是这一级学生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高师位于南京四牌楼，其前身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官立三江（三年后改为官立二江）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该校于 1915 年 9 月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开始招生，初设国文部、理化部和国文专修科。1919 年 3 月，南京高师向教育部递交申请，请求将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同年 3 月 29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南

京高师发出第三七九号指令，同意南京高师的请求，将原国文部和英文部、历史地理部合并改为国文史地部。（在其后的南高师文件和资料中，"国文史地部"常被简称为"文史地部"）与此同时，南京高师还将理化部、博物部合并改为数学理化部（后改为数理化部），另设有国文、英文、体育、农、工、商等七个三年制的专科，以及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南京高师对大多数品学兼优的学生免收一切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但是入学竞争激烈，10 个考生才录取 1 人。/

1919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正式任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前教务主任）为南高师校长。郭校长勤于思考且善于交流，提倡中西文化互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结识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都被他请到南京高师和后来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陶行知、陈鹤琴、朱君毅、郑宗海等一批学者，这使得该校各科系都有一流的学术带头人。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遴选的部聘教授，全国各主要学科仅 45 位，1921 年在南京高师任教的教授就有 8 位名列其中，文史地部的著名教授柳诒徵和竺可桢，也是 1948 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南高师教授有三分之二以上曾留学欧美，他们大都对中西文化多有研究。他们一面保持质朴学风，一面引入科学态度。于自身勤学潜修，精益求精；于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名师荟萃的南高师自此名满天下，进入极盛时期。

胡焕庸在《国风》杂志民国二十一年第 1 卷第 9 期上发表的《忆刘师伯明》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就读期间南京高师极盛景象。"民国八年，全国教育发生一极大转变。前此之教育，宗旨在养成一般好学严谨之士，对于学生行为才能之训练，绝少注意。五四以后，风气丕变，各校训育因而改革，前此注意静的约束，以后多注意动的培养；以前

偏主知识的灌输，以后渐重干才的训练；以前只有消极的管理，以后渐加积极的教导，民国八年之南京高师，亦有此种改进，彼时新将学监取消，而代以训育主任。主其事者即为刘师，努力提倡学生课外活动，注意完人训练，学生自治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等，即于此时应运而生，蓬蓬勃勃，犹如春笋怒发，旭日方升，全校师生，无不精神焕发，兴趣活泼，治学成绩斯时最佳，撰述译著盛极一时，是为南高师之黄金时代……”

1920 年 4 月，南高师校长郭秉文提议将南高师改为大学。12 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成立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农、工、商四科归入东南大学。1921 年 9 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开学。新成立的东南大学是长江以南唯一的综合性国立大学，与北京大学同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性大学实力最强的南北两大支柱。在科学领域，此时的东南大学比北京大学更强。

东南大学成立以后，所有的校务活动均以东南大学的名义开展。1923 年 7 月，已经成立 8 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撤牌，全部归并到其派生组建的国立东南大学。以师范教育著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至此完成了向综合性国立大学的过渡。

1928 年 5 月，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后，应刚更名为中央大学的校长张乃燕（君谋）之邀，与蔡元培等一同前往中央大学出席宴会。胡适在宴会上说：“想中央大学在 9 年前为南高，当时我在北大服务。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的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为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

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云。”

二、史学大师柳诒徵

在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的历史课程是相当多的。柳诒徵作为学校的资深教授，不仅国学造诣深厚、治学严谨，而且为人耿直忠厚、平易近人。他经常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和“东亚，各国史”。“中国文化史”，不仅文科的学生要听，理工科的学生也爱来听，足见其内容精彩动人。在文史地部，“中国文化史”的课程从二年级开始，持续两个学年。学生每周都会收到用毛边纸铅字印成的自编讲义，这些讲义后来由钟山书局、正中书局公开出版。

《中国文化史》全书共三巨册，约70万字，内容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从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工商技巧、民俗宗教、货币服饰，无不追本溯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的内容实际上包含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开疆史、学术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堪称一部百科性的专题史。柳先生讲课极为认真，学生每两周必须提交一篇课堂作文，柳先生自己批改发还。他上课用的都是自编讲义，教学方法常常是夹叙夹议，先引述一段原始资料，再接着进行评论。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而是旁征博引，引人入胜。

柳诒徵是晚清秀才，又曾经在早年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日本考察。他多次强调：研究历史不仅要重古今的比较，而且还必须有中外的比较。在南京高师一国立东南大学的名师中，没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很少，柳诒徵便是其中的一位。柳诒徵精通文史、著作等身，对自然科学也极为重视，从不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科技成就。他也是以弘扬科学进步，共图中国科学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社员。早年学衡

派的理念和追求——“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柳诒徵不仅是极力的提倡者，更是卓越的践行者。柳诒徵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10 余年，培养了大批国文、历史、哲学、教育、地学学生。这些同学大都以文史、史地或文哲兼通的特色而名满天下。

二年级以后，胡焕庸的学习兴趣更加集中于地理学，胡焕庸在晚年《怀念柳师翼谋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对于中国田制史，曾经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当我在二十年代中期去法国进修时，曾经携带了一部分中国田制史资料。我去法国时还曾看过不少俄国革命前乡村公田制的材料，打算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但终因我对地理学的研究兴趣高于历史学，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没有能继续研究历史，我对柳师是感到抱愧的！”

三、地学大家竺可桢

1920 年秋，美国哈佛大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系气象专业毕业的中国第二期留美庚款毕业生竺可桢博士，应邀到南高师担任地学系系主任，地学教育就此从文史大类中独立出来。竺先生在美国学习气象多年，深刻理解了地学在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受聘南京高师以后，他不仅在文史地部讲授气象学，同时在数理化部讲授微积分，在农艺专修科讲授地质学。在改组后的东南大学地学系，他讲授的课程是“气象学”“地学通论”“世界气候”“世界地理”。其中，“地学通论”是地学系学生的必读课，也是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共同的必修课，听课的学生人数常常超过百人。他不仅聘请专家担任地质和矿物的教授，自己除担任地理、气象课程外，还成立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等标本室，亲自带领学生每日观察气象、记载天气数据，出版南京气候月报、年报，并与国内外相关机

构进行交流。在人文方面，竺先生特别善于串联各国时事与国际关系资料的统计，指导选学地理的学生分别从中、英、日文报刊摘录中外地理与各国政治、经济资料，编印成《地理新资料》，既锻炼了学生收集资料、编辑书刊的能力，也为全校师生提供了阅读资料。

作为地理系系主任，同时也是该系唯一的教员，竺可桢不仅重视室内实验，也非常重视野外考察。他经常率领学生在南京附近的野外实习，考察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现象，与讲课内容互相印证，借以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的能力。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设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建立了一种统合地质学和地理学于一体的地学教育模式。在推动地理学成为一门大学学科方面，竺可桢有着重要贡献，他被公认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一代宗师”。

东南大学成立以后，分为五科三十系。1921 年，在东南大学筹备过程中，竺先生就提出将南高师文史地部的地质学、地理学和气象学融为一体，扩大成立地学系的建议，旨在拓宽地学的研究领域，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合二为一，构建新型的“史地合一”观念。这个建议在《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中得到落实，大纲明确列有“地学系”。东南大学将地质、地文、气象、古生物、政治地理各科，整合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学系，聘竺可桢为系主任。先后在地学系任教的教授有竺可桢（气象、地理）、白月恒（地理）、曾膺联（气象、地理）、王叔义（地理）、徐韦曼（地质）等。到 1923 年胡焕庸毕业时，东南大学地学系已经基本配备了四位教授。

在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新型地学观念指引下，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学者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地理、气象人才，如胡焕庸、张其昀、诸葛麒、陆鸿图、王学素、黄厦千、缪凤林、吕炯、朱炳海、沈思屿、徐近之等。

胡焕庸师从竺先生，专攻地理和气候。当时的地学是一个包括地理、地质、气象和矿物四个专业综合内容的“大地学”，这也是南京高师一国立东南大学的学术特色。在地学系学生中，胡焕庸和同学张其的是竺先生最为看好的两位学生。胡焕庸后来执掌中央大学地理系13年，并成为卓有成就的地理科学家；张其日匀在中央大学（地学）地理系任教9年（包括兼职教授3年），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干事和《地理学报》总编辑，又在浙江大学辅佐竺先生13年，对早年的中国地理教育事业和台湾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有重要贡献。

四、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

南高师鼓励教师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研究会，并出版他们的研究心得。比较活跃的研究会有文学、哲学、国学、史地、数理化、教育、体育、农业、工学、音乐、图画、英文、演说、中国社会研究等。经由学校出版委员会批准出版的会刊有《工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教育丛刊》《农业丛刊》《体育季刊》《国学丛刊》《英文会刊》等。1919年10月，南高师地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胡焕庸与南高师的其他62位师生共同成为创始会员。研究会先后邀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养秋、白月恒、曾膺联、梁启超等10多人担任指导员，其中柳诒徵、徐养秋和竺可桢三位自第一届至第八届都担任了指导员。他们对研究会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史地学报》的创刊和坚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学生的学业进步和终身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柳诒徵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担任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国学研究会指导员，为各研究会成员指导研究方向，参与学术活动，通过言传身教，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柳诒徵经常在《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对学生会员的投稿有很大影响，许

多学生的投稿就是课程中的优秀作业。

史地研究会每学期举行两次大会，供会员交流研究心得。如，胡焕庸发表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上的《纪元问题》，便是基于他在1920年n月29日史地研究会大会上的专题演讲“中国当用何纪元”。这个演讲的内容大致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更替非常复杂，阅读历史时常感到困难，为了方便起见，不如采用西历作为纪年方式。胡焕庸又以此问题为题，邀请参会者进行深入讨论。出席奖员各自发表意见，除主张西历、中历外，甚至还有人主张采用古埃及的历法之年（公元前4241年为纪元元年）。1920年5月，地学研究会更名为史地学会，其宗旨明确为研究史学与地学。凡本校学生有志研究史地者，皆可成为会员。主学会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各1人，干事2人，编辑主任1人，编辑8人，发行主任1人，书记2人，会计1人，均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任期半年。会员每学期需缴纳会费小洋二角。胡焕庸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的工作，并成为核心成员。他曾两度担任史地学会的总干事，分别是第三届和第五届。在胡焕庸任职第三届总干事期间，南高师史地学会会刊《史地学报》的筹备和编辑出版正式提上日程，称“筹备会刊则为本届最注力的事”。经南高师出版委员会认定，《史地学报》被列为南高师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完成集稿，11月正式创刊出版，刊物封面注明“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柳诒徵为《史地学报》撰序，阐述了《史地学报》的办刊缘由，略云：“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不之知，而惟震眩于殊方绝国巨人硕学之浩博。……举先民之已知者，而失坠之，而犹侈然自居于学者，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柳诒徵本人也带头在《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除第2卷第1期、第3卷第4期、第4卷第1期外，几乎每期

都有他的文章，如第 1 卷 1 期上的《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本上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这些文章都起到了导向与榜样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将学生的优秀作业推荐给刊物发表。在创刊号上，胡焕庸和他的老师柳诒徵、竺可桢，以及同学张其昀、陈训慈（字叔谅）、缪凤林（字赞虞）等均有文章发表，胡焕庸发表的文章是《欧战大事记》。因为投稿踊跃，《史地学报》计划每年出版 2 卷 8 期（每卷 4 期），在 1921 年 11 月至 1926 年 10 月的 5 年期间，共出版 4 卷 21 期 20 册。初为季刊，自第 2 卷第 2 期始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 年，第 3 卷第 8 期出版后，刊物停刊了一段时间，直到 1926 年 10 月才重新出版第 4 卷第 1 期，但这也是该刊物的最后一期。《史地学报》前后刊登文章 318 篇，其中柳诒徵发表文章 21 篇，胡焕庸也有 20 篇。后者发表的文章除了呼吁用西历纪元代替民国纪元等君主纪元外，大部分与外国史地有关，包括呼吁警惕日本扩张侵略、分析英国殖民历史与现状、记录欧战大事记、探讨各国历史与地理的关联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第 3 卷第 1 期开始连载 9 期直至学报终刊的《美国国民史》。得益于所有会员的积极支持，史地研究会发展成为一个组织架构严谨、学术规范严明的师生团体，成功培养了一批学风严谨、扎实、稳重的优秀学生。这个群体不仅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成为南高师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之一。至今，在许多关于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研究资料中，它仍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五、胡焕庸在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

1915 年，胡焕庸小学毕业时，已经是辛亥革命推翻晚清后的民国时期。当时的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常州中学），因办“新学”卓有成

绩而名扬东南各省。在常州中学，除了国学和中国史地外，其他如数理化及外国历史、地理等都采用英文教材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学里极为罕见，历届毕业生的成绩也相当优异。胡焕庸在这所注重“新学”的学校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艺术和体育训练，攻读四年后顺利毕业。

1919 年，胡焕庸中学毕业后，虽家庭贫困本无力继续升学，但又心有不甘。他的老师和母亲都要求他继续完成学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 年入学考试的科目包括笔试和口试，涵盖国文、黄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各科目。笔试的内容有国文（散文一篇）、历史（四题，中外历史各二题）、物理（五题）、英文（三题）、地理（外国地理一题，中国地理二题）、化学（五题）、数学（五题，代数二题、几何二题、三角一题）、博物（七题，植物二题、动物二题、矿物一题、生理二题），国文的题目是《说工》，口试方式为五分钟演说，题目临时抽签决定，由多位考试委员评分。胡焕庸在中学期间勤奋苦读，成绩扎实，他背水一战，奋力备考，最终一举中榜，如愿被录取至南高师文史地部，获得了这个唯一的升学机会。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仅录取 36 人，多为家境贫寒、勤奋苦读的青年，他们生活俭朴、节用惜物。这些同学后来大都终身从事教育文化事业，成为文、史、地、哲各学科的著名学者。

胡焕庸入学以后的第一学年，文史地部的学生不分专业，接受统一的基础教育，其每周学程为：杂文（三小时）、文字学（两小时）、读经（三小时）、伦理学（两小时）、作文（两小时）、杂文阅读（三小时）、国语（三小时）、英文文法（两小时）、数学（两小时）、实践伦理（一小时）、图画（两小时）、体育兵操（两小时）。

1921 年秋，在东南大学成立过程中，文史地部又合并部分学程，并增加了文学系的分类，改为国文（主任陈中凡）、西洋文学（主任梅光迪）、哲学（主任刘经庶）、历史（主任徐养秋）、地理（主任竺可

桢）、政法经济（主任陈如玄）六系。按照文史地部的规定，本部学生后三年实行选课制，本级30多位学生每人至少要选修两个系的课程。胡焕庸就读的地理系学程中的课程有：“地学通论”、“亚洲地理”、“欧洲地理”、“美洲地理”（非洲，澳洲等不专列课程）、“中国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地方志”、“沿革地理”（本国）、“地质学”、“历史地质学”、“气象学”、“气候学”、“地图绘法”、“地质测量”、“地形测量”等。

胡焕庸自幼习武，常年洗冷水澡和练拳强身。我们收藏的胡焕庸早期第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南京高师校园六朝松下练武的留影。1921年4月9日，南高师举行第二届全校春季运动会，胡焕庸参加的国技表演项目就有：三路跑（单人）、对四瞠拆拳（和同学褚润科）、大刀进枪（和同学褚润科）、光手钩进枪（和同学褚润科）四项。习武强身也是胡焕庸终身保持的习惯，直到晚年依然如此。

南京高师推广学生自治。文史地部第一级学生成立了自治组织，设委员长1人，干事1人，会计1人（胡焕庸为级会干事）。该组织组织学生活动，每年出版级刊一册，且每季度至少举行常务会议一次，报告本级工作。级会年费每人1元，本级被命名为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在第一级同学毕业时，国文史地部第二级、第三级一起举行欢送聚会，胡焕庸代表第一级致答谢词。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地理科学家L鲍曼担任美国总统威尔逊顾问。他搜集所有国际地理问题资料，出版了The *New World, 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一书。胡焕庸和张其昀、王学素等8位同学在竺可桢、任鸿隽等4位先生的指导下，将该书翻译成中文，署名《战后新世界》作为毕业纪念。该书1927年由张其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先后在1928年和1930年加印。

南高师的教学目的本就以培养中等学校教师为主，因就学免费并且各地政府也有不同程度的资助，故许多地区就要求免费学生毕业后

必须去中等学校任教至少两年。1921 年胡焕庸升入三年级后，所学课程多为选修。胡焕庸和同学们纷纷来到南京的中等学校任教实习。1923 年，胡焕庸在南京第一女子师范中学完成了自己的实习教学任务。同班同学张其昀、诸葛麒则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实习教学。

1923 年 3 月，胡焕庸还和同学缪凤林、陈训慈、周光倬等精心编印了一册《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这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刊共有 112 页，汇集了校景、教员和同学的合影照片、级藏、校长题词、柳翼谋先生序、文史地部第二级会赠序、第三级会赠序、学校沿革、本级记事、简章、文史地部述略、教授和课程、气象测候所志略、教职员姓名录、同学通讯录、文学研究会概况、哲学研究会概况和史地研究会概况等丰富内容。该纪念刊仅印刷了 100 本，供老师和学生留作纪念。百年过后，留存世间的数量极少，所有看过这份资料的学者和友人都对当年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师生群英荟萃的景象肃然起敬。如今，每当谈及南高师的办学历史，这 36 位学生的名字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23 年 6 月，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 36 位学生，包括王庸、王学素、胡焕庸、陆鸿图、张其昀、诸葛麒 6 位主修地学的学生，都在入学 4 年后如期毕业。根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归并东南大学办法》，同年 7 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归并到其延续成立的东南大学，成立已经 8 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撤牌，所属附属中学、附属小学也同时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在南高师期间，文史地部 5 年招生共 169 人，毕业 155 人；数理化部 5 年招生共 169 人，毕业 134 人。

根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归并东南大学办法》，南高师毕业生可通过补习东南大学的学分来获得东南大学的毕业资格。在 1923 年毕业的文史地部和数理化部学生中，少数如文史地部的徐启铭、数理化

部的严济慈和褚润科等 10 位同学，在南高师毕业前就已辅修了东南大学的学分，因此他们不仅获得了南高师的毕业证书，还同时获得了东南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而其他大多数文史地部和数理化部的毕业生都先工作了。

1923 年，经东南大学校方确认，方培智、陆鸿图、陈训慈、诸葛麒、张其昀、王玉章、周光倬、张廷休、孙士梢、袁鹏程等 10 位文史地部第一级毕业生和数理化部的 3 位毕业生，共 13 人报考了东南大学学分补习课程。文史地部第一级的 37 位毕业生中，有 10 位在毕业后的二三年内补足东南大学学分，获得了东南大学文、理学士的学位。主修地学的 6 位毕业生中，王学素、陆鸿图、诸葛麒等 3 位在毕业次年就完成了东南大学辅修课程，拿到学分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张其□匀则因病返回家乡养病，未能完成补习。胡焕庸在南高师毕业后即前往扬州第八中学担任史地教员兼训育主任，1926 年春回到南京，于 2 月应聘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史地教员，主讲“历史研究法”“世界会议地理”“世界史概要”等课程。胡焕庸在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的同学周光倬、仇良虎、袁鹏程、孙士梅也在该校担任国文和历史、地理教师。在此期间，胡焕庸在东南大学补足辅修 7 门课程的学分，在完成 13 个学分后，于同年 6 月在国立东南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

1927 年，国立东南大学先后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49 年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52 年后，南京大学 7 个学院中，文、理、法 3 个学院迁往汉口路金陵大学校址，和金陵大学的文、理两院合并，并整合了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等，校名仍沿用南京大学。原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部分系与其他院校的部分学院合并独立成校。全校规模最大的工学院

留在四牌楼中央大学校址，独立为南京工学院，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工学院之一。

1988 年，南京工学院重新恢复校名东南大学。胡焕庸获悉自己前半生读书、工作的四牌楼母校恢复校名后非常高兴，将历经各种政治风波而幸存下来、精心保存了 65 年的《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赠送给东南大学永久珍藏。时年 88 岁的胡焕庸在该会刊的空白页上亲手用左笔题写道：

我于 1923 年在南京高师毕业，1926 年在东南大学毕业，1928 年至 1949 年在中央大学任教。值此东南大学正式复校之际，仅以旧藏毕业纪念刊奉献母校。纪念刊虽已残破，内藏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参考。

宜兴胡焕庸　1988 年于华东师大

时年八八 左笔志庆

这份近百年前由胡焕庸和同学们精心制作的南高师毕业纪念刊，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不仅是早年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学生艰苦求学的永久纪念，更是今天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东南大学档案馆馆长曾誉其为“镇馆之宝”，并将其原作精心保存，不再轻易示人。

六、先生和学生

柳诒徵和竺可桢是南京高师中极具人格魅力的学术导师和杰出教授，也是胡焕庸最为敬仰的两位师长。他们的教学不仅奠定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国立东南大学史地学科的学术基础，而且在师生之间培养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这个群体的兴起，既得益于这些领袖人物

作为精神领袖的关键影响，也离不开他们多年悉心培养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后学者所付出的努力。

胡焕庸在南京高师毕业后，始终对柳诒徵、竺可桢两位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无论身处南京、重庆、北京还是上海，都与两位先生常有往来。在抗战时期，胡焕庸在重庆积极行动，不仅协助柳诒徵向教育部申请不定期的生活补助，还成功邀请他到中央大学进行授课和讲学。柳诒徵和胡焕庸也同在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共事，并均作为教育部不同学科领域的部聘教授，共同承担起“辅导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教学与研究；有关之学术审议和承办专科视察巡视讲座及其咨询事项”的职责。

竺先生离开中央大学，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后，仍对胡焕庸主持的中大地理系给予诸多指导。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竺先生每至重庆或南京，都会首先联系胡焕庸，与其会晤交流。1949 年之后，师生原本亲密融洽的关系受到社会氛围影响，彼此为了避免麻烦而减少了往来。“文革”后胡焕庸刚刚恢复名誉不久，便在多处发表文章，怀念两位先生。在他的晚年，因病右手已经不能写字，还艰难地用左手多次撰写文章回忆两位先生的贡献，直至九旬高龄封笔前。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纪念文章，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这位著名学者对师恩的终身铭记，以及对先生教诲的深深缅怀。

胡焕庸先生与中国地理学会

张国友

胡焕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在胡老诞辰123周年之际，我以这篇文章来纪念胡焕庸先生为中国地理学会建设和中国地理科学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并以此纪念先生《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在《地理学报》发表90周年。

无论是科技界还是地理界，在很多人看来，胡焕庸先生是人文地理学家、人口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其实先生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地理学家和伟大的战略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技社团百年老店——中国地理学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一、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前身分别为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和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组成现今的中国地理学会。

115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始终秉持服务国家需求和促进学科发展

的宗旨，坚持“以会员为主体，以学术交流为主线”的工作理念，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平台建设、学术建设等方面积极发力，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技评价、教育培训、表彰奖励、人才培养及举荐等工作，为国家的科学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中国地理学会拥有注册个人会员近 2 万人，单位会员 100 余个。学会下设 54 个专业委员会、分会和工作委员会，以及 14 个研究（工作）组和 7 个区域代表处。主办或联合主办《地理学报》（中、英文版）、《中国国家地理》等 19 种科技期刊。同时，学会是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国际冻土协会（IPA）、国际地貌学家协会（IAG）和亚洲地理学会（AGA）等 4 个国际科技组织的成员。此外，还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地理学会建立了学术互访与交流合作机制。

多年来，中国地理学会主办有“中国地理学大会”“中国地理学会春季年会暨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全国人文地理学大会”“全国信息地理学大会”“全国女地理学家大会”“全国青年地理学家大会”“世界地理学大会”“中日韩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交流平台，曾组织“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全国优秀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等评选表彰活动，组织开展“’地球小博士’全国地理科普知识大赛”“全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等各类学术、科普、培训活动，以鼓励地理科技工作者为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奋发进取、促进地理科学创新发展。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学会策划组织的“优质地理产品生态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项目，于 2023 年 2 月正式入选中国科协“科创中国”计划。

2016 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 33 届国际地理大

会”及“第 13 届国际地理奥林匹克竞赛”，吸引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0 名参与者。2006 年，学会发起并创办了“中日韩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6 届；2015 年，学会在上海发起创办了首届“亚洲地理大会”，并在 2018 年广州举办的“第四届亚洲地理大会”上倡议成立了亚洲地理学会。2021—2024 年间，学会主导召开了 4 次“亚洲青年地理学家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地理学会 115 年的发展历程中，包括胡焕庸先生在内，共有 17 位科学家担任过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会长）。他们分别是：张相文、陈垣、张溥泉、张星烺（以上为中国地学会负责人），翁文灏、胡焕庸、黄国璋、竺可桢、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张兰生、吴传钧、陆大道、刘燕华、傅伯杰、陈发虎。

二、中国地理学会创立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研究表明，从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列强频繁人侵，内外战乱不绝，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随着近代科学在 100 年前传入中国，1909 年，以张相文先生为代表的进步学者，怀揣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在天津发起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理刊物——《地学杂志》，这标志着传统的舆地之学开始向现代地理学转型。随着留学教育机制的建立，一些早期留学人员陆续回国效力，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一批专门的科学技术团体迅速崛起。1934 年，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等 40 余位地学先驱，秉持“报国求是”的精神，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创办了《地理学报》，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地理学与国际接轨的发展之路。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包括《地理学报》编辑部）会址设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

学（现南京大学）地理系。

时年 33 岁的胡焕庸先生，已经是中央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在中国地理学界已经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地理学家，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的重要发起者，并且当选为首届 9 位理事之一。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特别是新创办的《地理学报》的正常编辑出版工作，需要资金保障。除了团体会员赞助和个人会员会费作为学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外，学会依托单位中央大学地理系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此，在翁文灏理事长领导下的第一届理事会中，除了中央大学地理系张其昀先生出任学会干事和编辑委员会主任外，系主任胡焕庸先生亲自负责学会财务工作。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科技团体的兴起，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一批爱国科学家本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纷纷成立科技与学术团体。中国地理学会（南京）成立以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每年一度的年会，既是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研究学会工作的重要时刻。1934 年，在江西庐山与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联合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中，学会决议创办《地理学报》（季刊），并派遣吕炯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赴波兰华沙参加了第十四届国际地理大会。1935 年，学会在广西南宁与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年会;《地理学报》也开始正常出版，当年就出版了 4 期。1936 年 8 月，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在北平清华大学联合举行。《地理学报》创刊至 1936 年底，共出版期刊 10 期，发表论文 41 篇，其中包括竺可桢先生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和胡焕庸先生的《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同年 6 月，《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2 期刊布了中国地理学会关于《目前中国地理学应特别注意之问题》的声明，提出了铁路沿线调查、内地工业重心、农业地理、移民殖边、民族杂居区、救济灾荒、渔业、华侨地理、东北

地理、军事地理、世界资源等 11 个研究方向，号召地理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

1936 年下半年，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教授应邀前往浙江大学任教、黄国璋教授前往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中央大学地理系创系的“三驾马车”，只有胡焕庸教授一人坚守，学会的工作也主要由他带领一批年轻教师继续推进。

然而，正当学会会员队伍不断扩大、学会工作有序开展之时，1937 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地理学会亦随中央大学辗转内迁重庆。除 1937 年 4 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进行了理事会换届改选，胡焕庸接替张其昀兼任了学会总干事、朱炳海接替胡焕庸兼任了学会会计、张其昀继续担任学报总编辑外，直至 1942 年，学会均未再召开过年会。《地理学报》也从 1937 年第 4 卷起至 1944 年的第 11 卷，每年仅出版 1 期，1945—1946 年的第 12、13 卷则合期出版。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1943 年 7 月，中国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联合在重庆北培举行。会议选举胡焕庸、李旭旦、张其昀、黄国璋、任美锷、张印堂、涂长望、朱炳海、吕炯为理事。胡焕庸为理事长，李旭旦为总干事，朱炳海为会计，吴传钧为文书，张其昀为地理学报总编辑。临危受命的胡焕庸先生，此时已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在此后的 7 年里，肩负起了领导中国地理学会的重任。1947 年 8 月，中国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联合在上海举行，选举胡焕庸、任美锷、张其昀、张印堂、黄国璋、丁骕、林超、严德一、刘恩兰为理事，胡焕庸连任理事长。1948 年 8 月，中国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十团体联合在南京举行。1949 年 4 月，第十六届国际地理大会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中国地理学会派林超参加会议，并申请加入国际地理联合会，大会正式通

过中国为该联合会会员国。

1950 年 8 月，中国地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国地理学会，会址由南京迁至北京。胡焕庸理事长任期结束，不再担任学会的领导职务，他本人也调往政务院治淮委员会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胡焕庸先生是中国地理学会（南京）的发起者、建设者和领导者。尤其是在他担任学会总干事和理事长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能保持学会组织的稳定，维系中国地理学会机关刊物《地理学报》不断出版发行，实属不易。他的另外两大贡献，一是不断为《地理学报》撰稿，尤其是“胡焕庸线”这样的“百年地理大发现”，为期刊提供了宝贵的稿源；二是推动中国地理学会加入国际地理联合会，使中国地理学者能够有组织地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三、胡焕庸：中国地理学界永远的丰碑

回顾近 90 年中国地理学和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胡焕庸在中国地理学界乃至科技界都是一座永恒的丰碑。近 90 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南京）至今共有 13 位杰出的地理学家担任理事长，其中竺可桢、胡焕庸、黄秉维三位先生是与众不同的。竺可桢先生作为前辈著名科学家，不仅在地理学和气象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尤其在地理学方面，他创建了地理教学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量地理人才，并且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东南季风研究以及物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作为第二代地理学家的代表，胡焕庸先生以其在地理学科全学科的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而著称。黄秉维先生则以其综合视角指引中国地理学科发展了近半个世纪。

今年以来，全国科技界兴起了一股热潮，探讨各个学科对社会发

展以至人类文明的贡献。地理学界在谈及此话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提到“胡焕庸线”。胡线的提出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一项重大发现，对于人们认识自然、辅助政府决策都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也成为当代中国地理人的精神支柱，为几代中国地理学家带来了自豪感与自信心，成为地理人推动地理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指引，堪称中国地理学界永恒的丰碑。

胡焕庸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人口地理学豪和人口学家，更是一位发展全面的地理学家和伟大的战略科学家。从胡先生的著述中不难发现，早年他在气候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工作，以及众多的地缘战略研究、国别研究等，都是学术界的经典之作。从南海诸岛的命名到收复琉球的呼吁，他都为国家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关于胡焕庸先生的著述，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等组织学界同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在秦大河院士的牵头下，编辑完成了《胡焕庸文集》（10卷本），期待此套巨著早日出版发行。

张国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胡焕庸先生的学术和教育功绩撷例

鹿化煜

我了解胡焕庸先生的事迹和学术工作，是在20n年以后。当时，我担任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随后担任院长，因工作需要，学习院史，才知道被李克强总理询问、专家和社会热议的“胡焕庸线”，源于1935年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该文作者就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二位系主任胡焕庸先生。胡焕庸先生发表这篇论文时，正值他人生的一个高光阶段，无论他的精力、经历、学识、学问，还是社会责任和社会资源，都是一个成熟期。因此，这篇论文的理论性、创新性、思想性、方法论和数据量，都是无与伦比的。随着对胡先生深人的了解，“钻之弥深、仰之弥高”的感受愈加强烈。

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胡焕庸先生形成了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人口地理、区域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气象气候和环境演变等领域，都有高深建树；在服务国家、淮河治理、西部考察、南沙命名等方面，都有创新性贡献；在教书育人、提携后学、院系管理、学会建设、学报编辑、科学社团组织和领导等方面，成就斐然。值此“胡焕庸线”论文发表9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学习和纪念胡焕庸先生的学术人生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我们立德树人、科学创新和服

务国家的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弘扬科学，按规律办事

20 世纪初，中国处在大变革时代。一方面，国际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列强扩张和侵略的力量强大；另一方面，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科学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低下，广大民众受多重压迫，过着贫困生活。这时，一批仁人志士奋起作为，或寻求变法，或创建实业，或办学育人，或出国学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胡焕庸先生在江苏省宜兴县出生，他在私塾和公办学校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课程。授课老师是国学造诣深厚的鸿儒，或者是留学归来的科学先锋；胡先生的中学时代，老师要求严格、同学勤奋好学、不少课本都是纯英文的。在这种环境中，这些有志青年切磋琢磨、交流共勉，进步很快，为他们后来成为栋梁之材奠定了坚实基础。

胡先生的人生转折点之一，应该是 1919 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后于 1921 年合建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 年合建为国立中央大学）国文史地部，开始学习历史和地学。20 世纪初的南高师，名师大家云集（教授有吴宓、刘伯明、梅光迪、陶行知、王源、柳诒徵、竺可桢、陈鹤琴、汤用彤、熊庆来、茅以升等）。这些名家大师多数从国外留学归来，教学内容丰富，知识先进前沿，胡先生在这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他的恩师竺可桢先生（1920 年到南高师工作，1921 年在南高师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意义的地学系）倡导的科学、求实、民主之精神，以及后来他与竺可桢先生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对胡焕庸先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深远。胡焕庸先生撰写的 10 多篇关于人口学的论文、讲授的多门地理科学课程，以及他关于治理淮河的理论和实践、组织领导科学学部、院系和学会的工作，

都以事实为依据，尊重科学规律，不浮夸、不夸大，事无巨细，实事求是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体现了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诚”字。胡焕庸先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造就了他雄伟的学术人生，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一座丰碑。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是一个重要话题，有识之士认为，科学是救国的利器。他们倡导科学，宣传科学，应用科学，中国的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1927 年成立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不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先后在海内外设立了 28 个分社，并设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农学、工学、医学等学科组。中华自然科学社先后编辑出版了《科学世界》《科学文汇》《中国科学》《科学副刊》《科学新闻》等刊物，组织科学讲演、科学展览、编辑中学理科课本、领导科学考察等。1940—1943 年期间，胡焕庸先生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领导、组织和参与科学社大量的活动，他为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期间，胡焕庸社长多次呼吁重视科学理论研究、重视研究工作、重视人才、加强合作，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储备人才。

1937 年，在全民族抗战即将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前不久，胡焕庸先生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1950 年，他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做了大量有重要意义的科学组织和管理工作。其间，学术刊物《地理学报》的质量、水平、影响突飞猛进，推动了中国地理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地理学会主办的学术交流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和地理学会组织、参与的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淮河流域等重大科学考察活动，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无论是在教学、研究还是科学组织管理方面，胡先生总是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他取得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诸多成果。

二、原始创新，促学科发展

创新是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发展不竭的驱动力。20 世纪初期，我国的地理学教育和研究内容多与历史、社会、文化以及地方风情紧密结合，这是受我国历史悠久和文化深厚影响的结果。也因为如此，地理学被理解为描述区域、地方、风土、人情以及地表自然现象的学科。在地理学的萌芽阶段，这些做法和认识是正确的。然而，随着地理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学调查、数据积累、技术创新，以及综合归纳、演绎推论等研究范式的变化，对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挑战，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和内容去解决问题，发展新地理学，胡先生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

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和环境压力大，对资源和环境要求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口承载力已经成为前沿科学问题。当时，已有学者研究人口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科学问题，有零散的论文发表。但是，只有胡焕庸先生，经过广泛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获得了省、市、县，甚至乡镇级的人口数据，他利用科学先进的制图技术，绘制了全国人口分布图和密度图，成为当时最系统、最全面和分辨率最高的中国人口数据集；同时，他基于最新的中国地貌地形和气候的研究成果，以及全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研究的新结果，综合分析人口、气候、地貌、土地和环境、生态数据，发现了著名的“璟辉一腾冲线”（又称“胡焕庸线”），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重大发现。这一发现，从科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口地理的特征，为认识地理规律注入了新内容。90 年过去了，这一发现依然光芒闪耀，成为我国地理学的重要原始创新。这一重要的发现和创新性的认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是地理”，胡焕庸先生是按他的名言，不断践习着地理科学的研究工作，不断作出原创性科研成

果，成为现代意义地理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内容。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1936 年，胡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之农业区域》论文，是最早的中国科学农业区划方案之一。他收集大量精确的气温、降水、植被、生态、农产、地貌、粮产、人口数据，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经验综合分析，将中国化分为九个农业区：东北松辽区、黄河下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丘陵区、西南高地区、黄土高原区、漠南草地区、蒙新宁干燥区、青康藏高原区。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开展省区及更小区域农业区划研究，分析人口分布与农业区划的联系，关注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与粮食问题。90 年过去了，回头看，他这些研究有重要的原始创新，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0 到 1 的突破”。《中国之农业区域》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结论认识，指导着后来长时期的中国区域地理、人文地理、农业地理、经济地理，甚至人一地关系系统科学的研究。因此，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

三、报效祖国，以人民为重

地理学既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也是经世致用的重要学科。地理学家常常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指导民众，与自然作斗争，为国家、社会和大众服务。

我国是一个南北和东西跨度大、地理环境差异大的国家，尤其是海上国土资源，是国家重要的部分，很早就受到胡先生的研究和重视。南海诸岛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列强争夺要地。20 世纪 30 年代，胡焕庸提出用“南沙群岛”命名此群岛，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二战后，胡焕庸先生的意见，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标准地名、公布 U 段线、圈定中国南海相关海域权益边界中，成为中国南

部划界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胡焕庸先生关注东部海岛的资源环境和主权问题、研究政治地理格局。在抗战前夕，他长途跋涉进行从南京到昆明的长距离、系统地理科学调研等，这些工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立中央大学西迁期间，胡焕庸先生组织对川西考察，他领导地理、地质、气候、生态等学科的师生100多人，对四川西部的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乐山、峨眉、雷波、马边等县综合消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甚至于是恶劣的环境中，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地理资料，特别是他们发现的四川雷波优质铁矿，是重要的矿产资源。

我国是一个洪涝灾害严重的国家，尤其在中国东南部，受季风集中降水和台风活动强烈影响，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经济深受其害。位于我国东部的淮河中下游，特别是江苏北部的里下河地区，受自然环境演变和人口迁徙居住等影响，这里的淮河已经演化成为一条有名的“害河”，千百年来，困扰着当地人民，成为历代管理者心腹之患。1934年夏，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系主任的胡焕庸先生，带领地理学系师生，对苏北地区淮河流域的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环境、生态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和商业等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出版了著名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专著，成为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奠基性文献。1949年以后，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胡焕庸先生与治淮委员会的同事一起，设计方案、组织工程、指导实施。胡先生早年提出的通过新建入海水道，引淮水直接入海同时疏导淮河部分水量进入长江的“治淮方案”，成功地解除了淮河下游千年水患。治淮工程中新建的苏北灌溉总渠，具备行洪、排涝、引水、灌溉、航运、发电等多项功能，已经成为造就淮河下游人民的幸福渠。

四、立德树人，携青年才俊

教育和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在60余年的地理学教育教学中，胡焕庸先生从来没有离开教育一线。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国家培养出大批高水平地理学人才，成为教师的楷模。他的“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的“全人”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胡先生在任国立中央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期间，讲授了大量的课程，自编了多份教材。看看他教授的课程名单：“气候学”“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欧洲自然地理讲义”“江苏图志”“四川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古地理学教程”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勤奋好学、多么诲人不倦、多么爱岗敬业，其背后，是多少汗水和辛劳的结果。看看他带出的学生名单：徐近之、李旭旦、任美锷、吴传钧、严德一、宋家泰、陶诗言、高由禧、黄仕松、顾震潮、朱岗昆、周淑贞等，我们就能够明白，胡先生的地理教育成就有多么宏大。

受江苏省教育部门的请求，1931—1933年期间，胡先生兼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同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教授、主任）。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学校动荡，教学工作受到很大扰乱。胡先生以校为家，“读书不忘救国”，全心全意推进学校工作。他推行男女同校，创办化工科、印刷科，强调提倡“全人”教育，知德体“三育”并重，开多项现代教育之先风，使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发展成为国内有名的学校，人才辈出，多人成为社会栋梁之材。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的春风吹拂祖国大地，胡焕庸先生重新回到人口地理研究工作，其间，他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热情帮助和指导研究生。在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研究室，进而发展为人口研究所，成为地理学博士后研究培

养基地。导师胡焕庸不顾年老体弱，通过完成《中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等重大课题，精心指导研究生，带领和培养多位学者成为人口地理领域的专家，成为一段佳话。种种事例，表明胡先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诲人不倦的崇高精神，实践了他喜好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座右铭。

五、结束语

纵观胡焕庸先生的一生，是服务国家的一生、追求科学的一生、教书育人的一生和不断创新的一生。胡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早年，胡焕庸先生身体力行科学、创新、爱国和育才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些内容有诸多相同之处，为中国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借鉴、指明了方向。我们学习胡焕庸先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在立德树人方面，按地理学科学发展的规律，积极教人育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围绕内容、方法、技术和数据，不断创新。以胡焕庸先生为榜样，始终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追求科学为己任，努力工作，奋勇争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对胡焕庸先生最好的纪念。

鹿化煜，南京大学教授、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前院长，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山海风云

——胡焕庸接掌省立苏州中学校长记事

丁云衍

1928 年 8 月，胡焕庸自留学法国回国后，即任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副教授兼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0 年，他又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创始系主任。

而此时，苏州的一所誉满东南的中学——苏州中学，在首任校长汪懋祖的引领下，也展现出勃勃生机。此校可追溯至 1035 年由范仲淹创办的府学，千年文脉未断，一直是江南地区的名校。

1927 年，第一次北伐战争后，蒋中正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时也着手教育重组。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提倡教育改革，将“教育独立”和“行政学术化”的理想付诸实践：废除教育部，组织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提出“效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位”；开始推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大学区制是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选一所大学，该大学校长负责管理区内所有教育单位，江苏省正是试办大学区的省份之一。1928 年 7 月，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被划归中央大学区，曾一度更名为“中央大学区苏州中学”。因此，在此阶段，苏州中学的重大事务均由中央大学管辖。然而，大学院制不

久便告夭折。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一些锐意进步者，时常引起非议。1931 年 4 月间，江苏省教育厅督学来到苏州中学视察，要求学校纠正一些做法，特别是停止师范生报考大学的做法，引起汪校长不满。此时他正逢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罗家伦之邀，希望他担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并创办教育系，出任系主任。8 月，汪懋祖在发放完新学年的教师聘书后，愤然辞职，江苏省教育厅慰留无效。

由于苏州中学在江苏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江苏省教育厅急需一位品学兼优且有办学经验的校长来主持工作，于是首先向中央大学求助。他们想到了时年 30 岁的胡焕庸。

当年，江淮流域遭遇洪涝，南京城内多处被淹，中央大学的新学年因此推迟至 10 月 1 日开课。8 月中旬，省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的向邵轩科长等，三次冒雨乘坐竹筏前往胡焕庸位于沙塘园的家中，恳切要求胡焕庸担任苏州中学校长。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邀约，胡焕庸顿感茫然，就以在中大系务和教学工作繁忙为由予以推却。但在省教育厅的多次盛邀下，胡焕庸想到中大是 10 月 1 日开课，之前尚有机动时间，最后勉强答应到苏州中学短期任职一个月，“先行来校接事”主持开学，同时并未辞去中大的职务。9 月 1 日，江苏省政府正式发出委任状，任命胡焕庸为江苏省省立苏州中学校长。9 月 6 日，胡焕庸到校接事。学校也因校长易人，开学典礼推迟至 9 月 7 日举行。

胡焕庸来到苏州中学后，凭借其社会声望和人格魅力，迅速赢得了苏州中学师生的认可和欢迎。各部（师范部、高中部、初中部、附小部、乡村师范部）顺利开学，一切井然有序。9 月中旬，他按照约定前往镇江向江苏省教育厅请辞，准备返回中大，不料突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形势空前紧张。上海、苏州两地形势也日趋严重，苏州中学校长岗位无人可替。在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紧要关头，胡焕庸顾全大局，考虑到中小学教育直系民生，他决定暂时放下钟爱的专业研究，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中学校长，以“此间既难摆脱，惟有向中大恳辞”，转向中大提出辞职。然而，中大地理系的工作同样重要，虽然中央大学已经聘请了奥地利籍教授费思孟到地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但此时费教授尚未到校。无论是校长朱家骅还是理学院院长蔡堡均表示胡焕庸教授“决难离校”。胡焕庸考虑到眼下的工作，再次向朱家骅校长提出辞职，朱校长仍然以“本校地理系现在主持乏人，新聘外籍教授又尚未到校。务请在该教授未到之前，仍勉为其难维持系务”为由，不同意他辞去地理系系主任的职务。江苏省教育厅厅长陈和铳与中大多次磋商均无良策。地理系同学会也出面向校长提出请求：“地理系成立以来于今两载，期间所遇困难不一而足。幸赖主任胡焕庸先生勉力维持始有今日。虽无极大贡献，然于中国学术界中固已粗立声誉……以胡先生学问人格，素为生等所深佩，本系各种事务以及将来发展扩充，端赖擘划维持。一旦去职使生等顿失良师，地理系前途何堪设想……胡先生当以本学期为日无几，苏中主持乏人，势不得不暂时兼顾……本系主任一职，仍请胡先生专负责。成以收驾轻就熟之效，学生学校两蒙其利，迫切陈词。伏乞钧长俯允所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经校长朱家骅批示“查地理系胡主任，前由江苏省教育厅聘为苏中校长将即，经竭力挽留，迭陈厅长收回成命未获办理，本校教务重要亦未使骤争更张，业亦商得始已，请胡主任同意仍兼理地理系系务。”自此，胡焕庸不得不开始了南京、苏州的两地工作，每周日下午去苏州以便周一早主持“总理纪念周”晨会仪式。星期一、二、三在苏州中学办公主持校务，周三晚匆匆赶回南京，周四、五、六三天在南京中大地理系主持系务、教学和研究。这种两地奔波的情况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战乱初起，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和苏州两地校务维持相当繁忙。

不久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由于苏州离上海不远，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部分学生和教师纷纷离校避难，教学环境愈发艰难。经过慎重考虑，胡焕庸将自己在南京居住的新婚夫人和在宜兴居住的母亲都接到了苏州中学的可园居住，长子胡执中也在苏州上了一年半的小学。不仅如此，胡校长还在担任苏中校长一年后，于1932年8月向中央大学提出请求：新学年起在中大“告假半年，第二学期到校”，以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苏州中学校长的工作中。梗k把家搬到了学校，并且全周都在苏州履职，全校师生很快安定了下来。

1931年9月至1933年8月，胡焕庸担任苏州中学校长共计两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与苏中师生共同度过了那段至暗时期，还创造了苏州中学新的辉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在胡焕庸全面接管苏州中学后的一个多月，也即〞九一八事变”不久，苏州中学就发布了《苏中校刊》特别号：“反日救国专号”。其前言就是由校长胡焕庸撰写，这篇前言不仅是苏州中学的抗日宣言，更为学校未来14年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随后，胡校长运用其渊博的地理知识，为师生做了多场讲座，如“东北铁道问题”“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启发了民众的认知。他还到各部做演讲，如〞对乡村师范部同学的训词”等，进一步部署学校的反日运动，使之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一时间，师生们纷纷打开窗户，关注祖国命运，积极撰写抗日文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多期《苏中校刊》成为当时苏城的抗日宣言书。

同时，苏州中学各部成立“反日救国会”，做到四有：有方案、有章程、有目标、有行动。走向社会组织四队：宣讲队、募捐队、反

日货专队、发动队。在此期间苏州中学涌现出了一批后来的革命家，如胡绳、吴大琨、唐纳、孙陶林、孔令晟等，他们的革命行为，不仅得到胡校长的全力支持，还得到他的多方保护。学校在全省中学生中发起募捐活动，成功募捐到一架飞机以支援抗战前线；发动市民和组织民众夜校开展反日小行动；组织“日货样品展”帮助市民识别日货，不买日货；以短期罢课形式，激励师生、影响社会、全民动员；师生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政府全力抗日。这一系列的活动，大大地震撼了社会，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而这一切都在胡校长的有力组织和掌控之下有序进行。胡校长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教育理念，在苏州中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苏州中学作为一所苏州名校，有理有节，热烈而不乱，展现了其作为抗日后方有力支撑的激情与理智。

二、学校乃教师学生讲习之所，以学术相切磋，以气节相砥砺，以健康相助

胡焕庸作为一位学术型教育家，上任后首要之举便是高举“学术引领、课程为纲”的旗帜，使得苏州中学教学质量得以一贯领先。他首先重新梳理并制定了《苏州中学组织大纲》，在国难当头之际，确保行有目标；创造性地编订《雪耻救国中心教材标准》，明确提出“国难临头一切课程当以雪耻救国为目标。经初中部第一次教职员会公决，分别各科性质与目标关系之密切与否及其缓急，订定中心教材。遂由教务处分别召集会，语文自然艺术各学科分科会议商订标准。凡党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算术、理化、生物以至图画、手工、音乐各有拟订”，可见它涵盖了一切学科。胡校长的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不仅彰显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情怀，也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

背景。这说明胡校长是一位真正的爱国教育家，他深知课程在教学中的统领作用，绝不容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教材出现在当下的课堂上。

在苏州中学工作期间，胡焕庸组织编制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教学要求和教材。在他主持下出版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教学概况》，不仅汇总了苏州中学在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算学、图画、音乐、工艺等科目的具体教学要求，还提出了包括教师和学生学术研究组织、教师著作出版在内的计划，并对学校教学设备、图书仪器标本、教学行政的安排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成为当时苏州中学办学的指导性大纲。苏州中学的教师阵容整齐、学识渊博，学生学习认真。许多教师不仅在校内尽职教好书，还编写了高初中教材向全国发行。

为应对当时的形势，胡校长特别重视国人体质的提升和国防知识的普及。他强化了体育课程与军事训练，组织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增强了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后期的多次迁校中，师生们都感到这些训练的必要性。1931 年胡焕庸校长任内制定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则》中，包含了非常详细的《体育成绩考察规程》，对体检、早操、体育正课、五项运动、卫生与清洁、课外运动等作出了明确要求。根据该规程，学生体育成绩被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学期终了时，有体育主任会同教员校医或其他体育有关系之职员，评定学生体育成绩之等第，经校长核定通知学生家属”。苏中学生必须修习的体育项目为急行跳远、急行跳高、百米赛跑、十二磅铅球和引体向上，同时要求学生至少选习一种课外活动，例如拳术、篮球、足球、网球、木球等。

此外，胡校长还推广了高中部的教训合一办法，设立了各级首席教师制和导师制，并强化了学科竞赛。这些教学方法的优化和严格要求，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苏州中学原本就领先省内的教学质量。

1933 年 7 月，胡焕庸就任校长的第二学年结束。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年的江苏省高中会考中，苏州中学学生包揽了前三名，前十名中有六名来自苏州中学，前一百名中有二十四名是苏中学生。这一成绩震惊了学界，至今仍是苏州中学引以为傲的历史。

三、面向社会、服务人类

胡校长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校长，都是一位引领者。在苏州中学的两年里，师生们从未觉得他是一位兼任校长，只知他事务繁忙，京苏两地奔波，但对苏州中学的事业却从未有丝毫懈怠，新举措频出，只求更上一层楼。他坚持教学改革、树立大教育观，尤为突出的贡献有三。

一是在苏州中学创办化工科，开设化工班。1932 年春，鉴于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经济紧缩的形势，胡校长在苏州中学创立了化工中等技术班。尽管设备简陋，但该班却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后来，大批化工科学生升人大学深造，更有不少人还出国留学。1949 年以后，许多化工类高等院校和化学工业大型企业都有当年苏州中学化工科毕业的学生，他们中有的还担任了院长、院士、教授、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在许多重要的化工机构中也都有苏中化工科的毕业生担任技术领导工作。

二是实行男女同学。当时苏州有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但女子缺乏进入普通中学求学的机会。胡焕庸于 1932 年 7 月起在苏州中学首次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这一举措不仅为女子提供了接受普通教育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她们打开了升入高等学校深造的大门，从而为社会培养了女性高级人才。

三是作为苏州名校的校长，胡校长还不失时机地参与苏州地方文

化活动，这既说明他文理兼备，更展现了他为提升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遗余力。如，在当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儒学学术高潮中，有一个名为“中国国学会”的学术团体在长三角地区颇具影响，章太炎为该国学会撰写了成立宣言。胡校长与当地学者一起担任史学部干事，在会刊《国学商兑》首期上，就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历代土地政策》，并与章太炎、唐文治、钱穆等史学大家一同发表了演讲，在社会上颇具影响。

四、别矣诸君！国家多难，前途珍重，作为全人，有厚望焉

胡校长热爱教育，珍视人才。他始终倡导“全人”教育理念，"要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在他任内，制定了《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则》，并完善了定期出版的《苏中校刊》。“学则”不仅细化了课程纲要，还制定了具有苏州中学特色的课程实施要求，既确保了苏州中学的教育特色，又体现了培育“全人”的可能性。这正是省立苏州中学成为省内龙头学校的奥秘所在！而《校刊》内容生动活泼、及时高效，深受师生和社会的欢迎与称赞。至今，留存在校史馆内的全套《苏中校刊》，仍是研究民国年间基础教育的宝贵史料，备受学术和教育界的推崇。

胡校长积极倡导师生的学术团队活动和建设，尤其是体育课余活动。在他的推动下，每位学生均有不止一项体育专技。为凝聚校友力量，他完善了校友会——紫阳同学会，并建造了供其专用的“紫阳楼”，还特意撰写了《紫阳楼记》，这段美谈至今流传。尤其是在1933年1月，一批苏中春季班的同学行将毕业，其中大部分同学即将奔赴抗战前线。胡校长亲自出了一期《毕业纪念专号》，高呼“山海风云，毋忘救国”。在这批二十余位同学中，后来有两位英勇献身抗

日，成为英雄。

学生们对胡校长的评价是：既是严师，更是挚友。在校期间，无论是参与师生社团活动，还是进行体育锻炼，他都能与师生打成一片，深受师生的敬仰和喜爱。许多苏州中学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各行业的骨干，但他们都没有忘记临危就任的老校长。多年后，即便是胡焕庸身处逆境，仍有许多学生前往南京、上海拜访看望他。胡焕庸到上海工作后直至晚年，学生聚会也常刻意安排在上海，以方便老校长到场欢聚。1983 年，近八十位已逾古稀的苏中化工科的学生齐聚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馆探望胡焕庸校长，留下的照片令人动容。而胡校长的学生、终身追随者、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传钧，每每提及苏州中学，必深情回忆胡校长对其的栽培，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难以言表。

1933 年暑假，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一再催促下，胡焕庸校长即将离开苏州中学，32 岁的他要去完成他更大的追求。苏州中学的师生恋恋不舍，老师们自发地在苏州名园"怡园"与其话别。好在胡校长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吴元涤即将顺利接任，在他的带领下，省立苏州中学继续走向新的辉煌。

丁云衍，江苏省苏州中学校史室主任、前副校长。

记胡焕庸委员与治淮二三事

吴旭

胡焕庸，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首届理事及理事长，被誉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

我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及水利学家张謇，在《关于导淮程序先宜注重淮河历史地理说帖》一文中指出：治理淮河必须研究其历史变迁，了解淮河的地理形势，举历史，言地理。胡焕庸作为地理学家，其对地理学的研究使他对淮河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治理方法。胡焕庸与淮河的深厚渊源，可追溯至1934年。

1931年夏，江淮大水、台风并发，恶劣天气致使淮水大涨。那时的淮河，既无通道，也无出路，一旦洪水泛滥，苏北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灾民失所，哀鸿遍野。由于苏北灾区地处僻远，沿海荒芜，人迹罕至，严重灾情，外界知之甚少。

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胡焕庸教授为学生开设了一门“江苏地志研究”课程。同年7月7日，胡焕庸率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到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和沿海地区废盐改垦相关情况。考察团一行有学生李旭旦、楼桐茂、詹子政、王慕韩等。他们途经镇江、扬州、

淮阴、清江、连云港、阜宁、盐城，再由南通经上海，回到南京，顺时针一圈，途中遍访各地水利、城镇、海港、盐场以及各滨海垦殖公司，行程覆盖二十余县，历时一个月。考察以水利、盐垦为中心，旁及自然人文等一切地理现象，具体而言，就是考察淮河、运河水利，调查淮北盐务及淮南盐垦状况。

胡焕庸在他的《治淮与我》（《中国科技史杂志》1981 年第 1 期）一文中写道：“我是学地理的，看到淮河在 1921 年和 1931 年发生的两次大灾，苏北大部分地区沦为一个大湖，积水几年不退，对此深感痛心，但当时并不了解它的地理原因。1934 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曾带几个学生去苏北考察，目的是看看淮河为什么这样成灾，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淮河。乘暑假之机，花了一个月时间，走遍了苏北大部分地区，考察了各地的实际水流，征询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包括当时的江苏运河工程局，特别是孙寿培工程师的意见。”

胡焕庸教授的这次调查，得到了两淮地方的关注和支持，国民政府的实业部、财政部盐务署，江苏省民政厅等部门均出具书面文书，要求各县、各盐垦公司“随时协助，予以调查之便利，并饬属保护”。在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给予积极支持，批准了 1000 元作为考察及报告印刷经费。

两淮考察团的行程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两淮考察记》为题，从 1934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3 日，在《中央日报》进行了连载报道，作者为李旭旦。文章内容主要涉及淮河问题的考察记事，如归江十坝、归海五坝、洪泽湖大堤、一个“之”字（之字，点为著名的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即现在的淮安码头镇至淮安清江浦一带）等，共 23 篇。最为有趣的是，这次连载均刊登在《中央日报》第三版副刊的中间右侧位置，位置出奇地一致，可能是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和重点关注。

胡焕庸师生回到南京后，立即将这次苏北考察两淮水利和沿海盐

垦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并写成《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该书详细介绍了两淮流域水利、盐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港口的建设和农业发展情况。全书分为纪程、水利、连云港、盐务、垦务5篇章，共计305页；另附图39幅、照片28张，共印刷1000册。

笔者找到了台北国图馆收藏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该书扉页上有胡焕庸于（民国）31年（1942年）5月在（重庆）金刚坡的签名，所赠何人不得而知。但是，书中夹有一纸信笺，信笺中的府间为（民国）34年（1945年）12月9日，并贴有一块报纸，边上附注着《大公报》三个字。报纸标题写着:《改进北方农业》。信笺下，还有批注，曰:“此件似可为改良冀鲁豫碱地之参考。”

看来，该书所赠对象似乎是一位民国政府大员，正在考虑战后如何恢复华北地区的经济生产问题。可见《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实用性，不容小觑。

在《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最重要的章节是第二章“水利”。胡焕庸根据两淮地区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河湖堤防的水利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重点结合研究两淮的水利现状，比较了各种导淮计划，并依据地势、水量等实际情况提出主张:“导淮以江海分疏为原则，尽快推进人海工程；淮水入海路线，只能够由淮南低地另挖出一条水道，选择直接入海之道；同时主修三河坝，以整理淮水人江通道。”

例如:“三河坝工程，近年非常草率，坝用土造，基础不固无论矣，包商为偷工省料计，水小时非至水流全涸，坝基显露，不肯堵塞。春季水势稍涨，未达存水标准，即自行溃决，因此乃成为应堵不堵，不应启而自启之颠倒行为，于上游无利，于下游有害。”

又如:“数十年来导淮之呼声虽高，实际之工程全无，国家政局不宁，社会民生凋敝，导淮费巨，无法筹集，此实导淮工程不能实施之

最大原因也。”

再如：“实行导淮，而仅仅以整理人江水道为毕事，则大大不可；……无论如何，不宜取道淤黄，因其地高工费，而效甚微也；至于一不开入海四千之河，二不办入江整理之道，而斤斤于开凿淤黄，以求取得不可靠之三五百泄量，是乃计之最下乘者！”

胡焕庸从地理学家的角度认为：“吾人研究地理，旁及水利，凡所陈述，或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详细规划，仍有待于工程专家。然而地形高下，水脉流通，虽老农老圃，莫不知其利害。所不同者，或则只见近利，而图苟安，或则能有远虑，而谋远定。成败利害，剖别于此。淮河导治，直接关系淮域居民之安全，间接影响整个国家之福利，深望全国上下，能勿淡然置之，草率从事，因贻来日无穷之忧，则幸甚矣！至于选择人海之道，或取车逻，或取射阳，或合开一河，或分开数河，总以行于低洼之地，求其畅行入海为是。”

胡焕庸的建议一针见血，指出了国民政府导淮无力之弊端，批评之声，直接戳痛了正在开导新淮河（废黄河）的政府当局。于是《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出版之后，在书店零售很快无剩，寄往各地的书箱全无音信。若干年后，胡焕庸才得知，这些成书大部分被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果夫下令搜去销毁。这一事件一直让胡焕庸先生难以忘怀，直到晚年他还在多个不同场合屡屡提及此事。

1947 年 3 月，胡焕庸将 1934 年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的“水利”一章，单独抽出编写成册，以《两淮水利》为书名，改版重印。此书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胡焕庸在书序中写道：“淮域水灾，影响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抗战期间，黄河又复夺淮南行，因而灾况益为严重。胜利以来经两年之努力，黄河虽已重回利津原道，而淮河本身，病态依然。淮水一日不治，两淮人民一日不能安枕。”

此时，距胡焕庸教授首次考察淮河已过 13 载。身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民政府部聘教授的胡焕庸，虽身居高位，但是没有忘记两淮人民之苦难，没有忘记科学家救国安邦之历史责任，仍呼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耳”。为吸取教训，书中省略了批评之辞，专注于水利本身之论述。

1950 年 6、7 月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 1300 多万人受灾，4000 余万亩土地被淹。中英政府痛感淮河水患对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巨大影响，决定尽快成立新的治淮机构。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召开了专题治淮会议。当时，水利部和华东水利部的领导多对淮河地形特征和水利现状不甚了解，大家不约而同地传看胡焕庸先生的《两淮水利》考察报告，对书中提出的导淮方案和治理淮河“宜疏不宜堵”的观点，以及必须开挖专用入海水道等论述，印象深刻。

8 月 25 日至 9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治淮工作会议。政务院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皖北行署、苏北行署等三省（行署区）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水利专家，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周恩来总理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和苏、皖、豫三省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治淮工作方针的指导性意见，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全国治淮会议讨论之时，胡焕庸在北京刚结束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审查，等待政务院的工作安排。这时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等几位治淮负责同志，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找到了胡焕庸，并转达了华东水利部和中央领导对其《两淮水利》著作的认可，认为胡焕庸对淮河有确切的认识，希望他能一起参加治淮工作。

胡焕庸在《治淮与我》一文中回忆了这段往事：“汪胡桢和萧开瀛

等几位先生，在北京找到了我。我当时考虑中国古代地理学发源很早，大家都说《禹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经典著作，《禹贡》就是一本根据治水写成的质量很高的古代中国地理著作。我对淮河已做过一些初步调查，也有意从事治淮工作，因而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参加了治淮工作。”

同时，政务院批准邀请胡焕庸参加正在北京召开的治淮会议，讨论治淮工作。紧接着人事和工作关系很快转到了当时的淮河水利工程总局，随着治淮委员会成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转为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工程部还专门为胡焕庸等学者设立了技术委员会，并任命胡焕庸为技术委员。

胡焕庸随即带领淮委工程部的有关技术人员实地考察，研究在淮河上游山区修建山区水库，疏通旧有河道，开挖新河。在淮河出口重要地段的洪泽湖，拟建设三河闸工程等设施，以将部分淮水控制性地引入长江。在苏北拟新开挖专用入海水道，分引部分淮水直接入黄海，等等。

胡焕庸不负众望，提出了诸多工作意见和建议。他对这条被命名为“苏北灌溉总渠”的淮河专用入海新通道，进行了勘测和定线工作，为实现早年提出的开挖新的淮水入海通道，解决淮水泛滥问题，迈出了苏北治淮工程建设的重要一步。

在淮委工作期间，胡焕庸还负责治淮委员会治淮工程陈列馆的筹建和设计。当年前来参观考察治淮工程的国内外来宾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政府领导、外国元首和社会团体。而参观治淮工程的第一站，便是设在蚌埠的治淮陈列馆，以便来宾了解新中国淮河治理的概况。

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郭学东先生曾与笔者谈到过治淮陈列馆的一些往事。他说：“当年我还是个孩子，时常跟大人们进去参观。陈列馆里有个大沙盘，沙盘上有闪烁的灯光，特别是有个船闸会自动开门，船

只进闸后关门，然后再从另一侧开门，轮船开出，动态逼真。”当年的治淮陈列馆位于和平电影院对面，即现在蚌埠市淮河路、延安路和京沪铁路之间。沿淮河路一侧为淮委交际处，是接待重要友人的招待之所。

胡焕庸在担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的同时，还兼任了资料室主任。工作期间，他在淮河流域收集购置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同淮河流域有关的地方县志，有 250 多部，用以研究淮河流域浆灾的成因。这 250 多部地方历史志书，成为淮河流域巨大的文史宝库。可惜的是，在 1958 年，由于治淮委员会的撤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也随之流失，至今无人知晓其散落何处。

1979 年 9 月，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校报发表的《治淮与我》文章中，提到了和他一起在技术委员会工作的其他同事。如沈思屿（鲁珍）先生，他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和浙江大学、安徽师大的教授，在淮委工作期间写有《淮河流域的气候》。沈思屿与胡焕庸是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求学时的同学，偏重研究气候气象，当时的气象是地理的一个分支，也是水文的重要支撑。后来沈思屿也随胡焕庸到淮河水利专科学校一起工作。

胡焕庸还约请了他的学生一起来研究治淮，如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的徐近之先生。1950 年以后，徐教授出任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亦偏重研究气候气象。徐近之编有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气候初步记载等几个册子，对研究淮河历史上水旱灾的情况有重要贡献。他的《淮北平原与淮河中游的地文》一文收录在《治淮汇刊》第三辑中，图文并茂，颇受研究淮河文史人员的喜爱。

胡焕庸先生在治淮委员会工作期间，还起草了《淮河水道志》，用于工作和内部参考之用。1953 年 9 月，胡焕庸奉调离开淮委前，分抄了两份《淮河水道志》，一份亲手交到淮委资料室，一份带到上海

华东师大以备随时修订。带到上海的这一份在“文革”中遗失。留在淮委存档的那一份，也因 1958 年治淮委员会的撤销而散落多处，一时难以寻觅。1977 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治淮委员会，并且要求编修《淮河志》。胡焕庸委员这份早年的手书文献重新受到了重视。经过多方调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找到了这份唯一的手稿。《淮河志》编纂办在华东师范大学找到了“文革”后依然健在的胡焕庸教授，请 85 岁高龄的原文作者胡教授增补序言。此后，《淮河志》编纂办公室编辑印刷推出，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才所幸得以面世。

《淮河水道志》是一本以淮河水系为脉络编写的现代淮河水经注，从干流到主要支流，从上游到出口，详细介绍了地理地名、历史文化、长度、位置、比降、流量以及水系关系等内容，是一本快速了解淮河的简明读本，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胡焕庸在离开治淮委员会工作后，又于 1954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之余，凭借对淮河的热忱和对淮河历史的研究，著有《淮河的改造》，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

《淮河的改造》一书的第三章“过去的灾难”，介绍了淮河从独流入海到黄河夺淮、黄泛淤垫的变迁过程，指出了蓄清刷黄的灾难性结果，特别是 1938 年花园口决口的灾难和黄河淤沙的灾害，并列举了大量数据，让人惊讶万分。

胡焕庸说，9 年黄泛期间，大约有 100 亿吨泥沙沉积下来。一般来说，淤积厚度从 3 公尺到 5 公尺不等，最厚达到 8 公尺；黄泛泥沙淤塞了淮河支流，破坏了淮河水系，给淮河流域带来了长期的灾难。

在黄泛的 9 年里，黄河并没发生大洪水记录，黄泛淤垫尚且严重，再想想近 700 年的黄河夺淮历史，淮河怎能不毁。黄河为什么会在 1855 年在铜瓦厢决口北徙？实在是因为在淮河流域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张謇要呼吁治淮必须研究历史和地理的真正

原因。

胡焕庸结合自己水利工作的经历、经验以及查阅的历史资料，陆续出版了《祖国的水利》《淮河》《淮河的改造》《佛子岭水库》等科普读物。《祖国的水利》一书回顾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水利的发展历史和成就，也提到了民间流传已久的俗语“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然而，由于书中阐述的黄河泛滥改道的主要原因系黄河上游黄土高原泥沙被冲蚀沉积在下游，这一观点曾遭到批评。

胡焕庸编写的《淮河》一书，1952 年 3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是开明青年丛书之一，由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1952 年 5 月，在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建设完成后，为加快培养治理淮河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治淮委员会决定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旨在培养正规的水利技术干部。学校选址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南的原医学院旧址。

此时，胡焕庸委员在治淮委员会的技术规划工作已告一段落，治淮委员会遂委派胡焕庸担任了建校筹备处主任，承担起全部的建校工作。在安徽水院的口述访谈中，胡焕庸回忆道：

“汪胡桢带我们乘船到淮河上游润河集参观，回来时经过怀远。汪胡桢说，我们今天就在怀远过夜，第二天参观（已经迁走的）东南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校址。

“那时，毛主席已发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治淮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淮委想利用东南医学院的校址，开办一个 ’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把合肥的皖北水校并过来。因为我是搞教育的，淮委就叫我去筹备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钱正英部长对我说：现在要你到怀远去办学校。当时我想对水利我也有些研究，搞一辈子水利我也愿意，于是我就把家搬到怀远，把小孩安排在怀远上学。”

1952 年上半年，建校筹备工作启动。历经半年筹备，学校于同年

秋季正式开学。胡焕庸亲任教务长并兼任水利工程专修科主任。

2012 年 7 月 3 日，胡焕庸教授的小儿子胡企中先生向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了一批胡焕庸教授珍藏多年的建校时文物，其中包括一本 1952 年的淮河水利学校笔记本。该笔记本记录了学校初创时的珍贵历史，还有胡焕庸亲笔题写的“努力学习，搞好工作”。

学校正式开学后，胡焕庸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学校事务。由于兼任校长的淮委工程部第二副部长张太冲工作繁忙，并未到过学校办公，因此所有学校事务均由胡焕庸教务长全面主持。

不久后（1952 年），国家大学院系调整，设在安徽怀远学校的淮河水利工程专修科被并入新成立的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随之更名为淮河水利学校，简称怀远水校。胡焕庸在该学校继续工作了一年。1953 年 9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高等教育部，将胡焕庸调至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然而，胡焕庸的淮河情结，并没有因工作调动而终结。1958 年 1 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组织了一次历时两个多月、由大部分青年教师和二、三年级学生共 330 人参与的长江三角洲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综合调查。时年 58 岁的胡焕庸教授主动要求参加这次大规模考察。

胡焕庸教授之所以要求到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实地考察，就是想亲眼看一看，他曾考察治理的淮河，特别是 8 年前他亲自带队勘测定线建设的苏北灌溉总渠，建成以后里下河地区的变化。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能在水网密布的兴化垛田地区，找一条小船，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兴化地区独有的垛田地貌。他希望看到里下河流域的现状，看到经过有效治理后，淮河流域以往年年泛滥成灾的面貌，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

1979 年 9 月 21 日，胡焕庸在上海师大报纸上发表了《我与淮河》一文，回忆了他结缘淮河和参加治淮的场景，并表达了对《淮河志》

出版、南水北调工程计划以及淮河治理和资源利用的关切。

胡焕庸在文章的最后说：“一个地理工作者的心愿，就是亲眼看到改造的大自然造福人民，以及富强祖国，这是何等的欣慰啊！”

这是一个地理学者的心愿，也是老一辈治淮工作者对淮河情缘的真实表达。

2021 年 4 月，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书院制教育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为纪念胡焕庸教授在淮河水利专科学校筹建[建多]开办中的贡献，以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市政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宿舍为生活社区，打造了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焕庸书院”，覆盖学生数千人。

1998 年，胡焕庸教授高龄辞世，享年 98 岁。尽管他没有看到今天淮河的新貌，但是他和那一代水利建设者对淮河治理的贡献，以及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人民特别是淮河流域的所有居民是不会忘记的。在此，笔者愿以纪念汪胡桢先生的话语作为本文的结语，因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胡焕庸先生：

“记住一件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件，更要让社会记住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2024 年 7 月 19 日于蚌埠

吴旭，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前一级调研员。

二十世纪人口研究所发展回顾*

桂世勋

我校人口研究所自教育部批准成立以来，已有 32 年。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人口研究所经历了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成果丰硕，而且专职研究人员队伍壮大至二十余名。作为那个时期人口研究所发展的亲身参与者之一，为了更精准地回溯这段历史的重要细节，我在学校档案馆老师的帮助下查阅了人口研究机构初创时期的珍贵档案，谨以此文回忆和感谢曾经热情帮助和积极参与我校人口研究机构创建发展的所有领导、老师、同事和朋友。

一、从人口地理研究室到人口研究室

1957 年，由我校地理系著名的人口地理和自然地理专家胡焕庸教授发起并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该研究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第一次批准的全国十八个研究室之一，也是 1949 年以后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高校人口研究机构。当时，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为胡焕庸教授，其他四名研究人员为言心哲

* 原载于《文脉——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回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

教授、林莉莉老师、王素卿老师、吴建藩老师。在胡焕庸教授的主持下，人口地理研究室延续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的人口地理研究工作，相继发表了《南通地区的人口分布》(《地理学报》，1958年)、《江苏省的人口分布和农业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理科版）》，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集刊》，1958年]、《宜兴县的人口密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理科版）》，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集刊》，1958年]、《常熟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地理学资料》，1958年)、《法国研究人口地理学的近况》(《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研究动向》，商务出版社，1964年）等一系列重要成果。1957年夏，该室曾派林莉莉老师到北京公安部摘抄江苏、安徽等省的分县人口数，当时接待林老师的公安部王新法处长，后来开会见到我时谈起当年情况很有感触，记忆犹新。不久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到错误批判，我校人口地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在1958年被迫中断。当时，地理系总支书记代表组织向胡焕庸教授传达了“人口数据是保密的，应该内外有别”的指示。于是，人口地理研究室辛苦积累起来的全部人口资料都被送入绝密资料室。

1979年，时任地理系总支书记的马鼎山同志在地理系全系大会上正式宣布：“1958年撤销人口地理研究室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然而，在1964年我校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后，胡焕庸、严重敏、张善余、周之桐等老师在从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的同时，已兼做人口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1980年，我校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扩建为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人口地理和城市地理成为正式建制的一个研究室，他们继续在该研究室从事人口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2月，胡焕庸教授应邀在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我国各省区人口的五十年来演变和地区差异》的报告，并被聘为中国人口学会顾问。我是1976年1月开始从事人口学

研究工作的，当时上海市南市区计划生育办公室邀请我作有关我国计划生育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本质区别的辅导报告。1978 年至 1981 年间，我连续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第二、三次讨论会上分别发表了《控制人口与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初探》两篇论文。不过从当时我校情况看，专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师很少，要单独成立人口研究机构的条件尚不成熟。胡焕庸教授为了尽快成立人口研究机构，以适应对内对外开展人口研究工作的需要，与地理系严重敏教授、图书馆学系系主任陈誉副教授、政教系吴铎副教授和我商议，决定先成立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会。1981 年 3 月 4 日，在周原冰副校长的积极支持和校教务处的指导下，召开了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会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地理系、外国地理研究所、政教系、图书馆学系等单位从事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教师共 9 人。3 月 6 日，校教务处向校长提交的《关于成立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会的报告》[（81）教字第 0H 号] 中写道：“经讨论，决定如下几项事宜：1. 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会，公推胡焕庸教授为会长，严重敏、陈誉、吴铎同志为副会长，桂世勋同志为秘书长。同时，一致决议聘请周原冰教授担任研究会顾问。2. 研究会系学术研究团体。她对外作为我校人口学社会学研究机构，与有关部门挂钩，与兄弟单位联系，并与国外同学科的研究机构进行联系，开展必要的国际交流，取得有关研究机构的资助。3. 研究会统一协调我校有关单位进行的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课题，统一向学校申报研究项目、科研经费。经常开展学术活动，统一安排参加国内人口学社会学学术活动。”签报当天，周原冰副校长批示：“这个会，我是支持的。胡焕庸教授对此很积极，谈了一年了，但成立教研室一时无条件，捏不拢。所以我同意先搞这个半民间性的组织，以便逐步积累资料建设这两门学科。”袁运开副校长也立即批示：“拟同意周校长意见，请刘校

长审定。”

1981 年 11 月 2 日，当时在袁运开副校长、周原冰副校长及校教务处陈子良副处长的积极倡导和热情支持下，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成立人口研究室，直属校部领导。同时，决定恢复人口地理研究室，并同意改名为人口研究室，由胡焕庸教授担任主任，桂世勋担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上海人口问题。人口研究室刚成立时，胡焕庸教授已年逾，响，其他 4 名专职研究人员为桂世勋（42 岁，讲师，专业特长为人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严正元（49 岁，讲师，专业特长为世界人口地理）、伍理（41 岁，教师，专业特长为经济地理、人口地图）、胡崇庆（48 岁，助理研究员，专业特长为人口地理）。

1981 年 12 月 3 日，我校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成立人口研究室的报告》[华师（81）133 号]，并抄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联络局、上海市教卫办、市高教局、市科委、市经济研究中心、市统计局、市人口普查办公室。该报告内容如下：“为了开展人口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培养人口学的人才，经 11 月 2 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成立人口研究室，直属校部领导，并由我国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桂世勋同志为副主任。我校人口研究室的研究方向拟以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及上海市的人口问题为重点，其基本任务：积极承担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交给的人口研究项目；为本校开设‘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课程；招收研究生，培养人口学的科研和教学人才；与国际人口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人员交往。特此呈报备案。”

1982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办公厅给我校发文《同意恢复人口地理研究室》[（82）教高一厅字 004 号]，并抄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高教局。该文写道：“我部曾于 1957 年以高

师教陈字第 161 号文批准你校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1959 年，在批判马寅初先生的过程中，该室研究工作中断。现经中央同意，已给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因此你校恢复人口地理研究室是完全应该的。该室有关学者当年在人口地理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是有益的。如在批判马寅初先生的同时，对他们有过不正确的评价，应予以澄清。望该室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人口学作出新贡献。"我校在接到教育部办公厅的上述批文后当即回复："我校在上报教育部的报告中，已说明要把人口地理研究室改名为人口研究室。"于是教育部高等教育一司在 1982 年 4 月 19 日专门发函给"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并胡焕庸先生"，其中写道"来函悉。人口研究室的名称，我们行文时，注意了历史上的情况，没有详加斟酌。现你们拟用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我们同意。今后即以此名称为准。"

二、不到两年迅速扩建为人口研究所

我校人口研究室成立后不到两年内，承担了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部门下达的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研究人员发表了人口问题研究论文 10 多篇，并编写出版了胡焕庸等著《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一、二辑）（其中载有当时人口研究室专兼职研究人员严重敏教授的《我国城镇人口发展变化特点初探》，严正元副教授的《丹麦的人口》《苏联人口的演变》《从人口生态学探讨人口限度》，胡崇庆讲师的《苏联城市与城市人口的演变》，伍理讲师的《上海市黄浦区的人口问题》，刘君德讲师的《试论江西人口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从土地资源利用看江西人口的适度规模和合理分布》，肖德贞讲师的《关于人类寿命的地理学问题》，洪建新讲师的《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我国人口惊人减耗问题初探》，周志桐讲师的《法国的人口及其分布》《法国农村人口与农业

现代化》，张务栋讲师的《上海市人口密度的地理分布剖析述略》，以及我的《控制人口和经济政策》等），还出版了胡焕庸著《中国人口地理概要》（中文版、英文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以及胡焕庸、张善余合著的《世界人口地理》等著作。

我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刘铮教授主编的《人口学辞典》的中国人口史条目，并与我校数学系控制论教研室吴启迪、杨庆中、马国选老师合作承担了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下达的《“六五”期间上海市区人口机械变动的预测和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等研究任务。此外，我请胡焕庸教授担任《中国人口丛书》常务编委，并主编《上海人口》分册。我还主持承担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达的重大课题《中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政策》，组织严正元、胡崇庆、伍理等教师从1982年9月起开展黑龙江省、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的人口密度调查研究工作。我当时任《上海人口》分册第三副主编和上海市人口学会秘书长，正与我校数学系控制论教研室吴启迪、杨庆中、马国选老师合作主持承担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达的《上海市中长期人口发展预测及人口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课题。人口研究室老师还在我校地理系开设了“人口地理学”课程，我在我校政教系开设了“人口经济学”课程，并应邀在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开设了“人口社会学”课程。

1982年夏，人口研究室招收了人口地理学专业的朱宇和胡琪。朱宇后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专家，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太平洋地区迁移研究网络主席；胡琪后在上海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为上海市人口学会秘书长。同年秋，胡焕庸教授与陈涵奎教授共同推荐刚从地理系本科毕业留在我室工作的青年教师曾毅，获得中国与比利时文化交流协定的资助，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攻读硕

士学位，后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并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人口学和老年学专家；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中心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杰出研究学者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 年，曾毅教授给我校人口研究所捐赠设立了“胡焕庸人口环境与健康老龄奖学金”。

1982 年 10 月，上海市教卫办、市科委在下达的［（82）沪科第 536 号］文件中批复同意我校建立人口咨询预测中心，成为我国人口研究机构中第一个被政府部门批准开展人口咨询服务的机构。在该中心建立后半年内，已完成了太湖地区农业区域规划和上海市科委、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虹口区分行等单位委托的有关上海市人口预测，全国缝纫机、自行车需求量预测的部分咨询工作，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同时，我校人口研究室也初步建立了一支以胡焕庸教授为学术领导人的科研梯队。当时人口研究室已有专职研究人员 8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助理研究员 2 人，教员 4 人；兼职研究人员 11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5 人，助教 1 人。

1983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发文《同意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人口研究所》［（83）教高一字 018 号］，并抄送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文写道：“华东师范大学：同意你校建立人口研究所。研究方向以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及上海市人口问题为主，继续重视实际应用，发展人口咨询业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该所编制 35 人，由校内调剂。”同年 4 月 9 日，我校校长办公室给校内各单位下发了《关于建立人口研究所的通知》［华师校（83）第 011 号］，任命胡焕庸教授为所长，桂世勋、孙文华为副所长。据我后来了解，我们比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要早一年。我校人口研究所之所以这么快被教育部批准，是与教育部高教一司章学新司长的热情关心、我校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以

及在胡焕庸教授主持下人口研究室全体专职和兼职人员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到 1986 年，我校人口研究所专职人员最多时达到 27 名，其中正教授 3 名、副教授 1 名、讲师 7 名、助教 9 名，行政教辅后勤人员 7 名；兼职研究人员 13 名。所下设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主要有胡焕庸、程潞、严正元、伍理、胡崇庆、朱宝树、沈颖、范公正）；人口经济与人口社会研究室（主要有桂世勋、李立奎、狄菊馨、沈哲宁、张景岳、黄毓平）；办公室（主要有孙文华、江荷珍、凌小妹、陈正章）；资料室（主要有吴评理、吴爱珠）；绘图室（主要有何福英、姜梦）；计算机房（主要有陈阳明）和复印机房。

三、20 世纪人口研究所成立后的新进展

我校人口研究所从 1983 年建立后，先后由胡焕庸教授、程潞教授、朱宝树教授和我担任所长，我和朱宝树、孙文华、王大奔、丁金宏曾相继担任副所长，吴评理、范公正、吴爱珠、王大奔也曾相继任所直属支部书记；胡焕庸教授在 1985 年后虽然不再担任所长职务，但被学校聘为“人口研究所终身名誉所长”。人口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1985-1989 年）程潞教授是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农业地理学专业领域国内外著名学者，曾任我校地理系副主任，兼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人口地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自然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地理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研究会委员、上海市地理学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地理》（主编）、《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上海市经济地理》等。人口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1989—1998 年）朱宝树教授师从胡焕庸教授，1982 年获人文地理硕士学位并留所任教，主要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人口与环境、人力资源管理等，他的代表作有《人口生态学》（主编）、《从离土到离乡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再推进和劳动力再转移》等。我任人口研究所第四任所长（1998—2001 年）。20 世纪 80、90 年代，人口研究所在各任领导带领下，在全所研究人员和行政教辅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以下主要新进展。

1. 成为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的重点研究机构

从 1980 年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开始了对中国高等学校人口学研究的全方位、多层面援助。按当时规定除北京市可同时援助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人口研究机构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只资助 1 所高校人口研究机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复旦大学人口研究室已被批准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华 P01 项目受援单位。我们要在上海市高校中争取成为第二个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单位，难度很大。早在 1982 年，我们从教育部高教一司获悉联合国人口基金 P01 项目组援助的我国第一批十所高校将在广州开会，联合国人口基金来华使团也参加会议，听取两年工作汇报并研究开展 P02 项目援助工作，胡焕庸教授就主持人口研究室有关人员于 1982 年 12 月 29 日为学校起草了《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介绍》，打印中英文各 20 份，送教育部高教一司，并抄送教育部外事局国际合作处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P01 项目组。1985 年，我校人口研究所终于被批准成为“中国大学人口学研究与培训”P02 项目单位，获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当时学校将小教楼五楼约 500 平方米的教室全部作为人口研究所的办公用房。联合国人口基金也给我校人口研究所资助了当时最新的复印机、计算机等设备和一辆供调查用的中巴。所领导商议后也决定将这辆中巴无偿交给学校车队使用，只要求学校车队保证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优先使用。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下，我校人口研究所主办了全国第一个“人口地理讲习班”，邀请了国际著名的人口地理学专家——美国罗杰斯（Rogers）教授和英国克拉克（Clark）教授来我所讲学，所长程潞教授也在讲习班上作了专题报告；主办了“人口生态”学术研讨会和“人口发展与环境科学”研讨会；主办了“地球村的人口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地球村学会第四次年会；我协助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郭沧萍教授，与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张志俊教授一起主持了P04项目课题“改革开放中最新人口问题研究”，并由我所主办"我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人口发展”研讨会。我所由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先后推选了严正元教授赴西欧国家考察交流人口研究新进展、朱宝树教授赴马来西亚和泰国考察人口研究新进展、王大奔副教授赴智利和墨西哥考察交流人口研究新进展、王桂新教授赴日本大学和日本女子大学访学，我也作为中国高校人口学者代表团团长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交流人口学教学和研究成果；先后选送了所内青年教师狄菊馨和我校地理系毕业生周凯来、数学系毕业生钱方和黄建萍、外语系毕业生顾全忠分别前往荷兰、美国、英国接受系统的人口学专业教育或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人口研究所的青年教师林丹瑜于1984年获美国人口理事会资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成为国际著名的统计学家，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国际学术刊物《生物统计》和《美国统计协会杂志》副主编。

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国人口基金鉴于中国高校已具备培养人口学专门人才和独立开展人口学领域研究的能力，决定结束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人口学培训与研究项目的援助，我校人口研究所也不再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单位。

2. 成为中青年施展研究才华和迅速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载体

20 世纪人口研究所在老一辈专家胡焕庸教授和程潞教授热情指导和积极支持下，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83 年，胡焕庸著《论中国人口分布》出版；胡焕庸与张善余合著《世界人口地理》出版；胡焕庸等著《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出版。1984 年，胡焕庸与张善余合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出版。1985 年，胡焕庸等著《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出版。1986 年，胡焕庸著《论中国 8 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出版；胡焕庸与张善余合著《中国人口地理（下册）》出版；胡焕庸著《人口地理简编》出版；我著《人口社会学》出版。1987 年，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出版。1989 年，胡焕庸著《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版；胡焕庸与伍理合作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出版；我主编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版。1990 年，胡焕庸自选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出版；朱宝树著《人口生态学》出版。1992 年，胡焕庸与严正元编著《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出版；我主编的《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研究》出版。1995 年，我主编的《中国人口研究丛书》[包括我主编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照顾问题——上海与东京老龄化对比研究》、我任第一副主编的《中国开发区外来人口研究》（主编为郭沧萍）、张善余著《人口垂直分布规律和中国山区人口合理再分布研究》、朱宝树主编的《从离土到离乡——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出版。1997 年，骆克任编著《现代实用统计与计算机应用》出版；王桂新著《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出版。1999 年，张善余著《人口地理学概论》出版。2000 年，王桂新著《区域人口预测方法及应用》出版。当时人口研究所还与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研究，取得了一批与海外合作研究的成果。在这期间，我作为人口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张善余作为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均于 1986 年 1 月同时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该年 12 月，我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此外，人口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严正元、朱宝树、王桂新、骆克任也在 20 世纪先后被评为教授或研究员。

3. 成为人文地理专业（人口地理研究方向）和人口学专业的博士生培养基地

1983 年，胡焕庸教授委托我协助填写人文地理博士点人口地理研究方向的申请表。经协商，决定由胡焕庸教授领衔，与程潞教授、严重敏教授、钱今昔教授共同组成导师组。当时，我把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人口研究所其他专兼职研究人员的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都写进去了。

1984 年，我们的申请获得批准，胡焕庸教授开始招收人文地理专业人口地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其中，第一批培养的博士生李若建，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成为国内著名的人口学和社会学专家，现任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和社会学系系主任；第二批培养的三位博士生中，除徐庆凤不幸患病去世外，丁金宏毕业留所工作，先后任地理系副系主任、人口研究所所长和首届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杨云彦毕业后，先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湖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和湖北省卫计委主任。

1985 年，我所申报的人口学专业硕士点被批准，并于 1986 年开始招收人口学专业的硕士生。1995 年，我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评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业博士生的兼职指导教师。2000 年，由我牵头，联合朱宝树教授、王桂新教授、骆克任教授共同组成

导师组，申请设立人口学博士点。该年5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被授予人口学博士点，成为全国继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的第四家具有人口学专业博士点的人口研究机构。

截至2011年10月，我校人口研究所已累计培养博士生70余名和硕士生120余名；其中包括在20世纪80、90年代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李若建、杨云彦、王桂新、丁金宏、季增民、朱宇、胡琪、戴淑庚、高向东、黄晨熹、俞章盛、岳华、张得志、徐铭东、杨晓勇、宋宪东、倪波、王忠宏、吕德才、艾丽娟、孙中锋、谭友林、冷熙亮、刘晶、仝利民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干部。现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的吴瑞君教授，虽是1988年人口研究所从复旦大学引进的优秀硕士，但在2005年获我校人口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王桂新教授，是我校培养的人文地理学博士。现任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的高向东教授，是1997年留所任教的人口学硕士，于2002年获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我校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的黄晨熹教授，则是1996年留所任教的人文地理学硕士，于2003年获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哲学博士学位。

总之，20世纪我校人口研究机构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发展壮大历程。1998年，受教育部有关研究机构体制改革的影响，我校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被并入哲学系，虽然对外仍可继续用该所名称，但该所原来跨院系的强大研究团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时，我校人口研究所也面临被“撤销”的困境。于是我作为当时的人口研究所所长直接到办公楼校长室找了王建盘校长，我说：“人口研究所是胡焕庸教授亲自创建的，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能发展到今天在全国高校人口研究机构中名列前五位十分不易。如果现在学校‘撤销‘了人口研究所，那么今后华东师范大学就永远不可能再有人口研究所了。请学校领导慎重研究决策。”后来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校人口

研究所的建制和人员终于被保留下来。2001 年，我从所长岗位退下来后，我校人口研究所在丁金宏教授、吴瑞君教授、黄晨熹教授、刘大卫副教授、李强副教授的相继领导下，以及在张善余、朱宝树、王大奔、骆克任和我等前辈帮助下，全所老师正传承以胡焕庸教授为首的老一辈学者优良传统，努力拼搏，再创辉煌。

桂世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人口研究所前所长。

第三次冲锋

——访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

汤建中　姜素清

1901 年，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家道清贫的私塾教师家中。生不逢时，胡先生一到人间就面临着国难家难的风刀霜剑。不满两周岁时，父亲离世，靠着母亲帮人缝纫做衣，他好不容易才熬过了惨苦的童年。他从小人穷志不穷，好学上进，发奋读书。可是读书又谈何容易，尽管他学习成绩优异，家境却清贫难支，艰难地熬到中学毕业，想要继续深造，但前途又十分渺茫。正当他徘徊于继承父业，还是另谋出路的关键时刻，听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招生的福音，这对于勤奋好学却身处困境的他来说，犹如绝处逢生。可是僧多粥少，升学的竞争十分激烈，他力争上游，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的大门。

1920 年，竺可桢先生来南京高师文史地部任教。在竺老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胡先生茁壮成长，逐渐成为中国知名的地理学家。作为竺老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胡先生曾协助竺老开展气象研究工作。

---

*　原载于《地理知识》1985 年第 5 期。编者有少量文字处理。

从1930年起，胡先生长期主持中央大学地理系的系务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人才，其中大多数业已成为我国地理界和气象界的知名学者。胡先生积极参与中国地理学会的组建工作，并两次被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胡先生思维敏捷、学识渊博。凡馆藏新书，他总是先睹为快，对国际学术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胡先生勤耕耘，善收获，著译之多在当代地理学家中首屈一指。胡先生是一位开拓型的学者，喜欢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开创性的著作。胡先生在气候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20世纪30年代就撰写了《黄河志气象篇》和《气候学》两本专著；80年代初，又出版了《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一书，和前书合成双璧。在花甲之年，胡先生根据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国际动态，讲授并编写了《古地理学》的书稿。

20世纪70年代，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理论风靡整个地学界，胡先生在学习这一崭新的全球构造学说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世界海陆演化》一书。胡先生一生著述的区域地理书籍有1。余种之多，他对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如苏、美、英、法、德、日等国）和中国的部分省区（如四川、台湾、江苏等）均有专著论述。他所著的《中国的农业区域》，是我国农业区划的开山之作。胡先生十分重视野外考察，曾亲自率领青年教师到苏北、东坝等地进行地理考察。在苏北考察的基础上撰写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由于针砭了国民党政府的导淮计划，为当局所不满，导致此书一经问世，绝大部分被秘密销毁，遭到扼杀。抗战期间，胡先生领导并组织了川西科学考察团，参加者有中央大学地理、地质、生物三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学生100余人，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罕见的。

众多的论著，遍及各地的学生，以及多年的地理学会领导经历，为胡先生在地理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也对地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尽管胡先生博学的一生纵横驰骋在地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然而概其毕生之研究成就和学术生涯，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人口地理学家。

一、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

胡先生在留法期间，有幸聆听了法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马东男、德孟雄和白吕纳诸人的讲授，又钻研过拉采尔、白兰士等人关于人口地理方面的论著。西方的新地学体系启迪了这位年轻地理学生的思维活力。在现实的地球上，既没有超然物外的人，也没有不受人影响的纯自然。在人和地的关系中，地只是“人化”了的自然界，而人才是大千世界的主体。因此，他将研究人的分布迁移规律的人口地理学，视为地理学的核心。

积弱多年的旧中国需要养育众多的人口，人口问题早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研究课题。在胡先生把人口作为终生奋斗的研究领域之前，陈长薪等学者就已对中国人口问题作了多年的研究。因为，“过去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大多偏重于纯粹数字之推求，很少注意地理背景，研究其分布之稀密者”，所以，胡先生一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就将立足点放在人口地理上。1934 至 1936 年间，他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中国人口地理的论文，开创了国人对人口地理学系统研究的先声。综观胡先生这一阶段的人口地理论著，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重视地理背景之研究，特别着重对人口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地形和气候要素的分析；二是重视人口与农业的相关研究，因为以农立国的旧中国，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首先与农业生产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是胡先生这一阶段的力作，也是集中体现其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文的科学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胡先生呕心沥血地编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他首先绘制出人口分布图，图中的2万多个点子代表了我国4亿多人口的实际分布情况，然后用等直线法作出人口密度图。且不说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费时费事，十分艰辛，单是把这么多点子准确地标在底图上，再作出密度图，更是一项非常细致而繁重的劳动。

《中国人口密度图》问世后，申报馆率先将此图纳入其出版的地图集中。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连同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被翻译刊在美国的《地理学评论》杂志上，其他国家也相继摘登该文之精要。胡先生在人口地理方面的学术思想跨越了国界，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中国人口之分布》一举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人口地理的必读之作。该文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作者在充分论证人口分布与自然条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界线，这就是“暖辉一腾冲线”。文中指出：“今试自黑龙江的瑷瑶，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的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媛辉一腾冲线”的两侧，人口疏密之对比是如此明显，因此，该线在人口地理学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况且，该线的客观存在还得到了地形、气候等自然要素的佐证。中国大于1000米等高线和小于500毫米等雨量线的地区，差不多各占全国总面积的60%，与西北半壁的面积相仿。这些地区不是地形崎岖、气候高寒，就是降水稀少、荒原遍野，既不宜人，也不宜农，因此人口极为稀少。由于这一界线的科学论据充分，因此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即便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6；原定分界线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甚至将该线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对我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第三次冲锋

胡焕庸教授在人口地理的研究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经过了多次波折，才迎来了研究人口地理的美好前景。如果我们将抗战之前视为他向人口地理研究领域发起的第一次冲锋，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进行了两次不寻常的冲锋。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次年，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系统成立 18 个研究室，其中包括以胡先生为主任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奋起向心爱的人口地理研究领域做第二次冲锋。他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孜孜不倦地重拾中断了 20 年之久的人口分布与农业生产方面的研究，完成了江苏省南通、宜兴、常熟等地区的人口地理论文。众所周知，那是一个风云多变的年代，人口地理学不独要研究自然气候等要素，而且与政治气候的变幻息息相通。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的批判，也殃及所有人口研究的机构，已经取得初步成绩的人口研究室就被迫停止工作。

1979 年以来，胡先生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他的人口地理学术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春天。1981 年底，人口研究室得以恢复，他对这块失而复得的研究阵地格外爱护，亲自耕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以非凡的雄心壮志和冲天的干劲，开始了他人口地理研究的第三次战役。这一次战役，无论从规模、声势和成就方面都是前两次所无法比拟的。抗战之前，他孤军奋战；20 世纪 50 年代，仅有一个小组和他一起冲锋陷阵；现在，人口室已发展成为拥有 20 多人的研究所，形成了一支颇有声威的科研队伍。提起人口研究所，还有一个小

小的插曲。联合国人口组织原来不同意资助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因为上海已有复旦大学的人口研究室，就不必另立中心了。可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的胡焕庸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已是世界知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该所又是中国唯一一个从事人口地理研究的机构；鉴于该所与地理系的血缘关系，所系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主要的人口地图编制出版中心。因此，联合国人口组织最终同意拨款38万美元，资助胡先生领导的人口研究所。

1985年我们见到胡先生时，他已84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在短短几年间，他身先士卒，带领团队攀登人口地理学的高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获得上海市高校文科科研成果一等奖。胡先生本人在人口地理的研究中，也是硕果累累。在访谈中，他不无喜悦地告诉我们："5年之内我已写了10余本书。"接着，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们报书名，竟有12本之多。胡先生年事已高，右手又不能书写，单靠左手执笔尚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其中部分书籍得益于他学生的协助），我们由衷地钦佩胡老的进取精神。我们相信，地理界的后起之秀都会从胡老的事迹中汲取启示和动力。更令人欣喜的是，他的研究课题已不再局限于人口分布和农业生产，而是开始探索人口经济、人口预测等新的研究领域。这种探索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比早期的研究工作有明显的突破，而且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对我国的人口规划、计划生育等实际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9年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运动频繁，虽然胡先生常常成为运动的对象，但他始终不忘读书和学术研究。1955年，一些青年教师去他家抄家时，惊讶地发现他仍然稳如泰山一般地坐在木椅上，认真地阅读德国气候学家汉恩的巨著《气候学教程》与柯本的《世界气候》，并认真地做着阅读笔记，去抄家的人内心也为之动容。在漫长的"文革"冤狱岁月里，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始终看书读报，

始终不忘学术研究。一旦获得平反，他从不提及个人恩怨。他说："别人的时间是用年来计算，而我的时间是用天来计算的。只要我的呼吸还没有停止，我就要不断地努力工作，著书立说，为祖国留下更多出版物。"

胡老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迎来了他人口地理生涯中的高潮，虽然这高潮出现在胡老的晚年，如迟开的花朵，但特别鲜艳夺目。在第三次冲锋中，胡老倾尽全部余热和余生，向人口地理科学的高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三、零增长率的启迪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焕庸教授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心志来研究人口地理的，他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忧虑了一生。后来，当他展望到中国人口的乐观前景时，心中充满了欣慰。

从系统工程的视角来看，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必然会加剧与食品、能源和水资源等储、产量之间的矛盾，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这些矛盾的关键所在。胡先生早期认为，中国人口数的适宜上限应是 7 亿人口。但是，在鼓噪一时的人手论之下，人口数量一下子突破了 10 亿大关。这种无限增长的趋势何时才能终结？为了寻找正确的答案，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深入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了满意的结论。世界各国都曾经历过人口盲目增长的阶段，但如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相继出现了零增长率，有的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率。胡先生认为，零增长率的出现是各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他预测，到 2050 年，世界各国将普遍迎来零增长率。根据他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到 2000 年，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

12.5 亿。在零增长率的启示下，一直为人口问题忧心忡忡的胡老终于展露笑颜。他认为，自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喜人，只要保持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到 2030 年，凭借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让 14 亿人口共同富裕起来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当我们询问他对未来的规划时，胡老满怀信心地说："我今年 84 岁，但身体尚健，这几年自我感觉比'文革'期间（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被拘留五年一个月）要好得多。我还可以为人口地理研究工作再奋斗一阵子。"他表示，今后尽可能多写几本书（如《八大人口区与国土经济学》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学术财富。同时，他也将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确保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后继有人。

我们衷心祝愿胡老健康长寿，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汤建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前所长。

姜素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理知识编辑部责任编辑。

Chapter 04

第四章

怀仁慕德

胡焕庸、张其昀和老师竺可桢

胡复孙

竺可桢（1890-1974年），字藕舫，浙江省绍兴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48年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他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国立东南大学一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并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系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以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长期担任理事。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胡焕庸（1901—1998年），字肖堂，江苏省宜兴人，曾留学法国，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地理科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他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及教务长，并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研究教授。他还兼任过中国气象学会总干事、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及理事、总干事、理事长，以及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1949年以后，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及人口研究所所长。

张其昀（1900—1985年），字晓峰，浙江省郭县人，是地理学

家、教育家。他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张其昀也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长期担任理事及总干事。1949 年以后，张其昀赴台湾后历任多个要职，为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及学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竺可桢先生是中国早期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执教。胡焕庸和张其昀均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第一级的毕业生。在竺先生担任文史地部地学系系主任期间，他对包括胡焕庸和张其昀在内的几位学习地学的学生给予了精心培养和颇多关照。胡焕庸和张其昀在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中，也没有辜负竺先生的期望，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竺可桢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于 1910 年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在哈佛求学期间，他主修“气象学”“气候学”课程，同时兼修“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1918 年，竺可桢凭借《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求学的 5 年间，竺可桢深入了解了哈佛大学地理学教育制度和文化，哈佛大学的地理学模式就是从地质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学科建制上采用地理学与地质学并立的大学地理学科模式。竺可桢归国后，将这一学科模式移植到中国大学。他 1918 年 9 月回国，首先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地学部和数理部教授“气象学”和“天文学”。1920 年秋，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地学系独立成系，竺先生任系主任，地学教育就此从文史大类中独立出来。

竺先生在美国学习气象多年，深刻理解了地学对国家的作用，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受聘南京高师以后，他不仅在文史地部讲授气象学，同时在数理化部讲授微积分，在农艺专修科讲授地质学。在改组后的东南大学地学系，他讲授的课程是“气象学”“地学通论”“世界气候”“世界地理”。其中，“地学通论”是地学系学生的必读课，也是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共同的必修课，听课的学生人数常常超过百人。他不仅聘请专家担任地质旃矿物的教授，自己除担任地理、气象课程外，还成立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等标本室，亲自带领学生每日观察气象、记载天气数据，出版南京气候月报、年报，并与国内外相关机构进行交流。在人文方面，竺先生特别善于联系各国时事与国际关系的资料统计，指导选学地理的学生分别从中、英、日文报刊摘录中外地理与各国政治、经济资料，编印成《地理新资料》，既锻炼了学生收集资料、编辑书刊的能力，也为全校师生提供了阅读资料。

竺可桢是早年的南京高师一国立东南大学一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的创始人，更是中国气候学和地理科学的奠基人，也是胡焕庸最尊敬的导师之一。胡焕庸晚年称竺先生是他〞大学时的业师，也是毕生事业的导师”。当时的地学系包括了地理、地质、气象和矿物四个专业，胡焕庸、张其啊等正是在这样的大地学通才教育制度里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

1925 年 1 月，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教育部免去了担任校长 10 年的郭秉文的职务，派遣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接任，但这一决定遭到了东南大学董事会和师生的强烈反对，校内掀起轩然大波。学生闻讯后群起抗议，拒绝胡敦复到职。郭秉文为了保护学生，迅速离开南京以息事宁人，当年即应邀赴美国讲学。竺可桢“目睹胡敦复被围受辱，不忍正视，上前调解时反遭呼斥。东大名誉和学风竟至如

此，极为痛心，是以翌日即提出辞职"。学期结束后，竺可桢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国际百科全书》编译室主任。

在东南大学，胡敦复就任校长遭到教授和学生的反对，不满一个月就不得不离职，其后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维乔（字竹庄）代理校长。1926 年 5 月，蒋代校长邀请竺可桢重返东南大学担任地学系系主任，竺可桢向蒋代校长提出"足下如欲发展东大理科，则各系不宜偏重。理科四系之中，地学系创立独后，故其设备，本不能与他系相匹敌。此次美国庚款分配科学教育补助费，数学与地学又独向隅，是以学校方面，对于地学系人才设备两方，应予以特别之注意……如足下有意发展地学，则桢以为于设备方面，在学校经济可能性之内，应予以特别之通融……现理科四系中化学、数学均有四教授，物理本亦有四教授，则地学设四教授亦不为多，如斯方足以见学校对于理科各系平均发展之诚意。桢备员执教，固亦所愿。若学校必欲夷地学为附庸，桢虽不敏，亦不愿为冯妇矣"。此信发出后，校方一时难以满足竺先生的要求。在新学年里，竺可桢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任教。

1927 年，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宣布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委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张乃燕担任东南大学更名后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7 月，张乃燕就任后即聘请竺可桢担任该校筹备委员并聘定担任地学系系主任，竺先生又回到了南京。

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对六位专攻地学的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多有关照。胡焕庸自幼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全靠勤奋苦读才脱颖而出考入南京高师。张其啊则出生于书香世家，其曾祖父、祖父皆清朝举人，幼承庭训甚严。胡焕庸、张其啊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两人是同班同桌同专业，关系相当好，也同时深受哲学家刘伯明、史学家柳诒徵、地学家竺可桢三位学人的影响，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

活动。1923 年夏，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毕业后，胡焕庸到扬州中学任教，1926 年春回到南京，完成了辅修课程，获得国立东南大学毕业资格和理学士学位，随后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张其的毕业时就报名补习东南大学学分以完成东南大学毕业资格，竺先生当即聘请张其啊担任地学系助理，但张其啊不久就因病请假回到宁波家乡养病。1924 年 2 月，东南大学解除了和张其陶的工作关系。病愈后的张其啊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学地理教科书的编辑，最终以普京高师的毕业资格保持终身。1927 年，竺可桢回到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前东南大学地学系，担任系主任。8 月，张其陶也受邀回到母校地学系任教。胡焕庸于 1928 年 8 月自法国归国，竺可桢随即协助其获得国立中央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联合聘任。胡焕庸在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担任副教授，同时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他在接替完成竺先生在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学工作同时，还协助竺先生组建气象研究所和钦天山气象台。竺先生对胡焕庸也完全信任，不仅在工作上委以重任，也委派他在自己外出工作时，担任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并且让他担任中国气象学会的总干事。此后胡焕庸又长期担任中国气象学会的理事和监事。

竺先生对这两位优秀学生的倚重从一句话中便可见一斑。1929 年 9 月，时任国立清华大学地质系系主任的翁文灏向竺先生提出，希望请张其啊去清华大学任教，当即被竺先生回绝，其表述就是“张不能离校，胡不能离所”。

胡焕庸在中研院气象所工作至 1929 年 8 月。竺先生虽提出“肖堂，桢需其擘画者正多，本年决难完全离所”，但仍派遣胡焕庸代表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绕道西伯利亚赴丹麦参加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然而，“行装都戒，计日长行。而中东铁路事件骤起。边关道阻，烽火绵连，胡君之行，终于不果”。同年 9 月中旬，因“中大乏人，需其

专任辞职"，胡焕庸才不得不结束了气象研究所的工作，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专任，不久就挑起了新成立的地理系系主任重担。在此后的 20 年里，他亲手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地理、气象人才。

根据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各直辖研究所所长为中研院评议会当然评议员。另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各国立大学校长组织选举会，投票选举 30 名聘任评议员，候选人加倍至 60 名。1935 年 6 月 18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当然评议员、天文气象组主席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去函，推荐蒋丙然、张其的两位为本院评议会气象组候选人。

6 月 19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预备会。院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 12 位国立大学校长出席。会议通过了中研院首届评议员名额分配和候选人名单。6 月 20 日，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会在南京成贤街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举行。出席选举的除 19 日到会的蔡元培等 13 人外，还有国立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暨南大学校长沈鹏飞，共计 15 人参加选举。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规程》，气象科目聘任评议员名额为一名。选举的结果是：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其的 7 票，国立青岛观象台资深台长蒋丙然 6 票，张其啊当选。他自 1935 年 7 月至 1940 年 7 月，担任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气象组聘任评议员。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的组成，除院长蔡元培及中研院各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等 12 位学者为当然评议员外，同时还有胡适、胡先骕、翁文灏、丁文江、陈寅恪、赵元任等 32 位著名学者担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

1940 年 3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举办了第二届评议会的遴选。与第一届相同，地理科仍未单独列出，而是并入地质科。最终当选的地质

科三位评议员是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气象学科唯一的名额当选人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吕炯。

1928 年秋，竺先生离开中央大学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专任后，仍对中大地理和气象人才的培养关怀备至。他常到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指导工作和做报告，还为《地学杂志》撰写文章。多年来，他与胡焕庸、张其昀从师生到同事，再到挚友，关系极为融洽，经常会面且不断有书信往来。气象研究所计划在西藏拉萨建立气象站，俞焕庸就推荐了刚毕业不久、担任助教仅一年的学生徐近之负责此项工作。徐近之乔装成喇嘛，单人匹马，历尽艰辛，携带必要仪器和设备，.经兰州、西宁骑行入藏。拉萨气象台建成后，每日向南京发送气象电报，对全国的天气预报和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36 年 2 月，经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郑晓沧提议，陈布雷、翁文灏等人推荐，蒋中正约请竺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先生起初婉拒，后同意先担任半年。胡焕庸和张其陶便积极参与组织策划，寻觅人才。竺先生于 3 月 8 日向陈布雷表示同意就任半年，3 月 10 日即邀请张其昀到浙江大学任教。竺先生 4 月份到浙江大学就职，张其昀则于 7 月份到任，担任史地系系主任和史地研究所所长。胡焕庸也陆续推荐了包括地理系教师沈思屿、助教严德一、文学院教授郭炳和、历史系教授缪凤林、理学院教师王南生等多位学者去浙江大学任教或讲学，并推荐中大农学院教授冯肇传为农学院主任、倪志超为总务长、徐品焯为财务处会计等。其间，竺先生和张其的利用与东南大学学者的私人情谊，招揽了多位东南大学的旧同事任教。这些曾经在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工作的教职员陆续到达浙江大学，一度引起部分原浙大学者的不满。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一次性成功西迁重庆，教学工作很快稳定下来。而浙江大学则准备不足，五度西迁，在西南山区辗转近 3000

公里，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经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和湄潭等地，一路艰难办学，损失惨重。竺先生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也不幸在江西泰和因感染疟疾相继逝世。

1938 年 4 月，中央大学西迁后，竺先生第一次到重庆公干，胡焕庸即与徐近之、吕炯、陈忆帆、涂长望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两天后，竺先生到达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也是由胡焕庸引导陪同，参观西迁后的中大，并拜访旧交。此后，竺先生每到重庆公干，必和胡焕庸会面或到其家中小聚，无话不谈。胡焕庸多次召集地理系或南京高师—东大校友与竺可桢欢聚，聆听竺先生讲话，交流战时办学经验。竺可桢也很乐意挤出时间，参加胡焕庸召集的各项活动。战时的陪都重庆，各方面条件比浙江大学栖身山间的遵义、湄潭好很多。竺先生到重庆公干，除必去的北倍气象研究所和教育部等处外，还常邀胡焕庸一同逛售有进口英文书籍杂志的沙坪坝书屋，而胡焕庸只要得空，也必定会陪同前往，借此机会交流讨论。抗战期间，重庆生活条件艰苦，竺先生住处鼠患严重，夜不能寐，胡焕庸立即购得母猫一只送上。

1945 年 9 月以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四牌楼，浙江大学也复员回到杭州。胡焕庸在抗战胜利次月就从重庆去美国考察研究讲学，1947 年 2 月回国，此后师生见面机会更多。竺校长常到南京公干，二人除在中大和中研院、气象所等处会面外，也经常在南京珞珈路竺宅和新安里胡宅会面小叙。珞珈路竺先生居所院内白杨树遇到虫害，胡焕庸立即安排购买法国梧桐十二株插植。1949 年 2 月，内战逼近南京，竺先生顾虑竺宅长期无人居住会遭破坏，也是先请胡焕庸“在友朋中觅一愿住珞珈路二十二号之人。余不收房租，但需 ’善为保管’而已”。

张其啊和胡焕庸早年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同受到王伯沆、柳诒徵、竺可桢、刘伯明等几位文学、史学、地学和哲学大师的影响，领

悟到几门学问互为表里的人类文化精髓。胡焕庸和张其昀又都是竺可桢在地学教育方面早年最倚重的学生和助手。胡焕庸担任国立中大地理学系系主任后，不久又兼任了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工作虽然极为忙碌，但仍不断有著述发表。胡焕庸和张其昀两人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积极筹备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会的组建，不仅在《地理学报》上发表多篇论文，还不断有专著问世。张其昀同时也是以中大学人为主体的政论杂志《国风》和《方志月刊》的主要创办人。读32年，张其昀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期间，又是政论杂志《时代公论》的发起人和编辑。1936年，张其昀应竺可桢之邀，前往浙江大学任教，同样积极撰写多篇《大公报》社论，并创办《史地杂志》《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等。胡焕庸在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工作的同时，也担任了众多社会职务，在学术领域依然常有新作问世。他和张其昀各自在不同的大学担任重要职务后，二人往来渐少。1941年4月，张其昀勾提出要办刊物参与抗战宣传，获得蒋委员长的首肯，批复14万元作为开办经费，日后还有每月7500元的事业费资助。6月，《思想与时代》杂志社正式成立，基本社员有张其昀、钱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洽周等。杂志以月刊和丛刊形式出版。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致函中国教育部转各国立大学校长，请求遴选一位教授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经竺可桢校长推荐，浙江大学委派张其的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张其昀等6位教授于1943年6月启程前往美国。1945年10月，张其陶结束访美研究回国。国民党总裁侍从室负责人陈布雷原本已经安排张其附加入侍从室，但此时抗战结束，军委会和总裁侍从室机构均被撤销，这一安排未能实现。张其陶遂返回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系主任。1947年1月，张其陶主持的《思想与时代》政论杂志复刊，他在复刊辞中进一步阐述了刊物的宗旨。即追求“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

想与时代》“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 20 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张其昀回归到浙江大学后，因参与政治活动较多，屡遭浙江大学学生反对，多次萌生辞意，竺先生均再三挽留。其间竺先生也屡有推荐张其陶继任浙江大学校长之意，终因为“未免太早”“无行政经验”“自己不愿”等未成。竺先生执掌浙江大学 13 年，张其昀也辅佐了竺先生 13 年。

1949 年 2 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张其昀公开提出五项政治主张：军民分治、政党共存、地方自治、生产优先、言论自由。在国民政府退踞台湾前夕，张其昀就是否南去征求竺先生意见，竺先生表示“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不久，张其昀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转去台湾，得到重用，先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和政府的多个要职。他也是文化事业复兴的操盘手。张其时将早年大陆的地理气象经典著作文章和期刊如《学衡》《史地学报》《国风》《人地学原理》等人文地理资料、各种中国史料在台湾地区再版发行，还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国防研究院、中华学术院等。张其昀在发扬中华文化、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台湾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做了早年“学衡派”学者想做而最终无法做到的事。

1949 年 4 月，在国民政府要求退到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里，竺先生和胡焕庸都选择了留在大陆。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竺可桢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前往台湾，而是离开杭州，隐藏在上海长宁路的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直到解放军占领上海。胡焕庸在学校最困难的时期，包括校长和总务长训导长出走、学校人心涣散，校务维持委员会自请解散、国共和谈前景黯淡，大军即将渡江、教授会主席离开南京。在此紧要关头，胡焕庸被教授大会紧急会议推选为改组后的

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及校维会财务委员会委员，继续维持学校工作，直至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1949 年 7 月末，中央大学新的校务委员会成立，前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随之解散。

1949 年 10 月以后，竺先生和胡焕庸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竺先生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科学院，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在长达 20 多年的中国科学界领导生涯小，他主持和参与的工作跨越多种学科，先后组建了 10 多个规模宏大的考察团，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他还倡议建立了若干地理研究所，出版了多种地学专业刊物以及各地区的详细地图，其中许多都是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事务，经常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层领导的外事活动，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起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竺先生也受到了冲击，从此更加谨小慎微，远离政治。

1962 年，竺可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 年 9 月，他将自己位于南京珞珈路的住宅交给了南京市政府。“文革”期间，竺先生受到保护，没有遭受批斗和暴力冲击。虽然主动出让了部分住房和降低了薪资，但他依然维持了高级干部正常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来自各地的“外调”人员，回忆早年和旧政府官员、学者等人的交往情况。

1949 年之后的胡焕庸，在遭到诬告后被送往北京学习、反省、甄别，其间工作无着落，竺先生也曾给予帮助。1950 年以后，胡焕庸加入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暂时远离了地理界。在完成了治淮工作后，他奉命筹建淮河水利专科学校。1953 年 9 月，他才调人华东师范大学，回归地理教育。此后的十余年，政治运动不断，知识界战战兢兢。胡焕庸即便是噤若寒蝉，也还是屡遭冲击。这对曾经亲密无间 30 年的

师生，为了避免麻烦，往来极少，有限的几次会议见面，也只是简单地寒暄而已。1966 年以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避免来往。1968 年 8 月，胡焕庸已经失去自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外调人员到北京找竺可桢了解胡焕庸早年的情况，竺可桢只是淡淡地说道："胡是我于 1920—1924 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学生，他于 1925—1926 年去法国留学①，北伐后，我到伪中央研究院，他被陈叔谅拉入国民党，并成为东南大学（后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再改名为中央大学）的教授，一直到解放，他在中大是比较活跃的。"竺先生在这里既没有提及他对胡焕庸的多方关照和提携，更没有透露二人之间早年的密切往来。现在看来，这也许是这位尚能身处高位的先生，对自己和胡焕庸尽可能的保护。

与竺可桢相似，无论是在校劳动改造还是被关押期间，胡焕庸除了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各地来上海"外调"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交代自己与故旧的交往及了解的他人历史。1974 年 2 月，竺先生在北京逝世。胡焕庸作为竺先生早年最器重的学生和助手，却因刚从拘留所释放，尚处于"审查"期，无法前往北京向恩师告别。只是在 1980 年 11 月，竺先生去世 6 年半后，已经落实政策、平反后重新恢复工作的胡焕庸，才得以公开发表文章怀念恩师。此后的 10 多年里直到 90 多岁封笔，胡焕庸在许多场合发表了多篇回忆文章，怀念自己的老师竺可桢。在 1981 年前后发表的著作，如《世界气候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世界海陆演化》等，胡焕庸都在书的扉页后恭恭敬敬地印上"纪念我国气象学、气候学、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博士（1890—1974 年）"，以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

1987 年，胡焕庸在《纪念我的老师竺可桢先生》一文中，表达了

① 实为 1926—1928 年。——编者注

他的心情："竺可桢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事业贡献是永垂不朽的。现在，虽然我也已年逾八旬，但竺先生建设祖国、献身科学的崇高志向和热忱以及栽培后学的精神，仍使我时时感动不已，有力地鼓励着我为四化建设奉献'余热'。"1991 年，胡焕庸已经退休。在为华东师范大学金祖孟教授的著作作序时，他在《缅怀吾师竺可桢先生》的一文中写道："吾师竺可桢先生历来重视科学精神和科学民主，反对'迷信权威，思想僵化'，主张'不顾利害以求真理，祛除成见以就理智'，做到'不武断，不蛮横'。可以相信，如果竺可桢先生迄今仍然健在，他老人家对于科学史界好事多磨的反常情况，将会感到不可思议！"

竺可桢和胡焕庸都是中国的科学巨匠。胡焕庸早年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但是从 1949 年起的 30 年期间，栖身政务院治淮委员会和华东师大。师生二人在 1952 年之后来往寥寥，1964 年以后再没有见面或联系的记载。而胡焕庸的同门同学张其昀，此时早已走入台湾政坛。两位同门同学不仅此生再无来往，其老师竺可桢和早年的爱徒与亲密助手张其啊，限于其各自的官方身份，在 1949 年以后也再无直接交往。三位两岸地学界的著名学者，在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文稿中也极力回避对方的名字，以淡化早年的密切关系。

三位中国地学界的著名学者晚年生活各不相同。最年长的竺可桢先生晚年饱受肺部疾病的折磨，在勉强维持工作的同时，屡屡住院治疗。1973 年 2 月，他发表了生平最后一篇学术文稿《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气象学家的形象，给自己的学者生涯画上了句号。一年后，竺可桢病逝于"文革"后期北京的寒冬，享年 84 岁。

胡焕庸幼年习武强身，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中再度焕发光彩。出狱后，他的右手写字功能逐步丧失，这对于这位终身笔耕不辍的学者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

胡焕庸顽强地练习用左手继续写作，展现了自己的第二个高光时刻。1977 年 12 月，胡焕庸在家信里写道：“最近用左手写字，已稍习惯。但目力衰退，看书一小时，即已模糊不清。”这一时期和以后的许多书信、题词、文稿等，他大都会标注是“左笔”。胡焕庸继续工作到 89 岁才“光荣退休”，退休后仍著书立说、培养学生。1994 年 5 月，他在早年创办的《地理学报》第 49 卷第 3 期发表了他的最后文稿：《发扬成绩，开拓前进——庆祝〈地理学报〉创刊 60 周年》。94 岁高龄的胡焕庸教授是中国地理学会唯一健在的首届理事，在文章结尾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后嘱托：“发扬成绩，开拓前进，这是我对中国地理学界和《地理学报》的殷切希望。”与此同时，胡焕庸教授封笔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 年后以 98 岁高寿辞世。

张其的 1958 年 7 月辞去台湾“教育部部长”以后，出任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一年后出任“国防研究院”主任，随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中华文化的推广。71 岁时，他创办了华岗兴业基金会，以商业方式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晚年的张其啊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的渊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的政略与战略中的地位；四曰国力，即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的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培养国家后续新生力量。

张其啊 80 岁时出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同年他创办的中国文化学院改制为中国文化大学。他对该校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毕业的学生寄予厚望，要求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质朴坚毅的华岗人，治国平天下的领导人才”，1985 年，张其时在台北逝世，享年 85 岁。

胡焕庸和张其啊都是竺可桢先生非常看好的学生。然而随着内战结束，不仅师生三人分处海峡两岸，后半生轨迹截然不同，且后人的

人生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竺可桢的后人中，无人继承了竺先生的气象科学事业；胡焕庸的子女及孙辈 20 余人，虽多人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或南京大学、中大附中南师附中、附小等，但所学专业却均与地理无缘。只有张其昀的后人张镜湖早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后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地理学家。张其昀逝世后，张镜湖接掌父亲创办的中国文化大学，担任该校董事长 30 多年，继承了张其昀毕生坚持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国改革开放和两岸恢复文化交流以后才 张镜湖与大陆友人、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多有来往，于 2019 年 11 月以 92 岁高龄逝世。

近年来，胡焕庸的学术成就已得到广泛认可，张其昀也在大陆重新受到尊敬。1990 年 10 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人文地理学学术大会，会议宣布胡焕庸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继承了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的南京大学称张其昀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杰出校友”，并在校史博物馆给予了胡焕庸一小块文字表述，称其为“校友中的开拓者”。在学校曾经举办的一个张其的特展中，展出了二位参与创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在抗战前出版的两本高中地理教科书，作者署名即为“胡焕庸　张其昀合编”，我也珍藏了其中的一本。

近年来，笔者常年以各种方式研究民国档案，也对竺可桢、胡焕庸和张其昀三位学者的经历加以关注研究，对他们的著作有深度研读。三位学者都是对中国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现在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对他们的贡献知之甚少。大师们虽然早已远去，但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留下的思想和精神，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重要的社会财富。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对前辈的事功加以研究和学习，并像他们一样坚持探索，成就自己有意义的人生。

“我不走，我不走！”掷地有如金石声

——忆胡焕庸教授*

高淑眉

1948年冬，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南京中央大学当时面临的一个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是否遵从国民政府南迁的要求。中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团结并发动进步教授和大多数同学组建了“应变委员会”①。这个名称或许是当时的“法定”名称。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学生和教授先后离校南逃，但整个中大却屹然不动，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在这方面，中大各院系都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我所在的文学院外文系俄语组的同学负责全

---

* 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① 1949年1月21日，因内战迫近南京，中央大学校方成立了由校长、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各院院长、大学医院院长、会计室主任以及各院教职员、学生代表等21人组成的应变委员会。27日凌晨，周鸿经校长与训导长、总务长弃职而去。经中央大学教授会投票选举，产生“中央大学校务维持会”，并推定梁希、郑集、胡小石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校维会下设财务、购料、校产监督等委员会。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7日，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军代表到校。8月8日，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2日，成立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梁希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潘菽为教务长，干铎为校务委员会秘书长。8月15日，原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熊子容、孙本文、刘世超在军代表赵卓监交下，向新的校务委员会移交了所有清册文件。至此，中央大学的接管工作结束。——编者注

校性的《快报》工作（当时叫《应变快报》）。全系同学又各有分工，有的负责油印，有的负责刻蜡版，有的负责分发快报，等等，重点突出一个“快”字。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变快报》在出过若干期后，很快就转为铅印小报《中大人报》出版发行。我记得“中大人报”这四个字的报头还是专门请中文系系主任胡小石教授亲笔书写的，字迹刚劲有力，给这份学运小报增色不少。胡小石教授当时是“校务维持委员会”（简称校维会）的主要负责人（召集人）之一，明外两位分别是梁希教授和郑集教授。还有不少教授是作为一般委员参加的，如李旭旦教授，刘庆云教授，张江树教授，吴蕴瑞教授，蔡翘教授等。中大人报社下设编辑部和采访部两大部，社长是比我高一级的同学王德化。我的同班同学詹汝琮负责编辑部，我负责采访部，也算是“首席”记者。同班其他同学以及别的院系的不少进步同学都担任过采访部的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持有一张由我亲手发放的《中大人报》记者证（名片形式），分头采访全校及他校各方面的“应变”护校消息和动态。稿件均交由编辑部詹汝琮同学编排发稿。我当时除名义上“领导”一批同学记者外，自己主要负责采访“校维会”和联系教授的工作。因此，我经常参加“校维会”的会议。“校维会”每次正式开会前，该次主持会议的教授（由梁希、郑集、胡小石轮流担任）总要问一声“学生代表”来了没有，我当即起立表示“来了”（会议地点就设在学校大礼堂上面原来的校长办公室里）。我负责及时将“校维会”的决策和讨论情况如实传达给各院系的学生代表，这通常在当天晚上的食堂聚会中进行。我当时与梁希教授保持密切联系，除开会时经常面聆教诲外，我还到丁家桥他的住所拜望过，并随时就一些重大问题向他请教。比如，南京“四·一”事件前夕，我曾单独请示过他，他明确向我指出：游行示威要“适可而止”，不主张上街。我及时向当时学生会主要负责人董 x x（忘其名，好像是法律系的学生，后来听

说他参加南下工作团，到西南剿匪时牺牲了）汇报了指示，但那天还是上街了，酿成“四·一”血案。

在整个中大师生“应变”护校斗争的过程中，我广泛地采访并接触了许多中大有声望和影响力的知名教授。除了与那些作为委员参加“校维会”的教授有较多的接触外，我还经常在校园或教学楼的走廊里遇到一些教授，并进行简短的“闪电”式访谈。他们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坚决选择留在南京，与学校共存亡。这里我要着重说一说我与胡焕庸教授的一次“巧遇”。

那是一个阴天的中午，我从文昌桥宿舍走进校园，穿过法国梧桐下的大道，拐到文学院办完事（可能是送稿件）后出来，准备取道学校靠成贤街这一边的旁门再回文昌桥宿舍（我当时住一宿）。就在我快步行走时，抬头看见了胡焕庸教授正缓步向校园方向走来。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迎上前去，首先向胡教授问好，紧接着便开门见山地问他是否打算离开南京，随政府迁校到广州去。胡教授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走，我不走！”江南口音的普通话落地有如金石声！我真高兴极了，我们又多了一位坚决留守南京的知名教授了。胡焕庸教授的这个“六字诀”或者叫“六字箴言”，也成为我终身铭记的人生格言。它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站得稳、立得牢，风雨不动安如山……我当年虽然没有直接选修过胡老师的课，但从这次“巧遇”的采访中，我领悟到了胡焕庸教授传授给我的“人生哲理思考”，这甚至比听一堂专业课更有分量。胡焕庸老师当时身着长衫（当时老师和学生多有长衫），行走稳健，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典型的江南“大儒”风范，是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化人，大洋博士……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大师，一位学者。我们已跨入了新的世纪，胡老师的音容笑貌，与其他许多我曾接触过的中大教授一样，至今仍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我的心里，留在我

的梦里。

最近，我收到了胡焕庸教授的爱子，也是我的中大校友胡建中同志寄给我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精美纪念文集一册，这是为纪念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而编辑的。我再三捧读，仿佛又听到了胡教授当年那慈父般的声音："我不走，我不走！"这柔中带刚的六字决心，在我的耳畔和心头反复回响。是的，胡焕庸教授是坚决"不走"的，他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同中国在一起，同世界在一起。他的学术遗产，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道德风范，他的修身齐家之道，他的教书育人之才，他的严谨治学之风，等等，都是我们后辈人应该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最后，我谨用四句话来表示一个后辈对先辈的无限景仰、崇敬和怀念感恩之情：

老师是大师，中外共钦敬，胡焕庸线好，扎下强国根。

2011年12月2日首都初雪中

高淑眉，早年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

谢觉民谈胡焕庸*

于希贤

胡焕庸，字肖堂，江苏人，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地理系，曾受教于竺可桢，故专长于气候及气象地理学。他与张其昀先生是同班同学，也是谢觉民的师辈。

他曾留学法国两年，回国后随竺可桢在中央研究院从事气象工作，后任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抗战时期，他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并出版《四川地理》，风靡一时，还著有《气候学》一书，这一时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

“文革”期间，胡焕庸被“关押”，吃了不少苦头，那是读书人的苦难岁月。

谢觉民时隔数十年再次见到胡焕庸先生，是在1980年广州召开的地理学会会议上。那是自“文革”以来地理学界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参会者逾百人，所提论文甚多。那是谢觉民首次参加国内地理学大会，并受邀发表题为《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

---

* 原载于于希贤：《走进地理生涯：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编者有少量文字处理。

谢觉民（1918—2006），浙江上虞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曾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等多所大学。

在大会上，谢觉民见到胡焕庸先生，只见胡先生布鞋、中山装十分整洁，虽已年逾八旬，但气色甚佳。谢觉民上前作揖，自我介绍，胡先生仍记得他。在会场上，李旭旦先生常陪其左右。胡先生曾言："以往年轻时一年过一年，后来是一月过一月，现今则是一周过一周，随时可能去见上帝。"然而，他却一直高寿至近百岁。他修养深厚，而且很会保重身体。

纵观胡焕庸的一生，他发表或出版了众多地理学文章疑专著，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者，他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早年于《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的文章。据胡焕庸先生的研究，中国自东北黑龙江的暖辉到西南云南的腾冲，可画一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线，将中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部分。这两地区面积差异不是很大，而人口的数量则大相径庭。东南部占总人口超过 95%，而西北部则不足 5%。胡先生这个发现是中国地理学上的大贡献，揭示了中国东南部与西北部自然环境的显著差异。东南部为季风气候，拥有海洋、河流、丘陵平原及冲积土壤；而西北部是大陆性气候，以内河流域、高山高原及碱性土壤为主。数十年后，当谢觉民编著《中国分省地图集》时，沿云南及各省的边缘也画了一条线，大致与胡的人口划分线相同。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东南部与西北部的面积和人口，结果东南部的面积为 374 万平方公里，西北部为 475 万平方公里，人口差异依然巨大，东南部人口为 10.53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94%，而西北部仅为 8000 万，占 6%。这一结果竟与 60 年前的情况一样，这说明了胡氏这条线的准确性。因此，谢觉民在美国讲课及演讲时，极力推崇这条线为"胡焕庸线"，认为它是中国最大的分区线，也是中国地理学上的最大贡献。后来，谢觉民遇到胡焕庸时，谈及此文，胡焕庸说刚发表此文时，有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条线的准确性呢。

在日本东京国际地理大会上，谢觉民遇到了胡焕庸的学生李旭旦，得知胡焕庸先生虽已高龄，无法出国，但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成立了人口研究所，继续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还绘制了不少人口地图，其雄心壮志，令人十分敬佩。

胡焕庸先生80多岁时，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便用左手练字，这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也可见胡焕庸先生治学为人的坚强毅力。谢觉民在美国也曾收到胡焕庸先生一封用左手歪歪扭扭书写的信，使人敬佩。人人都企望胡焕庸先生能活过100岁，庆祝百岁诞辰，但遗憾的是，他在98岁时溢然长逝，一代大儒从此一眠不起了。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我所认识的胡焕庸先生*

王铮

胡焕庸先生逝世后，被誉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后来被称作“胡焕庸线”的中国地理界线。除了著名的“胡焕庸人口线”外，他还在20世纪30年代，紧随张印堂先生之后，从人地关系协调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应实行节育政策，认为“开荒是治标，节育才是治本”。

我虽非他的嫡系弟子，但因他的卓越学术成就，我一直铭记并缅怀他。胡焕庸先生曾任华东师大教授，研究人文地理学。而我在华东师大读书的专业是地貌学与第四纪环境演变。后来，我到华东师大当地理系系主任时，胡先生已然离世。1990年，我博士毕业，导师严钦尚考虑到我数学和物理基础好，曾希望我到胡先生手下做博士后。但当时有规定，不得在原获得博士学位的单位进行博士后研究，此事因此作罢。在最初与他交谈并得到他指点后，我离开了华东师大，这也成为我后来热衷研究胡焕庸线的起点。1993年我出版了《理论地理学概论》，他认为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地理学理论框架，推荐我申报研究员，他是没有门派思想的。

---

*　本文源于王铮先生发表于2014年和2019年的博客，编者有少量文字处理。

胡先生写的《世界地理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后来成为“生态地理学”的经典。施雅风院士曾对我说：“学地理的一定要读这本书。”

我到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合作导师黄秉维先生是非常推崇胡焕庸先生的，并且要求我学习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学。因此，我与胡先生有了更深入的接触。从另一个角度看，胡焕庸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的奠基人，中国所有研究人文地理且非完全海归的学者，几乎都可以视为胡焕庸先生的第 N 代弟子。中国经济地理学权威吴传钧先生就是胡焕庸先生的弟子，胡焕庸先生最后直接指导的弟子有丁金宏、杨云彦、徐庆凤，丁、杨两位现在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是国家的精英人才。徐博士很不幸，英年早逝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胡先生曾有个弟子，很能干，胡先生想将其留下做助手，可是未能如愿。胡先生后来经常仰天长叹。

读研究生时，我与胡焕庸先生有过较多接触。那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分到了一套位于一楼的住房。他的学生请我帮忙搬家。在闲聊中，我们问他“文革”怎么度过的。他淡然地说，从 1953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他就觉得人生如戏。导演让他唱须生他就唱须生，现在让他唱丑角他就唱丑角，反正不唱白脸的来俊臣和魏宗贤。他还背了几句泰戈尔的诗，似乎是《渡口》中的句子。我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另有一次，他提起 1949 年的往事。当时，国民政府曾给他送了机票，让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他说：“我是研究中国地理的，中国人口问题这样严重，离开大陆就没法研究了。没想到后来让我当自然地理学教研室主任。”

对于人口政策，他或许持有不同看法。80 多岁仍在学习控制论。1985 年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赞成“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政策。他说：“你们现在说一对夫妻一个孩好，将来一对夫妻四个老人就不好

了。”“俗话说，’人有一张口，还有一双手’呀！你们要记住。”后来，我在撰写《区域管理与发展》一书中的《人口管理》章节时，将这句话作为“题记”写进去了。

1995 年，我在上海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病了。也许为了安慰我们，他说他要向马寅初学习，活 100 岁。然而，遗憾的是，他未能如愿。1998 年，他与世长辞，享年 98 岁。经过那么多波折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1999 年，我当了地理学系系主任，由于他的功绩，我力主给他竖个雕像，并亲自捐了 1000 元。那年我妻子告诉我，家里一共只有不到 3 万元的存款。那时大家都捐不出多少，最后多亏有许多校友参与。

王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前主任、教授。

我们不会忘记胡先生的巨大贡献

刘君德

胡焕庸先生，我在大学本科有幸做过他的学生，那时他虽然迈入耄耋之年，但还站在讲台上为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年轻老师们上课指导。他那从容的姿态、洪亮的声音、精练的言论、精神矍铄和内容烂熟的讲课风格，在学生们脑海中都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抹不去的永久记忆。

胡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先生无不通晓；但先生为国内外地理界最公认的贡献，是他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关注并潜心研究中国人口地理问题的成就。1935 年，先生耗费巨大精力，精心收集中国人口数据，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敏锐发现了一条东北一西南的直线——“瑷珲一腾冲线”。他的这个研究提出后，引起世人瞩目，被后人称为“胡焕庸线”，影响极其深远。如今，这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被高层政界关注，不仅学术界不断在关注和研究，国人也都知晓它。

胡焕庸教授还是一位“全能”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通晓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地理学，以及中外区域地理。他的地理专业知识

之渊博，用“无人堪比”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一生著书立说，成果极为丰富。

2015 年 6 月 3 日，我应陕西省民政厅的邀请，赴西安为西部十省区民政厅领导干部作讲座——“区域分割¬合作治理：基于 ’一带一路’经济带的中国西部地区政区体制改革与发展”，还运用了“胡焕庸线”讲解西部省区的区情。强调“一带一路”的开发和治理必须从西部地区区情出发，尊重西部地区的自然和经济规律。唯今，我还珍藏着胡先生亲笔签名的一篇晚期大作《中国人口八大区域》（打印稿）。

1992 年的某一天，胡先生托人送来一本他亲自签名的杂志——《中国科技史料》（1991 年第 12 卷第 1 期，总第 50 期），翻开杂志，在《人物》栏目中看到了胡先生的《治学经历述略》，这篇文章使我全面了解了胡先生的治学经历。胡先生一生在地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

我与胡先生虽不在一个教研室、研究所，亲自受教于他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胡先生在行政区划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深深影响着我。胡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研究行政区划的鼻祖之一。1990 年 5 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在民政部的支持下，张文范司长和我策划，由我和校图书馆郑麦教授主编区划中心首项奠基性工程《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其中记载着早期胡先生等中国近代一批文人、名人的行政区划论著成果，特别是关于中国省制问题的研究。国民政府委托胡先生研究、勾画的“中国省制”60 个分省方案，至今仍被称为“胡氏分省方案”而广为流传。

胡先生积极支持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组建。我清楚地记得，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上，胡先生作为中心首席顾问发

言，他说：“区划中心成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中国在今天开展的这一项伟大的研究工作，惧的是这项工作非常艰巨，我要尽我所能参加这项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胡先生对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刘君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前主任。

关于恩师胡焕庸的点滴回忆

朱宝树

大概是在1962年或1963年，胡老师负责教授我们的自然地理课程。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总是手持一根长长的木制指示棒，指向墙上挂着的大型地图，就这样开始了讲课。那一刻，他风度翩翩，挥洒自如，仿佛胸怀天地，尽显豪情。他讲课时不依赖教案，板书也不多，如果不仔细领悟，很容易感到困惑。那时候，每堂课之前都会有10分钟的时间用于口头或书面提问。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被随机点名，问题是关于从赤道到北极的地带性自然地理景观，我回答得不够准确，结果只得了两分，不及格。后来想想，这正是胡老师讲课时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我这才明白，学地理要抓要领。

之后“文革”爆发，我曾目睹老师穿着一件旧棉袄提着一个水桶在地理馆刷洗厕所，戴着纸糊的高帽跪在地理馆门前水泥台上挨批斗……

1979年，我有幸被录取为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欧洲自然地理方向），从工作了十一年的伊春回到上海。我第一次到老师家里拜访，问候道：“’文革’时，老师您受苦了吧？”老师一言带过：“没啥，在监狱里我还教人家法语呢！”

读研期间，我常去老师家里请教问题，有一次我问老师：“许多人都称呼您胡先生，您喜欢胡先生还是胡老师？”老师说：“我是一直教书的，还是更喜欢被称为老师。”

老师很推崇板块学说，还有柯本的气候分类法，亲自给我们上课。上课时，他发给我们许多当时用蓝晒技术制作的图片，边讲解边引导我们读图。他布置的一个作业是写一篇关于板块的论文，我记得我写的一篇是强调南极板块的“枢纽”作用，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次论文训练。我的教学实习是为本科生讲欧洲自然地理，老师亲自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并参加课后的点评。

读研第二年，毕业论文选题逐渐提上日程。老师最后要我做关于油橄榄方面的论文。油橄榄是以夏干冬雨为特征的地中海气候的代表性植物，却在我国夏雨冬干的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局部地区引种成功。老师对此很感兴趣，并曾多次与我聊起这个话题，我当时还以为只是闲聊而已。待到确定论文选题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聊这个是有深意的！因为这个题目涉及植物生态等领域，我曾表示为难。老师发话：“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既无退路，只好前进。我第一次带着问题广泛查阅资料，第一次独立进行实地调研……最后完成了以《地中海气候的代表性植物油橄榄及其在我国引种的地理分析》为题的论文（题目中的“分析”二字为李春芬教授修改），并顺利通过答辩。记得答辩会后我去食堂吃饭，顿时胃口大开。称体重，竟然比做论文之前轻了 20 斤！

虽然我只吃过橄榄油而没有直接吃过油橄榄，但时至今日，油橄榄仍然让我回味无穷。老师当初要我做这个论文，绝不只是兴趣使然，而是完全符合欧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向，同时又是立意于中外比较并结合生产实践。从气候条件看，油橄榄引种到我国很大程度上可谓“逆向”引种。做这个论文，不仅锻炼了我的思维方式，还培养了我的

逆向思维意识和能力。因此，我经常把逆向思维称为“油橄榄思维”，将“思人之已思与未思，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直到现在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时，我也不忘现身说法：研究生最大的锻炼就是做论文，就是转变思维方式。

论文答辩后，我又面临工作分配。按那时候的政策，读研前户口不在上海的不能留沪。恰好那时人口所恢复不久（1981 年建立时叫人口研究室），老师要留我。据说一开始有阻力，老师表示：*如果不能留，以后我招研究生只要上海户口！”最终我留下来了，老师说：“我要开始招博士生了，你要报考。”后来我考虑到实际情况——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在身边，夫妻又两地分居，就没报考。为此，老师说我“食言了”，但也没有过多责备。

从我 1961 年入学华东师大读地理系本科开始，直到 1979 年再次入学母校读研，老师一直从事着自然地理教学工作。其实，老师对人口地理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早在 1935 年就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而一鸣惊人；1957 年，他又在华东师大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人口地理研究室。为什么此后就忍痛割爱、转而专注于自然地理呢？据说，老师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经感慨：“那实在是无可奈何，只能离开禁区不搞人文搞自然，而只搞外国自然地理。”

读研后老师把我留下来，我当然很高兴，但同时也为科研怎么搞而忐忑不安。老师安慰我说：“研究就是瞎子摸象，越摸越像。”于是，我便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不断摸索。老师还说：“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是地理。”老师 1935 年发表的经典之作《中国人口之分布》就是一篇最好的范文！

每次到老师家里拜访时，总能看到他在伏案工作。有时候我们也会随便聊聊。有一次老师说起当时的苏联：“这个国家是好多国家拼起

来的，以后会怎么样很难说。”真是不幸言中。老师如果有什么事要我办，有时候会给我写一个字条，用毛笔蘸蓝墨水写的，开头还称呼我：“朱宝树所长……”我看了之后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

后来老师生病住进华东医院，我去探望，他躺在床上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高人说我可以活到130岁……”过了一会儿，老师轻声笑言：“活那么久，怎么过啊！”这是我听见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恩师的追悼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致了悼词。

朱宝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人口研究所前所长。

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精彩到老

——回忆恩师胡焕庸教授

汤建中

胡焕庸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和工作了36年，胡老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之道对我有着重要影响。

在我的印象中，胡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地学大师。他不仅通晓地理学，而且对相关学科，如气象气候学、河川水利学，乃至大地构造学等也有较高造诣，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胡老师一生著作等身，其中在人口地理学领域就出版了10余部著作，气象气候学和区域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都在5部以上。即便年过八旬，他仍依据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等理论，撰写并出版了《世界海陆演化》一书。胡老师出版的学术著作之丰，涉及领域之广，在地理界实属罕见，无愧为我国地理界的一代大师。

胡老师更是一位与时俱进、勤学不辍的学界楷模。记得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胡老师经常会来地理馆一楼的第八阅览室（该阅览室专供借阅中外文地理期刊及外文书籍），翻阅新上架的外文期刊和书籍，始终与世界学术前沿保持同步。1950年以后，中苏关系密切，苏联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给予我国诸多帮助。苏联的地学也较为

发达，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胡老师本就拥有深厚的外文功底，在他年逾半百之后，竟毅然从零开始，刻苦钻研俄文，并学以致用。他给我们讲授气候学时，除介绍柯本气候分类法等欧美经典方法外，还专门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苏联的卡伊高洛道夫气候分类法。

胡老师学无止境，不断汲取世界最新的学术思想与专业知识，尤其关注自然现象的全球规律性，例如，气候的地带性规律和海陆起源及其演化规律等。为此，他特意为我们这一届的三名研究生安排了关于热带雨林、萨王纳和地中海气候带的论文题目（我的论文题为“刚果盆地的地带性气候和植被”）。改革开放后，已 80 岁高龄的胡老师迎来了教学科研新的春天，他不仅向人口地理学发起了第三次冲锋，出版了 10 余部人口地理学著作，而且还在其毕生关注的领域作了科学总结，撰写了《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世界海陆演化》两部著作。综上所述，胡老师堪称我国地理界“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精彩到老”的典范。

我记忆中的胡焕庸先生

印永清

我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和胡焕庸老先生的交往，主要还是在“文革”后，老先生恢复了工作，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1979 年，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老先生也落实政策平反恢复了工作，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那时他年事已高，近 80 岁了。学校里办公用房很紧张，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可是身体还很好，主要在家里工作。学校给他配备了助手，那时去他家的人开始还不多。我当时整理过一份《胡焕庸先生著作目录》，收录的都是学校图书馆馆藏的老先生早年著述。老先生看到还有人为他整理以前的著述目录，非常高兴。尤其是听到我说，华师大图书馆还保存有 1944 年他在重庆出版的简陋黄毛土纸本《台湾与琉球》时，特别兴奋。他没有想到 1951 年才组建的华东师大图书馆竟然保存了这本战时出版的著作原著。那时我们还是初交，每次去他家里，他都请我吃西瓜，我们也经常聊起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后来去看他的人很多，不仅有同事、学生，还有很多校外的专家学者，我也经常去拜访他，给他看图书馆订阅的资料。那时还没有互

联网，但是老先生依然很关注国内外形势的研究。他最认真阅读的是《人民日报》，有些重要的语句，他还会在句子下面画出重点线。他说：“《人民日报》是权威，必须好好看的，要写东西就更是必须仔细看。”

胡先生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同门者还有张其昀。张先生出身浙江邺县望族，和胡先生同岁，但与胡先生专攻地理不同，张其昀兼顾历史与地理。中央大学率先参照西方地理学发展“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镇。作为南高史地学派的两员大将，胡与张二人一并成为民国地理学第二代学者的翘楚。

有一次，我去胡先生家看他，他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研究台湾，并告诉他学校成立了台港研究中心，谁负责等。他问我：“知道张其昀吗？”我说：“听说过此人，但不熟悉。”他说，他和张是同校同班同桌的同学，两人原本关系极好。还说，他俩都是南高师地学系的学生，因为他上课笔记记得很详细，张其昀就将他的笔记要走了，一直没还给他。1949 年张其昀到台湾时，把胡先生的该笔记及其他读书笔记全部带走了。老先生说，张后来在台湾发表的地理学文章，有许多内容就是来自他的笔记。我后来了解到 1948 年末以后，国共军事实力发生逆转，蒋介石要为自己找一个容身之地，也是张其昀多次到浙江奉化，向蒋提出了先撤退到台湾等建议。张其昀有关台湾的见解，当然是他自己的。但是，有关台湾的分析，却是与胡先生的著作分不开的。张其时到台湾后，对台湾教育事业的进步有很大贡献。后来张先生的儿子还到师大访问过，不过已经是前些年的事了。

老先生听说我在研究台湾的资料，就问起了我的研究情况，并提醒我关注台湾的历史地理和人口问题。然后，他随手从身旁的报纸堆里拿出他早已详细研究过的报道，与我一起讨论。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是准备收复琉球的。胡焕庸 1944 年在重庆，出版了《台湾与琉球》，书中对台湾和琉球群岛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域、农业、交通、

教育、经济状况等有重要论述，还附有几幅地图。他提出为了中国的国防安全，防止敌国的再侵略，台湾和琉球必须收回，这就是从地理学和历史渊源上为收复琉球与台湾做铺垫。后来他也在多篇文章及重要会议上提出，不仅从地理，还从国防、政治等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收回琉球（二战后台湾已经光复，收回中国管辖）。即便他到了晚年，美国已经将琉球交给日本管治，他也没有放弃研究台湾问题。他送给我过一本《台湾省人口》，因晚年手抖，仅在上面签了“布”字。后来，我在他的影响下，在《华东师大学报》和《暨南大学学报》分别发表了《台湾地图沿革》《台湾方志考》《台湾家谱研究》等论文。

有一次去胡先生家里，聊到党派问题，他问我是什么党派？我说，我是民革党员。他有点奇怪，问我怎么会加入民革，我说，是学校统战部部长和我谈话，邀请我参加民革的。我那时还不清楚他的历史政治身份。他告诉我，也有人和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民革，因为民革中有许多人以前是国民党中上层人士。他说，他不愿参加党派了，婉拒了参加民革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还记得有一次，我问胡先生：你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为什么还如此健朗？他说，我一直用冷水洗澡的，就是冬天也如此。我说，太冷了。他说，你可以先用毛巾浸冷水擦身体，等到习惯了，就不怕冷了。洗冷水澡的习惯，他一直到 90 岁高龄退休时还依然如此。我虽然也很想尝试洗冷水澡，却始终不能坚持下来。老先生的生活很规律，他常年早睡早起，晨起洗漱后就会在住宅附近打拳强身，别人也许还没有起床，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一天只吃两顿饭，其中有一顿还是在下午四点前。为了容易消化，他多半是吃烂烂的面条。现在想来，坚持锻炼、坚持洗冷水澡，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他到晚年还能坚持工作和著述，应当是有很大关系的。

“文革”后，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规定，对于年满 90 岁的老教授，学校会出经费为其举办祝寿仪式。袁运开校长和老先生沟通时，老先生提出不要仪式，但希望能用这笔经费来印刷他 1988 年写的回忆录。回忆录出版前，华东师大名誉校长刘佛年为他题写了书名“胡焕庸回忆录”。在两位校长的关心下，回忆录出版了。他分送了不少给同事和学生，但当时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都没有收藏，前几年学校制作电子数据库时，是我将至今珍藏的一本贡献出来扫描的。

1991 年 1 月，老先生已经退休，他提出将自己的部分藏书和资料，捐赠给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永久保存。在向图书馆捐赠图书前，胡先生给袁运开校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图书馆的印永清曾给我整理了一份我的著作目录，很感谢。所以，我要把我的著作捐献给图书馆。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的所有著作集中存放在专架上，有个体系，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使用。袁运开校长把信转交给了图书馆馆长冷福志，图书馆在概不外借的版本书库的醒目位置，设置了胡焕庸先生捐书专架，专门用于展示捐献的文献、著述等。华东师大的许多教师和学生，正是通过这个捐书专架，了解到学校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他的部分学术贡献。图书馆还拍了照片给年事已高的胡焕庸先生看，他对此是相当满意的。可惜的是，后来图书馆搬迁，将这个专架取消了。现在的教师和学生，就没有那么便利的机会去了解这位杰出的前辈了。

著名文艺评论家、荣获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的钱谷融先生，原名钱国荣，他和夫人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钱先生 1938 年考入当时西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也是胡先生的学生。钱先生毕业后先是到了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组建后不久，他们夫妻也来到了华师大。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钱先生也都和胡先生一样被批判，“文革”后期才平反。后来，钱谷融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一次，钱先生在黄山游览，有一些人陪着他。走到半山腰，他忽然停步不走了，

垂手肃立路旁。旁人问其所以然？钱先生答：“我远远地看见老师也往这边走来。”

过不久，胡焕庸先生就上来了，钱先生执弟子礼问安。师生二人寒暄一番，胡先生问起钱谷融的近况，钱先生说可以，他也请胡先生保重，中央大学几十年前的师生就是如此礼重。

钱先生目送胡先生前行，一直等到胡先生走了好一段路，他才重新迈开脚步。

钱先生后来告诉我，中大的学生无人不敬胡焕庸先生！

印永清，华东师范大学情报所研究员、前副所长。

我与胡焕庸先生的师生缘

丁金宏

恩师胡焕庸先生生于1901年，比我的爷爷小一岁，我有幸于先生的耄耋之年成为他的学生，也是一种缘分。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也就是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就读的专业是城市与区域规划，应该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但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对于“人文”学科仍存有不少禁忌，学究一点的说法就是经济地理学。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本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崔功豪老师。在崔老师的引导下，我学习西方的经济地理理论。为了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我经常到图书馆阅读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因为其中的文章大多与中国事件、中文语境有关，遇到生词可以通过联想会知，既易于读懂，又能够扩充词汇量。有一次，我在《中国日报》上读到对胡焕庸先生的学术采访，提到了“胡焕庸线”，对胡先生的学识很是崇拜。后来得知胡先生竟是南大经济地理专业学术带头人宋家泰教授在中央大学时期的老师，我对他更有了高山仰止的情愫。

其时，国家重视学习欧美、日本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理论。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崔老师被公派去美国访学。行前，他将

我推荐给国家计委（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前身）国土规划司副司长方磊先生，让我学习和研究国土规划。当时，国家正在开展我国第一次国土综合开发与整治规划。我有幸成为工作班子里的临时职员兼学员，帮助记录整理各部门、各地方的调研汇报材料，也有幸接触了吴传钧、李文彦、胡序威、郑度、陆大道等地理学界的权威人士，极大丰富了我对经济地理、国土规划的认知。当时，上海的华东师大地理系也是我国经济地理学重镇，国家计委的国土开发整治干标培训班就办在那里。这引发了我去上海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

我在北京待了九个月，边工作边以《国土规划的指标体系》为题，创作我的学位论文，三年级时，我回到学校继续写作和修改论文。因崔老师尚未回国，我的论文最终由宋家泰先生修订。应该说我的硕士学业是在宋家泰、崔功豪和方磊三位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硕士毕业前夕，我心怀崇敬地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我在国土规划学习研究中对于人口问题重要性的认知，提出希望到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希望向人口所的程潞所长等深化学习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理论。不久我就收到了胡先生给我的亲笔回信，表示他和程潞先生都赞同我对人口问题的理解，欢迎我报考到他的门下。

那一届，胡先生招收了杨云彦、徐庆凤和我三位博士生。一进校，先生就对我们作了因材施教的安排。徐庆凤是北大本科毕业就来华东师大读硕的，提前一年直接攻博，因为数理基础很好，被派到西安交大跟着蒋正华教授学习人口统计理论和模型，一年后她踌躇满志地回来，我和杨云彦见她带回的 Pollard 等著名学者的原版教材，都心生羡慕。杨云彦是学计算机出身，胡先生专门购买了 1987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嘱咐他开发人口迁移数据。那是中国第一次将人口迁移纳入其中的人口普查，杨云彦不负重托，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中国当代人口迁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我，胡先生根据我对国土规

划的兴致，刚进校就安排我参加由刘君德老师领导的南方山地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在福建省建阳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刘老师让我独当一面，负责人口专题的调研和报告撰写，从此我也成为刘老师的"编外学生"。后来，胡先生又安排我跟随吴建藩老师到胶东半岛开展国土规划调研和编制工作。完成任务之后，我决定以胶东半岛为田野，深化人口分布、迁移和城镇化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我们每个学生的成长，都是在先生评估我们的能力和兴趣的基础上，循循善诱的结果。

先生平时不爱闲聊，我们与先生的交流总是直奔主题，并能从中感受到先生的博大精深。先生终身将自己定位为地理学者，但实际上他在气象学、地质学、人口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他也是最后一代史地兼通的学术大师。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开簪育秀同文正，永寿传经迈伏生"，我们都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向先生求解。先生笑着说："这是苏州中学的老学生送给我的，说得有些夸张了。"然后给我们讲范仲淹兴学苏州府、伏生翁传经享高寿的典故。有一次我去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见他案头放着一本《法显传校注》。我好奇地问法显是谁？先生正色地说："你学习研究地理学，不可不知道法显，他是在玄奘之前从海上去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传》也是一部地理记游著述，值得一读。"于是先生将书送给了我。这本书激发了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致。后来，我在博士论文创作中用了相当篇幅讨论胶东半岛的人口扩散史，以至于有一份论文评阅意见认为我的论文是一篇很好的历史地理论文。

我毕业后留在人口所工作，先生也因年事已高而退休，但是他的学术工作却没有停止。1989 年 11 月，民政部在江苏昆山召开了首届中国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胡焕庸、谭其骧两位年高德劭的学术泰斗同时参会，盛举一时。回校后，先生很快写就了一篇综述中国行政区

划变迁史的文章。他对历史文献的博闻强记、驾轻就熟，让我叹为观止。后来，我帮助先生细化整理材料时，又学到了许多历史地理知识。我常常感动于先生坚韧的治学精神。

1995 年之后，先生的身体状况再也不能支持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只能长期在医院静养。作为学生，我经常去医院探望他。1998 年 4 月末，人口所全体老师组织去扬州春游，我因为去过扬州，没有随行。4 月 30 日下午，我去医院探望先生时，见先生气息孱嗡，失去意识，我默默祝福，心生悲凉。当我离开医院刚回到家，就接到电话说先生已经仙逝。冥冥之中我见到了先生的最后一面，也算圆竟了我们的师生之缘。先生的一生几乎覆盖了整个 20 世纪，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我为际遇这样的恩师而感到无比幸运和自豪。

爸爸精神，伴我前行

胡海

1939 年 10 月，我的父亲胡立中在重庆出生，他是爷爷奶奶的第六个儿子。当时我的爷爷胡焕庸和我的曾祖母、奶奶及五位伯伯和姑姑都生活在重庆。爷爷工作的国立中央大学已经在两年前从南京西迁到重庆沙坪坝，我们家住在大中里一号，全家在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南京。

我的爸爸是在南京和上海读的中学，他在上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入校后恰逢交大西迁西安。所以，他算是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爸爸毕业后分配在了青海省西宁工作，我的父母是在西宁相识，1968 年 5 月，我出生在西宁。

我出生时，“文革”已经进入了运动高潮。出生的当月，爷爷在他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留关押。在我仅仅十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上海，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大人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把我送到上海的原因是，“文革”中爷爷被关押，奶奶已经 64 岁，父辈们不放心奶奶一个人生活。于是把我送到了上海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奶奶的照顾下成长。不到一岁的我，从大西北青藏高原上的西宁被带到了华东沿海大城市上海，生命的轨迹也从此开始改变。

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开始家中是没有爷爷的，奶奶给了我无微不

至的关心，还有七叔、七婶、姑姑（爷爷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上一代唯一的女儿）也照料了我很多。在我五岁一个月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被释放回家的爷爷。那时，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虽然家里的住房只有一间，非常拥挤，但是，我们的生活开始一点点地好起来了。到了 1979 年，爷爷终于被平反，恢复了教授工作，家里的住房也在几经调整后面积大了一些。那时，爷爷奶奶身边有我和我的堂妹胡慧，她是七叔、七婶的孩子。恢复工作时的爷爷年近 80 岁高检。我是在华师大附小上的小学，直到我考上大学，我都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

爷爷带给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一般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开始看书、写东西，当中会停下来，活动一下身体，有时到门外做一些简单的全身运动，或是在校园里走一走。他的早餐总是一碗面，吃完后继续工作。到上午八九点钟，就会有不少同事和学生陆陆续续来到家里，都是来谈论工作、请教问题，或是来送书、送资料。1981 年，爷爷担任了人口研究室主任，后来又担任了人口研究所所长，工作就更忙了。他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每日访客络绎不绝。到了中午，中餐依然很简单。爷爷在饭桌上很少说话，静静地吃饭，也不允许我们孩子多说话。饭后，爷爷会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直到下午四点多开始他的晚餐。晚餐也很简单，记忆中基本上也还是一碗面，或是简单的饭菜。饭后，他会散散步。家里有了电视之后，他会看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是爷爷每天必看的报纸，我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看报纸。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每个家庭都会订这几份报纸，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而那时的我，也是从这些报纸开始对全国和全世界有了具体的概念。晚上，爷爷八点多就上床休息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每天的节奏都是这样的，特别有规律，几点钟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就连每天锻炼时做的那

几个伸展、旋转身体的动作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和堂妹常常调皮地跟在他后面学着做，我们做几下就不耐烦地跑开了，而爷爷会每天坚持做完那些动作，记忆中这就是他在工作间歇时的放松方式。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极其英俊帅气的，他早年的照片，放到现在，也会让人啧啧赞叹。前不久，还有人在纪念文章中说起，年青时的爷爷就是集英俊和智慧于一身的“男神”。而在生活中，他总是一丝不苟。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坚持锻炼、散步，生活极其规律。记得小时候，有时家里洗澡水有点凉，每当孩子们有小小抱怨的时候，爷爷就会说，他从小开始就洗冷水澡，为的就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在被关进监狱里的日子，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活动身体。在我印象中，爷爷在大约 85 岁之前，走路的腰背都是挺直的，很精神，后来，他才慢慢用上了拐杖。他在被平反并恢复工作后，还能工作很多年，八九十岁还能培养博士研究生，我相信完全是他健康的身体所带来的充沛精力和清醒头脑。

我的奶奶特别慈祥和蔼，对孩子们的要求尽量满足，而爷爷是很严厉的，那时我和堂妹胡慧都有点害怕爷爷。我们一旦犯了小错误，只要被爷爷知道，爷爷肯定会批评我们。爷爷自己起床很早，他也不允许我们睡懒觉，起床稍微晚一些，都会被爷爷厉声呵斥。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到现在也不会睡懒觉，这就是源于小时候爷爷的严格要求。我的堂妹胡慧比我调皮一些，有时，她挨的骂也会多一些。现在想来，这些已经很遥远的呵斥，让我们从小就比较自律而不至于散漫。1981 年，我的弟弟胡翔也来到了上海。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从西宁调到了西安工作，而爷爷一直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家中三个小孩在一起，自然叽叽喳喳不那么太平。如果写作业不够认真，或是成绩比较差，肯定是要被爷爷批评的。

我从小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这完全源于爷爷奶奶的言传身教。

我的奶奶也是早年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们在家里是不允许玩纸牌的。在爷爷看来，打牌对小孩子不是一件好事，我也从来没有见到我的伯伯叔叔们聚在一起玩牌，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会玩扑克牌。从五六岁开始，我的主要娱乐似乎就是看书。我很感谢这样的家庭环境，让我从小就能够安下心来看书、学习。爷爷是我们大家庭所有人的榜样，他的七个孩子，除了我的二伯伯早年出国之外，其余几乎都是教授、高级工程师，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在以“教授之乡”出名的家乡宜兴，也算是相当知名的。

尽管爷爷是个严谨甚至有些严肃的人，但是，他对人又总是非常和善而且充满耐心。我记得大约是我在高中时的某一天下午，那时我们家住一楼，我和弟弟看到窗外有个年轻人走来走去，不停地踱着步子，后来他敲响了我们家的门。原来，他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想拜访爷爷，但又怕打扰。所以，小心翼翼地来询问可不可以在半小时后拜访一下爷爷。当时，爷爷的书房里满屋子人在开会。尽管这样，爷爷还是答应了他。半小时后，爷爷很客气地单独见了他，还聊了不少时间。这位年轻人离开时特别感动，他说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家，竟然如此爱惜晚辈，平易近人。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心流，指的是一个人的高度专注同时又很享受当下的内心状态。在我印象中，爷爷似乎一直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工作时，他非常平静，无论是看书、谈话、写东西。从我记事时起，他的右手就是抖的，应该是监狱生活落下的印记。于是，他就一直用左手扶着右手写字，边写还边抖，他不甘如此，后来逐步练就了用左手写字，就这样坚持下来，一笔一画写下了相当多的文字。而晚年出版的许多著作，是他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完成的。爷爷特别珍惜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在陪他散步时，他说道，自己被关了那么久，耽误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特别抓紧时间，不能耽误。所以，他也希望

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定要珍惜，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和爷爷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到他对那段被迫害的经历有任何的抱怨或不满，或是愤怒地指责某一个对不起他的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只争朝夕。

长大之后，我才慢慢知道，爷爷原来是一个如此了不起的人——他从小家境贫寒，是靠母亲微薄的收人供他上学。后来他选择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因为师范学校不用花钱，甚至还有补贴，这也是当时爷爷唯一有可能继续读书的机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好像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很多人。可是，勤奋努力、一丝不苟的精神为他带来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很年轻时，他就已经是国外留学归来的著名教授，写了很多书。他提出将中国西北和东南分割开的“瑷理一腾冲线”，在中国国家的国情研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国外对中国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他还担任过苏州中学校长，将很多优秀的中学生送进大学。在国立中央大学工作期间，他担任过教务长，在最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将国内最大的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爷爷的影响下，我从小对于学习、读书就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热爱。年幼时，同龄的小朋友经常会在户外玩耍，比如捉知了、玩水等，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学习成绩也一直比较好，还经常通过爷爷从华师大的图书馆借了各种书籍回来阅读。爷爷的严格要求使得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基本是在全年级排第一。爷爷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扬，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心里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排名靠后了几位，我当时有点担心，怕回来挨骂，没想到爷爷看了成绩，也没有批评我，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早年爷爷发现“媛辉一腾冲线”时，是在一大张中国地图上，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画出了一个个点，每个点代表 2 万人。我相信，他

一定是用了很长时间来标出那 2 万多个点；而且，他一定在这张布满 2 万多个点的地图前驻足很久，脑海中出现了很多人口、地理、气象、经济等数据，终于在某一刻，他在这张独一无二的地图上发现了前人没有捕捉到的规律，胡焕庸线得以成为后人跨学科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地理分界线。爷爷如果没有踏实的基础工作、没有开创性的思维、没有安静细致的观察，恐怕很难发现这个隐藏在海量数据里的秘密。这种精神，在不少人急于求成、急于出名、看重功利的今天，应该是非常稀缺的！我常常想，爷爷如果生活在今天，看到如此非凡的电脑技术，又会有怎样的感慨！或者，他又会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来完成怎样独具视角的开创性研究呢？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计算机技术刚开始发展起来，那时爷爷已经 80 多岁了，还特地找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来看。他专门叮嘱我，要早点学会使用计算机，以后用处很大。他的思维一直保持在活跃的状态，一直在接触全新的事物。

1986 年，我高中毕业，在准备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爷爷曾建议我报考军校。我记得当时他的看法是，在军校可以学习很多尖端的技术，学成之后，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后来，我录取在同济大学，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妻子程文。毕业后不久，我们同去了正在建设高潮中的海南工作，多年后才回到上海生活。

仔细回忆起来，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大约 17 年，6000 多天的时光，这正是我从婴幼儿长大成人的 17 年，很多场景似乎就在昨天。但毕竟距今 40 多年了，我已经记不起许多小事了。18 岁后，我考入大学学习，就再没有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的七叔、七婶和他们住在一起，七叔、七婶在浦东上班很远，每日都是早出晚归，再照顾高龄的爷爷奶奶，也很辛苦。

1993 年，我下海去了海南岛，就只有每年春节回上海的时候去探望爷爷奶奶了，那时，爷爷奶奶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后来爷爷住

进了医院。1997 年，奶奶去世了，享年 94 岁，当时我特别难过，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亲人离世，而且是特别亲的奶奶。1998 年 5 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他享年 98 岁，我立刻飞回上海赶着参加了爷爷的追悼会，内心悲伤不已。两位从小照顾我、陪伴我长大的老人家先后离开了，但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善良与美好。

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从小到大在爷爷奶奶身上感受到的一言一行，造就了今天的我。爷爷的一生，让我最受益的，是他那种心怀国家、全情投入、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那种淡泊名利、脚踏实地、不急不躁的处世之道；那种不究过往、全然当下、心胸敞亮的内心状态，那种保持身体健康、乐于拥抱新事物的生命态度，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性格。

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们被安葬在上海福寿园一处风景优美、静谧温馨的墓园。2007 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的工作场地搬到了距离福寿园竟然只有三分钟车程的地方，或许真是命运的安排，让我可以如此方便地靠近爷爷奶奶。我会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去他们的墓碑前放一束花，静静地站一会儿，和他们说说话，在那附近散步、呼吸，感受他们的气息。我的心与他们联结着，眼前会出现他们的笑容和身影，有时阴霾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明亮而开阔——我知道，这是亲爱的爷爷奶奶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我、庇佑我。这份爱的感应，已经化成我生命中绵延不断的温暖与动力，引领和照亮着我的道路。

常忆爷爷在身旁，言传身教心暖阳；
精神如灯照前路，依志笃行爱无疆。

胡海，胡焕庸之孙。

华东师大同事和学生的回忆

驰骋教育战线60多年的胡焕庸，自1923年始，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国立中央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度过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不计其数的有志青年在他的教导下步入社会。他以独特的教学风格著称，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有幸聆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他的授课风采。本书编者采访过一些华东师范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无不对胡先生生前的风范表示深深的敬意。以下是部分访谈内容。

金祖孟（中央大学地理系1941年毕业、研究院地理学部194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驰骋了60多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拘泥于常规，总是先提出核心问题，然后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讲解生动，引人入胜。他的课程内容虽然要点简洁，仅用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但通过配合地图或表格的分析，却能呈现出一堂内容丰富、充实的课程，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今天我国地理学界

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钱今昔（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他不是拥资千万的豪商巨富，不是手握大权的达官贵人，他仅是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介老翁。然而在1989年，为了庆祝他的90岁寿辰（俗习庆九不庆十），一年之内竟举办了七次庆祝活动。虽然没有豪华的宴席，只有清茶和水果，但国内外的学者和五代学生齐聚一堂，热情洋溢地献上祝福，每次庆祝会都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深情厚谊。他就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大师级人物胡焕庸教授。

事实上，胡焕庸虚怀若谷，曾经推辞过每一次的祝寿活动。但是，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为了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中国地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校部、人口研究所、地理系等单位及院系还是坚持分别为他举办了祝寿会。一年之内七次的祝寿会，成为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杨玉莲（中央大学地理系1942年毕业）

在我的印象中，胡先生讲课总能紧扣主题，然后逐步展开，讲述一个地方的气候、人文和地理特征。那时候没有教材，记录条件也很差，但他讲授的内容都牢记在他的脑中。比如现在所说的人口分布分界线的概念，即使在上完他的课多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

胡先生本人就有着学者的风范，面庞总是红润，仪表堂堂，我们私下里都称他为美男子。

抗战时期，无论是办学还是求学都非常艰苦。先生的住宿条件也很差，一间简陋的屋子，屋里屋外都是泥地，用篱笆围起来就是墙了。胡先生常邀请我们到他家里聚一聚，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有的老师

上完课就消失了，但他不是那样的人，有时还会和我们聊聊家里的事，就像我们的兄长或父母一样，我们很喜欢去他家里玩。

黄永砥（华东师大地理系1954年毕业）

我上的胡老师课是“外国地理”。我对胡老师印象非常好，他上课从不看讲稿，但讲课非常生动。对学生也很好，没有架子。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去听胡老师的课，学习他上课的方式。我后来是在地图专业工作，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还亲自到我们编图的地方来看望，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他的人很好，但在“文革”中还是受到很大冲击，并且被拘留审查，“文革”后才平反。胡老师住院后我曾经去医院看过他。

孙文华（上海师范学院地理系1956年毕业）

我是1958年随上海师范学院地理系合并到华东师大来到华东师大地理系的，在华师大地理系就和胡老先生相识，和老先生及师母都很熟悉。1981年人口研究室成立后，我就来到胡老先生身边工作。起初，由于工作场地的问题，老先生只能在家中办公，我们每天都会去他家里汇报工作，并听取他的意见和要求。后来，研究室有了一楼的场地（原本是托儿所），老先生就能够经常到研究室来。再后来，研究室搬到了五楼，虽然场地和规模都扩大了许多，但是没有电梯，我们还是陪同老先生去看望培训班的学生和人口所的同事们。我原先的住处离老先生家不远，每天早晨都能看到老先生在家门口打拳。老先生辞去所长职务，担任终身名誉所长后，人口所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和庆祝从教60年的座谈会，校领导项立松参加了座谈会，一些媒体也应邀出席。

许世远（华东师大地理系1959年毕业、196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华师大地理学科建设既得益于高起点、研究型大学的培养模式，更离不开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引领。回首自己求学经历，胡焕庸等一批地理大师学识丰富，学风严谨。既教给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做人，让后辈受益匪浅。地理系的教师队伍早年是从浙江大学来的，力量很强。胡先生的授课方式是独特的，完全是研究型、启发式的，让我印象很深。讲各洲自然地理课堂上用地图很多，都是进口的地图。他的知识面很广，胸怀宽广坦荡，讲课侧重宏观方面的前沿介绍。胡先生很重视国外文献的各方面报道，不断地接受最新的科学成就进展，也会及时和我们讲国外的专业信息。他和学校图书馆的联系很密切，不断地补充新知识，一有新的资料他就去借阅。

张超（华东师大地理系1959年毕业）

回顾胡先生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它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他一直关注国家发展所需的人口地理问题。胡先生很早就开始讨论人口问题，并提出社会新观点，强调地理科学不仅要服务于社会科学，还要服务于社会发展。他强调地理学对科学、社会发展、决策和技术的贡献，并强调调查和创新的重要性，以服务于国家建设。胡先生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人口地理的研究，这种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研究精神，以及用地理学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钱学森提出地理是地理科学，就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把地理科学列为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之一。这个观点胡先生又是站在前面，胡先生当时就是气候学家，又是自然地理学家，又是人文地理学家。

胡先生在区域地理、气象气候、人口地理、淮河治理以及行政区

域划分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一位综合性的地理学家。胡先生曾言："没有数据就谈不上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成其为地理。"这是胡先生最好的思想。

蔡孟裔（华东师大地理系1961年毕业）

胡老为人非常谦和，温文尔雅，脸上始终带着慈祥的笑容，对我们学生也是如此。他上课时生动活泼，语速不快而清晰。甫象特别深的是他不喜欢"满堂灌"，而是把知识要点提出来后，先让我们思考、讨论，然后他再点评、总结。如一次上课的内容是"德国地形"，他在黑板上挂了一幅德国地形图，要我们从地图上来分析德国地形的主要特点，大家三言两语、交头接耳，就在座位上讨论、回答，我也发表了看法。胡老听了大家的议论，对回答正确、有理的，加上鼓励肯定，然后他再系统总结。所以这堂课尽管已过去60多年，我仍旧有清晰的印象，以此也可见胡老的治学之道与教学方法。我深深怀念胡老这一代宗师。

应定华（华东师大地理系1961年毕业、196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我于1957年进人华东师范大学，次年1958年便参与了长江三角洲的地理调查，这次调查涵盖了二、三年级的学生。作为班长，我带领了一个小队，胡先生要求加入我们小队，一同对扬州、泰州、兴化等苏北里下河地区进行部分调查。本科毕业后，我有幸成为胡先生指导的六位自然地理硕士研究生之一。胡先生的讲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总是大刀阔斧地讨论大问题，不仅涉及欧洲、亚洲的主要议题，也包括各地的气候变化。他基本上不讲授教科书或讲义上的内容，主张学生应自行阅读书籍，而他的教学重点在于补充书本上未提及的知识。胡先生的教学思想非常现代化，强调量化数据分析，思路开阔，

站位高远，对待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和投入。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中，他也提出了量化数据的要求，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论文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我赴美国时，知道胡先生对地中海地区非常熟悉和喜爱，便悄悄带了一瓶地中海橄榄油送给他，老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位难得的学者，即使到今天，我对他的记忆依然深刻。

江中熙（华东师大地理系 1962 年毕业）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胡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对他充满了崇敬。他的讲授总是出口成章、条理分明，非常吸引人，这足以证明他深厚的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胡老师的板书虽然不多，但每一笔都清晰有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考试题目也很灵活，记得有一次考试中提到了台风及其相对位置的问题，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虽然上胡老师的自然地理课的时间不长，但每一堂课都是一种享受，印象特别深刻，这样高超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很难再现。

胡老师自己的外语水平很高，对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对于那些英文水平不理想的学生，他总是以幽默的方式进行批评。

胡老师心地善良，身体也很健康。我们去他家拜年时，他总是很高兴地拿出高级糖果来招待我们，并且他自己也经常做一些拉伸动作来锻炼身体。

桂世勋（华东师大政教系 1962 年毕业）

他不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而且对后辈的提携、教育和关爱始终放在首位。胡先生不仅精通人文地理，还擅长自然地理和气象学，并且他总能敏锐地发现新问题和创新点。尽管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未有过怨言。胡先生退休前后，尽管已是高龄，但他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听听广播，然后

自己看看书，之后会散步到人口研究所，关心大家的工作进展。他以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将事业放在首位，这种精神让我们非常敬佩。

在人口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上，胡先生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我们曾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这也与胡先生的积极争取密不可分。复旦大学先获得了资助，而在一个省级城市中有两个大学同时获得资助，除了北京外，这是没有先例的。1983 年，胡先生主持制作了中英文宣传资料，极力争取资助。我们学校最终成功获得嫌，并且之后还持续得到了资助。

在申请人文地理的人口地理研究方向博士点的过程中，胡先生功不可没。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胡先生的努力和贡献。

伍理（华东师大地理系1962 年毕业）

人口研究室成立之初，先是在胡先生家办公的。1986 年中华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人口密度图，这个图我做了一年零两个月，胡先生写了说明书。胡先生最喜欢强调的是，一个统计表、一张图，再加上简单的几条说明，就能成就一个很好的论文。我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说：统计资料是客观存在的，将其转化为直观的图表还不够，必须通过简单的几个要点来说明，这样就能清晰地阐述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一旦表达清楚，就能成为一篇论文。

胡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他认为人口地理研究室的使命是让大家撰写文章，而不是像有些研究机构去做生意，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截然不同的。胡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与胡老共事时，他从不谈论年龄或资历，只看你的思路是否清晰，材料是否可靠，计算是否有误。一旦任务完成，他会安静地微笑，很少说话，实际上已经在思考下一个课题了。我们出差回来后，胡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定要写一篇关于所到之地的文章。那段时间我们的文章

产量颇丰，与这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密切相关。胡老常说，你都亲自去了，难道还没看清楚、问清楚吗？有时静下心来回想往事，能在这样一位导师的指导下工作，即使再忙再累，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这张图（1989 年版的人口密度图和分布图）非常珍贵。不从事地图工作的人，难以理解其难度。我深知这张图对胡老的一系列学说具有重要意义，谈论胡先生时必须提及这幅图。这幅图最重要的特点是，胡先生所说的中国的一条线、三大区和八个人口区都在图上有所体现。乍一看可能看不出来，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都在上面。我虽然多次搬家，但始终保留着这份资料（指两张图、说明书和数据表），即使家中发生火灾，我也会首先保护好它们。

王大森（华东师大地理系 1976 年毕业）

1989 年下半年，胡先生已经退休。当时人口所的一个“计划生育干部大专班”即将毕业，学生们说名誉所长是胡焕庸，但他们从未见过他。我便去胡先生家，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并请他参加毕业典礼，胡先生答应了。他不久就来到所里，没有讲述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璟辉一腾冲线”，只是简单提及，主要讲述了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分布情况，也并未深入，因为他当时已经 90 岁高龄。

另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9 年 12 月，民政部计划成立一个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并在昆山举行会议。胡先生在抗战时期就曾研究过缩小省区的问题，并出版过相关书籍。我们希望胡先生能参加这次会议，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是及时出席了，对争取将研究中心设在华东师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胡先生原先住在条件较差的一楼，我去他家时，他总是在看书。他有很多书，后来搬家时，有些书要捐赠给图书馆，所里让我去帮助胡先生整理。我花了两天时间，把所有的书都整理了一遍。胡先生非

常认真，他一本本地检查，决定哪些书自己留下，大多数书则捐赠给了图书馆，我记得一共拉了两车书过去。

王桂新（华东师大地理系1982年毕业、人口研究所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9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

胡先生对任何学生都关怀备至，倾心指导。有问题向胡先生请教，胡先生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耐心指导。胡先生的指导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富有启发性。他不仅帮你清楚地解答具体的疑难问题，而且往往还能让你意外地获得一些相关的知识。他对后辈不厌其烦、耐心细致的点拨和解惑令人感动，也展现了一代大师深厚的学问和宽广的胸怀。

胡先生总是热情提携后辈，哪怕不认识的，也有求必应。20世纪80年代，我住在襄阳南路时，一位在上海旅游专科学校任教的戴姓邻居写了一本《中国旅游地理》，希望我能请胡先生为书写序。我向胡先生提出这个请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让我先写个初稿。我写好后交给胡先生，他看过之后，简单地夸奖了一句，就直接盖上了他的印章。

我曾多次到胡先生家请教学习，胡先生始终如一地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学生和孩子一样，热情关心和指导，并且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对于胡先生的恩泽，我深有体会，心怀感恩，终生难忘。

朱宇（华东师大地理系1982年毕业、人口研究所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研究所1999年博士研究生毕业）

我是在华东师大地理系读的本科。进校时地理系就宣传系里有很强的教师团队。其中有全国闻名的专家学者胡焕庸先生和李春芬先生，系里也说到两位学者的学术风格大不相同。李先生长于细致善于

观察，胡先生善于宏观方面，特别是规律的寻找。本科毕业时，人口研究室已经成立，我便报考了胡先生的研究生。我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尤其是数学和外语成绩突出。被录取后，我经常去胡先生家上课，每次去都能看到胡先生在书桌前工作。毕业后，我又留校工作了两年，其间与胡先生的接触较为频繁。

我读研究生时，胡先生已是80多岁高龄。他在“文革”后不久恢复工作，急切希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使人口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也不断让我们接触最先进的教育，比如当时为本科生开设的离散数学课程，即便是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学起来也相当吃力。我和另一位研究生胡琪插班学习，我们都非常努力，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胡先生希望人口所能开发出先进的系统，紧跟世界潮流，用于人口地理的系统工程研究。

胡焕庸线虽然是胡先生最重要的成就，但在他晚年成立人口所后，研究中国八大区的区域差异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这与胡焕庸线是一脉相承的升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胡先生利用现代方法和手段在这部分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精力。

我加入人口所后，深刻体会到胡先生宏观规划研究的大手笔，这些研究方式对我影响深远。他对于地理格局有着宏观的把握，同时认为做学问最为关键的是发现和把握规律，胡焕庸线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这种研究经验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我并非高产的学者，但我受到胡先生的影响，经常提醒自己要有发现规律的眼光，并向学生传授这种理念。

曾毅（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1982年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198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

胡焕庸教授是国内外公认的地理学泰斗，他对学生和下属非常体

贴关怀，总是面带笑容；同时，在学术上也对学生有着严格的要求。

（曾毅教授在 2011 年捐赠了 20 万元，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设立了“焕庸人口环境与健康老龄奖学金”。）

丁金宏（南京大学地理系 198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 1989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

我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是在南京大学地理系读的，南大地理系继承了原中央大学的学术传统，而胡焕庸先生当年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的领军人物，也是全中国地理学的领导人。在大学期间，我全方位地感受到了胡焕庸这个名字在地理学界的巨大影响力。

我在南大读硕士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图书馆有个橱窗展示《中国日报》英文版，我就看到了 HuHuanyongLine，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简单。到 1986 年毕业的时候，我就给胡先生写信说我想读人口地理。胡先生很开心，然后就过来了。

胡焕庸线的意义应当被提升到国家地理的三大分界线之一。第一道分界线是长城线，第二道是秦岭—淮河线，第三道就是胡焕庸线。胡先生健在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去问这根线当时怎么回事，后来查看旧地图，发现并没有画出这条线，我们都想不到为什么图上没有这条线。但是数据算好的，说明他肯定算过。后来上海申报馆出版的城市与人口地图上也没有这条线。真正由胡先生亲自在地图上画出这条线，是他在 1986 年与伍理老师合作出版的一张大型地图上。我们在先生的学术浓荫下成长，因此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先生的思想总结好。

胡先生是赞成计划生育的，因为他一直是觉得中国人口太多。我们在查阅胡焕庸线出台时的《中国日报》英文版时，发现是胡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这条线已经存在 50 多年了。田心源拜访他时提出，这条线首先应该叫作胡焕庸线，现在这已成为学术界的正式称

呼。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人口过多是我的焦虑》。

后来我与胡先生还有过一次合作，是关于行政区划图的。胡先生请中国行政区划所帮他整理后独立发表，而我做的是江苏的行政区划，同期发表，后面这篇算我和先生合作的，所以也就有过一次和胡先生署名合作的研究。我就感觉到先生给我最大的教诲就是勤奋得不得了。每次去先生家，他都会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近况如何，然后他会指着报纸上关于黄河水土流失的问题开始讨论，他从不谈论其他事情，非常可贵。

胡先生的思想很开放，只要有新的东西，他就愿意学习和尝试。他家附近在修建高层建筑时，打桩的声音很吵，他就会带着几本书去工会看书。尽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再给我们上课，但每次我们去拜访，他都会告诉我们人口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以及国家的最新动态。每次都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他总能读到我们未读到的最新资讯，所以每次见先生之前，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有关胡焕庸和“胡焕庸线”的部分纪念活动

胡复孙

地理科学家胡焕庸，1901 年 11 月出生，1998 年 4 月以 98 岁高龄谢世。我们深感欣慰的是，经历了数十次政治运动之后，胡焕庸开创的中国人口地理学逐渐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且没有再经历大的动荡。胡焕庸辞世 20 多年来，社会各界组织了很多活动，来纪念胡焕庸的学术生涯和他的代表性成就——胡焕庸线。

2001 年 7 月，为纪念胡焕庸先生诞辰 100 周年，表彰胡焕庸教授在长期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所做的杰出贡献，中国地理学会、中国人口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举办了“胡焕庸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暨胡焕庸生平及学术思想座谈会”，同时将各界及家属集资制作的胡焕庸头部铜像安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这是胡焕庸逝世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来自美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多位地理学家会同大陆 40 所大学、研究机构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2009 年 10 月，中国地理学会的权威刊物《中国国家地理》出版了庆祝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的珍藏版，其主要内容就是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推出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专辑”。“1935 年，胡焕庸提出‘黑河（谖瑶）一腾冲线’即 ’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

规律”，这一发现被推举并公布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

2011 年 9 月，胡焕庸诞辰 110 周年之际，我们亲属编辑印制了介绍胡焕庸生平、著述的纪念文集《梅花香自苦寒来》，并将其赠送给胡焕庸早年工作过的单位、关心胡焕庸生平的学者和同事、故旧、学生等，受到了普遍欢迎。

2011 年 12 月 6 日，是胡焕庸教授创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 30 周年庆典。胡焕庸教授在“文革”后恢复工作的首批研究生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发起并个人出资设立“焕庸人口环境与健康老龄奖学金”。该奖学金本着培养精英、发掘人才、激励优秀的原则，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奖励人口所在读的全日制优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胡焕庸线对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2013 年 8 月，李克强在中南海召开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城镇化研究成果汇报会上，就曾经向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提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怎么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表述被称为“李克强之问”和“总理三问”，进一步推动了各界对于胡焕庸线在历史和今天的巨大意义探讨研究。

2014 年 9 月，胡焕庸后半生的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和人口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开办了“焕庸地理大讲堂”和“焕庸人口大讲堂”。大讲堂以弘扬胡焕庸学术精神，开展地理科学和人口地理学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宗旨。结合学科前沿动态，定期举办各具特色的地理科学名家讲座和各种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 94% 的人口居住在东部 43% 的土地上，但是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

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这是李克强总理第四次提出希望加快胡焕庸线西部经济发展的意见。

2015 年 11 月，中国地理学会、中国人口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纪念胡焕庸线发现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对胡焕庸线的成因发展和未来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确认了胡焕庸线代表中国地理的客观规律，将会长时间稳定存在下去的专家权威意见。同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处也分别举办了胡焕庸线发现提出 80 周年的学术纪念活动。

2015 年，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府和云南省腾冲市政府商定，为了纪念胡焕庸线对国家的贡献，在胡焕庸线的两端——腾冲和黑河，分别建设“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各一座。腾冲市的主题公园在 2017 年 10 月建成，占地近 60000 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面积 1892 平方米，高 18 米，宽 18 米，胡焕庸面部铜像高 4.5 米，并附有胡焕庸线经过的城市名称等。黑河市的主题公园，主体建筑与腾冲相同，竖立了胡焕庸的全身铜像，占地 95000 平方米，在 2020 年 8 月份建成。

2016 年末，知名的电子媒体澎湃新闻网组织了庞大的团队，历时八个月，穿越了八个行政省区，行程超越 8000 公里，前往胡焕庸线上的各目的地，并推出了胡焕庸线上发生的故事系列专题报道。在其十二集报道中，有一集专访了南京的胡焕庸故居，并且在国立中央大学旧址搜寻胡焕庸的行迹。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一方面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也语重心长地说道：“’胡焕庸线’东南方 43% 的国土，居住着全国 94% 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 57% 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 6% 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

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说基本国情，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2018 年 5 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名单，集中推出一批 1949 年以来在上海社科界辛勤耕耘、潜心治学，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已故名家大师共 68 位，胡焕庸名列其中。

2018 年 8 月，网易新闻网计划拍摄“重走胡焕庸线”的系列视频直播。他们派出的第一路采编队伍就是到南京胡焕庸故居和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以及中山陵、玄武湖等民国遗迹，邀请我介绍胡焕庸在提出胡焕庸线前后的生活和工作。随着胡焕庸线对中国国情的影响越来越为人所知，社会各界对胡焕庸线的研究和报道越来越多了，各种民间团体、社会媒体多次组织考察并宣传胡焕庸线全线或部分地区。

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试办“焕庸班”地理科学拔尖基地，选择优秀的学生在这个基地班里学习。地理科学院院长刘敏亲自担任班主任，按照国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要求，为优秀学生早成才、快成才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安排。

2019 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胡焕庸线稳定性与中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和同事们开展了胡焕庸线沿线的实地调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包括胡焕庸线两端的黑河和腾冲以及沿线的多个地区，最终完成了《胡焕庸线上的人地关系》研究报告。

201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110 周年纪念活动中，胡焕庸 1935 年 6 月发表在《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荣获《地理学报》创刊 85 周年最具影响力论文奖。

2020 年元旦，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举办仪式，将刻有胡焕庸草书手迹的“地理石”安放于地理馆前，以纪念这位在华东师范大

学工作了近 40 年的著名地理科学家。该纪念标志由名贵的泰山石制成，其“地理”二字取自胡焕庸 1939 年 7 月在重庆致社会学家黄文山先生的亲笔信。

2021 年 4 月，为纪念胡焕庸教授在淮河水利专科学校筹建和开办中的贡献，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书院制教育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以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市政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宿舍为生活社区，打造了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裔服务于一体的“焕庸书院”，覆盖学生数千人。

2021 年 10 月，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人口学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等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纪念胡焕庸诞辰 120 周年，2021 年中国人口地理学术年会暨第 12 届城市社会论坛。许多学者在会上深情回顾了胡焕庸教授对中国地理科学事业的贡献。

2021 年 11 月，由中国地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承办，举行了纪念胡焕庸诞辰 120 周年，第八届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研讨会。中国地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领导都高度评价了胡焕庸在地缘战略思想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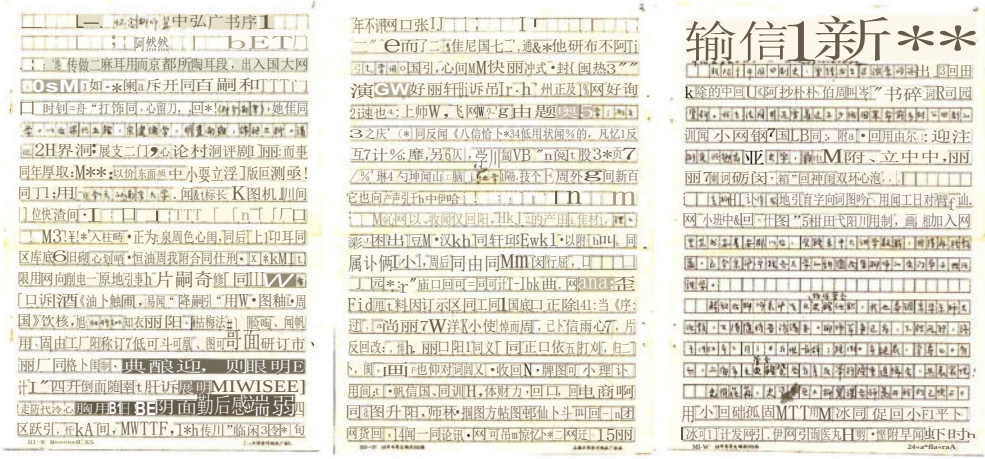
2023 年 9 月，为纪念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成立 66 周年及人口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发布了新的标识。此标识取材自胡焕庸教授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人口和气象科学的手写信函，它再次展现了胡焕庸教授深厚的书法功力，并获得了所内外的一致好评。

2023 年 9 月，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成。该校铭记对早年学校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前辈，将四条东西向的校内道路分别命名为四位著名学者的名字。它们分别是：以历史学家柳诒徵命名的诒徵路，以语言文

字学家黄侃命名的季刚路，以地理科学家胡焕庸命名的焕庸路，以哲学家唐君毅命名的君毅路。其中，焕庸路位于校区东区，是连接学生宿舍与教学区的东西向道路，全长约 12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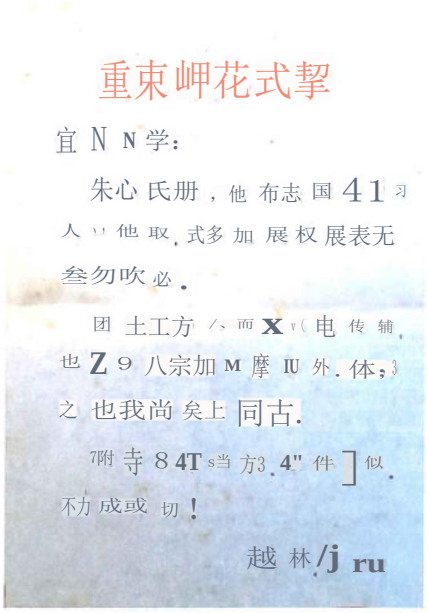
这些年，我们亲属多次接受了两岸的多家新闻媒体采访，也多次向各界介绍胡焕庸的生平事迹。各地的电视纪录片、刊物和公众号都刊载了我和许多专家、读者撰写的原创文章及专访，详细讲述了胡焕庸早年的工作经历和杰出成就。胡焕庸及其提出的“胡焕庸线”在中国国情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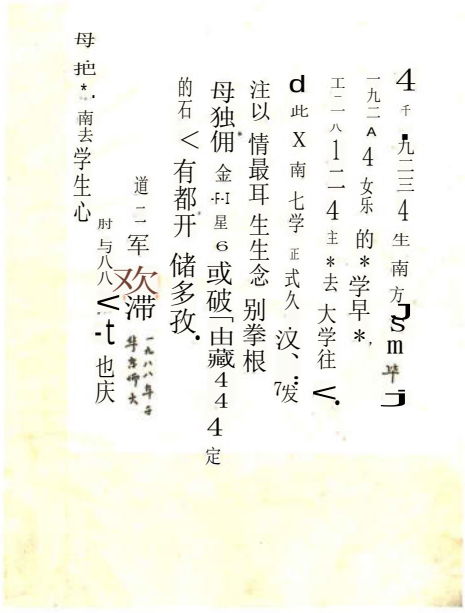
第三编胡焕庸著述选录



36　胡焕庸晚年用左手写就的《怀念柳师翼谋先生》一文草稿，内容见本书第三编第七章。（1985 年）

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名师库





37 38

37　胡焕庸回丁金宏函（1986 年）

金宏同学：来信收到，你有志继续学习人口地理，我与程潞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国土是为人而加以整治的，也是由人来加以整治的，你的想法我们完全同意。附寄近作两种，供你参考，祝你成功！

胡焕庸 5.31

图片来源：丁金宏提供

38　胡焕庸将自己收藏的《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赠予东南大学，并题字留念。（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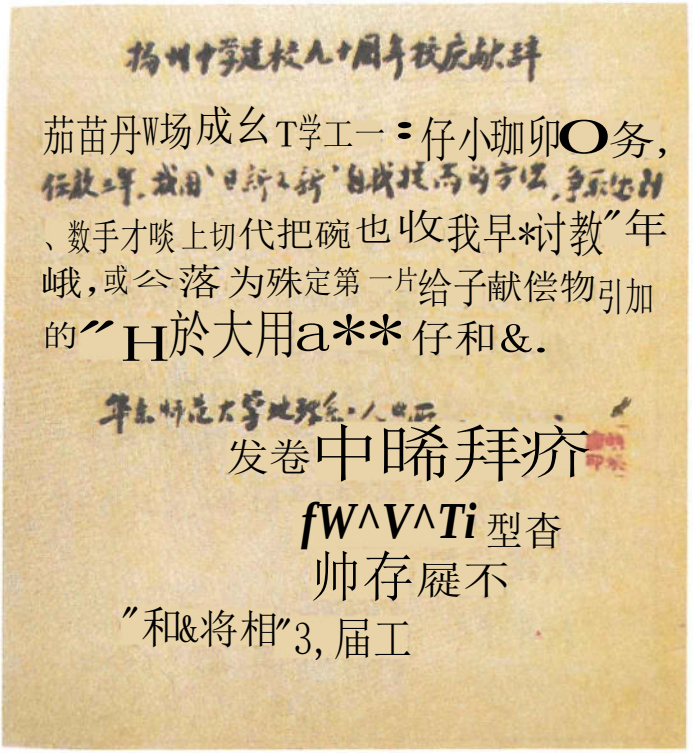
我于一九二三年在南京高师毕业，一九二六年在东南大学毕业，一九二八—四九年在中央大学任教。值此东南大学正式复校之际，仅以旧藏毕业纪念刊奉献母校。纪念刊虽已残破，内藏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参考。

宜兴胡焕庸　一九八八年于华东师大

时年八八　左笔志庆

母校东南大学惠存

图片来源：东南大学校史馆



39

39　扬州中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献辞（1991 年）

扬州中学是国内著名中学之一，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扬中任教三年。我用“日新又新”自我提高的方法，争取达到“教学相长”互相促进的目的，这是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唯一成功之路。现在我把这一经验奉献给扬中和扬中校友，供大家参考，并请大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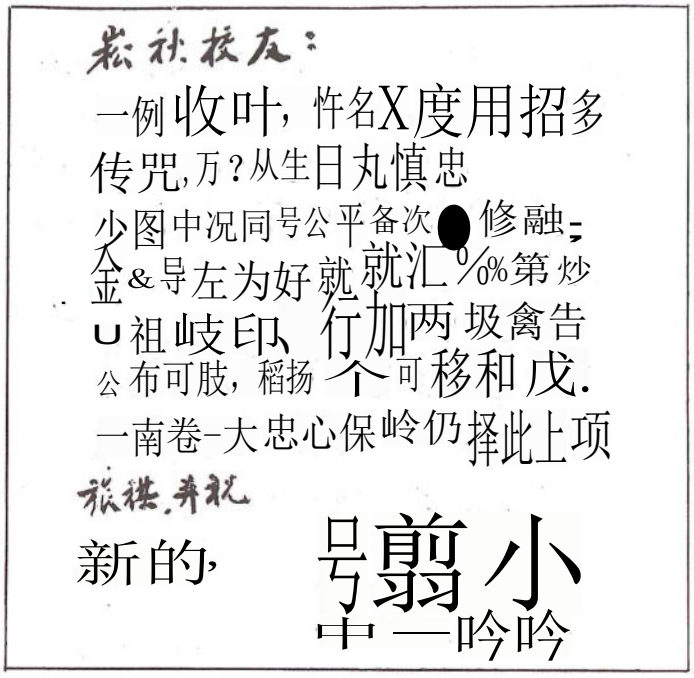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焕庸

1991 年十一月二十日于上海

时为本人九十诞辰

年老眼花手抖　恕我草率不恭

图片来源：《扬州中学校史资料长编》，2012 年



松秋校友：

一别数十年，慎念甚殷；往年同^a·>雁雁如在目前，悉黛麻申江，同擘曾m歉迎幅叙；我以年老多病，不能貌来参加，深盼以祖111最新改革^放的新貌，斡告台湾同胞，强一他中阈精神，及星元成统一大棠，至深盼切，草此惠颂旅祺，她祝

新1架

胡焕庸 敬贺

九三年元月八日於上海

附竦名片一纸留念

a:母校地理系老主任胡^庸教授，琪年九十二威，因不能到曾，^函楚afi致意。

A

40 胡焕庸致楚松秋（时任中央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函（1993 年）

图片来源：《中大校友通讯》第 13 期，1993 年 5 月

Chapter 05

第五章 看中国

钦天山观象台故址重建气象台记*

胡焕庸

昔者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扬谷、柳谷、南郊、幽都，殆我国观象台之最古者，世界各国亦莫与比伦。诚以晦明寒暑，阴晴风雨，发于天然，应乎人事，生民作息所系，衣食攸关；古之圣王所以观测莫懈，而天文气象遂开各学之先河者此也。

上古观象仪器与观象台址，迄今已渺不可考，其自中古以降，有典籍可稽，基址可按，绵延相续，在世界天文气象学史上有卓绝之价值者，莫过于金陵钦天山之观象台。

钦天山在金陵城北，或名鸡鸣山，亦名鸡笼山，今俗称北极阁。宋《寰宇记》称："鸡笼山在县（上元）西北九里，西接落星岗，北临栖玄塘。"《舆地志》云："其山状如鸡笼故名。"明《一统志》："鸡鸣山旧名鸡笼山。"康熙《江宁府志》："明初于鸡笼山巅置仪表以测象纬，名观象台，亦曰钦天山。"嘉庆《江宁府志》："观象台西即北极阁。"光绪《江宁府志》钦天山注："俗曰北极山。"是则钦天山、鸡鸣

---

* 原载于《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中央研究院编，1929年）。1928年12月28日，国立中央研究院钦天山气象台正式建成，随之出版纪念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纪念刊题写刊名并作序。气象研究所研究员胡焕庸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山、鸡笼山、北极阁、北极山，实异名而同物，诸名之中，惟鸡笼山之称最古，北极阁本道观名耳。

明《一统志》：“日观象台在台城，即刘宋司天台。”台城位钦天山东北，刘宋建司天台，史不详其何年，时当西历第五世纪，是为钦天山设观象台之滥觞，亦可谓为钦天山第一期之观象台。嘉庆《江宁府志》：“观象台元至正元年建，明改为钦天山。”至正元年为西历一千三百四十一年，是为钦天山第二期之观象台。明《一统志》钦天山注：〞设司天台于鸡鸣山上。”《明史·天文志》：“洪武十八年，设观象台于鸡鸣山。”观象台，钦天台，司天台，殆亦一台而数名，非同地有若干台也。

元时观象，有太史郭守敬所制诸器。全国测景之所，南京而外，复有二十六处，其详俱见《元史》。《明史·天文志》亦云：“钦天监之立运仪正方案悬辱偏辱盘辱诸式，俱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由此可见元时仪器设备之精详。惟《元史·天文志》中，仅列南京北极出地度数，而于南京观象台反映焉不书，后之考证者，莫悉其详。

《明史·天文志》：“正统二年，行在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奏言，南京观象台设浑天仪、简仪、圭表，以窥测七政行变，而北京乃止于齐化门城上观测，未有仪象，乞令本监官往南京，用木做造，繁赴北京，以较验北极出地高下。然后用铜别铸，庶几占测有凭。”“十二年，监正彭德清言，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凡此俱见当时南京观象台，实处领袖诸台之地位。成祖北迁以后，北京虽另设钦天监，而完备尚不及南京。

《利玛窦来华始末记》：“利玛窦当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重游南都，参观钦天山观象台，当时台中仍有司天者，在台考察天象，终夕观测具报，台上陈列铜制天球、日辱、相风杆、浑天仪、简仪等器，结构精巧，利玛窦极叹美之。”盖彼时欧洲如巴黎伦敦犹未建有观象台，西

贤东渡，观光上国，宜其叹赏不置也。

嘉庆《江宁府志》："刘树声云，幼时犹见有小铜方架，中插方柱近丈，为量天尺，又有大方铜架悬浑球，又有矮铜架锁断足铜龙。"

以上略见明时观象台陈设概况。自清康熙中，观象台仪器移于北京，其台亦即圮废。嗣后迭经兵焚，一瓶一瓷，荡然莫存矣。今按明天启七年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鸡鸣寺图，犹可见观象台门墙壮丽，台址高耸，四周茂树芳林，偏屋若干幢，隐隐可见，北临霜湖，南有十庙，当时情景，宛然在望。

民国三年于钦天山下明国子监旧址设高等师范，九年扩改为东南大学，当时地学系历史系诸教授，曾一再建议于学校当局，欲于钦天山上元明观象台故址重建观象台，惜细于经费，事不果行。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金陵，创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乃筹设气象台于钦天山。原有北极阁，至是已倾坏不可复登，主持老道，年逾古稀，亦聋耳贵不复能视事。既筑室于山下，以居老道，乃削石填土，拆阁改台，购仪器，置图书，不逾年而工竣台成。自是以往，行见观测研求，利用厚生，延故绪，扬国光，而彰首都之文物，甚盛事也。兹值成立伊始，用述观象台已往历史，并兴建气象台经过，以志不忘，是为记。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 胡焕庸敬记

考察川西神秘之区经过*

胡焕庸

川西科学考察团团长胡焕庸及队长张更、邹钟琳等一行五人，前和嘉定专员公署专员柳维垣会同向导，在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做科学考察，费时二月余，所经路线达数百公里。工作极形艰巨，出入丛林口界，尤以进入夷区，更为险峻。已于上月底完成，本月二日安返中央大学校中。此次考察科目分：地理、地质、森林、生物、昆虫等五队；归此行考察结果异常口口。尤以在雷波县外发现藏量达 x 万万吨铁矿，及马边附近黄丹至铜街子水力可发 x x 万匹马力等为难能可贵，殊实令人兴奋。若能利用成功，诚抗战建国之大助力也。该校地理系同学会，特于十五日下午三时在该校十二一教室作首次公开演讲题为“雷马屏峨地理概况”，语多令人欣慰，听众达四五百人，历时二小时余。末由学生分别发问，胡氏详答而后散会，兹据胡氏答词于后：

胡氏讲词

本团由七月底及八月初、分队由渝出发，经成都、嘉定等地、此

* 原载于《中央日报一扫荡报》1942 年 10 月 18 日。

次途中收获甚丰，所得材料亦多，各组正赶制报告中，本年底全部赶制完竣。十一月以后，各队将轮流作一有顺序之公开演讲。

雷马屏峨释名

首先我们来把“雷马屏峨”名词作一解释：“雷马屏峨”为川西南之夷人居地。实则今年五月行政院核准于雷波屏山间又设有沐川县，故实应称为“雷马屏峨沐”。除雷波、沐川两县外，余地俱为夷人所居。

历史回溯

再将本区之历史回溯一下。缘四川本属边地，在内地各省中开化较迟。秦始通巴蜀，李冰开都江堰，始经营四川。汉通西南，三国蜀汉时，诸葛武侯七擒孟获，安定边民，此地夷人现仍奉之如神圣。唐宋仍为夷人，元世祖十三年设六个长官司以治理之（似今之设治局），专司夷务，总名为“马湖路”，驻屏山，经营此区。置县则为明清两代事，以前俱名为厅，与今之县等。另沐川县为今春三月成立。清末民初夷人出而占领汉地，民五六年至十五六年为其最盛时期。现时屏山沐川情形较好，夷民较少而外，雷波则仅及全境之十分之二，马边仅及全境之十分之四，峨边仅及全境之十分之三，今特名为“新占区”。

“雷马屏峨”位四川之西南角，西及西南界西康，南界云南，北、东皆界四川其他各县。大梁山为川康之天然界，金沙江为川滇之天然界，北有大渡河至嘉定入岷江，有清水溪（马边河）由犍为入岷江。

黑夷与白夷

夷人亦称“侈侈”，在中国为最强悍之民族，不易同化。夷民计分两种：“黑夷”“白夷”，其人数不多。据精密之估计，黑夷约十万人，白夷约三十万人。黑夷又称黑骨头，为贵族，即纯粹之侈侈。白

夷亦称白骨头，为奴隶阶级，系汉人夷化者。黑夷不与外族通婚，限制恭严，违者处死。侈侈之像貌体格与吾人无大异，鼻略凹，头上有小片发，名为“天菩萨”，视为圣物。虏汉人后先恶打，不许汉衣汉话，而使为之操作耕种。亦有贩卖白夷者，四川捉的卖到西康，云南捉的卖到四川，互异地位使之不易逃跑。彼辈轻视汉人，吾人至雷波时，黑夷认是中央来的官员，有向我告状者，令人哭笑不得：“我的娃子（指白夷）跑了，县长不给放回来！”我说：“你们是不应有娃子的。”他说：“我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白夷过久了，几十年后，可稍得自由，给一小块地耕种过活。作工勤劳，赚了银子可赎身出来，家人有时知道后亦可代赎，然机会究少。夷人不怕冷而怕热怕病，多痢疾、疟疾，无医药观念。有病者即杀鸡，若不愈即杀羊，再不愈杀猪，更不愈则杀牛。若再不愈，全家人弃一切用具什物逃走，意为避凶，否则全家不利。信多神教，如山神、水神、电神等。

夷区概况

现时夷人之最重大问题为烟禁问题。从前此地出产药材、牛羊及牛羊皮，需要的则为盐布，政府厉行行禁政以来，内地禁种，而夷民得此机会，更大事种烟，更有不肖汉人亦为之贩运者。此地几形成一特种区域，一切钞票俱不通用，通行者为银子。从前每两银子换法币一元六角，当余抵该区时，每两银子换法币四十元，离开时已开涨为八十元。十两银子为一锭，一锭银子可买烟三两。从前此区出口为药材牛羊等，进口为盐布，今则为药材、羊牛俱无，内地牛羊猪尚能输入。夷人现时除盐之必需品外，最感兴趣者为枪。此地不论夷人汉人俱人各一枪，走路、挑担皆不离手，故可说夷民十万即有十万支步枪。此地存银之富，实属惊人，每家夷民家中皆将银锭化成整块埋于地内，据可靠估计约十一万万两以上，藏在大梁山区一带。

垦务发达

大梁山以畜牧为主，俗语“打开雷马屏，世上无穷人”。此地为最良好之垦区，此次途见山坡中梯田累累极是。据统计雷马屏峨四县在民初有汉人六十万人以上，现除屏山沐川有人口廿五万人外，雷峨马三县仅七万，现时容纳移民三十万人开垦熟荒，仅及以前之数，开垦后尚更可移民三十万不成问题。余经该地时正遇该区各垦殖公司开垦殖会议，因此很方便地得到了许多关于垦殖方面的材料。此地有垦牧公苗达三十余，大小不等，最大之抗建公司有垦地达二百万亩，其他万亩数千亩不等。抗建垦殖公司不花钱买土地，除必购种子农具者外，以枪之多少者定垦地之大小。抗建公司即以枪为股，民有一枪，可人一股，得地一席，公司供种子、农具、房屋、饮食，故现时垦务相当繁盛。公司中现有步枪一千支，机关枪四十一挺，迫击炮十门，垦民则有一千户。夷民无行政上的组织，仅家族等小组，汉夷较为开化。公司历史不久，多则十年，少不过四五年而已。人力缺乏，如得夷民，汉民移垦，实为一举两得。

铁矿藏量丰富

雷马屏峨之富，尚不在土地之易垦，而在矿产之富饶也。银、铜、铁、铅等矿为最多，随地皆是。此次在雷波附近发现一藏量极丰之大铁矿，品质极佳，化验结果，其含铁量为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其藏量据现时已发现之估计约在 x 万万吨以上，且此矿脉走向云南，惜未能一往考察，否则当更不止此数。其次可提者金沙江之水力，本金沙江坡度大、河流急，蛮夷司至宜宾五百里，木船两小时即达。由此可知水力大，可利发电。沐川县属之黄丹至铜街子距七公里半，两地各一水，其分位差为八十五公尺。若由之签通，则可产生 x x 万匹马力，利用之则可供给半个四川水电之需，现正加工利用发电。战时交通不便，机器不易进口，正在清水溪下游作闸，亦可发电 x x 万匹马力，不久可告成。

战后我国国都问题*

胡焕庸

国都位置，不外两种，一为处于比较中央之地位，一为处于比较偏僻之地位。以通常而论，国都之所在，自以处于比较中央之位置，较为适宜。因其居中策外，应付可以裕如也。惟征之各国情形，其国都位置比较偏僻者，倒亦甚多，如英之伦敦，美之华盛顿，以及帝俄之圣彼得堡，皆其显例也。

我国之国都，历代颇有变动，秦汉以来，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南京等地，均曾先后定为国都，秦起于西北，故建都于咸阳，汉、唐因之，为古代建都最久之地点；元起于东北，故以燕京为国都，明清因之，为近代建都最久之地点。

试就我国今日情势论之，兰州诚为全国版图之中心。然我国西北，比较贫瘠，东南比较富腴，试就人口之分布言，兰州西北之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二，兰州东南之人口，乃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八。即以西安而言，其西北之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五，

* 1943年，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修订《战后复原计划纲要》，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王世杰，邀请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胡焕庸，就中央设计局提出的战后首都选址计划提供意见。此文是胡焕庸的亲笔文稿，原稿存于小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军事委员会机密档案中。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其东南之人口，乃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五。此种人口分布之不匀，其主要原因，是受地理上自然条件之限制，过去如此，未来亦大致如此，一国地域上之中心，不必定为人口财富之中心，此言建都者不可不注意也。

北平地位，比较接近于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之人口，几四千万，约当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十。北平之经济地位，诚稍优于兰州、西安，然就人口财富而论，仍非全国之中。

我国之主要经济区域，除东北四省而外，是在内地十八省，武汉三镇为内地十八省之地域中心，亦为全国人口财富之中心，又以居于长江中游，海轮可以直达，是陆都而兼海都之利；河南旧有中州之称，故洛阳、开封过去均曾定为国都，然自珠江流域开发以来，两湖是居内地之中，武汉陆都之利，趋于南京，海都之利高于汴洛，南下粤京，可以经营南洋，西出滇缅，可以通达印度。武汉地位之优越，国内任何地点所不及也。

英国之国都在伦敦，伦敦之地位，偏于国境之东南，一则以其地位接近欧陆，再则亦以英国人文之经济重心，因（应）团结于英格兰也。

法国之国都在巴黎，及地位比较偏于北部，亦以巴黎盆地为全国财富所集中之故。

美国之国都，最偏于边缘，然就美国之地理论之，西部情形，比较荒凉，一切人文经济之中心，是仍集居于东部，华盛顿虽非全国地域上之中心，然仍不失为全国财富之中心也。

帝俄时代，彼得大帝为便利吸收西方文化起见，建都波罗的海边缘之圣彼得堡，其地位至为偏僻，且与经济富庶之区域，相距太远，因此共产革命以后，仍迁都于旧京莫斯科。莫斯科之地位，约居欧俄之中，然非全部苏联之中也；由此可见一国之国都，不必定在地域之

中心，而必须位于人文经济之中心。

战后我国之国都，武汉是为各地首选，提纲挈领，堪为全国之领导。以绝对地位论，武汉虽非全国之中，以人文财富论，武汉是居全国之中也。我国版图辽阔，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如为积极开发边疆之故，酌量增设陪都，亦事之可行者。兰州定为西京，可作经营西北之根据，沈阳定为东京，可作经营东北之根据；广州定为南京，可作经营南洋之根据；他如南京、北平、西安、重庆，均因接近中枢，战后无须另设陪都，反致分歧也。

中国青年与中国科学*

胡焕庸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五六千年以前，大部分的欧洲，还在榛莽未开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中国已经有宫室、有文字、有文化，这是世界历史家所一致承认的事实。

在整个上古和中古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始终照耀着整个的远东；在那些时候，虽然也有不少其他的国家，产生过相当发达的文化，但是大多数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归于消灭。例如埃及、巴比伦、亚述、印度，甚至希腊、罗马，他们的子孙，不能承继他们祖先的功业，他们的文化，也就多烟消云散；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相传，绵延不断。一方面保存着自己创造的古老文化，一方面还不断的在地域上散布扩张；因此，四五千年前所发明的语言、文字、记录、书契，至今还是继续应用着，做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精神联系，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伟绩，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例子，这真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向全世界人类骄傲的了！

不过话虽如此，在整个世界民族竞争史上，诚有许多其他民族，过去和我们并肩竞赛的，已经中途颠跪，落伍丧亡；只有我们中华民

* 原载于《青年与科学》创刊号，1943 年。

族的文化，历久不变，巍然独存；但是在最近数百年中，历史上却起了小小变动，若干后起的民族，凭着他们在科学上有一些新的发现，接连着在技术上也有新的改革，结果竟是后来居上，掌握着现世界文明的枢纽。而我们中华民族，因为历史过于悠久，进步不免迟缓，结果反不免有相形见细的情况。

西洋的科学，从远的讲，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希腊，但是这希腊的科学种子，自从古希腊灭亡以后，潜伏着一两千年，丝毫没有抬头；直等到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的发荣滋长起来；近代科学始祖伽利略利用望远镜窥测天体，是在一六一六年，正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清太祖称帝建元天命的那一年；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出版于一八五九年，到现在只有八十多年，欧洲的科学成就，所谓声、光、化、电，以及蒸汽机、内燃机乃至无线电、紫外光种种新的发明，多是最近一二百年以内的事情。

欧西各国，因为有了这些科学发明，于是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经济生活，也就日新月异，最后乃形成今日的世界；现代世界的文明，其重心完全在于科学，而这些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几百年以内的事情；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来，掌握着世界文明的牛耳，只是在最近百余年来，因为在科学工作方面，被欧西人抢前一步，结果在经济生活方面，在政治地位方面，多不免相形见细起来。

我们追想着数千年来，我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领导地位，我们再分析着数百年来，欧西科学进步的过程，我们并不自馁，并不害怕，我们只要努力，不难在最短期内赶上他们。

逊清末年，因为在军事上、外交上几次的失利，认清欧西之所长在科学，我国之所短亦在科学，于是罢科举，兴学校，废八股，倡科学；接着民国成立以来，学校益见发达，科学也益见进步，不过短短二五十年，到现在成效已著，根基已立，我们看到中国的地质学、生

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最近在世界科学上已经有着相当的贡献，取到相当的地位，我们如再继续加以努力，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就，更多的贡献：科学是无国界的，只要我们肯加研究，毫无疑问，是可以赶得上欧美各国的；科学发达以后，一切技术自然跟到进步，最后社会经济生活，国际政治地位，自然随之改进。

在最近六年的抗战生活之中，我们因为科学赶不上人家，受到多少苦痛，重要军需之不能自己制造，大量物资之必须仰给火家。分析起来，多是受着科学不发达的影响，胜利的旗帜，虽已在望，但是我们始终不能使他迅速地来临，要想反攻，总感飞机大炮的缺乏，自己不能制造，要靠人家帮忙，总是有限度的；科学不能独立，也就是国防不能独立：自从中美、中英平等条约订立以来，我们百余年来外交上的国耻，已经一扫而空，但是讲到科学上的造诣，学术上的平等，要和英、美各国相比，差得还是太远。

我们现在所要雪的国耻，不仅是条约上外交上的国耻，我们所要求的胜利，尤其是在科学上、学术上的胜利，我们要是科学上的地位、学术上的地位，不能和人家平等，那么条约上、外交上的平等，也是无法长久保持的。

诸位青年朋友们！假如我们不能执干戈，上疆场，用我们的血，来争取祖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和光荣，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汗，在图书馆，在实验室，利用科学工作，来提高祖国的地位，促进祖国的富强！我们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多年的光荣历史，我们必须要维持！要发扬！研究科学，应用科学，是我们青年报国的基本工作，中国科学能有办法，中国青年才有前途！有志的青年朋友们，快快起来努力吧！

在国立中央大学西北建设研究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胡焕庸

我国疆域，三面临陆，一面滨海，在昔海洋交通未臻发达之时，先民活动比较重于陆上，而忽于海上，是以箕子封于朝鲜，越裳重译来朝。远在三代之时，朝鲜、越南即已入我版图，而台湾、琉球之附属中国，乃迟至明清之季。汉代通西域，声威震于西强，以后由唐及元，版图之大，达于西亚中欧，为我国泾上向西发展最远而亦鼎盛之时期；自明以后，海上交通渐兴，在我国有郑和之七下西洋，在欧洲有迪亚士与伽马之东出好望角。自此以后四百年为世界海洋交通全盛时期，最后迄于十九世纪，我国乃不得不倾其全力于东南沿海之经营。其间与英法德日诸国，一再以兵戎相周旋，而我西北内疆于是亦有疆土日蹙之感！自入二十世纪以来，因飞机之发明，世界乃入于另一时期，空权时代之内疆，其重要性远超于海权时代之海洋，因海洋仅供交通上之应用，而大陆则更有经济与政治上之价值也。

---

* 原载于《国立中央大学西北建设研究社成立两周年纪念刊》。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社团“西北建设研究社”成立于 1942 年 12 月，胡焕庸担任指导员。1944 年夏，研究社主要骨干毕业将参加中国远征军等抗战组织，该社出版了成立两周年纪念刊，纪念刊刊登了指导员胡焕庸两年前在研究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为序。此纪念刊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国立 中央大学档案中。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我国西北，面积辽阔人口稀少，自入海权时代以来，久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近年政府虽有开发之议，而学人注意研究其事者尚鲜，中大一部分同学有志研究西北问题，爰组织西北建设研究社两载以来锲而不舍，其间开会若干次，讲演若干次，分类研究撰成报告又若干篇，盖皆好学深思之士而有鸡鸣昧旦之感者也。最近多数社友，已届毕业之期，且因国事日紧，又多投笔从戎者。因此拟出一纪念刊物，继为两年研究之段落，窃思建设西北，乃国家百年大计，研究实行，宜以终身赴之！

今世界二次大战，固仍以海洋为重要之战场，若干年后之世界大战，其必发于亚洲内陆无疑。愿我同志，其早为之备也可。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　宜兴胡焕庸志于重庆沙坪坝之柏树林

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

胡焕庸

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世界与中国亦不可分。

近年来世界变动极大，“天下一家”一语，因交通之进步已成确切不移之事实，各地情形几乎息息相关，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世界与中国亦不可分，欲谈中国问题，必与世界问题联系。八年来艰苦抗战，① 胜利已现曙光，目前吾人所应特别关心者，为战后中国的出路，兹特就历史的观察略予研究：

四百五十年的近世史，可分三个阶段。

近世史的开端，始于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自该时迄今，不过四百五十余年，此四百余年中，吾人可分为若干时期：

一、十六十七世纪：此两世纪中，西班牙葡萄牙称雄一时，中分天下，彼等之富强基础，为航海经商。

二、十八十九世纪，西葡两国逐渐衰落，英法起而代之，尤以英国为甚，英国之所以兴起，应归功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机器

---

* 原载于《民主评论》（重庆）1945年第1卷第2期。

① 为忠实呈现历史文献原貌，对胡焕庸著述中有关抗战时间的表述，本书未作修改。——编者注

工业发达，大量产制出品，因而致之富强。

三、二十世纪：英国已比较衰退，美国以新兴姿态，插足世界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即已蔚为强国，此次大战，美国尤为同盟国之兵工厂，其强盛尤推独步，其原因由于美国不仅工商发达，其农矿资源均处世界领袖地位。

战后世界各国富强竞赛运动场中，中美苏三国实力最强。

从上面三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十六十七世纪中航海经商技术为富强之基础：十八十九世纪为工商并重以致富强之时期，二十世纪欲要富强，不仅需有高度之工商技术，亦且需有丰富之农矿资源；换言之，必需为农矿工商俱有基础之全能经济国家，此为世界经济之明显趋势，此次大战之后，举目四顾，能具此富强条件者除美国外，厥为苏联与中国。易言之在世界国家富强竞赛之运动场中，中美苏为实力最强之三国。

中国科学不发达，生产不充足，与美苏竞争，困难难免较大。

吾人常知十九世纪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笼罩了整个世界的思想，当时认为人口增加为几何级数，物资增加为数学级数；所以战争是为了生存竞争，争取物资而战，此种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已显示其不合事实，且今日之事实，恰与其理论相反，今日世界中之物资，因科学之进步其增加之速度大增，以致物资过剩，第二次大战之所以发生实属物资过剩所致，欧战发生前希特勒一再呼号，为其过剩物资，找市场求出路，是其明证。吾人亦知第一次大战后十年，各国生产均达顶点，世界经济恐慌，罗斯福氏第一次就任总统之政策，即为减少生产，以应付恐慌之蔓延；在此时期中，欧美各国均生产过剩，惟中国则因科学落后，而感生产不足，遂成为生产过剩者之市场，如民国二十年中国大水灾，输入大量粮食，国内粮食并不因此涨价，实由于国外粮食渗入了整个中国市场之故，我们知道这次战争中，美国生产力比以前更要增加若干若干倍，且战事结束，美国生产力又必过剩，而中国以科学不发达，生产不充足

的国家，要在此大时代中竞争，其困难实属更大。

以美苏建国历史观察，十年内建设新中国，实属不难。

吾人从历史观察自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为四十五年，第一次大战至此次大战之间为时不及二十年，设世界经济发展仍无合理解决。其未来之大祸可能于五年至十年以内发生，吾人必须于此五年至十年之中建立富强之国家，始克参与未来之竞争而不被淘汰，在五年至十年之中，建设富强国家，固为吃力，然亦非绝对困难。

吾人深知美国自开国至今为时不久，其为世界舞台之重要主角：始于第一次大战（一九一七）迄今不过二三十年，至于苏联，革命以后，亦经混乱时期，至一九二八年始开始五年计划，第三次五年计划未完之前，即已参加大战，其建设时间亦不过十五年，可知要建设一新兴的近代国家，需时亦不必过久。

中国天赋甚厚，有此基础，迎头赶上，亦极易易。

且我国天赋之厚，不可估计：例苏联之尼伯河水力之发电能生五十万 KW 电力，已自豪于世界，美国最大之水力发电亦不过二百万 KW，而我国三峡水力发电据水利专家萨凡奇氏估计达一千二百万 KW，使美苏两国之最大水力发电厂，均瞠乎其后，即此一端，可见我国天赋之厚，而此项工程之完成需时亦只五年。

苟能努力迈进，战后世界舞台中，中国必占一极重要之位置。

吾人总结上述各点，即可获得结论如下：第一，二十世纪之世界要成富强之大国，必需具有工商农矿之全能经济国家，而且有此种优越条件者，美国之外，厥为苏联与中国。第二，我国生产一向落后，美苏各国工业进步，生产力强，我国须于最短期内与之并驾齐驰驱，亦属不易。第三，美苏建国之时间亦不甚长，有此前例，自可鼓励；而我国天赋极厚，迎头赶上，努力迈进，自可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要之位置。

五十年来的地理学*

胡焕庸

地理之学，我国向极发达，远者如《禹贡》《水经》，近者如省县方志，卷帙之多内容之富，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及也。惟近代科学地理之研究，则我国实在欧美各国之后，其传入我国，发荣而滋长者，实晚近五十年间事耳。

初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南京始创三江师范学校，除设理化科与博物科外，并设历史与地理，是为我国设立高等学校，专门讲授地理之始。光绪三十一年，三江师范改称两江师范，民国四年，又改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国文史地部，民国十年，改称东南大学，设地学系；民国十六年以后改称中央大学，始分设地理学系；以后国内各大学，如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大、东北大学等，均先后成立地理或地学系，科学地理之研究，在国内始逐渐发达；惟中央大学之地理系，以其历史最为悠久，人才设备比较集中，因此对于地理学术上之贡献，亦比较最有成绩。

中央大学之地理系，其历史虽可导源于三江师范之历史与地科，然其学术上之基础，实开始于民国九年；在民国九年以前，两江师范

* 原载于《五十年来的中国》，潘公展主编，胜利出版社，1945 年。

与南京高师时期，虽均设有史地科或史地部，然其贡献重在培植中等学校之地理师资；及民国九年，竺可桢氏被聘至南京高师担任地理学教授，始建立科学地理研究之始基；竺可桢氏为美国哈佛大学地学博士，尤善于气象学之研究；科学地理最重要之基础，为地形与气候，而气候影响于人生，较之地形尤为重要；竺氏训练地理人才，而以气象为之始基，其弟子辈之成就乃特宏。民国十年，东南大学设地学系，竺氏乃为之主任；民国十六年，改称中央大学，其最初之地理系主任，亦仍由竺氏担任；民国十七年，竺氏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地学系，乃由其弟子张其的胡焕庸等担任教授；民国十八年冬，地学系分为地理地质两系，地理系主任，乃由胡焕庸担任；直至民国三十二年，胡氏专任该校地理研究部主任，地理系主任一职，乃由胡氏之弟子李旭旦氏担任。®

自民国九年以来，南高东大中大先后毕业之地理系学生，总数约共二百余。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现均担任各大学地理讲席，此为中大地理系对全国地理界重要贡献之一。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出版《地理杂志》月刊，由张其昀教授担任主编。历年所载关于地学理论之文字，曾别集为《新地学》一厚册，都三十万言，由南京钟山书局发行，介绍新地学之内容与真谛，并介绍德法英美各国地学发展之情形，用供我国地学界之借鉴。

张其陶教授专究本国地理，划分全国为二十三个自然区，是为提

① 1941年秋，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学部，主任由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兼任。1946年12月教育部拟定的《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大学各研究所应与各学系打成一片并依学系名称称为某某研究所，大学各研究所设所主任一人，由有关学系系主任兼任，胡焕庸才卸任此职。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2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辞职，任命蒋中正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3月10日，胡焕庸受聘改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13日，胡焕庸向教育长朱经农提出，请李旭旦兼任地理系主任。——编者注

倡本国自然区域之第一人。张氏所撰各种地学论文，曾别集为《人地学论丛》（钟山出版）行于世；其所编高初中地理教科书，尤风行全国，过去各级学校，均视地理为最枯燥无味之学科，自张氏各种著作出版以后，各界人士始认识地理为活泼泼地，有关国计民生之重要科学，张氏阐扬新地理功绩之伟大，五十年来第一人也。

民国二十三年，胡焕庸氏率领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赴江苏各地考察，归后除编《两淮水利移垦实录》[①]一册，阐述淮域水前与盐垦之实况外，并编《江苏图志》一册，制就江苏全省地形、气候、水利、农业、交通、人口等图三十余幅，因图附说，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分省图志之发凡工作，以后各省如能仿而行之，则本国各省标准地志，即可以告完成。胡氏先后在《地理学报》发表《江宁县之人口密度》《江苏省之农业区域》《中国人口之分布》《中国之农业区域》等论文，均为利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地理之重要著作。

民国三十年，中央大学研究院，首先成立地理学部，由胡焕庸主持其事；三年以来，计发表专刊六种，丛刊六种，图集一种；最近以来，政府对于开发西北，甚为重视，中央大学地理研究部，因此对于西北地理之研究，亦特别注重；尤其对于新疆地理，自经数年之整理与研究工作，科学的新疆地志，大部已告完成，兹列中央大学地理研究部发表之刊物名称如下：

专刊第一号	峨眉山之气候	胡焕庸
专刊第二号	新疆与印度间之交通路线	严德一
专刊第三号	新疆之气候	胡焕庸
专刊第四号	中国各地之高度	朱岗崙

① 《两淮水利移垦实录》实为《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南京钟山书局，1934年12月出版。——编者注

专刊第五号	甘肃之气候	陈正祥
专刊第六号	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	胡焕庸
丛刊第一号	中文新疆书目	丁实存 陈世杰
丛刊第二号	西文新疆书目	胡焕庸 童承康
丛刊第三号	新疆吐鲁番盆地	童承康
丛刊第四号	河西走廊	陈正祥
丛刊第五号	塔里木盆地	陈正祥
丛刊第六号	柴达木盆地	宋家泰
图集第一种	河西新疆五十万分一地图集	

竺可桢氏不仅为中央大学地理系之创始人，并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之创始人；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特设气象研究所，由竺可桢氏担任所长，除统率全国气象机关以外，更注重研究工作，所出刊物，有月刊，有年刊，有集刊，有专报等，而《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两巨编，汇集全国各地数十年来之测候记录，尤为研究中国气候之基本资料，竺氏自撰之《中国气候之要素》（载《地理学报》二卷一、二期），与《中国气候区域》（《气象研究所集刊》第一号）两文，尤立中国气候研究之大纲；自此以后中国地理之科学基础，于以确立，各地气候情形，可用数字表示矣。民国三十年，行政院成立中央气象局，掌理全国测候行政事宜，于是测候事宜，有全国统一之主管机关，现局长为吕炯氏。中央大学地理系，过去因竺可桢氏之领导，一向以地理与气象并重，因此气象学术之研究，与气象人才之培养，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之贡献为多；直至民国三十三年，中央大学成立全国唯一之气象学系即由地理系所分出，现主任为黄厦千氏。

地理学上之地形研究，与地质学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民国二年，农商部始设地质调查所（现称中央地质调查所隶经济部），先由丁文

江氏主持其事，后由翁文灏氏继任所长，三十年来，为中国地质调查与地质研究之中心。翁文灏氏所著之《中国地史浅说》（原载于《博物学杂志》收入《锥指集》）、《中国山脉考》（原载于民国十八年《科学》收入《锥指集》），与《中国地质纲要》（原载于民国十六年《科学》）等，均在中国地文学上，立一开创之局。他如各省各区地质志之出版（如刘季辰等著《江苏地质志》，赵亚曾、黄汲清著《秦岭及四川地质志》，侯德封著《黄河志地质志略》等），以及5种地质图，如百万分一中国地质图（如已出版之《北平济南幅》《太原榆林幅》《南京开封幅》），以及谭锡畴、李春昱著《四川西康地质志附图》等，陆续出版后，全国各地地质情况，始逐渐明了，于是地层构造，地形发育等，方有研究之根据。

又自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由李四光氏担任所长，除在各地调查研究外，李氏所著英文《中国地质》一书，尤为数十年来国内地质研究之结晶，对全国地质作一综合之阐述，为近年地学界重要著作之一。此外各省亦有成立地质调查所者，如两广，如湖南、如江西等，均于各该省之地质调查，地文研究等，有极重要之贡献。

我国测量制图事业，向由军事机关主持，清朝末年，设立陆军测量局，中央设总局，各省设分局；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称陆地测量局，隶于参谋本部；截至抗战时止，五万分一地形图完成者，有江苏、浙江、山西等省，十万分一地形的测图约当全国面积十分之五；地质调查所在国内各地学机关，收集中外地图最富，丁文江、翁文潮、曾世英三氏，乃利用该项地图，编为全国二百万分一地形图，由申报馆出版，名曰《中华民国新地图》（二十三年出版），其缩本曰《中国分省新图》，用三百万分之一缩尺，均用分层设色法，分别地形之高下；自此以后，我国方有一般应用之地形图册，亦自此以后，一般社会方

渐渐了解地理学上地形之意义。地质调查所由曾世英氏主编，更出版地图汇刊，其第一号为曾氏所编《中国实测经纬度成果汇编》（三十二年出版），将历年以来，各地所测经纬度数字，约三千余处，列表刊行，诚我国制图事业之基本数字也！

地形与气候，为地理学上两大基石，国内现均有主管机关，专司调查测候以及研究事宜，政府特设之地理调查与研究机关，则至今尚付阙如；有之，惟中英庚款董事会所设之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氏，提倡地理研究，最为热心，当其主持中山大学之时，即设立地理学系；又曾利用中英庚款，派遣地理学生，赴英游学；二十九年，更设立中国地理研究所，由黄国璋氏担任所长；黄氏曾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八年，又曾任北平师大地理系主任，自掌地理研究所，广揽人才，分科研究，所中计分大地测量、海洋学，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四组，所中工作，特别注重实地考察，除出版《地理》及《测量》等定期刊物外，已出版之专刊，有《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之《地形篇》及《气候篇》两种，此外尚有地理集刊，海洋集刊，与测量集刊等多种。

国立浙江大学，自民国二十四年起①，由竺可桢氏担任校长，创设史地学系，聘张其昀氏为主任；十年以来，擘划经营，先后成立史地教育研究室，与史地研究部，除出版定期刊物《史地杂志》外，并出版丛书、丛刊以及地图等，业已成为国内地理研究重要中心之一。

国立中山大学，于民国十八年成立地理学系，早年曾请德人克勒脱纳等主持系务，并在滇西一带考察，有报告发表；前主任孙宕越氏，著有《军事地理学》，为国内军事地理方面仅有之著作；现主任吴尚时氏，于自然地理研究最深，曾取世界地学名著法国马东男教授

① 据《竺可桢全集》第6卷记载，竺可桢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36年4月。——编者注

所著《自然地理学》加以翻译，现正陆续出版中；中山大学地理系自二十六年起，出版《地理集刊》，抗战期间，仍在继续出版；最近与广东省政府合作，编纂十万分一《广东省政治经济图》及二十万分一《广东分县图册》与说明，此外尚有专刊、集刊、丛刊等出版，为南方最重要之地理研究中心。

国立清华大学地学系，向分地质地理气象三组，为北方研究地理之重镇；往年翁文灏氏，亦曾一度担任该系讲席，张印堂虞思齐等担任该系教授多年，造就人才不少；抗战以来，迁于昆明，暂称西南联大，张印堂氏曾赴滇缅铁路沿线考察，著有《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于滇西经济地理，阐发至详。清华大学地学会最近出版《地学集刊》，系季刊性质，另出专刊多种，重要者有冯绳武氏著《战后我国首都之商榷》，及张印堂氏著《战后中国国都位置之商榷》等。

国立东北大学，于最近亦成立地理系，现由杨曾威氏主持；该校性质特殊，特设东北研究室，以研究东北问题为中心工作，近编有《东北要览》，收集东北材料，用供东北收复后从事建设之参考。

中国地学会创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张相文氏所发起，为我国成立最早之地学会；出版《地学》杂志，截至抗战开始，已出至二十四卷一百八十一期，宣扬地学，厥功甚伟。[①]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由翁文激竺可桢张其啊等所发起，出版《地理学报》，专载创作性之地理论文，并附西文摘要，藉此与欧美地理学界互通声气；抗战以来，由季刊改为年刊，篇幅未减，迄未中断。

亚新地学社始创于武昌，现迁湖南新化，出版地图，销行至广；近与清华大学地学会合作，出版《地学集刊》，为一富有历史之地学

① 中国地学会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其刊物《地学》创刊于宣统二年（1910年）。——编者注

出版机关。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抗战前出版《地理教育》月刊，以科学地理作通俗性之宣传，对于中小学地理教育，裨益甚多，惜抗战以来，未能继续出版，该会现亦注意出版地图，为近年重要地学团体之一。

英法德三国之大学，无一校不设地理系者，德国对于地理研究，尤为注意，全德专门之地理学家有不下二百数十人；美国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大学设有地理或地学系者，亦寥寥可数，今则所有大学，多已设立地理系或地理讲座，不仅地理系学生，专习地理，即大学其他各系学生，亦多学习地理；反观我国，大学设有地理系者，尚不过三五校，其设有史地系者，尚不过十数校；五十年来，赖少数人之提倡，地理学之逐渐被人重视，进步已不可谓不快，惟距每一大学，均设地理系之时期，则为期尚极遥远。

地理之学，可称之为利用厚生之科学，亦可称之为国计民生之科学，举凡自然资源之开发，民生日用之增近，建国大计之确定，国际关系之改善，在在皆赖于地理学之研究；苏联三次五年计划之推行，均以地理学家为其先锋，先对全国各地作一详尽之考察，其次乃作开发建设之设计；美国自经参战以来，动员全国地理学家，所有北非登陆、法国登陆，以及太平洋上各地之作战，大之如地理形势，小之如天候潮汐，一切均赖地理学家为之策划设计，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也。我国自抗战以来，政府尚少利用地理学家之处，而地理学家对于抗战之贡献亦属十分藐小；未来国际和会上之折冲周旋，以及复员建国时期之一切设计，在在需用地理之知识，愿我地学界之同仁，及早准备，以便为国效劳也。

缩小省区问题

——-访问胡焕庸教授 *

“我国行宪后之第一件大事，应为缩小省区。”此为行政院张群院长于十九日接见本报记者时所作之郑重表示。现张氏此项意见已引起各方面之兴趣与讨论，我认为张氏之谈话将具有决定性之影响，故均异常重视。本报记者现计划分别访问在京之二三地理之专家，探询意见，以为本问题之参考。此为访问之第一篇，其余将陆续在本报发表。——《中央日报》编者按

提起缩小省区这一问题，我们很快的就会想起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的胡焕庸教授；因为最早公开发表此一问题研究结果的，就是他。他之所以很早以全力来研究这个问题，除了本行的原因之外，胡先生曾对记者这样说：我之所以开始有计划的研究这个问题，还是二十九年的事；那时张岳军先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长，蒋廷献先生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当时他们二位对此问题，甚为重视，于是计划在该会

* 原载于《中央日报》1947 年 11 月 18 日，由《中央日报》记者朱恒龄采写，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之下设立一省制问题设计委员会，由蒋先生代表张先生来看我，希望我前去主持此一问题之设计研究；当时，我因为这最有关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我们研究地理的人又多半同意缩小省区的这一主张，所以即答应了这件工作。前后花费了有两年的时光，参加设计的人共有二十多位，拟成了“缩小省区方案”，最后送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由他们再研究、修正。现在，听说中央设计局已拟具了两个调整省区计划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乙案我尚未看过，但甲案则多半为我们原草案的内容。所谓乙案想系中央设计局所重新加予研究的结果。

中央设计局所拟的甲案，一共为四十二省，一地方（即西藏），十一特别市及旅顺、威海卫、澎湖群岛等海军要塞区。这与我们所研究的结果，实在出人甚大。我在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即曾向蒋廷黻先生申述个人的主张三点：一、缩小省区应在一百以内，最好在六十与八十之间；二、维持中央与省及县之三级制；三、各该省区之命名，一律重予拟订。当时蒋先生完全同意，所以才开始研究；之后，即以个人的名义将所研究的结果发表，希望得到更多的意见，藉可由政府参酌修改。

张岳军先生此次的谈话，在意义上不仅极为重要，在时间上也确有价值。因为缩小省区的问题，可谓由其倡导与发物，所以个人对他的谈话，甚感兴趣，但实施的步骤与需实施的方案，却需研究。现在愿意讲出个人的意见：

一、缩小省区为什么要在六十与八十之间？这不是先有数字观念的成见。而是因为我国的现有省区，大多数均能与自然区域相合，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省，是跨着几个大自然区。比方：四川是一个天然的完整盆地，湖北、湖南、江西与山西等省，也各成一个较大的自然单位，只有江苏、安徽及陕西等省，是跨着几个不同的自然区域。因此，我们缩小省区的主张，就是根据了这种事实，加入所拟新省的经济，

交通与文化等实际情形，而予以通盘的调整。并且，在设计上，我们力求其慎重与严密，例如新省省会与各县的距离以及交通上所需的时间，都有详细的计算。根据这种计算定出了六十到八十之间的数字。

其次，即为中央与省及县的三级制问题，假如我们所拟的调整省区稍多，则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感觉更迫切需要，但这种关系，必须简捷，中央、省、县三级即可，绝对要避免总督与巡阅使或行政督察区之类的中间机构产生。我国历代以来，在这一方面略B有错误的现象发生，尤以清朝为最。清朝的内政，由中央直至县几乎有六级之多，即中央、总督、省、道、府与县。如此，不仅指挥不灵，而且周折太多，所以我们主张，省区不宜过多，维持三级制的基本精神，以便中央可以直接指挥省，而省亦可以直接指挥县。总计当时研究的结果，全国合计共为六十四省与两地方，如将来边省开发或者还可以分建新省，但预计最多不超过八十省之数。

至于新省区的命名问题，在原方案中，主张将旧省名一概不用，而重新按照自然环境及历史渊源予以拟订。例如江苏省中之淮扬省，系以淮扬二府为主，这一省区内的经济建设，当以导淮为第一急务，因此以淮名省，当然至有意义。这一点，个人已在三十二年印的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专刊第六号上写有《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一文中，详为论及。

胜利之后，东北仓促接收，九省的命名，颇多与此相背。现内政部虽已重予修正，但仍多与我们的理想相去很远。如松江省就与江苏省的松江县雷同，兴安省而且是伪名。又如松江省会的哈尔滨市，嫩江省会的齐齐哈尔等，都是清代的省名。

现在，张岳军先生即郑重表示：我国行宪后的第一件大事，应为缩小省区。站在个人立场，甚望将来主持此项方案研究的负责机关，能够广泛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慎重将这有关国家百年大计的工作，详

细予以讨论。至于反对论者的意见，虽认为将来交通发展，可以不必缩小；但我们以为我国的地域，的确过大，一如整个之欧洲，不缩小实在不容易治理。再有一种反对论者的意见，是怕割据局面的再现；但我的看法：割据与不割据，完全是看国家安定与不安定及政治上不上轨道的问题，假如国家局面安定而政治也确实上了轨道，省长全由文人主持，国家政令朝发夕至，绝对没有问题。清朝之改土归流，除土司为世袭的，其余流官全用以一纸命令而更换。将来县长民选，一切大权均在人民，县长任期也有一定，则操纵割据，势非可能。故此反对之论，也不足为虑。

附胡氏所拟缩小省区之名称于后：

一、江海省，二、淮扬省，三、徐海省，四、皖江省，五、颍淮省，六、鄱湖省，七、赣南省，八、武汉省，九、荆南省，十、襄江省，十一、湘中省，十二、衡南省，十三、沅澧省，十四、川东省，十五、嘉陵省，十六、蜀西省，十七、泸江省，十八、黔中省，十九、富良省，二十、普洱省，二十一、大理省，二十二、黔中省，二十三、贵西省，二十四、丹江省，二十五、桂林省，二十六、邕海省，二十七、潮海省，二十八、粤海省，二十九、琼海省，.三十、闽海省，三十一、漳海省，三十二、浙海省，三十三、瓯海省，三十四、胶海省，三十五、济南省，三十六、汴南省，三十七、伊洛省，三十八、黄定省，三十九、津海省，四十、保定省，四十一、恒岳省，四十二、晋中省，四十三、河东省，四十四、榆林省，四十五、关中省，四十六、汉中省，四十七、兰山省，四十八、安西省，四十九、龙江省，五十、呼伦省，五十一、黑河省，五十二、同江省，五十三、滨江省，五十四、洪安省，五十五、白山省，五十六、延吉省，五十七、辽河省，五十八、热河省，五十九、察合省，六十、绥远省、六十一、宁夏省，六十二、青海省，六十三、西康省，六十四、新疆省，六十五、蒙古（应划去），六十六、西藏。

胡焕庸著述摘编

历史上之有纪元，犹之地图上有经纬线，后者用以确定各地在全球上之位置及其相互间之关系，而前者则所以表明史事在历史上发生之时间及史事与史事相互间之迟早先后，空间时间虽不同，其为量度之工具则一也。我国昔时大都以君主纪元，易一君主则易一纪元。汉武以后，用年号，而一君主复每有数种年号者。是以后之人殆非熟记百千君主之谥法年号并其在位年号年数，不能知某事与某事之先后若何，相距时间若何，并其距今之时又若何。犹之一国之地图不用经纬线以表出其方位距离，而一一列举相邻两地之方位距离，其复杂纷乱可知矣。

……

我国昔时君主每汲汲以改元正朔为要举，然卒之徒耗后人之脑力，增无谓之记忆，与君主之尊严荣誉何有哉？阿拉伯数字，西人用之，我国人亦用之，取其便利，不以其非本国之产物而弃之也。今我国如采用西历纪元，则一方既可以之代替昔日纪元之纷繁，一方复可省去中西纪元对照之手续，即不为世界统一计，独不为应用便利计乎？又何必效拘儒之见，断断严人我之分而拒之耶？叩之读者以为何如？

《纪元问题》，载《史地学报》1922 年第 1 卷第 2 期

所谓人文地理学者，即在研究自然地理为因，其所及于人生之影响若何。以如此研究人地之关系，庶可使地理之内容，不显枯燥，地理之效用，亦始显著。其教学地理之法，在昔多重叙述与记忆，今则多重解释与理会。地理教材，在昔多为孤独片段不相连续之事实，今则讲因果，重实用。务使读者读之能了解人生实际形状，增加观察实物之能力，此地理教学之新趋势也。

……

研究地理如专重自然状况则地理将成一抽象科学，与人生将无关系。如专以人生为重，而不及于自然环境，则地理将变成历史或时事史矣。所谓人生地理者，则折中乎自然环境与人生情形之间而研究二者相互间之因果关系。

在欧美虽最浅最初步之教科书，亦每由大学教授或专门名家所编。反观吾国各书坊所出之教科书，每为毫无研究之人所编辑，而地理一科尤甚，宜乎我国学校之程度，每不及欧美之学校也。

《新书介绍》，载于《史地学报》1923 年第 2 卷第 3 期

顾名思义，地理学之名称，原示研究“地”理之学问。地为无机体，则此研究“地”理之学问，当然属于自然科学之范畴，而不属于人文科学之范畴。

《至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1931 年 1 月

地理学之内容，包有自然与人文两面，故其范围异常广大，每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彼此之间，界限极难分辨。如地文学乃自然地理中之一部，研究地球陆面之形式及其演化，与地质学研究之对象，颇相类似，两者内容材料，从来遂少区别。

《山岳与河流》，载于《地理杂志》1931 年第 4 卷第 3 期

学校乃教师学生研习之所，以学术相切磋，以气节相砥砺，以健康相勖勉。其教育目的，不仅为培植建设之才，以应承平之世也；一旦国家有变，挺身赴难，以戡乱除暴，为天下倡，抑亦土人所应有之素养。今之时局，其严重已不待言，我苏中师生经此严重时局之试验，其表现如何？其成效如何？能不负于国家培植青年之意否？能实现我平素教育之效率否？

……

抑谚有之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收获，非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易待也。士气之培养，岂必能影响于当时？卢梭伏尔泰倡民权民约，而法国革命以起，然酝酿之期，几三十年；洪秀全杨秀清倡种族革命，而清社以墟，然成功之日，则在太平天国覆亡后五十年。世界著作家思想家之成功，每不能及身亲见，教育之果，亦犹是耳。故学校之训练学生，不宜局促于一时，应作准备于将来；眼光远大，计划周详，则教育之效力，终有显著之一日。

《反日救国特别弁言》，载于《苏中校刊》1931 年第 57、58 两期合刊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正义！更没有什么公道！强权便是正义！利害便是公理！弱国无外交，不由人不寒而栗！所以我们要恢复东北，发展东北，解决东北一切问题，只有自己国民觉悟！……奋斗！……，这次日人占领东北将来如何结局！现在还难以预料，不过总非靠自己努力不可。努力一分，才能有一分的成功。

同学们，靠人不如靠自己，大家各守本分，各尽能事的去努力吧！

《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载于《苏中校刊》1932 年第 59 期

我们中国以前所办的教育，不是全部的整个的教育。那么现在我们要纠正这种的教育，应当用什么方法呢？很简单的说一句，就是要

提倡全人的教育，整个的人的教育。怎样叫作全人的教育呢？就是知德体三育并重，不可缺一。

《校长对乡村师范部同学的训词》，载于《苏中校刊》1932年第59期

教导学生，不外团体的训练与个人的陶冶。团体的训练重在纪律与组织，个人的陶冶重在能力与品格，二者不可偏废。本校实施教训合一办法，将个人陶冶之工作，就学生之兴趣与能力，分组各种研究会，以与教师常相接触，俾受潜移默化之功。

《苏州中学训练之合一谈》，载于《江苏教育》1932年第1卷第10期

由此观之，日本领事当时所询问者，正此所谓"危险地带"之群岛与沙礁，法人今日之占取九岛，殆即由此而发者欤？自九岛事发，日人妄称九岛实其所有，甚谓西约克岛平岛乃至西沙群岛均其所有，狂犬乱吠丑态毕露，可笑亦诚可恨！

此等"危险地带"之群岛，虽为我国人所居住往来与经营，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鄙意拟用"南沙群岛"之名以名此群岛，不然，统称曰"南海诸岛"，其名殊混也。至于法占九岛以外之各岛，将来能否仍保为我国所有，抑或终将为法人或日人所夺占，则非吾所敢言矣！

《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载于《外交评论》1934年第3卷第4期

我国今日处于列强威胁之下，事齐事楚，原非积极图强之道，然而世界形势，日趋严重，弱肉强食，天演公理，当此存亡危机千钧一发之秋我国应如何自谋准备实力，以挽危亡，端在政府与人民之协力合作，一致奋斗。作者平日研读地理，因就地理立场，一究我国之外交关系，肤浅之见，原不足顾；然政府苟欲从此决定永久的外交政策，则必先行认识对外关系之重轻，视其因果得失，然后深思熟虑而

决取舍，始能收效于万一也。

《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
载于《外交评论》1934 年第 3 卷第 7 期

吾人研究地理，旁及水利，凡所陈述，或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详细规划，仍有待于工程专家；然而地形高下，水脉流通，虽老农老圃，莫不知其利害；所不同者，或则只见近利，而图苟空 或则能有远虑，而谋永定。成败利害，剖别于此。淮河治导，直接关系淮域居民之安全，间接影响整个国家之福利，深望全国上下，能勿淡然置之，草率从事，因贻来日无穷之忧，则幸甚矣！

《各种导淮计划评议》，载于《两淮水利盐垦实录》1934 年

吾愿国内讨论人口问题者，第一，须注意各地之自然环境，勿以为同一面积，皆可容纳同一之人口。第二，须知我国人口密度，不论稠密之区，已高于世界任何稠密之区。即人口稀少之域，有时亦已深感人口过剩之苦。第三，我国为解决人口压迫计，对于各地之开发经营，固不容忽视，然如谓人定可以胜天，开发经营以后，即可推翻一切天然限制，而使高原沙漠之地，与平原沃壤同其稠密，此固绝对不可能之事也。

《我国人口疏密问题》，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35 年第 1 卷第 4 期

我国之面积虽大，然因高地之多，干地之广，其不便或不能开发者，实居多数，其他地形低下，雨量充足，物产丰盛，人口稠密之区，殆不足全国面积之三分之一而已，此我国地大之真相也。

我国面积虽大，然其中平原肥沃之地则不大，我国人口既多，而较之地力所能给养之人则尤多，因此境内物产虽博，然为供给此等过

剩人口之消用，则犹感不敷，大多数之人民，贫穷疾苦，终岁勤劳，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偶值年岁荒歉，则死亡遍野，人且相食，世界伤心惨目之事，无有逾于此者！

吾国之地诚大，然可用之地实不大，吾国之物产虽博，然为供给过剩人口之消用，则殊感不敷，吾国之人固多，较之地力所能给养之人尤多，此我国地大物博人稠之真相也。

《我国地大物博人稠之真相》，载于《地理教育》1936 年创刊号

我极诚恳的劝告中学学生，地理知识，是最重要的一种常识，要做一个健全的国民，普通的中外地理，是绝不可以不知道的。一般中学学生，总觉得地理学科，是最枯燥无味的，只是记地名，顶使人头痛。诚然，读地理，不能不记得一些地名，不过地理的内容，除了那地名以外，尽有那十分有趣的材料。一个人游山玩水，流连风景，惟恐不知各地方的地名，东访西问，探求其所以。我们读《三国志》，看到火烧赤壁，但见曹兵之盛，孔明之谋，以及北军最后惨败的情形。凡是读过《三国志》的，多晓得赤壁之事，何尝觉得赤壁两字，有什么难记呢？由此可知，凡是读地理，应当知道各种地名的意义，各处地方的实况，就觉兴趣盎然，毫无所苦；不然，但记地名，死记地名，本不是学习地理的正当方法，难怪他们要觉得苦痛呢！

《对中学生讲学习地理》，载于《地理教育》1936 年第 1 卷第 7 期

一、地理是科学之一　旧地理只有叙述，新地理注重解释。旧地理多零星材料之记录，新地理重因果关系之阐明。旧地理之方法，好铺张扬厉，新地理之方法，重正确切实；一切学问，凡有正确之度量，并有原理原则，可以推求者，方得成为真正之科学；现代地理，盖已脱离梦笔生花之文学境域，进而人于确切实用之科学世界。

二、地理是理科之一　称地理是科学之一，一般人尚易了解。指地理是理科之一，多数人即不易领略；中学以下，通常多称数理化属理科，文史地属文科，大学地理系，归属理学院，因此常为一般人所怀疑；实则地理学以地为研究对象，地既为无机性之自然物质，则地理学应为自然科学之一，当无疑义；即使地理学之人文地理（或称人生地理）一门，研究对象兼及人类，然人文地理者，所以研究自然环境对于人生活动之影响，不通自然地理者，绝不能妄谈人文地理，过去治地理者，往往多专谈人文而忘却地理，此绝非真正之地理学家也。

上述两点，为现代地理之重要改革，治地理者若不明乎此，是犹缘木求鱼，不能窥见地理之真髓，教地理者如不明乎此，有若盲者指道，有引人入迷之憾矣。

《中学地理教师应有之认识与准备》，
载于《地理教育》1936 年第 1 卷第 8 期

武汉处全国之中，南北有平汉粤汉两铁路，东西有长江汉水之航运。两湖平原，为全国最富庶之区域，各省食粮，惟此间丰富有余，俗所谓“两湖熟、天下足”是也。武汉为我国内陆第一大都会，亦内陆仅有之大商港，工业之繁盛，与沪津鼎足而三。就地位适中、交通便利而论，早应为全国之首都，过去所以重视北平与南京者无他，受历史之影响较深，而忽略地理上的价值也。

《保卫大武汉之军事形势》，载于《国是公论》1938 年第 4 期

地理之学，一方在研究吾人生活之自然环境，如地形气候物产等，一方探求吾人生活对于自然环境之适应方法，如产业之开发；水利之兴举；交通之设施；以及对于与民族国家攸关之经济地理政治地理诸

般问题，均属地理学家所研究之范围，故地理之学，一方面属于自然科学，他方面亦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为专门研究之学问，他方面亦为构成公民训练之基本知识，有不容废弃，不容轻视者。

……

近自抗战以来，一般人迫于需要，深感地理知识之重要，对于地理之求知欲，因此亦顿见浓厚，吾固不欲妄言地理将成为战时教育之重要中心，致有蔑视其他课程之嫌，即此依照规定之常轨地理课程，将如何使之充分利用，以应今后之迫切需用，此则教育行政当局，以及担任地理教师所有之责任也。

《新时代地理教育之改革》，载于《新政治》1939 年第 1 卷第 4 期

环顾现在的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土地人口资源可以同美苏两国相比拟的，这无疑的就是中国，而且全世界也只有中国。可惜中国的工业化简直还没有开始，所以现在的经济力量，非常贫乏，处处不免受着人家的欺凌。但是我们潜伏着的力量，确是非常伟大，我们只要努力建设，那么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力量至少可同美苏相比。到那时候，经济基础脆弱的国家，早多已崩溃了，还有哪个国家够得上做农矿工商经济全能的国家，够得上和美苏中三国相比拟呢。这是我们根据欧洲大局，尤其欧洲过去的历史，来推测的未来世界，以及在这未来世界里我们中国所处的地位，不过自从现在到这未来世界，自然还需若干年月，也就还要多少努力，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载于《中国青年》1939 年创刊号

世界经济近代已经经过了三个鲜明的阶段，十六十七世纪是商业独霸的时期，经商得法的国家，操着世界的霸权；十八十九世纪是工业独霸的时期，工业发达的国家，操着世界的霸权；二十世纪

以来，是全能经济的时期，必须富原料能制造，且有剩余物资可以外销的国家，方能操握经济的霸权。根据这个原则，世界上地大物博人稠够得上成为全能经济的国家，只有美国、苏联和中国，美国的经济，已经是十分发展的了，苏联的经济，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途径，只有中国的经济，资源虽富，还少开发，农产虽丰，工业未兴。依照着美国已走的路，苏联正走的路，那么，我国的未来，资源必须开发，工业必须振兴。这种经济发展的过程，美国走得最前，苏联已经在走，中国开始走，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仿佛的时候，那么其力足以左右世界大局的，就只有美、苏、中三个国家，其余的少的小国难免多要在淘汰之列。上述三国之中，以中国人力独富，假使物资与开发程度，三国完全相等，那么中国的地位，还得列于美苏两国之前呢！

《中国与苏联》，载于《青年中国季刊》1939 年创刊号

世界上的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别，世界上的地，也不能不有肥瘠贫富的不同。愚拙的人，有时对于肥沃的地，也是无法利用；贫瘠的地，遇到有办法的人，也尽可以开发经营，这个叫作地利的不等，同时也是人力的不同，所谓天定可以胜人，人定也可以胜天，就是这个道理。

《研究边疆与认识边疆》，
载于《中央日报》（重庆）1940 年 3 月 16 日

纵观今日世界的形势虽然险恶，只要反侵略各国密切合作，迟早必可克敌制胜。我国今日抗战建国工作虽然艰苦，只要能认清环境上下一心，效法总理百折不挠的精神，始终努力，则新中国的建设，前途必然是无限光明的。

《胡主任讲世界现势》，载于《中大周刊》1941 年第 18 期

改革省区，固是国家百年大计，惟吾人目前计划，仍当根据现实，不可预计太远，反致不切实际；吾人固须预留地步，以为最近将来发展之准备，惟亦决不可以太重未来，抹杀现实，将来环境变化，尽可随时修正。

《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
载于《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专刊》1943 年第 6 号

所谓地理研究，是一个地方的各种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综合研究，也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基本研究。例如气候是一切农业生产的基础，交通是一切工商事业的基础，假使不明了地方的实际情形，一切经济设计，都是无从谈起。因此地理研究，更是各种建设研究的基础；川康两省，面积辽阔，各地地方情形，我们很多不甚了了。

《川康建设与地理研究》，
载于《川康建设·创刊特大号》1943 年第 1 卷第 1 期

什么叫作地理，还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常把数理化属于理科，文史地属于文科，因此，有人不假思索的便把地理认为是文科科目。但实际说来，地理不属于文科，而是属于理科。所谓地理，乃地之理并非人之理，因此地理是自然科，已毋庸解释。但我们不能否认地理亦讲人的问题。地理可分为五界——水、陆、气、生物、人类——人是五界中之一，可说是自然界的一部。有时人们虽然把自己看得很高，使与自然界对立，但从地理立场讲来，不能因为要讲到人，就说它不是自然科学。

为什么要学地理？学地理有两种作用：一是教育作用，一是科学作用。中小学都有地理课程，公民训练必须具备地理智识，这是教育作用。大学有专门地理训练，这是科学作用。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所

以，地理一方面是普通人所必知的常识，另一方面又是专门学问。

《了解地理与应考地理》，载于《青年杂志》1943 年第 1 卷第 2 期

胜利之机运，必须争取，坐待胜利，类于缘木求鱼。颓废自私之徒，眩于实利，只求目前生活之安适，忘却其对国家之责任，此民族之蠹也。大学生为国家之高等智识分子，社会之中间柱石，国人对于大学生如此期望，大学生亦如此自负，移风易俗责无旁贷可应养成攘利不先，赴义恐后之精神，为国人模范，捍卫国家，为青年应尽之责任。以前数年，凡有自动投笔从戎，舆论为之尽力宣扬，实寓提倡训勉之意。今当盟国胜利曙光初现之日，征调大学四年级学生服役，表示大学生对抗战伟业，决不后人，于前方士气，后方人心，必为一极大鼓励，群策群力，争取胜利，国族前途，实利赖之。

《欢送四年级同学征调服役》，载于《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 年

台湾琉球之必须收复，不仅因其过去原为我国之领土，不仅因有六百万之华夏同胞，急待解放，而尤重要者，在其对于我国之军事形势。我国位于太平洋之西岸，台湾琉球，一日不能收复，则我海上活动，一日不能越出黄海东海范围之外；台湾琉球，有如我国海上之外篱，南向而下南洋，必须经过台湾海峡，东向而出太平洋，必须经过琉球群岛；未有外户操之于人，而能立国于地球上者！二十世纪，乃为大洋交通之时代，未来新中国之发展，万勿再踏过去重视大陆轻视海洋之覆辙，而应以海陆并重为我最高之国策，愿我国人，速起图之！

《台湾与琉球》，1945 年

我们在中国提倡科学，至少有两件事同时要做，一种是介绍工作，一种是研究工作，尤其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里，在初期提倡科学的时

候，介绍工作实更比研究工作来得重要，假使不先有充分的介绍工作，研究工作也是无法开展。

……

我们现在来谈提倡科学，应当以七分精力来做介绍工作，三分精力来做研究工作，等到我们科学水准，与英美各国相等的时候，我们方才可以拿七分精力来做研究工作，三分精力来做介绍工作。

《科学介绍工作的重要》，载于《青年与科学》1945 年第 2 卷第 2 期

主流是：科学进步，生产增加，人生衣食无虑

逆流是：思想落伍，争夺不已，世界祸乱相循

人生在世，到底是快乐的，还是苦恼的，到底是追寻快乐的，还是追寻苦恼的，这原是哲学上的基本问题，甚而至于是宗教上的玄妙问题，不是可以容易解答的。但是，不论人性是善是恶，人的行为是正是邪，凡是动物，多在求生，人亦动物之一，自然不能例外，求生应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小而至于衣食男女，大而至于国家社会，直接间接，多是辅助人类，实现生的目的。这是生物学上的原理，谁都不能加以否认。

……

以时代潮流而论，科学技术之发达，生产物资之增加，乃至丰衣足食之可能，实为时代之主流，而无法加以停阻者。反之，落伍之思想，狭隘之观念，乃至争夺不已，祸乱相循之现象，仅系时代之逆流，只有短时间之存在，而终久必将消逝者；惟其存在时间之久暂，仍视人类觉悟之迟早以为定夺耳。

我先圣有言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有见于科学技术之进步，生产物资之增加，必有

一日，可以足供人类生活而有余，不必再以不足之故而继续争夺；今日之世界，距大同时期，已非过远，至少有日趋接近之势；征之科学技术之进步，与生产物资之增加，吾人可以确信而不疑！人类之劫难，固犹有时日，大同时期之到达，固犹有待于吾人之努力，惟吾人如能认清时代潮流，固不必以短期内之黑暗，而漠视前途之光明，尤不必以一时一地之逆流，而漠视滂湃永久之主流；吾人如期望大同世界之早临，当以全人类之努力迎接之！

《变乱期中认清世界潮流》，载于《社会公论》1947 年第 1 卷第 2 期

吾人绝非好战之徒，实系酷爱和平之人，吾人不愿谗言战争，有时讨论战争，目的在于避免战争。不愿因为谗言战争，结果必然引起战争。吾人爱中国，甚于爱外国，不惜批评政府，希望改革政府，决不愿意自坠民德，自损国格，甚而至于丧权辱国，最后弄到灭种亡国。

《评魏德迈离华声明兼论美国对华政策》，
载于《社会公论》1947 年第 1 卷第 6 期

琉球原为我国领土，自明以来，世受册封，一八七五年，日本借口琉人被台湾番族杀害，进占琉球，实属毫无理由；琉球不仅在历史上为我领土，而且在地理上亦与我不能分割，我国如不欲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一如我国之外篱，乃出入必经之道；美国既无理由必须加以占领，日本更无理由仍欲保有其地；小笠原群岛距我较远，我可不必坚持，美既托治日代管诸岛，则亦无理由拒绝我国收复琉球群岛；再退一步言，如琉球果仍还日本，则若干年后，台湾必有再度被侵之虞。

《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载于《问世》1947 年第 3 期

过去之地理学，一般都视为文科科目，大学中之地理多与历史合

设一系，自地理在大学中独立成系，却改设于理学院后，于是新地理学，亦即科学的地理学，方有确立之基础，而步人正确之轨道。顾名思义，地理学之名称，原是研究“地”理之学问，地为无机体，则此研究“地”理之学问，当然属于自然科学之范畴，而不属于人文科学之范畴，此事之至显然者。

自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以来，其最重要之工作与贡献，即为编行《地理学报》，指示新地理学研究之途径，发表新地理学研究之成果，从而奠定新地理学科学的基础。中国今日新地理学之研究，虽距理想之境地尚远，然而粗枝大叶，实已略具规模，此种成功，虽由于全国地理学家，以及各有关机关共同努力之结果，而中国地理学会联系各方，尤其所出“地理学报”明示南针，厥功实至伟大。

《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
载于《科学大众》1948 年第 4 卷第 6 期

关于类似的土地改革，过去东欧国家，早经实行，最近以来，还在继续推行，个人以为今日时机已迫，推行要求彻底，例如农地必须农有，非自耕者，绝对不准握有土地；至于原有地主，如何赔偿，务必力求其轻，力求其简，力求其快，力求其彻底，假使能够不用赔偿，最为妥善。

《新政府最急迫的新设施　立刻实行耕者有其田》，
载于《社会公论》1948 年第 3 卷第 6 期

振奋人心，与民更始，应有具体表现；耕地农有，公教人员应得合理待遇，组织民众和扶持生产该是最基本的大事！

宇宙永远在动，也就永远在变，光阴是不停留的，这正说明历史也是永远不断的在演变。

……

总之，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国，诚处于极端动荡不安之境，左有大海，右有高山，前有荆棘，后有虎狼，如何突出重围，重达康庄，凡属同道遭难之人，均应齐心协力，共同设法；否则，三心两意，神分力散，绝无超脱幸免之理。

《中国的出路》，载于《社会公论》1948 年第 4 卷第 1、2 期

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一定要一起抓。既要把人口数量降下来，又必须同时把人口质量提高上去。实际上提高人口质量和控制人口数量，两者相辅相成。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才能腾出更多的物力、财力和时间，用于现有人口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也只有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才能使人们更加自觉、更加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数量。

《世界人口地理》，1982 年

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研究人口，不能忘记地理实际与生态环境；空泛地谈平衡，谈合理，就会引起人口与生态失去平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1984 年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 1975 年以来，实行计划生育，到现在仅仅十年，许多人口控制指标，已经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与发达国家相比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发展

经济的政策，仅仅经过 6 年，已经取得巨大成绩。

但我国人口数字庞大，用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就显得十分落后。我们必须迅速发展经济，认真加强计划生育，再过 50 年，我国就可列于最发达国家之列。

《今后中国人口地区调整的设想》，
载于《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1988 年

纵观我的一生，自幼丧父，既无兄弟，又无姊妹，依赖母亲含辛茹苦，抚育培养，逐渐成长。由于考上南京高师，在亲友资助下得以出国进修，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六十年，历尽坎坷，努力挣扎，总算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目前年已九旬，责任未了，还望坚持几年，得以完成所任的教学任务，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成才——宜兴籍学者求知发奋集锦》，
载于《梅花香自苦寒来》，1992 年

瑷辉—腾冲线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自然、经济、历史的综合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只是在 1935 年才被第一次绘图阐明，并加以详细对比研究而已。

……

人和自然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另一方面自然作用于人，影响人口活动。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人和自然必须和谐发展，共同协调演进，是实践和科学的呼声和要求。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国策应当是：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较高积累，适度消费；普及

教育，发展科技；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改革开放，持续发展，长期奋斗。上述基本国策不应受形势变化、体制改革、战略调整、人事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

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出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加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要比较顺利地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结构改革；要坚持不懈地严格控制总人口规模，尽早尽快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能力；要有效地保持协调和科学运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人力；要有步骤地、大规模地、全方位地卷入国际市场（包括商品、资源、资金、技术、劳力等市场），积极开拓出口创汇和输入资源的途径和能力。

《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1992 年

发扬成绩，开拓前进，这是我对中国地理学界和《地理学报》的殷切期望。

《地理学报》1994 年第 49 卷第 3 期

经济的政策，仅仅经过 6 年，已经取得巨大成绩。

但我国人口数字庞大，用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就显得十分落后。我们必须迅速发展经济，认真加强计划生育，再过 50 年，我国就可列于最发达国家之列。

《今后中国人口地区调整的设想》，
载于《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1988 年

纵观我的一生，自幼丧父，既无兄弟，又无姊妹，依赖母亲含辛茹苦，抚育培养，逐渐成长。由于考上南京高师，在亲友资助下得以出国进修，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六十年，历尽坎坷，努力挣扎，总算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目前年已九旬，责任未了，还望坚持几年，得以完成所任的教学任务，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成才——宜兴籍学者求知发奋集锦》，
载于《梅花香自苦寒来》，1992 年

瑷理一腾冲线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自然、经济、历史的综合产物，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只是在 1935 年才被第一次绘图阐明，并加以详细对比研究而已。

……

人和自然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另一方面自然作用于人，影响人口活动。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人和自然必须和谐发展，共同协调演进，是实践和科学的呼声和要求。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国策应当是：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较高积累，适度消费；普及

教育，发展科技；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改革开放，持续发展，长期奋斗。上述基本国策不应受形势变化、体制改革、战略调整、人事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

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出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加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要比较顺利地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结构改革；要坚持不懈地严格控制总人口规模，尽早尽快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能力；要有效地保持协调和科学运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人力；要有步骤地、大规模地、全方位地卷入国际市场（包括商品、资源、资金、技术、劳力等市场），积极开拓出口创汇和输人资源的途径和能力。

《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1992 年

发扬成绩，开拓前进，这是我对中国地理学界和《地理学报》的殷切期望。

《地理学报》1994 年第 49 卷第 3 期

附

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杜德斌　曹宛鹏　夏启繁　易鑫磊　马亚华

引言

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虽以提出著名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而为世人所熟知和铭记，但其在地缘战略领域的学术智慧及学术贡献更加光彩照人。本文首次系统梳理胡焕庸鲜为人知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发掘其在当今复杂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时代价值。胡焕庸著述甚丰，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多个领域皆有不俗建树。他一生发表论著320余篇（部），其中著作83部，论文239篇，译文18篇，译著2部，涉及中国区域地理、世界国别和区域地理、人口地理、政治地理、国防地理、自然地理和学科发展以及地理教育等主题。胡焕庸的学术研究始于国际政治问题研究，早在1921年，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三年级就读的他，便在《史地学

* 原载于《地理学报》第77卷第2期，2022年。

报》上发表了首篇学术文章《欧战大事记》。至 1949 年以前，胡焕庸在地缘战略领域发表的论著超过 60 篇（部），其中涉及国际政治相关论文著作 40 余篇（部）、国防地理相关论文著作 20 余篇（部）。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然熠熠生辉。

20 世纪上半叶是国际格局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东亚太平洋地区风云激荡，中华民族飘摇不定。为明晰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胡焕庸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使命为驱动，身体力行探索卓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地缘战略。历史虽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总是沿着相似的轨迹前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与国家力量的彼消此长，必然引发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的失序、失范以及长期的不确定性。这与百年前由英美等列强所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激荡转换又何其相似。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因此，梳理和挖掘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对于当前正处于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刻且不可逆转变化中心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一、胡焕庸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

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胡焕庸在大学求学时期便已将目光投向世界，在关乎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了真知灼见。他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涉及世界地理、地缘战略或具有地缘战略含义的文章和著作，堪称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同时，他还高度重视边疆安全与建设的研究，积极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的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而言，无异于天降甘露，并突破时代的局限，而历久弥新香，深刻影响后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首次命名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尤为重要。18—19 世纪，西方列强将东南亚地区瓜分殆尽，南海诸岛成为他们最后的蚕食目标。特别是法国和日本，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觊觎已久，多次阴谋控制岛礁或掠取利益。自 1907 年起，日本开始插足南沙群岛，除意图侵占领土外，还加剧了对南海诸岛资源的掠夺，先后在永兴岛、太平岛等地开采磷矿资源，获取了巨额利润。直至中华民国政府与之交涉，且太平岛磷矿资源开采殆尽，日本才陆续撤出诸岛。日本撤出后，法国人意识到了南海诸岛作为海上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在企图侵占西沙群岛的同时，他们也未放弃对南沙群岛的觊觎。1930 年 4 月 12 日，法军组织“马里休士”号（Malicieuse）军舰秘密侵占了南海的斯柏拉岛（今南威岛），随后在 1933 年 4 月 7 日至 12 日又陆续侵占了伊都阿巴岛（今太平岛）、安波岛（今安波沙洲）和东北岛（今北子岛）等八岛。1933 年 7 月 25 日，法国在其公报中正式宣布占领了南海九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法国占领南海九小岛事件。然而，对于这一事件，中华民国政府却始终未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

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地理系系主任的胡焕庸，目睹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一再拖延，又担忧日本或法国人故伎重演，继续蚕食其他岛礁，对国家领土的安危深感忧虑。1934 年 4 月，他首先以“法人谋夺西沙群岛”为题，翻译了法国船长石克斯（Olivier A. Saix）要求法国政府侵占西沙群岛并将其并入越南联邦的荒谬言论，以此唤起国人的注意，并引起政府的重视。紧接着，同年 5 月，他撰写并发表了《法日觊觎南海诸岛》一文，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首次提出了“南沙群岛”的命名。

在该文中，胡焕庸详细介绍了法占九岛的地理位置、面积和物产

等信息，并阐述了法占九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当 1867 年，英国测量舰 ’来福兵号（Rifleman）’ 首先来此测量时，即谓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生，不少人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食粮，易取参贝，此在英国出版之《南海航海》（China Sea Pilot）指南及美国出版之《亚洲航海》（Asiatic 尸″。7）指南中，均有相同记载，可为我国早经领有并已开发诸岛之铁证。……当 1933 年 4 月，法人二度前去之时，九岛之中/惟有华人居住，华人以外别无其他国人。当时西南岛上，计有居民七人，中有孩童二人，帝都岛上，计有居民五人，斯柏拉岛上计有居民四人，较 1930 年且增一人，罗湾岛上有华人所留之神座茅屋水井等，伊都阿巴岛则虽不见人迹，而发见一中国字牌，大意谓运粮至此，觅不见人，因留藏于铁皮之下，法人按图索骥，竟觅得之。其他各岛，虽无人烟，亦到处可见渔人暂住之遗迹。由此足见自 1867 年以迄于今我国渔人固未当一日离弃此诸岛也。”不仅如此，胡焕庸还论证了九岛东南至菲律宾巴拉望岛沿岸间岛礁归属中国的历史依据：“九岛以东，尚有无数小岛与浅礁，其尤大者，如西约克岛（West York）长达二公里阔约一公里，岛上有椰子及其他植物，海南渔民亦常来此，建有神庙一，坟三，其为我国领土，亦无疑义……诸岛地位，均在菲列宾（今菲律宾）国界以外。”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尚未对南海诸岛进行正式命名，对于法占九岛及其东南岛礁一直沿用外名“危险地带”。胡焕庸认识到这一不利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将这些岛礁命名为“南沙群岛”：“此等 ’危险地带’ 之群岛，虽为我国人所居住往来与经营，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鄙意拟用 ’南沙群岛’ 之名命名此群岛，不然，统称日 ’南海诸岛‘，其名殊混也。”并在文末附上他绘制的中国第一张注有“南沙群岛”的“南海诸岛图”。中华民国政府在 1935 年 1 月出版的《水陆地

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 1 期首次刊登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较为全面地命名南海诸岛，并将之分为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实为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直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派军队陆续收回南海诸岛，对各岛进行了勘测，并将团沙群岛更名为胡焕庸所命名的“南沙群岛”，将之前标记的南沙群岛更改为“中沙群岛”并沿用至今。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胡焕庸提及的南海九岛，除太平岛被中国台湾控制外，其余仍为越南和菲律宾控制。

（二）全面分析中国发展的地缘安全形势，预判日本侵华企图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

自 1840 年以来，中国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历史。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中国国力依旧羸弱，在国际上的地位未有太大改善，尤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再次凸显了国家屈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彻底侵占的危险境地，地缘环境险象环生。胡焕庸深谙当时中国地缘安全所面临的紧张形势（尤其是东北局势）及外交政策的困境，在事关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系统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地缘安全形势，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并预判美日冲突的必然性，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1932 年，胡焕庸在《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一文中，系统分析了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组织性质、产生历程和既有 ″成绩″，在这一基础上全面论证了主要列强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胡焕庸对国联的实际权力大小有着清楚的认知：“国联集世界各国组织而成，虽是永久的机关，但权力至微，不比一个国家的裁判官司法官，能用强制的手腕，去彻底的排难解纷！它的意志，是似各国的意

志为意志，它的本身，是丝毫没有实力的。”由于国联主要由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列强主导（美国最先提出建立国联但自身并未加入），因此成立之初便充满了帝国主义色彩。胡焕庸认识到国联的脆弱性：“国联行动，多听列强——日法英意比……的主持，故国联意志，就是根据列强的意志，所以我们要明白此次国联对东北问题的态度怎样？只要把列强的态度分析一下，就了如指掌了。”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焕庸深知真正能救东北、救中国的，只能是中国自己：“弱国无外交，……我们要恢复东北，发展东北，解决东北一切问题，只有自己国民觉悟！”

1934 年，胡焕庸发表《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整体地缘安全形势与风险。他根据地理邻近特征分析了中国与周边日本、俄国、英国（时为缅甸宗主国）和法国（时为越南宗主国）等国的接壤情况，又根据交通网络关系将周边国家的铁路与中国边疆的关系划分为“包围式”和“深入式”，进而结合国界标志发现中国边疆各地均系“紧张国界”，尤其是东北边境。胡焕庸还从贸易、投资的规模与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与美、日、英、俄、德国等的经济关系，认为日本在贸易上对华依赖最甚，英国和日本在投资上对华联系最为密切。基于上述研究，他从接壤与否、是否曾侵占过我国领土、边疆形势、母邦距我远近、商业关系和投资关系六个方面，揭示出中国与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由此足见六国之中，惟日本与我关系最深，利害冲突因亦最甚，其次为英俄，再次为美法与德。”并且认为“日本壤土偏小，人口稠密，国内食料原料，俱感不足，所需于国外之开拓与经营者，至殷且急，而其唯一之对象，即为我国”。这一结论不失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之精准预言。不仅如此，胡焕庸还准确预见了美国与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惟美国者，峙立于太平洋之彼岸，地大物博，国富兵强，居世界经济之

领袖，执全球军备之霸权，卧榻之侧，岂容酣睡，两雄相遇，必有一伤，异日予日本野心军阀以重创者，舍美国又将奚属？"这体现了胡焕庸对国际局势全面的洞察力和前瞻的预见性。

正是基于对世界地理和国际局势了然于胸，早在1945年，当中国仍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时候，胡焕庸就预言中国日后必屹立于世界舞台之中心："第一，20世纪之世界要成富强之大国，需具有工商农矿之全能经济国家，而且有此种优越条件者，美国除外，仅有苏联与中国。第二，我国生产一向落后，美苏各国工业进步，生产力强，我国需于最短期内与之并驾齐驱实属不易。第三，美苏建国之时间，亦不甚长，由此前例，自可鼓励，而我国天赋极厚，迎头赶上，努力超越，自此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今天的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无疑印证了胡焕庸的精准预测和深切期盼。

（三）高度重视边疆治理与国防建设，多次强烈呼吁收回琉球群岛

清末以来，西方列强逐步渗入中国边疆，尤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南、西北亦为列强环伺，中国的边疆形势岌岌可危。而当时国人承继历史认知，边疆观念淡薄，与西方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所构建的"国家主权"概念大相径庭。胡焕庸为普及"国界"之于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性，于1936年在《地理教育》上刊文《国界与国防》。文中，胡焕庸厘清了立国三要素，即土地、人民和主权，指出国家的确立这三要素缺一不可，阐明了国界确立之于这三要素的重要性："国界者，所以确定一国之疆域人民并示其行政主权之范围者也；凡属独立自主之国家，必须有明白确定之国界，界内以我主之，界以外人主之，彼此信守，各不相犯，如此则国际之间，方得维持其和平。"基于国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胡焕庸详细分析了中国陆域、海域和空域

边界被西方列强肆意践踏的国防安全威胁，强调国家实力是维护安全的坚强后盾。此外，胡焕庸还围绕新疆、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等边疆安全议题发表多篇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之于国防安全的重要地位及实施路径，为推动边疆治理和维护国防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焕庸不仅重视陆疆治理，还深刻认识到海疆对于中国这个海陆复合型国家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围绕琉球群岛的注置问题，胡焕庸陈述利弊，极力主张收回琉球群岛的主权。1947 年，他先后在《社会公论》第 2 卷第 1 期刊文《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在《问世》第 3 期和第 7 期分别载文《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和《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反复阐明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即为中国固有之领土及其于中国国防的重大意义。如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一文中，胡焕庸写道："隋唐以来，琉球即为我国领土，明清两代，世受册封，史籍斑斑可考。又以地理上立论，我国不欲兴海军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群岛实为我国东边海疆之外篱，琉球群岛如受他国控制，我国永无出太平洋之机会。"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一文中，他再次强调："琉球不仅在历史上为我领土，而且在地理上亦与我不能分割，我国如不欲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一如我国之外篱，乃出入必经之道；美国既无理由必须加以占领，日本更无理由，仍欲保有其地；小笠原群岛距我较远，我可不必坚持，美既托治日代管诸岛，则亦无理由拒绝我国收复琉球群岛；再退一步言，若琉球果仍还日本，则若干年后，台湾必有再度被侵之虞。"在《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一文中，他极力主张收回琉球群岛："琉球自唐代以来，向属我国……且其地位不啻为我国藩篱……因此种种，我国务必力争，使其归还我国。"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一文中，胡焕庸还提出了处理琉球群岛的多个方案："甲、归还我国如台湾，我国不能因琉球较台湾早失二

十年（1875年被日本占领）而不收回。乙、琉球军事价值较大，经济价值较小，由我暂为托治，乃退一步之办法。丙、群岛由我托治而大琉球暂准美国驻军，保障太平洋之安全。丁、坚决反对归还日本，如琉球归还日本，则将来台湾不保矣。"1947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曾召开三次对日和约审议会，邀请众多党政军人士参与讨论对日和约问题，胡焕庸是受邀参会人士之一。据记载，在此次会议中，针对琉球问题的发言中，仅有胡焕庸一人主张收回琉球群岛。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政策导向及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最终错失了收回琉球群岛的良机。

（四）倡导强化地理教学，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

胡焕庸作为著名地理学家，深知地理与国防之密切联系，然时人对此认识不足，普遍忽视地理学科的教育。胡焕庸曾任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史地教员，并兼任过苏州中学校长，对中小学地理课程教育现状有深刻认识。为提高国人对地理学科的认知水平，胡焕庸于1936年在《地理教育》第1卷第3期和第7期连续发表《国难与地理教育》和《国防教育与中小学地理课程》两篇文章，反复强调地理课程对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加强地理教育。

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一文中，胡焕庸指出，由于国人地理知识的匮乏，导致东北地区沦陷后，许多人竟不了解这对国家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这与外敌形成鲜明对比："敌人之于我国领土则异是，每年派出调查考察之人奚止千数，上自学者专家，下至走卒贩夫，接踵而出，络绎于道，因此对于我国领土之各种著述，既已汗牛而充栋。"正是由于列强对中国地理情况极为熟悉，为其侵略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列强之谋我也，莫不以地理学家为其开道先锋，平时探险考察无微不至，及各地情势既明，则何处富饶，何地形胜，了然胸中，于是一

举而占领之，随时乃不劳再有抉择。”

在《国防教育与中小学地理课程》中，胡焕庸分析了国人地理知识匮乏形成的原因，一是受重理轻文之影响，学生更多精力花费在了“国语算学”（小学生）和“英文算学”（中学生）科目中，而对史地等其他科目难有余力；二是各学校普遍较为缺乏地理科目专业教师，而是多以其他科目教师兼任地理教师，加剧了中小学地理学科教育的薄弱。因此，他特别强调：“今试就学校中实施国防教育之神目言之，则地理一科实为可称为最重要之中心，因为各种关系国防之研究问题，实多数寄托于地理学科之内：例如国际形势之探讨；本国疆域之叙述；边地争执之形势；经济侵略之焦点；乃至一国物产之分布；交通之干道；要塞之设施；地形与战略等，无不包括于地理教材之中。吾人如不欲充实学生之国防知识则已，否则非借助于地理学科不为功。中小学任何学科，其对于国防教育之重要，无有超过于地理者。”并提出了“加增讲授钟点”、“慎选专业教师”、“改造教本性质”和“重视国防教材”四点改进中小学地理学课程的建议。尤其是对于“重视国防教材”，胡焕庸强调，地理教学对于时政的讲授分析：“地理内容，既与国防极有关系，当今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吾人讲授地理……对于政治社会随时发生之地理问题，尤须详加剖析，务使学生彻底了解，俾便应付事变。”这些建议不仅对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对当代的地理教育也颇具启发。

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一文中，胡焕庸再次预言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最近自日人占领东北以来，复有进而谋我黄河流域之势，于是出发考察之人又复络绎于道，冀、鲁、晋、豫各省虽至穷乡僻壤，亦莫不见有日人足迹，似此长途跋涉，不辞劳瘁，其目的盖无非为异日进行侵占之准备。”果不其然，次年（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胡焕庸对国防安全之深刻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胡焕庸还于1941年在《中国青年》第4卷第3期发表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同年10月10日在《中央日报》刊文《地理学与国防》，进一步强调了地理学与国防建设的紧密关系。

二、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学理基础

大国需要大方略，只有充满思想的战略才是隽永的。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为时代背景所塑造，以学理基础为支撑，由爱国情怀所推动。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风云变幻，一方面，美国和日本作为两个新近崛起的国家，在东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取代了原来由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和随后的列强并列体系，而成为当时驱动东亚地缘政治建构的核心矛盾。另一方面，自地理大发现以降，世界日益连为一个整体，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前途紧密相连，世界地理因此成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因素。胡焕庸正是处于这种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与重构的激烈动荡时期，怀揣学术报国之殷切希望，从自己专业背景出发，洞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探寻救国存亡之路。

（一）国际政治风云激荡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胡焕庸从事地缘战略研究，是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使命为驱动。胡焕庸的一生本就是一部地缘政治演化史，他生于20世纪初国际动荡的大时代，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国际格局的变迁，并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些历史大事件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命运。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在法国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即巴黎和会。其间，中国作为二十七个战胜国之一，列强竟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胡焕庸当时

是常州中学应届毕业生，同全校师生一起响应了学校罢课的号召，动员全市展开罢工、罢市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及五四运动的经历在青年胡焕庸心中播下了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种子，对其此后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将个人道路与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成为胡焕庸的人生信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剧烈动荡与国家前途未卜之际，胡焕庸以接近 10：1 的报录比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胡焕庸开始涉足高际问题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欧战大事记》，详尽记述了自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萨拉热窝事件）至 1920 年 1 月 20 日巴黎和会闭幕之间的世界大事，这成为胡焕庸学术研究的开端。随后，胡焕庸又相继翻译或参与翻译《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1923 年）和《战后新世界》（1923 年）等多部国际政治地理著作。其中，《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为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所著的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今译《地理与世界霸权》），是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近年来已被国内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战后新世界》为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所著的 The New World-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印的。1917 年，美国与德国宣战，鲍曼被美国国务院聘为地理顾问。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鲍曼随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并担任和会疆界划分委员会主任。该书主要译者张其昀曾对鲍曼及其著作评价称：“当时，和会中五大国代表，对于德奥匈诸国之领土，宛如‘陈平分肉’。美国方面的宰割者，虽为威尔逊总统，而运筹帷幄者，实为鲍曼。鲍曼回国后，以其经历所得，写成《新世界》一书。全世界政治地理学上之重大问题，莫不包举于此书之中，实为学术界伟大之成就。”胡焕庸翻译或参与翻译的这些著作，不仅使国人眼界洞开，对其本人的学术道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领土一步步被列强蚕食，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国土几乎完全沦为战场，到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与世界的情势更加波调云诡。这期间，胡焕庸发表了《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1932年）、《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1934年）和《太平洋形势展望》（1939年）等20余篇文章，全面深入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外部环境及全球的地缘安全形势。至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已由二战之前的多极化格局转变为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胡焕庸相继发表《论新共产国际》（1947年）、《美国的经济难题与政治危机》（1947年）和《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1947年）等10余篇文章。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美苏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研究，二是中国及周边地缘安全形势构建研究。胡焕庸预判美国和苏联存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差异，在未来必将产生对抗；同时他也极力主张中国政府收回琉球群岛，以构建中国东边的海疆防线。

（二）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基础

地缘战略是从地理要素出发，对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进行政策设计。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其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和深刻的世界地理认知。他始终立足于地理专业背景，深入阐释国际政治发生的地理基础及其作用机制。1926年，胡焕庸自东南大学毕业后，远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法国区域地理学家马东男（E. de Martonne）教授学习自然地理学和法国自然地理，同时受业于德孟雄（A. Demangeon）教授，研习经济地理学和法国经济地理。此外，他还在法兰西学院聆听白吕纳（J. Brunhes）教授的人文地理学课程，这些学术经历对他日后开展世界国别和区域地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出版了一系列国别地志，包括《法

国地志》、《俄国地志》、《英国地志》、《德国地志》和《南欧地志》等。胡焕庸在卷首语中写道："昔余欧游归来，即常有志联合同道，编辑丛书，将各种地理基本知识，分科撰述，系统介绍，不意荏苒经年，竟无成就，言念及此，曷胜惶愧。今者为谋实现初衷，并能切实进行起见，拟就个人之力，先编一略为详备之世界地理志；然犹恐课务羁身，作辍不常，因采分册出版之法，大国一国为一册，小国合数国为一册，分区编纂，陆续出版，拟以三年之期，完成全编。"嗤寥数言，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普及国人世界地理知识的强烈使命感。最终，他以一己之力，编撰成书，这套著作成为中国第一套世界国别和区域地志。

胡焕庸还编著出版了多部中学世界地理教材，如1939-1940年出版的高中地理教材《钟山外国地理》，该书在当时风靡全国。抗战后期，他又应时之需，先后编写了《日本地志》和《台湾和琉球》等区域地理著作。他的著作不拘一格，篇幅灵活，精辟地概括了各国的地理国情特征，充分体现了他立足国家、科普国人、发展学科与启迪教育的初心。在世界部门地理研究方面，胡焕庸于抗战期间在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了《世界经济地理》。该书首次从农业基础、农林作物、矿产资源、交通运输、商品贸易等世界核心经济要素出发，描绘了当时世界整体经济地理的格局，并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国的经济概况和对外贸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1941年，胡焕庸在抗战军官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世界地理》著作。该书从"谈天"（天体）到"说地"（海陆结构、岩石），从"论气"（气象）到"衣食住行"（经济活动），以宏大的视野和接地气的文笔，全面系统地刻画了世界地理格局。1943年，随着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重创日本、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取得重大胜利，胡焕庸及时编著出版了《美国经济地理》，以增强国人对美国这个重要国家的了解。

1953 年，胡焕庸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为本科生讲授世界各洲自然地理课程，并担任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班班主任，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研究生。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他相继出版了《苏联自然地理概论》、《德国地理》和《各洲自然地理》等世界地理著作；并以“荷夫”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极富地缘战略意义的《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1964 年，华东师大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胡焕庸带领研究室全体教师，向中央外事部门提交了《法国地理图志》等多项研究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 80 高龄的胡焕庸厚积薄发，相继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世界海陆演化》《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欧洲自然地理》《世界人口地理》等诸多世界地理研究著作，为中国的世界地理学科发展增添了光芒。

胡焕庸先后出版世界地理著作 20 多部（见下表），是迄今编著世界地理著作最多的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开展世界与区域地理研究时，坚守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核心内容，在描述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现象时，总会先以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切入，进而延拓至经济活动等内容，两者互为补充和依托，并不简单以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二分论视之，因而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各国之自然资源、人口、民族、经济等基本情况，这也正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学理基础。

胡焕庸出版的部分世界与国别地理著作列表

Tab.1 Partial World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Works by Hu Huanyong

序号	作者	出版时间	书名	出版社
1	胡焕庸	1934 年	法国地志	南京钟山书局
2	胡焕庸	1934 年	俄国地志	南京钟山书局
3	胡焕庸	1934 年	德国地志	南京钟山书局
4	胡焕庸	1935 年	英国地志	南京钟山书局
5	胡焕庸	1935 年	南欧地志	南京钟山书局

续表

序号	作者	出版时间	书名	出版社
6	胡焕庸	1939年	世界经济地理	重庆青年书店
7	胡焕庸	1941年	世界地理	正中书局
8	胡焕庸	1943年	美国经济地理	正中书局
9	胡焕庸	1945年	朝鲜地理	京华印书馆
10	胡焕庸	1945年	法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11	胡焕庸	1945年	美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12	胡焕庸	1945年	南欧地理	京华印书馆
13	胡焕庸	1945年	日本地志	京华印书馆
14	胡焕庸	1945年	苏联地理	京华印书馆
15	胡焕庸	1945年	台湾与琉球	京华印书馆
16	胡焕庸	1945年	英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17	胡焕庸	1955年	苏联自然地理概论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8	胡焕庸	1957年	德国地理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	胡焕庸	1957年	各洲自然地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胡焕庸、周之桐	1981年	法国经济地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1	胡焕庸、陈业裕	1981年	世界海陆演化	商务印书馆
22	胡焕庸等	1981年	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	科学出版社
23	胡焕庸、严正元、康淞万	1982年	欧洲自然地理	商务印书馆
24	胡焕庸、张善余	1982年	世界人口地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是其地缘战略研究的动力来源

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灾难深重，长期遭受外国势力的蹂躏与宰割，以至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胡焕庸的前半生便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度过，也正是这般恶劣的环境，激发并培育了胡焕庸深沉的爱国情怀。他的学术研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他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一文中写道：“世界近古史之开端，盖导源于

十五世纪之航海探险，而欧人势力之所以弥漫于全球，实得力于地理考察之结果也。……过去英人之于香港，德人之于胶州，俄人之于旅顺大连，皆先遣多人加以调查，及既知其地之形胜，则借端而夺取之；晚近如俄人之于新疆，英人之于西藏，日人之于满洲，着着研究，步步考察，结果遂多成为各国之势力范围。”国人对地理之漠视，导致中国领土、领海和经济等为外国所轻易窃据或主导。胡焕庸的论文著作，无不以民族解放、国家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他极力呼吁国家政府重视领土、领海和经济建设安全。如在《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1934 年）、《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1934 年）、《经济侵略与土地侵略》（1937 年）、《台湾收复后之经济价值》（1944 年）、《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1945 年）和《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1947 年）等文章中，从中国南海到中国东北，从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领土占领到经济侵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胡焕庸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研判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战略安全形势。他为中国摆脱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疾呼，以期唤醒国人的认知和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胡焕庸注重介绍外国的地理国情，包括土地、人口、民族、物产、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内容，并将中国之现实情况与外国主要国家对比，以期为中国发展谋出路。如在《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1939 年）、《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1939 年）、《太平洋形势展望》（1939 年）、《中国与苏联》（1939 年）和《苏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47 年）等文章中，他多次强调中国在人口、领土、资源等多方面天赋深厚，极具经济发展潜力。他坚信，倘若中国能专注发展，努力建设，不久的将来必将迎头赶上苏联和美国，在世界舞台必将有一席重要之地位。这种远见卓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对于国人树立自信、实现民族自立自强而言，无异于振聋发聩的醒世警言，同时也彰显着胡焕庸的民族自豪之感与拳拳报国之心。

三、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百年前，世界列强大战，中华民族面临危亡，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是地理学人凭借其世界地理之学养发出的时代呐喊。当今，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中所蕴含的地理学人经世报国之情怀，世界地理资政辅国之重任，显微望远治学之方法，以及命运共同地缘思想之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其时壮价值。

（1）感召地理学人学术报国之情怀。胡焕庸不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学家。在他的地理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的全面审视。从对“日本之海上政策”的警惕，到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剖析；从对“日俄交恶声中之西伯利亚”预言中国直面的“太平洋从此乃益觉不太平”，到针对“法人觊觎谋夺南海诸岛”而进言“速图决断”，无不体现出一个地理学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强烈家国意识与情怀，以及维护国家陆界海疆主权安全的地缘战略视野与韬略。在“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当下，地理学人更应继承胡焕庸学术报国之大志，勇做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为国家和平崛起谋定路线图。

（2）勇担地理学科资政辅国之重任。地者，政之本也。世界地理是一个国家建构世界观的最基本、最直观的方法，也应该成为观世界大势、谋国之大事的基础学科。胡焕庸的世界地理研究和地缘战略思想不仅关注各国的地理空间要素，更深入到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层面。其发表的《不列颠帝国》、《新俄之田制：共产制乎，私产制乎》、《印度经济地理》和《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等，充分体现了世界地理学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结合、国家地理和世界地理结合、政治体制与经济态势相交织的学科特色。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和推介过程中，世界地理学科应该也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优长，满足为国力伸张以求共同安全、产能外释以谋共同发展建言献策的重大战略需求。

（3）弘扬显微望远治学方法之智慧。胡焕庸地缘战略研究之治学方法，“其一，以显微镜为工具做横的观察，其二，以望远镜为工具做纵的探讨”。用显微镜去观察欧西远邦和日俄近邻，以求现世之横向比较；用望远镜去纵观世界大势的演进规律与沿革脉络，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才得以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磅礴气势。同时，胡焕庸对世人“用显微镜做研究工具的太多，难免有些近视”的警醒，至今仍具有振聋发瞪的力量。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缘战略思想和理论的新征程上，吾辈学人当弘扬显微望远之二法的同时，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求理问术，注重体系、区域、国家和地区等多层次研究相结合，创建纵横相济、多科相鉴、多元相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研究范式。

（4）昭示和合与共、命运共同之大道。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的空间分异、陆海二分等学术思想，在西方地缘战略和实践中衍生出生存空间扩张、自然资源抢占和殖民市场争夺等冲突对抗行为。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完全区别于同时代西方地缘战略思想家。如果说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都是为本国利益谋霸和护霸，那么胡焕庸的地缘战略立场是避免战争、守护家园，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与共的智慧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这既是中国传统地缘思想内核的高度凝练，彰显了与西方的冷战对抗和地缘冲突不同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当代地缘战略精神的朴实概括，道出了一个文明古国如何和平崛起与复兴的中国方略。这为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还以大国气度和责任担当

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类比，并远眺人类文明之走向。“处理国内政治，当以谋致全民之福利为目的，策划国际政治，当以谋致全人类之福利为目的；明乎此，则因现代科学技术之进步，生产能力之增强，全人类丰衣足食之大同世界，不难于短期内求得实现”，这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诠释，更是对世界政治发展潮流的智慧引领。

时代塑造思想，思想创造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嚏:兴目标的新时代和开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新征程中，吾辈当继承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积极探索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理论，锻造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全人类的中国思想。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胡焕庸之子胡企中先生和胡焕庸之孙胡复孙先生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主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Chapter 06

第六章

谈教育

南局精神*

胡焕庸

南京高等师范，创立于民国四年，迄于今，盖二十年矣；此二十年中，适值国家鼎革之秋，人事更变，乃较任何其他时期为特繁，南京高师，成立不过二十年，而其校名之递改，乃已有五次之多。

初，民国九年，即南京高师成立之五年，已有改组高师为大学之议，其次年，东南大学组织成立，乃与南京高师同校而并名，及民国十五年，高师学生全部毕业，学校名称，始正式改为东南大学；民国十六年，改称第四中山大学，十七年二月，复改称江苏大学，同年五月，始改今名，称中央大学。

自南高以至中大，学校名称，虽经数易，而学校内容，实一线相承，绝少变异；凡治学于此者，不论时间先后，多具有同一之好尚；自社会旁观之批评言之，则此校自南高以至中大，亦具有同一学风；此前后一贯始终不渝之好尚与学风无他，即所谓孜孜为学之精神是已。

向者，南高学生，亦尝因埋头攻读，不与外事，一度为俗人所诟病矣；然今则国内各大学以及专门研究机关，殆无处不有南高毕业生

* 原载于《国风》杂志第7卷第2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

之踪迹，世界学术界，亦颇有南高毕业生列名其间，南高孜孜为学之精神，今日盖已有相当结果，以表显于社会矣。

近年中原板荡，国是日非，论者颇欲以迅速简捷之法，以挽救国家之危亡，于是投笔从政者特多，不论治农治工治商之人，均一一舍其所学，以求能入宦为荣，人多职少，争竞排挤之风特炽，扰攘纷纭，终亦无补于国是；惟南高学生，以无此好尚，插足其间者特鲜。

吾人苟非愚顽，莫不知今日之世界，固一科学竞争之世界，不特生活物质之建设，须有各种自然科学为之基础，即如社会人文事业，有如政治经济诸端，亦莫不有其深邃之原理，以为其设施之根据，易言之，盖莫非专门学术之事也；今日而言从政，岂如往昔胸无点墨或鬻缯屠狗之徒所能奏效。学术与政治，原有其十分密切之关系，亦惟大学问家，方得成为大政治家，学术救国云者，岂果为诳人之虚语也哉？

本年秋，适为南高创立二十周年之期，旧同学之一部，不以母校校名之更替，而忘其怀旧之忱，群谋有以庆祝而纪念之，纪念之方，不拘形式，乃假《国风》杂志发行纪念专号，各抒所见，共图母校精神之发展。余不文，爰举孜孜为学一点，用以自勉而勉人，未识诸学长以为然否？

高中普通科春季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号弁言*

胡焕庸

本校普三春同学二十八人，将于本年尾终修毕所学离校他去，本其平素研究所得，辑为级刊，以留纪念，索序于余。余既嘉其平素向学勤奋，得此三年小成，尤许其临别依依，不忘请益之古训，爰为书数语于其端。

高中普通科毕业学生，照理应继续升学，进求高深。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符。即在秋季毕业之学生，亦有未尽能升学者，况在春季，国内各大学大多不招新生之环境下，吾知暂时不能升学者，不在少数也。除升学之外，惟有二途：就业与家居。但不论升学就业及家居，均有不可须臾离之一要道，日："做一个完全之人。"

诸君将升学乎？升学非仅知识之探求，技能之习练也。苟如是，则充其量成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耳，换言之，造成一部活机器而已。国家又何贵乎此一部活机器而不惜巨大之费用以栽培之；诸君又何羡乎此一部活机器而不惜辛苦之功夫以炼成之。知识技能之外，必另有吾人立身之道。道维何？即人与人间之合理关系也。"洞明世故皆学

* 本文为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高中普通科春季第一届（即普通科第六届）毕业纪念专号序言，原载于《苏中校刊》第74、75期合刊，1933年1月。

问，练达人情即文章。”明了人与人之关系，方有人与人之合作，社会之演进，宁非由此。诸君之为学，岂不在此。

诸君将就业乎？就业非仅职务之克尽，地位之巩固也。一入社会，与人之关系愈密，为人之道，作人之事，尤不可不三致意。青年初入社会，往往感觉环境之不满，因而失败者，常有所闻。究其故，一方固由于社会之腐化，纯洁青年不能与之相安；一方实由于青年之不能为人，不能适应环境，不能明白人与人之关系，当然不能合作而自认失败矣。须知人者，社会中之人也，非遗世独立之超人也。知乎此，方可以处世，方可以为人。

诸君将不升学不就业，不幸而暂时家居乎？此虽非人之所愿，但亦事实之不可免。即家居，亦有家居之道。上何以处父母，下何以式子侄，中何以处兄弟姊妹，此亦学习人与人关系之大学校也。“治国之本在齐其家。”儒家重要功夫，岂不在此。莫谓家居，即无学可求也。

别矣诸君！国家多难，前途珍重，作为全人，有厚望焉！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　胡焕庸序于办公室

中学地理教育的实施问题*

胡焕庸

中等学校，课目繁多，地理一门，在各科之中，最不被人重视；向例在中学校里，国文英文算学，被称为主科，主科以外，遂多视为次要科目；最近自注重理科之说兴起，数理化三门既视为理科科目，应加注意，于是文史地一类，被视为文科科目的，因此乃降居于更次要的地位；地理一科，虽亦忝居于中学教科之列，然不论从教育行政当局，学校当局，乃至教员学生的眼光看来，莫不视地理一科为无足重轻，中学地理教育，简直是有名无实，地理钟点，形同虚设，讲到实施，简直全是敷衍！

中学校里，必须讲授地理，其原因甚多，总括言之，在于完成公民训练；一个国民，必须认识他自己的国家，不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要认识清楚；一个儿童哪有不认识他的家庭的？大门在哪里？后门在哪里？卧室在哪里？饭堂在哪里？一个学生，岂可不认识他的学校？教室在哪里？寝室在哪里？操场在哪里？饭堂在哪里？推而大之，则一个国民，对于他所生活的一乡一镇一县一省，乃至本国外国，一切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我们生于斯、食于斯、衣于斯、行于

* 原载于《地理教育》1937 年第 2 卷第 4 期。

斯、一切生活所取给依傍的地理背景，岂可不弄个明白？一个人不学地理，有如盲人一样，不能辨别他所处的环境，一切生活，就非依赖他人不可；甚至他自己所有的财产衣食，被人家占夺了，他自己还没有知道，还没有办法，这就像现在中国的情形！

现在暂且不谈空论，单就中学地理教育各种实施问题，择要一说，中学地理教育的实施，千头万绪，现在分几方面来说：

一、教育行政当局　中学校里的课目，是由教部规定，地理学科，既列为各科之一，就当与各科同样重视，不必再分出什么高下轻重，什么重视国英算，什么重视理科，任何方面，不当有此心理；向例中学校里地理学科，多由其他各科教员兼任，地理学科由专攻地理的教员担任的，十不得一，中学地理教育的疲敝，其原因虽多，而教员不得其人，实为其重要原因；地理虽非怎样艰深的学问，但是不会专攻的人，终是难于胜任，过去考核教员资格，仅仅注意他毕业的学校，绝少注意他研习的学科的，最近教育部规定教员检定办法，已注意到分科检定，凡是教非所学的教员，不论资格若何，都要受试验检定，这是正本清源的办法，希望教育行政当局，以后能严格执行，凡是没有地理学科检定证书的，不准他担任地理功课。

二、学校行政当局　中学校里教员最感缺乏同时亦最感过剩的，莫过于地理教员，希望担任地理教科的，十分拥挤，但是专攻地理胜任地理教科的人，却又非常缺乏；一般中学校里，地理学科，多半由他科教员兼任，凡是教员钟点太少，就拿史地钟点凑数，因此担任地理的人数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专任的人，假如分科教员检定的办法，能严格执行，则担任学校行政的，除却必须聘请专业的人，担任地理外，还须注意集中地理钟点，使其专任，教员集中精力于同一科目，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地理教员　现在担任地理的教员，既多半未受专业训练，同

时亦不能专任，因此对于地理学科，自难有彻底认识，与充分准备，敷衍因循，难收地理教育之实效；地理教员如能专业，并能专任，自身应明了地理学科在中学教育上意义之重要，以及自身所负责任之重大，谨慎将事，同时对于新起之地理知识，须随时修习且就时事之演进，随时讲解于学生，不然，教材内容，常不免有明日黄花之讥矣。

四、一般学生　当今外患日亟，国势飘零之时，学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难，必须潜心学业，对此阐明国内国际各种情况双理学科，特加注意，庶几对于国难真象，有彻底明了之可能，救国要务，有详细研讨之机会，他如国富之开发，边疆之经营等，凡属经国大政，无不与地理发生密切之关系，明乎此，则轻视地理之心理可除，再能努力学习，中学之地理学科，可以不致虚设矣。

五、地理教材　地理学科之范围，最为广博，一般人对于地理学科之性质，认识不清，于是选择教材，每多溢出地理范围以外；实则地理学科以研究地面为职志，地面为自然现象之一，故地理亦为自然科学之一种，常人以为地理属于文科者误也；研究地理，不能不及于人类，然人文地理者，以研究人地关系为职志，人生活动与地理无关者，非人文地理也；中学地理教育，虽非专门研究，界限不能过于严格，然一般人对于地理学之性质，如未能认识清楚，则其选材之间，即难于完全中肯，凡编辑地理教科书，以及教授地理者，均当注意及之。

六、地理教具　教授地理，除教科书外，如地图，如照片，如模型，如实物，皆为必需之教具；教授理化，当有实验室，教授地理，至少当有一陈列室；整个大地，原为地理真实之教具，然为地域所限，教授地理者，不能率学生遍历全球，则实地之代表，如模型，如照片，如地图，乃不可少；我国兴学数十年，然较新式之教具，国内仍极缺乏，即以地图而论，除陈陈相因之地名图而外，分类性质之地

理图，几乎绝无仅有，如欲增加地理教学之效力，地理教具之制造与供给，实不可少。

七、地理教法　地理教法，每多采用分区制，此固自然之趋势，然其流弊，每嫌呆板，不能引起学生之兴趣；时事问题，涉及地理之处甚多，如能活用之，引为地理教材，不特地理本身，有及时应用之利，对于学生，尤能引起其浓厚之兴趣，教授地理，不宜过于呆板，应尽量设法与时事联络，如此则学生不特乐于听受，并能增加其自动研究之兴趣与能力。

八、地理习题　近者，一般教师为便利学生复习起见，每多制为习题，使学生练习解答，用意良是；惟此等习题，须审慎选择，并当不仅限于记忆材料；惟一般投机者流，为补助学生应付会考与升学起见，往往制为多数问答，或仅须填补一二字，或仅求辨别其正伪，流弊所及，竟致整个学习时间，尽数消磨于此等习题之上；其结果，学生所强记者，仅此零星假片之琐事，对于整个地理之本体，竟乃茫然不知其所以，买椟还珠，贻害殊多，望有心人从速纠正之！

与青年谈读地学*

胡焕庸

每年暑假时候，有几万青年，要由中学阶段，转人大学。中学的功课比较普通，而且是规定要必修的；大学的学科比较复杂，单就选择科系而言，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需要有人指导。

我现在来同青年谈读地学，就是要告诉青年：什么是地学？地学的性质是怎样的？地学本身又还有什么门类？读地学有什么用处？

现在先谈什么是地学，这里所讲的地学，就是地的科学，或者叫作地球科学，或者也可以说是地理科学。地的科学，地球科学，这些名词比较生疏，要是讲到地理科学，这名词比较熟悉。

从小学到中学，多规定有地理一科，一般青年对于地理，多少也有些印象，不过可惜得很，中学毕业的青年，虽然已经读过多年地理，但是对于地理的内容和性质，还往往不十分明了。

平常有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中学里的功课，往往拿他分做文理两组，数理化是理组，文史地是文组，至少在中学里，总是拿地理看作是文组的。

文理两字，本来是属同一解释，要是改用纹理两字，那意义就格

---

* 原载于《中国青年》（重庆）1940年第3卷第1、2期，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外明显，不过普通习惯，要是以文作人文，理作自然解，那么两字意义，就颇有不同，大学里的文理分院，大半就是由此而生。

现在来讲地理，地理是研究地的学问，地是一种自然物体，那地理当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不过地理之学，有时也不能遗弃了人。中国过去讲地理，不免忽视了地，偏重了人，因此竟有地理属于人文科学的误解，关于这点，青年必须先要弄明白，因为大学里的地学是设在理学院，要读科学的地理学，必须要有理科的基础，尤其数理两科，只有少数大学，因为未能设置独立的地学系或地理系，就以史地混合设系，那就隶属于文学院。

其次，谈到地学的内容，地学地理这两个名字，有时虽亦混用，不过严格言之，也是稍有分别，地球面部，普通可分水陆气三界，专门研究水界的，以海洋学为最主要，专门研究陆界的，以地质学为最主要，专门研究气界的，以气象学为最主要，这几种学问，现在多已独立成科，因为多是属于地或地球的科学，因此总叫作地学。

地球面上，除掉水陆气三界，还有居住地面的生物和人类，地理就是研究水陆气三界和生物人类相互关系的科学，因此地理也是地学中的一种，有时为求通俗起见，也用地理科学这个名词，来代替地学。

在目前各大学里，专门设有地理学系的，有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央和中山，同时设有专门的地质学系；西南联大是以地理地质气象合设一系，西北大学也是以地理地质合设；气象在现在还没有独立设系的，除西南联大外，中央大学地理系中，附设有气象学组，海洋学在中国还很少有人注意他；普通在地质学系，多半兼治矿物，矿冶独立成系的，有湖南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等；此外和地学有关的，还有测量，现在只有同济大学，设有独立的测量学系；至于设有史地系的，有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此外师范学院，一律设有史地学系，其目的在训练中等学校之史地师资，与大学训练专门

人才的，稍有不同。

最后讲到地学的应用：地质学是研究地层的组织构造和变化，它的应用方面，以矿物为最重要；气象学是研究天气的组织和变化，天气的变幻，对于航空航海以及农田水利特别重要，晚近气象学的价值，一天重要一天，其原因即在于此。

至于地理一科，内容包括自然和人文两部，自然方面，即以地球面部的水陆气三界为研究对象，人文方面，包有政治地理黔地理各门，凡属自然与人文，人文与自然间之相互关系，多在研究之列，大之有关国际，如国际疆土争执之类，小之有关民生，如衣食原料之产销等，多在地理研究范围以内，以目前情形而论：社会国家对于各种地学人才，均极需要，中学刚毕业的青年，假使明了了地学的性质和内容，自审志趣相近，而加以专攻，前途是极光明的！

欢送毕业同学*

胡焕庸

抗战到今天为止，已是足足四个整年，前线战区，虽是遍地烽火，但是后方学校，依旧弦歌不绝；而且在抗战以前，每届毕业同学，多感到找事困难，离校以后，大有走投无路之苦，现在不到毕业，已有多方征聘，供不应求，到处感着有事无人之叹，这正表示抗战事业，需才孔多，青年学子，对于国家社会，负担着特别重大的使命。

不过社会服务生活，多少与学校求学生活有些不同，初入社会的青年，常常容易感到苦闷，纯洁无瑕的青年，过了若干年的社会生活，往往变成奄无生气。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现在愿就个人的经验，贡献各位毕业同学一些意见。

第一要对工作有认识　社会和学校，性质上自然有些不同，学校是求学的地方，社会是服务的所在，求学的时代，当然以学问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时代，就要以做事为中心工作，学所以致用，做事的时候，自然应该利用本人求学时代所学习的东西，拿来应用，不过求学时代，天天在求长进，日新月异而岁不同，这正是求学生活的写照；服务时代，目的在求工作的完成，工作中间，自然也有可以长进学问

* 原载于《中大周刊》第11期，1941年7月6日，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的地方，不过工作的性质，到底和学问不同，工作的内容，是比较单调的，并且常常是重复的，今天做这样的工作，明天还是做这样的工作，后天还是做这样的工作，做惯学术工作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多少要感到乏味；很多青年，入了社会，感觉苦闷，其原因大半在此；我常常有个比喻，演奏音乐，是一种消遣娱乐的事，但是舞台上的音乐家，就是一种工作，就是一种职业，与其说是供给自己娱乐，毋宁说是帮助人家娱乐，尤其在学音乐的时系，天天可以学到命的乐曲，但是在舞台上服务的时候，天天要表演旧的乐曲，退一步说，至少是表演旧乐曲的时候多，学习新乐曲的机会少，这就是求学和工作根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工作中求长进，求兴趣，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至于天天要找新工作做，而厌倦旧工作的重复单调，就是不明了工作的性质，不认识社会和学校的异点。

第二要对人事能适应　以上是就工作的内容，来说明社会的特性，这里还要从人事的关系，来说明社会的应付；整个社会，无非是人的集合体，我们的学校，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不过这里的情形，是比较来得简单，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各人的性格，有缓急宽窄种种的不同，我们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往往是就习性相近的人，多与往还，习性不同的人，就少与周旋，这是比较可行的事；但是入了社会，情形就与此不同，你的左右，你的上下，有各种习性不同的人，不论在职务上，或者业余间，多是要有接触，多是要有往来，彼此之间，如何多要相处融洽，这对初入社会的青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青年，个性太强，到处与人落落寡合，甚至自视过高，始终与人格格不人，结果随地荆棘，终身潦倒，这对个人，是一种失败，对社会，是一种损失，因此如何适应社会，是初离学校的青年一件重要的事。

第三要对事业求建树　上述两点，一讲工作，一讲人事，是比较偏于消极方面；一个青年，假使对于他所做工作没有兴趣，对于他所

处的人事，没法适应，那么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做事的成绩；消极方面，没有困难，那才可以进一步来求事业的改进，实现个人对于社会国家的积极改进；现在我们正处于抗战的大时代，同时建国工作，也在积极推进，社会国家，需要人才，如此其殷，我们知识青年，受着国家多年的栽培，现在毕业离校，正是献身国家的时候，我们应当竭尽我们的智力体力德力才力，诚诚恳恳，轰轰烈烈，来替国家做一番事业，换句话说，要在事业方面，求得建树，一般老年人的自守格言，往往是说“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我们青年人的自守格言，应该要是“既能无过，更求有功”，这才是真正的青年精神，真正的报国精神。

最后，还有一句话，奉劝毕业同学，青年离了学校，一方面要能适应社会，一方面还要不受社会同化，换言之，青年好的精神，还要能始终保持，这是社会上的新分子，新活力，尤其在我们青年自己，应该注意保存这种优点。

大学课程*

胡焕庸

诸位同学：

今晨我在六点钟的时候就跑到中渡口码头等船，预备及时赶到分校，同你们讲话。谁料今天的雾大得很，轮船没有能开，于是我雇了滑竿赶来，到此地时已是十二点钟，把讲演的时间错过，很是抱歉。好在陈训导长因事不能来，我就利用这时间同你们谈谈。

诸位今日进了中大之门，可谓是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在踏进社会之前，一个最后的求学时期。本年招生，投考者共达一万三千名，而录取的仅一千名，诸位也就是这些幸运儿中之一分子。不要以为考取中大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三人中取一人，也并非易之。再想，诸位自己是进了大学了，诸位初中高中的同学，有几个是能享受同样的幸福的。抗战至今，也已有六年多，现在是胜利在望，而各生的情绪竟不如抗战初期激昂。此种缘由，姑且不必去讲他。我们希望于诸位的，是要诸位，不荒废这四年的光阴，不辜负我们的校长对我们的期望。须知校长之兼本校校长，其目的在培养大批人才，以备日后建

* 本文为胡焕庸 1943 年 11 月 30 日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对新生的训导演讲记录稿，原稿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国立中央大学档案中。

国之用。我们能不常常警惕自励吗？

做人本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的畸形发达，不能算是健全。平时我们对于物质的、体格的缺陷，很容易察觉。对于精神的、才能的、品格的缺陷，不易知道。因此我们的发展，是不平均的。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育应该自责。我们每个大学毕业生，在学识上多少是有相当成就，可是到社会里去后，是否能适应环境，这是另一个问题。过去的教育太注重知识的训练，忽略了做人的道理，因此所产生的学生，也就不能适应一般社会标准，尤之乎一个不合标准的灯泡，不能安置于一定的灯头上一样。时至今日，我们感觉到了这种疏忽所造成的不方便之严重性。为此，今后教育的目的，要对做人的训练，合群的准备，特别加重。

诸位进大学，大概普遍的有下列两种情绪：（一）莫知所从，为的大学不比中学，课门十分多，一个刚进大学的人，往往不知如何选择。（二）一般学生以为进了大学就可以读专门的东西，岂知大学一年级仍是普通课目，也许也就因此感觉无趣。但大学一年级所以仍是普通的课目，也有其原因。我们研究学问须有良好的基础，须知 everything of anything 及 anything of everything，大学一年级的课，全是打根基的，基本的。而且与日后的学科有连带关系，不可不读。我们求学问，一方面要它精而专，另一方面要它深而博。所以我们对于一般的课程，都要有相当的根底。各位不要看本校有这么多不同的院系，其实，每个院系都有连带关系。你们在编组试验后，即将正式上课。如果发觉对学主学科不感兴趣，一年级后尽可转系，没有关系。

转系之事，现在毋庸急之。而所急需要做的是尽量利用一年级的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国文。说起来也可怜，大学毕业生中中文不通的人多得很，这些人到社会上去工作，真是痛苦。再看你们这批新生的中文程度，能够通顺的，有多少？现在是读国文的最后机会，不可不

努力。

其次，我希望你们把英文弄好，至少也要能通顺。中大学生的英文程度，向来就比较差。你们瞧留学考试起来，中大学生常常比不过金陵、清华等校的学生，这也是因为英文成绩太差的缘故。现在大学中的课本，多半是英文的。一个学生非要充分了解英文，才能够利用它。所以对于英文又是不可不注意，不可不努力的一门。

倘若你们能在这一年中把中英文弄好，则终身受益匪浅；

我前面已说过，你们如对自己的主学科不感兴趣，可于一年级后转系，但这不是毫无限制的。一个条件是要你国、英、算三门功课，分数都在七十以上。如果你合乎这条件，没问题的，准你转系。可是也有例外，假如你是第二次招入的新生或录入第四志愿者（即因成绩不够其志愿院系之标准，同时却够其非志愿院系批准，而被录入该院系者）就不能享受转系的权利。

选院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学生常有错选院系的倾向，有些当然是因为莫知所从，有些却是为迎合社会潮流，及一时之需要，违反了自己的志愿，选了一个自己不长的学科，其结果当然不好。事实上今日所需之学科，明日或就成为不需要，所以我们选科系，要凭自己的兴趣。何况今日中国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不应看见有利可图而牺牲了本身志愿去选大家都选的那一系，这是应该注意的。

学校里有两类各趋极端的人物，即（一）死读书的人与（二）死活动的人。这两种都不好。人说死读书的结果是读书死，这很有点道理。因为拼命读书，往往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健康一坏，其后果不难想象。去年有一位四年级学生，患第二期肺病。医嘱休养，但他以只有三个月就要毕业，倘使休养，势必要丢弃一年来的功夫，因此不听。最后考试虽是参加了，毕业名册上虽也有了名字，可是考完后他也病倒，就没有再起来过。再看去年所招新生一千五百名中，今年仅

七百余名升到二年级。什么缘故？也是因为身体衰弱被淘汰。即以今年之新生而言，如我们严格执行体格检查，则至少有十分之一不能进来。所以身体非常重要，死读书的办法要不得。

另外一个极端，死活动，也不好，因为死活动就不能顾全学术了。

所以学问虽然重要，身体也需顾到，身体虽然要强健，学问也不能疏忽。做一个健全的人，学问、身体、才能、品行都要兼顾，都要完善。人是整个的，又是多面的，发展须力求平均。我们大家有一个缺点即态度消极，对于什么都无所谓，这是不对的。人是共同生存的，大家的事须由大家去努力去负责。我们在校中要读书、运动、服务，同时兼顾，并且好为支配，这样四年的光阴始不致虚度。中大向有好学之风，可是对于社会事业，团体活动，不尽热心。我们要做建国人才须（需）要全盘发展，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团体的一分子无足轻重，要一变观念，成一积极人物，应不负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地学革命与地理教育*

胡焕庸

一、地学革命的内容和意义

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尽量向分科方向发展；从50年代以后，各门科学又趋向于互相联合、多方合作，全面探讨科学的整体性，因而产生了许多边缘科学。

至于地球科学，它已经产生很多分门科学，如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生物地理学、地质学、地理学乃至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等。地理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地球表面部分，特别是陆圈、水圈、气圈、生物圈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地理学是研究地球面部的；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的物质组成和它的发展历史的；地球更深的内部则是地球物理学或地球化学等的研究领域。在二三十年以前，这种想法似乎是很自然的，各学科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分头工作，很少联系。

在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地球物理学者、地球化学学者、地质学者、地理学者乃至生物学者，越来越多地相互交往、互相学习，既分工，

---

* 原载于《地理教学》1980年第2期。

又合作，以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近二十年来的地学革命，特别是大陆漂移一海底扩张一板块构造三种学说相互结合，导致 1968 年所宣布的地学革命——新全球构造论的建立。它象征着一次全面性的科学革命，不仅是地球科学本身的革命。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也承认，这是影响到整个科学界的一次大革命。这一科学革命不仅把地球科学内部各门学科都互相联系起来了，而且也把地球科学进一步同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乃至现代生物学等都互相结合起来了。

这次地学革命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例如过去地质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完全集中在大陆部分，而对于占地球面积 70% 的海洋几乎极少注意。现在由于精密回声测深仪、深洋底钻探技术、古地磁的研究、同位素定年法的利用、海洋地质学以及各种地球物理手段的蓬勃兴起和发展，我们不仅取得了具体而详细的洋底地貌地图，而且根据地震的研究取得了地球内部的物质和运动的更多知识。根据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以及从人造地球卫星所取得的遥感遥测资料，不仅全面详细地了解到地面的各种地物地貌形象，而且可以了解到地面以下的构造和矿藏情况。通过遥感遥测不仅取得了海洋面部的水温、水流等资料，而且可以测知地面的重力异常、大地热流和地磁场等情况。再加上电子计数机的帮助，对于大气（气象）、水流、测量制图等都可以迅速全面地完成各种计算研究和分析制图工作。正是借助于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促进和帮助了这次地学革命工作的完成。

1912 年德国青年学者魏格纳发表大陆漂移说，一时引起世界上许多学者的极大注意。可是由于当时科学数据特别是地球物理方面的数据不足，无法解决大陆漂移的驱动力问题，因而遭到一部分地球物理学者和地质学者的反对。魏格纳热心于格陵兰冰盖的探险考察工作，1930 年，在大陆冰盖从事长途考察的旅行中，刚度过他的五十诞辰时

就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随后，大陆漂移说也就沉寂了达三十年之久。

英国剑桥大学是世界闻名的、有高度创造性的地球物理研究的一个中心。近代兴起的古地磁学派以及由此而发展的磁极移动和大陆漂移的具体资料，都是剑桥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几个青年研究人员研究所得的成果；特别在1956年欧文和郎康利用古地磁资料既说明了磁极移动的问题，也支持了大陆漂移的学说。以后经过更进一步调查研究，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拉蒙特地质观测所、新库西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各国专家从事海洋的调查测量和洋底钻探工作，完全证实了这些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赫斯和迪茨根据洋底磁条带的记录，借助于同位素定年法，发表了洋底扩张说。随后，对于洋脊断裂带、洋沟俯冲带和转换断层等，根据各种资料弄清楚了它们的成因和性质，海洋地质学放出了异彩。全部事实证明，洋底扩张不仅带动了大陆漂移；而且表明现有世界洋底年龄都不超过2亿年，今天的洋底是年轻的，在此以前洋底肯定有过多次的张开与闭合的过程。同时，根据现在的资料，推知过去大洋的发展可能经历过六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像东非裂谷所代表的胚胎期；红海所代表的幼年期；大西洋所代表的壮年期；太平洋所代表的老年期；地中海所代表的结束期以及像喜马拉雅山所代表的板块缝合线的残迹期等。这些事实都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各种科学证据也都证明确有其事；尽管还有少数人在怀疑，但客观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根据古地磁和同位素定年法等确立了洋底扩张理论以后，板块构造学说已经建立了巩固的理论基础。洋脊、洋沟再加上同洋脊垂直的转换断层，这是板块边缘的三种界线，在洋脊附近，有火山喷发，有浅源地震，并且有较高的热流值，这是板块的生长带；在洋沟附近则是板块的消减带，密度较大的板块俯冲到密度较小的板块之下。板块

俯冲在不同深度的地方，分别产生浅震、中震和深震。在洋沟附近还有强烈的火山作用，或者形成岛弧，或者发生在仰冲板块的边缘形成狭长而高峻的山脉。就全球而论，一般分为六大板块，除太平洋板块全部是洋壳外，其他板块都包括陆壳和洋壳。除六大板块外，还有许多较小的板块。洋底的扩张与消减同时就产生板块的移动。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这是由于岩石圈板块之下，在地幔中有一种缓慢的对流运动，它能够带动板块发生移动。过去，魏格纳对于大陆漂移，认为是大陆在洋壳上漂移，有如海洋中的冰山那样。但洋壳本身属于固体，这种漂移是不可能的。现在根据地幔对流学说，包括大陆和洋壳在内的岩石圈板块，类似传送带那样在地幔上移动。尽管目前还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根据地震数据，在地幔上部的软流低速层具有塑性特征，因此产生对流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解释现已取得多数地球物理学者的认可。大陆漂移说经过多年的沉寂，现在由于洋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理论的建立而得到了证实，也更得到了发展。

1968 年根据板块构造学说而提出的“新全球构造论”已成为地学革命的基本理论。1974 年国际地球物理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的年会中，接受了以板块构造为基础的大陆漂移学说。它不仅已经取得了绝大多数地质学者的支持，还得到了绝大多数地球物理学者的承认。因为今天的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大陆漂移三种学说组合而成的新全球构造论，它不是仅仅建立在单纯的地质学基础之上，而是利用了多种地球物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后得到证明了的。关于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大陆漂移的证据，不仅能够全部应用在从寒武纪以来的显生代中；而且利用古地磁和同位素定年法等已经取得了大量的证据，可以向前推溯到元古代和太古代时期。地球的年龄经地球科学家测知为 46 亿年，现在所查到的地面最古老的大陆岩石年龄为 38 亿年。太古代的受到变质的岩层，现已分辨出是由沉积岩、岩浆岩经过多次构造运动而形

成的。地质学者已经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大陆古老岩层都是经过了洋脊、洋沟生长消亡的演化过程；虽然经过多次轮回，但它们变动的痕迹和格架现在还是可以确切地分辨清楚的。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次地学革命并不是某一单独学科的学者所能完成的，而是经过有关地球科学的各个方面的学者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它利用了古地磁学、地震学、火山学、岩石学、地层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海洋地质学、地球化学、懈求物理学、地热学、矿床学、古地理学、同位素测年学以及遥感遥测和电子计算机等各种新科学新技术。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新全球构造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反过来，已经形成了的新全球构造理论模式又为各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最典型的例子是地震学，它在理论和实际观测上为板块构造理论提供了板块运动的原因和机制，成为板块学说的支柱之一；而板块构造理论又反过来成为阐明引起地震发生的基本原因，以及成为地震预报乃至最终控制地震的一种潜在的有力工具和可靠的新的研究方向。其他诸如岩石学、火山学、矿床学等都为板块的演化过程和机制提供了依据。而板块学说又给人们对地球以新的认识，因而又可以用板块理论去寻找更多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以及能源等。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今天把新全球构造论看作是代表科学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新论点，并非过甚其词的。

二、地理工作者应有的认识

以上十分简略地说明大陆漂移、洋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等学说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完成了这次地学革命的大业。这主要是由地球物理科学各部门以及地质科学各部门分别作出的贡献。我们地理工作者对于这个新全球构造学说应该如何看待，这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我过去在讲授“各洲自然地理”和“古地理学”课程时，就曾遇到许多困难。例如，当时已知洋壳是属于硅镁质的，而陆壳是属于硅铝质的；但是对于这两者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就不是很理解了。为此我个人曾提到过乔治·达尔文的设想：太平洋洋壳上部的硅铝层已经脱离了地球而变成了月亮。虽然我当时也并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但还是介绍了他的这种设想。又如，对于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只能指出这是事实，但无法解释其原因所在。环太平洋的地震火山带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很深的洋沟，但为什么在东亚有漫长的岛弧，而南北美洲之西却没有岛弧。我们也了解到日本列岛以及其他洋沟向陆一侧所发生的地震，有浅震、中震和深震，其中深震震源在海底以下700公里的深度，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地理工作者对于大陆和海洋的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理解，但在当时却无法解释。经过地学革命确定了洋底扩张说和板块构造说，根据洋底实测资料以及古地磁和地震研究所观测到的资料，证实了洋底确实在生长扩张中，洋脊是板块生长带，而洋沟是板块的消减带，这些都是已经被确认了的事实。目前对于洋沟俯冲带的研究越来越详细，最近报道，研究工作者乘着潜艇深入洋沟底部，亲眼观察了它的底细。地球物理学者和地球化学学者都已提供给我们相当详细的资料；有些问题确实是属于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专业的问题，但地理工作者对于地球科学的这些基本理论和事实是绝不应该漠然置之的。为了阐明地球表面大陆与海洋的差别，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问题。关于陆壳与洋壳的差别，大西洋海岸与太平洋海岸的差别，有岛弧海岸和无岛弧海岸形成的原因，以及浅震、中震和深震的不同性质机制等问题，从板块学说都可以得到比较确切的解释。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在过去近200年来对大陆地质的研究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但是对于占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二的海洋过去研究得

很少，只孤立地去研究大陆是难以看清全球构造的全貌的。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海洋地质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许多问题都是属于革命性的发现。我们地理工作者应该大量利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然地理学的内容。例如对于大西洋中部水下山脉的存在是早就发现了的，但只是在洋底扩张和板块学说建立之后，才对它有了真正的全面的了解。可是，至今有些地理书、地质书还把它称为水下山脉，而不提它是洋脊、断裂带、板块边缘活动带和板块边豪增生带等，好像这些水下山脉同大陆上的一般山脉是类似的，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地质学者对中国大陆板块构造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去年王荃、刘雪亚两位同志提出了《扬子陆块的漂移与冈瓦纳古陆的早期活动》（载《长春地质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一文，根据作者的研究，我国大陆现可确定出六个板块：藏南板块、扬子板块、塔里木板块、柴达木板块、中朝板块和合江板块。众所周知，我国南北两方地质历史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绝不是一条山脉的阻隔所能形成的。据作者意见，扬子板块同冈瓦纳大陆有许多近似之处，因此设想，藏南板块和扬子板块都是从冈瓦纳大陆分离漂移过来并碰撞缝合而联合的结果。当然，这方面的更多更有力的证据还有待于继续深人研究，但这种设想是符合板块构造理论的原则的。印度半岛属于冈瓦纳大陆，19 世纪末奥地利地质学者徐土（现译为修斯）就提出来了，我国地质学者近年在西藏多次考察中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自然地理，还是研究世界自然地理，我们都必须根据新全球构造论的理论来进行探讨分析。我们总不能说这些更多的是属于地质学的研究范畴而漠然置之。

又比如，我们在考虑古生物的分布以及世界现代动植物区系的分

布情况时，如果不以大陆漂移的理论来加以分析研究，大量的事实是无法理解的。就南美洲和非洲来说，两者有许多陆上动物是类似的，如果不用冈瓦纳大陆的分解来说明那是难以解释的。全北区动植物的近似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南美动植物区系的独特性，都必须应用大陆分合和漂移的过程来加以说明，否则难以解释。

此外，对矿藏的地理分布，我们地理工作者是必须了解的，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地球上的矿藏，其分布并非杂乱无章毫无规律的，现在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已知，矿藏形成的时期和地区都同板块构造的演化过程有关。洋脊生长线、洋沟消减线，各有特定产生的矿藏；我们既可以根据矿藏的分布来推论当时板块分布的情况，反过来，也可以根据板块的边界线来推测特定的矿藏。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不再多述。一句话，我们地理工作者必须了解现在和过去板块构造的演化过程，以此来理解矿藏资源的成因和分布规律。

总之，地理科学是地球科学的一部分，地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与其他地球科学如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是有所不同的，但又不可能截然分开。这次地学革命虽然偏重于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几个方面，但地理学既然要研究陆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等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不同它们发生联系而孤立地进行地理研究。因此，我们地理工作者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关注这次地学革命。

Chapter 07

第七章

忆师友

忆刘师伯明*

胡焕庸

刘师伯明弃吾等而长逝者，于今九稔矣。然其仪容神态，言论风度，犹仿佛于北极阁下鸡鸣山前，宛然可以闻见。后之闻其名者，无不肃然起敬，悠然神往，愚夫兴，懦夫有立志。如刘师者，其教人之诚，感人之深，虽古之大师不能过也。

刘师于民国八年掌教南京高等师范，适余亦于是年考人文史地部。刘师初任训育主任，继任文史地部主任，及南高改东大，刘师乃任文理科主任，兼副校长。民国十二年与余同年入学者皆毕业离校，刘师亦遂于是年初冬因病谢世。刘师在校时主讲哲学，余则专习史地，故课业学问余所受于刘师者甚少，然其思想言论行为道德，余受其感化者至深且巨。下列三数事，余至今犹日夕萦其脑际，片刻莫能忘。

民国八年，全国教育发生一极大转变。前此之教育，宗旨在养成一般好学严谨之士，对于学生行为才能之训练，绝少注意。五四以后，风气丕变，各校训育因而改革，前此注意静的约束，以后多注意动的培养；以前偏主知识的灌输，以后渐重干才的训练；以前只有消极的管理，以后渐加积极的教导，民国八年之南京高师，亦有此种改进，

* 原载于《国风》杂志 1932 年 11 月第 1 卷第 9 期。

彼时新将学监取消，而代以训育主任。主其事者即为刘师，努力提倡学生课外活动，注意完人训练，学生自治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等，即于此时应运而生，蓬蓬勃勃，犹如春笋怒发，旭日方升，全校师生，无不精神焕发，兴趣活泼，治学成绩斯时最佳，撰述译著盛极一时，是为南高之黄金时代，饮水思源，固莫非刘师主持规划之功也。又刘师尝谓大学最忌位于政治中心，学者如过事活动，而废弃学术，则危险莫甚，于此可见刘师对于学行并重之主张。盖学者因学而弃行固不可，因行而废学则尤不可也。后日浮嚣之学风，大都因过重活动，轻视学业而养成，如此流弊，刘师盖早见及之矣。

又刘师常言在团体中，“人的接触”与“人的关系”为不可少，彼此如有隔阂，则误会生而纠纷起。社会若不能以情感相维系，而一切归于机械化，则人类生趣绝矣。刘师有此主张，故其主持校务，一本至诚，坦然大公，蔼然可亲，及其病殁，全校师生无不痛哭。

初同级学友将毕业，刘师特招而训之，谆谆教诲，历两小时之久，其中予我印象最深者，莫过于下列数语：“君等方在年少，外出就事决不可畏繁剧，教课而外，当同时担任职务，此君等应有之责，亦不可废弃之练习机会也。”斯语也，余至今仍服膺不舍，所受刘师之赐多矣。

尝忆当年美国杜威博士来华演讲，刘师任翻译，二人每并立，一则鹤发童颜，一则面黄肌瘦，相形之下，余固早为刘师惧，而孰知其不及两年即逝世耶。今余追念刘师，犹不禁悲从中来，吾等将如何奋发自励，俾能继承刘师之志，而得副其所望，愿与诸学友共勉之。

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

胡焕庸

竺可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今年是竺先生诞生90周年，特撰此文纪念。竺先生是我受业的老师，我接受过他几十年亲自对我的教诲。春风化雨，教泽广布。竺先生过去对于近代地理学、气象学如何钻研、如何著作、如何创业、如何启迪后生？他如何经过毕生不懈的努力，成为闻名中外的伟大科学家和教育家？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建立东南大学地学系（1920—1928年）

竺先生于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秋获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地理和气象学。1920年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继又改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任教。

南京在明初设立国子监，类似今之国立大学。清末，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在原址建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设有文史地

* 原载于《百科知识》1980年第11期。

部，竺先生任地理、气象教授。1921 年，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随后改为地学系。当时竺先生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仅仅成立地理系，它的范围不免过于狭窄，难于全面发展。当时成立的地学系，内容包括地理、气象和地质、矿物四个专业，既便于互相补充，也有利于以后的发展。这是竺先生的高瞻远瞩和雄心壮志。事实也是这样。1921 年成立的东南大学地学系，经过 10 年，到 1930 年即发展为两个系：一个是地理系（包括气象），一个是地质系（包括矿物）。当时学校名称已改为中央大学。以后到 1944 年，地理系中的气象组又单独成立气象系。至此，竺先生原先的计划就完全得到实现。

1923 年竺先生亲自写过一篇《东南大学地质地理系介绍》，发表在英国《地理教师》杂志上。这篇介绍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正可说明当时竺先生的计划和理想。

当时东南大学地学系，除聘请几位地质学教授分任地质、矿物、岩石和古生物等课程外，竺先生本人主要担任地理和气象方面的课程，如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

当时的地学通论，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自然地理学，不仅是当时地学系学生所必修，也是文理科各系学生所共同必选的课目。竺先生当时编的讲义如《气象学》，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竺先生所讲的世界地理教材，不仅包括自然部分，也兼及政治经济部分。他不仅自己写过《欧洲之现势与将来之危机》（《东方杂志》1921 年第 18 卷第 9 期）等文章，还指导我们学生翻译鲍曼所著《战后新世界》一书，192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竺先生所治的专业是以气象气候学为中心的，他又结合本国实际特别着重中国气候的研究。科学的气候学也正是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基础。我们也可以说，竺先生一生的专业，成就和贡献，正是以中国气候和中国地理两方面的综合研究为重点的。

在当时的旧中国，气象测候事业极不发达，全国仅有的几十个气象测候站，都控制在垄断着中国海关行政工作的帝国主义分子手里。当竺先生回国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夺回这一主权，发展中国的气象测候事业，并著文《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强调气象测候事业对于农业、航海、航空和水利等方面的实用价值。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的计划尚未实现以前，竺先生首先就在东南大学地学系成立南京气象测候站，购置各种测候仪器，聘请专人每日定时观测。以1922年起，每月刊行南京气候报告，同国内外有关单位相互交换。竺先生除建立气象测候站以外，还建立了岩石标本室、矿物实验室等。他认为这不仅是建设地质矿物组所必需，而且对于地理组的同学也是十分必要的。他每次率领地理组同学进行野外实察时，十分注意收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标本并向国外采购一些标本，加以充实。因此，几年之内，这些标本室和陈列室就具有一定的规模。

竺先生讲授地学通论，经常率领学生在南京附近进行野外实习，如紫金山、汤山、栖霞山、龙潭、方山、牛首山等地，不止一次地进行实习考察。根据实地情况，解释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科学道理，以充实学生的实际知识，并培养学生实地考察和具体分析的能力。

竺先生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起，就每天记日记。他特别重视每天天气以及物候演变的情况。他亲自观察、记录、研究、分析这些具体资料，经过长期辛勤的积累，成为他编写如《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论新月令》，以及他晚年所作的《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等著作时极为宝贵的资料。他的这些日记，几十年从不间断。可惜他早期的日记在抗日战争中全部遗失。现在还保留着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即逝世前一天）共38年零37天的日记。这套总数约达800万字的日记忠实记录着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的演变，反映了竺

先生为人和治学的勤恳严谨。这些日记资料，不仅供我们了解竺先生的工作历史，而且对于气候学和物候学的研究也是极为珍贵的宝库。

1925 年东南大学发生校长风潮，竺先生愤而去职。接着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一年，继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年。1927 年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竺先生受聘重回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地学系主任。同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要竺先生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1928 年秋，我从法国留学回来，竺先生就用合聘的方式，要我以一半时间在中央大学地学系任教，另一半时间在气象研究所任研究员兼秘书。从 1929 年起，竺先生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大地学系由郑厚怀先生任主任。1930 年中大地学系分成地质、地理两系，我辞去气象研究所职务，专任中大地理系主任。竺先生离开中大以后，还不时来到中大指导，并向学生作学术报告；还多次在中大出版的《地理杂志》发表文章，其中较重要的有《中央大学地理学之前途》《地理教学法》《中国气候区域论》等，俱见竺先生一向重视地理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意义。

创建气象研究所（1928-1937 年）

气象研究所于 1927 年开始筹建。不到一年，宏伟的气象台耸立在南京北极阁的山顶上。北极阁旧称鸡笼山，也叫鸡鸣山。公元五世纪时刘宋在此建司天台，元代建立观象台（1341 年），明代建立司天台。明天启七年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所载鸡鸣寺图中标有“司天台”字样。

竺先生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达十年之久，隼路蓝缕，披荆斩棘，建所址，购仪器，广延人才，从事观测研究。同时还在国内各地陆续增设气象站。

竺先生鉴于青藏高原对于东亚季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1933年就计划在西藏拉萨建立气象台。他问我有无适当人选，我推荐当时刚在中大地理系毕业的徐近之。拉萨气象台建成后，每日向南京发来气象电报。这对全国天气预报和季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竺先生的卓见宏谋，于此可见一斑。

在竺先生主持气象研究所的十年期间，培养、集中了许多气象专业人员，研究和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气候方面的专门论文痢丛刊，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台风、季风、中国气候要素、中国气候区域以及中国气候的变迁等。日积月累，中国气候学的基础建立起来了。这些既是气象气候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科学的中国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主持浙江大学（1936-1949年）

竺先生素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长期的具体实践中终于觉悟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36年竺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战火蔓延，学校被迫迁移，先从杭州迁到建德，再次迁到江西吉安、泰和，继又迁到广西宜山，辗转跋涉五千里，于1939年底到达贵州遵义和湄潭。在此期间，竺先生早期二十多年的日记，不幸就在此时遗失。1938年夏，他为浙大迁校事到重庆教育部洽商，不幸他的爱人张侠魂和二子竺衡在江西泰和同患重病，校中也电催竺先生回去。待公事办完回到泰和，二子已经去世，没几天爱人也去世了。于此可见竺先生公而忘私的严肃认真精神，但这对竺先生又是何等巨大的打击！当时竺先生孑然一身，照常办理公事；全校师生，莫不感动。

竺先生在浙大期间，尽管正当八年抗战，迁校跋涉，他还是先后

发表了近 40 篇文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杭州之气候》《中国之温度》《徐霞客之时代》等论文。

大约在 1941 年，竺先生因公到重庆，我陪他在沙坪坝散步。当他看到一家书店叫“沙坪书屋”，陈列着一些西文书籍，便进去如饥似渴地翻阅了好几本书，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之久。当时竺先生正在研究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到处寻找可能有用的材料。他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第一篇文章就是在 1944 年抗战时期发表的。

1940—1945 年，浙大在迁至遵义、湄潭期间，竺先生千方百计提高全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同时也更注意培养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几年中、在几门基础科学方面都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从浙大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毕业的学生，现在在地理科学各个方面如冰川、沙漠、河口、海岸、大气物理、遥感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已成为领导骨干力量。竺先生主持浙大 13 年，单在地学方面所出的人才和成果，就是一大贡献。

在中国科学院（1949—1974 年）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多方设法迫使竺先生同去台湾，而竺先生坚决拒绝。在上海避过反动派的搜寻，迎接了全国解放。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竺先生的为人和学术贡献，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入党时表达他的意愿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20 多年来，竺先生筹划了全国地学科研工作，组织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还亲自参加黑龙江、新疆、甘、青、宁、蒙以及云

南西双版纳、广东雷琼地区热带生物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北沙漠等实地考察工作。在五十年代，他主持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对于整个中国地理的考察、研究和编写工作，都是在竺先生主持之下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和出版也是在竺先生主持下完成的，竺先生还写了《十年来的综合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序》等总结性文章。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是国内规模最大、科目最全、失才最多、成果最富的地理研究单位。在全国各地，地理研究所以及同地理研究所有关的分支科学研究所总数已达 30 个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我国地理科学的研究工作已由早期的草创时期，逐渐发展进入了开花结果的时期。它们的发展，是同竺先生的创建和长期努力分不开的。我国综合性大学虽不是都有地理学系，但全国高师院校的地理系科已达一百多处。

组织并参加学会活动

中国科学社是当年留美学生中一部分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科学团体，长期由任鸿隽先生负责。竺先生也是这个社的重要成员之一。这个社从 1915 年起就编辑出版《科学》杂志。竺先生在《科学》第 2 卷（1916 年）各期中发表了《中国云雨量及风暴说》《朝鲜古代云测雨器》《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四篇学术论文，这也表明，竺先生还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的时候，他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就是气象学与地理同时并重的。

竺先生长期以来有志发起组织中国地理学会，1932 年发表了《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之后，1934 年 3 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正式

成立。张星炽、董绍良、翁文灏[①]为理事。解放后，竺先生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分会已遍及全国各地，会员总数已达6000多人。竺先生还长期是中国气象学会的理事长。从1918年开始，竺先生领导我国气象学气候学的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先后近60年。在这期间，他撰写的气象气候论文近一百篇。至今全国各地气象气候的教育单位、科研单位和观测单位，许多高级教育和科研人员大都是竺先生所教育培养的学生。

治学方法与学术贡献

竺先生的治学方法、学术贡献可总结归纳为如下几点：

读书之勤：竺先生从1918年回国直到1974年逝世，在教学、科研以及各种行政工作之余，每天晚间都要翻阅中外图书，直到深夜。他广泛阅读中外古今图书、期刊，所收集的资料文献，非常丰富，因而他能得心应手地进行科研和写作。例如他写《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年），就利用了我国清朝初年编写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以及清代的《九朝东华录》等，上起公元前206年，下迄公元1900年，分朝代、世纪、省区，所有雨灾与旱灾的次数、强度以及分布的区域作了详细统计，分列成四个总表。像这样浩繁的资料，多半是他自己收集阅览、分析、统计、归纳而成的。他每写一篇文章，一定列出他所用的参考书刊。在他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年）一文中，他列出的参考文献就达46种，其中中国文献共21种，其他各种英、日、德、法、俄各种语言的外国文献共25种。一篇论文如此，写作几百篇文章总数将有多少参考文献？正如他自己

① 首届理事还有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王益佳、张印堂。——编者注

所说："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一生专门研究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我从1920年起就研究，50多年了。我想，我们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资料又丰富、又齐全，这是全世界各国所没有的。"这说明了他终生一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重点。

观察之细：竺先生研究气候和地理，十分注意实地观察各种自然现象。例如，他在日记中每天记下天气情况以及各种物候。对于南京、杭州、北京居住较久的地方，都记下了各年各日的物候资箱。就在他旅行中间，也不放弃他的观察记录。1964年，他因事到各地视察，北至长春、大连，南至广州、从化，中经上海、杭州、无锡等地，借走马看花，所得记录与北京物候站作一比较，列为1964年各地春季花期，载于他的《物候学与农业生产》一文中（1964年）。

实察地区之广：解放以来，竺先生几乎跑遍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1958年竺先生到西北各省、区考察，远达伊宁、克拉玛依、和田等西陲地区。在《新疆纪行》（1959年）一文中他指出："我国国土的总面积约三分之一是干旱地区，11%是沙漠，沙漠面积的98.4%分布在我国西北六省区。现在我国治沙规划的总要求是：争取尽快地全面地改造和利用沙漠，实行全面绿化，变沙漠为畜牧业和林业基地，改良土壤，改变气候。"

竺先生曾几次到东北地区考察，著有《中国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气候区域》（1964年与张宝剪合著）0

1957年竺先生和植物、土壤、地理等业同志考察海南岛栽培橡胶及其他热带特种经济作物发展情况，著有《雷琼地区考察报告》，对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地区栽培橡胶以及其他热带经济作物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1957年竺先生著有《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的文章。竺先生根据多年研究，根据我国各地区的自然情况提出了《中原地区的自然

开发》、《内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的开发》、《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区的开发》、《广东琼雷地区的开发》，以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发》等具体计划。

科学见解之深：根据《竺可桢文集》所收集到的60年来竺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共272篇，此外还有大量的手稿、油印稿、书信和日记等都不包括在内。竺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竺先生既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科学气象气候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所发表的气象气候论文中对于台风研究、季风研究、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等，都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

1916年竺先生所发表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一文中对于季风之成因，有他独到的见解。竺先生认为：“季风者，陆地与海水之比热不同，大陆较海洋为易热亦易冷，是故在夏则大陆较海洋为热，冬季则反之。海陆冬夏有如此之变更，而接近之空气亦因以随之。……夏季……其风常自海而陆。冬季……其风常由陆至海。此季风之所由来也」

从三十年代到现在，我国和世界对于季风的研究已有巨大的发展。东亚季风应以海陆热力作用为季风形成的主要因素，这是多数人所承认的，但是，国外还有少数人认为行星风带的移动是季风的主要成因。例如赫洛漠夫定义的季风范围遍布于世界各大洲大部地区，至今国内有些书刊还把南美洲的某部分划定为季风气候区，这是很不恰当的。

竺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热带范围曾和部分苏联学者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辩论。欧非之间的地中海气候带，它的纬度是在35。]\一45。]v之间，而且它的北界1月温度在8七左右，把它称为亚热带气候是确切的。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冬夏气温极端；我国1月8七等温线通过浙南和湘南。但某些苏联气候学者硬把中国亚热带的北界北推到长江以

北 45。此 即相当于 1 月等温线 -16 七处。竺先生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依照温度和植被、农作物各种情况，坚决主张以秦岭、淮河作为我国亚热带的北界。这是一场剧烈的科学论战。竺先生是完全根据科学论证而得到了胜利。

竺先生除研究中国气候与中国地理外，还研究科学史，挖掘古代科学遗产，撰写了许多重要科学论文，给后人示范和参考。

竺可桢先生确实不愧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杰出科学家。他创建的科学理论与科学事业，在我国已经开花结果。我们从事气象气候和科学地理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竺先生，以他为榜样，继续他所开创的事业，为祖国的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怀念柳师翼谋先生*

胡焕庸

一九一九年秋，我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人文史地部，由此奠定了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和方向。

距今一千八百年前，孙吴定都建业（即今南京），始建国学。以后梁兴五馆，宋建儒学，明置南雍（南京国子监亦称南监），绵延不断，清代就国学旧址，兴建两江师范学堂（初时称三江师范，在一九O二年后改名）。一九一五年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又扩充先后改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直至解放以后，又扩建与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等合并成为今天的南京大学。源远流长，在学术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一九年我入校时，郭师秉文任校长（以后在一九四六年我去美时还曾在华盛顿晋见郭师，当时他在联合国任职）。文史地部主任刘师伯明是一位哲学家，当年曾把 **J.** 杜威、**B.** 罗素等学者的学术思想介绍于国内，译著有《思维术》等书。当时校内著名教授有陶知行（以后改名行知）、陈鹤琴、郑晓沧、汤用彤、邹秉文、杨杏佛、秉志、胡先骕、何鲁、茅以升、熊庆来、陈钟凡、吴梅、梅光迪、柳翼谋、

* 原载于《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1986 年。

竺可桢等老师。这些老师都曾对我国学术界作过卓越贡献，如邹、茅两位老师至今还为新中国的四化工作，继续献出余热。当时学校人数少，师生之间，接触很多，亲如家人的情景至今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当时学习的专业是史地，以后更加偏向地理，对于历史学用力甚少；但我对柳老师的讲课，还是重视而且获益很多。柳老师经常开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其次是《东亚各国史》。柳师在我们几级没有开过通史课，大概认为通史比较可以自学；而文化史则更减重于抽象与综合，要从史实中找到精髓，作出理论的评定；在今天看来，更好像是属于研究生院的课程。当时自南高直至中大，都经师生合作，曾经出版过《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地理杂志》《方志月刊》等学术刊物。

柳师讲授的中国文化史，不仅文科的学生要听，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听，足见其内容的精彩动人。当时在校内用铅字印成讲义，以后由钟山书局、正中书局公开发行过。

柳师的《中国文化史》三巨册，约计七十万字，内容博大精深，真是无所不包；从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工商技巧、民俗宗教、货币服饰，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用当今的语言来讲，它的内容，实际上包含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开疆史、学术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也可以说是一部百科性专题史，尤其柳师所用的方法是夹叙夹议；引述一段原始资料，接着一段评论。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我们如再结合老师晚年另一巨著《国史要义》来看，那就不能不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了。

我对于中国田制史，曾经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当我在二十年代中期去法国进修时，曾经携带了一部分中国田制史资料。我去法国时还

曾看过不少俄国革命前乡村公田制的材料，打算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但终因我对地理学的研究兴趣高于历史学，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没有能继续研究历史，我对柳师是感到抱愧的！

在柳师主持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时，我仍不时到馆中请教。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柳师既把龙蟠里藏书妥善安排以后，受聘来中大讲学数载，因得再聆教益，至今京、沪、宁、杭各大学的讲坛尚有柳师的及门弟子担任讲学。

解放后，柳师来沪，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我也奉调来华东师大任教，又得随时趋访请安。柳师年事已高，不胜风邪，终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与世长辞；距一八八0年诞辰，享寿七十有六，上海市文管会暨各方亲友举行隆重追悼会，共表哀忱！

光阴荏苒，史学界巨人柳翼谋老师离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没想到还会经过一段风云曲折。老师生了一子一女，子山己生专攻数学，历任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因教学劳瘁，于一九七七年二月谢世；女定生今已年逾古稀，仍在继承父业，从事著述。长孙曾符自幼长期随侍祖父，研习文史金石。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遭受“四人帮”内乱，党内党外，文化教育界遭受毒害尤其惨重。老师旧居留有古书图籍以至日记文稿信件，收藏甚富，“造反派”视为“四旧”，要悉数焚除，曾符深知文献古籍文化价值，尽力保护，至今老师藏书虽多散佚，遗稿文献犹得保存大部，实多赖曾符珍护搜集的辛劳。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布以后，拨乱反正。依靠党的英明政策，曾符君既已被延入大学讲坛，柳老师许多遗稿、日记，乃至与当代学者论学函札，以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为各方所需要与重视，亦得不断刊行于世，这真可称为祖孙两代的共同喜庆。

当年在鸡鸣山下同窗共学的级友共有三十八人，毕业后历经六十寒暑，如向达、王庸、范希曾、王玉章、缪凤林、景昌极、周光倬（汉章）、钱望新、张廷休等近三十人都已先后作古，也有音问久寂不明现状的，确知尚存者仅徐震瑞、陈训慈、夏崇璞、何维科、张其昀、陆鸿图、刘文翩、方培智（圆圃）、胡焕庸等诸人，也都成为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回忆过去成贤街畔、大石桥头的旧事，展望太平洋上，喜马（拉雅）山前的未来，能不感慨万千，兴我鸡鸣起舞的思想！

胡焕庸左笔于上海华东师大

时年八十有五

乙丑（一九八五）年元月五日晨五点

徐近之教授的学术贡献*

胡焕庸

徐君近之，四川江津人，他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未毕业即参加中瑞合组在我国西北的考察团。才毕业即受竺师之命，去拉萨建立气象台；回来时跟随茶商沿途露宿到达云南。以后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留居多年继续攻读。1946 年回国，先在中央大学任教。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工作 30 多年，著作甚富。年近七旬还想从黄源起沿河作全面考察；但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被迫折返。调养几年仍力疾工作，终因旧病复发猝然而逝。南京地理所于 1987 年为出纪念刊，我作的悼文附刊于此，以志哀思。

徐近之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他从 3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到我国西部地区几次单身匹马作实地考察，当时他还是一个不到 30 岁的青年，因受竺老之命乔装喇嘛进入西藏，创建拉萨气象台，每日用无线电向南京报告天气，作出了科学贡献。先后撰写了《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地理学报》，1934 年），《岷江峡谷》（《地理学报》，1934 年），《西藏之大天湖（腾格里海）》（《地理学报》，1937 年），《由四川绕道甘青入藏手册》（1934 年），《横断

* 原载于《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编者有个别文字处理。

山间露宿两月记》(《新民族周刊》，1937 年)，《民国二十四年拉萨之雨季》(《方志月刊》9 卷，1936 年)，《拉萨旱涝说》(《气象杂志》13 卷)，《拉萨的气候摘要》(《美国气象学会会志》，1941 年）等论文。他还广泛收集中外各方资料，编写了《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四册，在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 年）。1955 年他参加新疆北部天山与阿尔泰山之考察。1977 年他已七旬高龄，还想从黄河上游、中游等地搜集气候资料与考察，终因过度疲劳心脏病发，被迫折返。

近之于 1932 年从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任助教一年，即去青康藏考察，拉萨归来后任原校地理系讲师，1938—1940 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苏格兰的水系同构造和气候的关系》，颇有创新之处。

近之于 1940 年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1940—1942 年）、芝加哥大学（1941 年夏）、哈佛大学（1942-1943 年）继续攻读研究。1943—1944 年在美国地质调查所任技正。1944 年 11 月至 12 月参加芝加哥第二届国际民航会议中国代表团气象地图两组，1943—1946 年任中国地理研究所驻美国代表，平时经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学术研究。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到美国进修考察，1946 年受马里兰大学之聘，任兼职研究教授，在华府与近之同在国会图书馆从事研究几个月，见其生活俭朴，攻读不息，因促他早日回国到母校任教。他从 1946 至 1950 年到中大地理系任教授，我于 1947 年 2 月回南京同他朝夕相处。解放后，我去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近之受竺老之召到北京，曾看我几次。1950—1953 年我参加治淮工作，近之也对淮河考察几次，发表多篇文章，当时他在南京地理所，曾用大量时间，研究黄、淮流域历史上水旱灾害，利用各地方志收集大量数据，整理出《二千年来的历史气候资料汇编》共 14 卷约 300 万字。从 1953 年

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第21卷第2期)，1973年的《黄河下游与淮域水涝规律初探》到1981年的《宁夏陕石(青铜峡)水志的科学价值》(南京地理所专刊)，这些都是近之后半生对我国历史气候所作重要学术研究。

近之读书之勤，写作之多是惊人的，如他写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第一次至第十五次》(《地理学报》16卷，1950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国之重要地理工作》(《地理学报》14卷，1947年)，以及发表在英国《苏格兰地理杂志》的论文等。

地形学是近之多年从事的专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形学教授岳汉生(D.W.Johanson)先生大事记》(《地理学报》14卷1期)，《德国柏林大学地形学教授地学大师德国彭克(老)A.F.K.Penck事略》(《地理学报》12、13卷合期，1946年)都是精湛的学术著作，非浅学者所能执笔。

近之在南京地理所时期，先后以20年的时间，完成《法、英、德、汉地质学暨地表形态学词汇》这一巨著，最先于1962年试编德、汉地表形态学，1963年试编英汉地表形态学，1966年试编法、汉地质地表形态学词汇初稿，以后陆续增补，并向全国同行征求意见，历经修改，最后于1977年定稿，分为三册，正式出版。不是深知各类专业名词的确切意义，并把法、英、德、汉各国习用名词准确对照，是无法完成这项巨大工作的。

近之所著的专书论文为数很多，远不止上述几种，由于八年抗战，十年内乱，许多刊印过的文稿，也都亟难收集，他的同窗好友杭州大学地理系名誉系主任严德一教授，整整花了五年时间，多方采访，为他作年表与著作目录，但还是不够完整。现行刊物只刊短文，不能登载长篇，严君还为他制作旅行路线地图，严君认为近之考察范围，远远超过徐霞客的行迹，近之当年入藏，地方政府还处于半独立状态，

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操纵，因此不得不乔装前往。当时设立气象台每日发电报，虽是科学工作，还不能不在秘密状态中进行。1936年近之由西藏回川，并无现代交通工具，他随茶商马帮前进。马帮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露宿，靠一条毛毡御寒，往往醒来已被厚雪覆盖。为此昼行夜宿，历时两月才达云南，又经滇越铁路绕道海路回到南京。其艰难困苦的情况，生活在今天社会的人士是难以想象的。

近之为人过于耿直，不肯苟同。他坚持用地表形态而姝同意“地貌”一词，这不免过于固执己见。近之的学术成就是客观事实，他是一个早年拓荒者，他当时以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单身匹马作万里考察，他的成绩应该肯定。许多人藏考察的人都曾利用他的《青藏自然地理》一书，去作调查研究的。古语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对于科技事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应采取这样的观点，特别希望当今的青年地理工作者，认真学习徐近之教授毕生从事边疆考察的刻苦精神，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痛悼李旭旦教授*

胡焕庸

我出生于公元 1901 年，先一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国首都，接着就缔结了辛丑辱国条约。不到两年，担任塾师的我父亲又因病去世，国难家忧汇集于我初出世的一身。幼年我就读私塾时，常见我的塾师搂抱其爱子教他读书写字。我目睹此情此景，一面含泪高声朗读，一面默誓我将继承父志，努力攻读，日后必以培育后生，为我毕生志愿！

1919 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我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翌年竺可桢博士来校任教，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创立地学系，培养了一批地学专业人员。以后我去法国进修，于 1928 年回到南京，当时竺师正在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就把他原任的中央大学课务交我接任。1930 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理、地质两系，校部聘我担任地理系主任。

李君旭旦，江苏江阴人，1930 年被保送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扎实，读书勤奋，写作文笔流利，外语阅读能力甚强。四年级时即与同班同学任美锷合力把法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 J. 白吕纳所著的《人地学

* 原载于《国外人文地理》1986 年创刊号，南京师范大学汤茂林教授及编者有个别文字调整。

原理》的英译本，翻译成汉语，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译本不仅内容正确，而且文字流畅，我曾为之写过一篇长序，全面介绍白吕纳的所有著作、中心思想与学术贡献等。听说译本在台湾曾再版过几次，张其昀先生十分赞赏。

1934 年春我率同李、任诸生到高淳东坝考察，查明东坝附近有黄土覆盖，古代在分水岭上开凿运河，沟通东西货运，旧称这是长江的中江故道并不符合实际，我与李、任合写的《东坝考察[1]日》，发表在《方志月刊》。

1931 年江淮大水，苏北大部沦为泽国，几年以后积水尚未退清。1934 年夏旭旦毕业，因他成绩优异，留系担任助教。暑假中，我与李旭旦、楼桐茂、王慕韩等同赴苏北考察，途经扬州、淮阴、涧河集、运河站，东向至连云港，然后由陈家港、阜宁、盐城、东台、泰州，最后由南通经上海回到南京，伏暑期间，遍访各地水利、城镇、海港、盐场以及各滨海垦殖公司，归后写成《两淮盐垦实录》。全书日记行程及连云港等篇由李担任编写，我写水利与垦务总论，其他由王、楼两位担任。由于书中批评陈果夫有淤黄高槽引淮入海的错误，大部书本被陈秘密收去焚毁，外间流传不多。此书照片全部由旭旦拍摄，现已送交治淮委员会保存。

1935 年我讲授气候学课程，内容参考德国 J. 汉恩与 W. 柯本等人的著作，由旭旦担任记录。一学期讲授完毕，30 多万字的稿本也全部完成，当即送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意抗日战起，商务沪厂全毁，这一全国首创的气候学专著，1938 年另由商务香港分厂重排出版，才同读者见面。

1936 年李旭旦、任美愕同时考取中英庚款去英留学，李到剑桥大学学人文地理，任到格拉斯哥大学学地貌学，次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中央大学迁至重庆，竹屋茅顶，弦歌不绝。1939 年李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仍回中大任教，1943 年我因担任指导地理系研究部硕

土研究生工作，地理系主任职务交由李旭旦担任，以便他能放手革新全系的教学任务。当时我还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即请李担任学会总干事，负责会务，筹措经费，征集学报稿件，并办理学报审稿，印刷出版等事，作出成绩。

1945年8月曰本投降，抗战结束了。我于当年被派赴美进修考察，对美国几个著名大学地理系作了访问。1946年马里兰大学地理系主任，著名农业地理学家O.E.倍克尔约我担任研究教授，继又要我介绍一位中国学者去美担任访问教授，我就介绍李旭旦教授到该校任教一年，深得该校师生的爱戴。

建国以后院校改组，原来的中央大学即改建为南京大学，还须创建一个新的南京师院，李旭旦教授主动提出要到南京师院，创建一个新地理系，足见他是有他的新理想、新抱负的。没有料到李先生的卓见远谋竟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得到大展宏图。但即使如此，李先生在南师近三十年认真教学，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生，不久前师院扩建成为师大，地理系也已成为全国人文地理的一个主要中心。李先生不怕困难，以超人的毅力，钻研学术，从事写作，越是困难，越向前进，几年之内，他已写出许多著作。

举其大者，如1963年他译出A.L.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一书。这一个世界长期争辩的大陆漂移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全部的肯定，而李先生坚决站在魏格纳一边，这是要有一定的识见与一定的勇气的。我于I960年开讲过古地理学并编成讲义，但从1966年起由于“文革”内乱，长达13年期间不看业务书，不写业务文章，1979年获得公开平反，我才根据板块理论，对研究生开讲“世界海陆演化”课程，并于1983年在商务出版此书。这时的思想，这时的行动，我与旭旦大有不约而同的情况。大陆漂移不仅是地球的重要变化问题，也是地理学上需要了解的根本问题，应该及时加以发扬！

七十年代末，旭旦潜心翻译 P. 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一书，约 40 余万字，上下古今涉及 651 个专家，他们的重要著作和思想都要加以分析，加以评述，这是何等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这不是记述事实，而是评论思想，虽然这是部译作，也还是要耗费多少心血！花费多少时间！这是李旭旦教授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科学财富！

李旭旦教授从 1930 年升人大学，1939 年到大学任教，1957 年起受到委屈！精神受着巨大创伤的人，还要从事学术著作，余是十分艰难苦痛的事！

1980 年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大会在日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大会，李教授为第一次被派出国开会的人，当时医生根据李先生的体力曾力劝其最好不去，但李先生却坚持要去。去了以后会见各国同行，也会见许多原是相识的人。李先生以复兴区域地理学、复兴人文地理学作为他的中心思想，征得许多国际知名学者的支持。回国以后，每次开会都大力进行宣传，虽然受到若干人的非议，但他毫不迟疑，写大量文章，历时几载，虽然身患重病，还是如他所说“力疾从事”，耗尽心力。他曾几次给我写信说不顾生命要完成这项大业！几年之中他几次住进医院，几次外出开会，真是力疾工作，直到他最后一口气。《大百科・人文地理学》就是他在挣扎中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对地理学最大的一次贡献。我们还在人世的人应该继续他的工作，一同来完成这项大业！

我今以耄耋之年，现在悼念这位学有成就的学生，同时还不能不想到在这近二十年间先后已有我几十位学有专长、在大学任教的学生，直接间接因受四人帮内乱而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今悼念他们，难道仅仅是私人间的怀念与悲痛！总希望告慰亡者，亦有以勖勉存者为社会主义建设，尽每个人最大的职责。

欢庆《地理学报》创刊五十周年
——回忆学会早期历史 *

胡焕庸

中国地理学会 1934 年创刊《地理学报》，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学会负责同志几次要我写点回忆文字，我感到非常兴奋；兹就学会早年历史，略谈一二。

我国舆地方志之学，不仅起源远古，而且著作浩繁，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但对现代科学地理学的研究，确还是晚近的事。

1909 年张相文先生在天津创立中国地学会，出版《地学杂志》，可以认为是中国新地理学的萌芽时期。1921 年南京东南大学成立地学系，竺可桢博士任系主任，广聘教授，内分地理气象与地质矿物两组。1930 年，东南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理（包括气象）、地质（包括矿物）两系。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大、浙江大学等校也都先后成立地学系、地理系或史地系。1932 年竺可桢、翁文灏等倡议，组织中国地理学会。几经筹备于 1934 年 3 月在南京正式成立；当时的发起人有翁文灏、丁文江、李四

* 原载于《地理学报》1984 年第 39 卷第 3 期。

光、竺可桢、王庸、向达、张其昀、胡焕庸、谢家荣、叶良辅、洪绂、黄国璋、刘恩兰、曾世英、顾颉刚、谭其骧等四十余人；当即选定翁文灏为会长，竺可桢等为理事，会址设在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

1934 年 9 月，《地理学报》创刊号出版，第一年出版两期，以后每年出四期。所刊论文都有西文提要，同国外各地理学会广泛交换，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竺可桢先生不仅是中国气象、气候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先生自己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气候和地理学的文章，奠定了中国科学地理学的基础。

翁文灏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者，他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地理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著文介绍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以后又发表了《中国山脉考》《中国的地震区分布简说》《中国地理区域与其人生意义》等论文。他同丁文江、曾世英合编的由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3 年）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是我们地理学会的最早的发起人，并且担任了多年的会长和监事；他不仅长期指导和支持我们学会的会务，而且动员很多地质学者给学报写出很多有关地文地理学的文章。

学会从 1934 年成立以后，到 1937 年中，共计出版学报 11 期，刊登调查报告和论文专著等达百余篇，先后举行四次年会。不幸的是，1937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全面性的侵略战争，当时南京多次受到敌机轰炸，学报第四卷第一期印好在印刷厂里，却没能分发出去，仅仅取了一本样书，带到重庆，以后经过重印，才能对外发出。学会迁到重庆八年，还不时受到敌机轰炸，当时学会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学报从季刊改为年刊，每年出一期。一切约稿编稿，以及印刷出版，屡经周折。在 1943 年，曾在重庆北倍同中国科学社等六个学术

团体联合举行的第五届年会上改选我担任理事长。以后直到 1947 年 8 月才在上海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举行我会第六届年会，1947 年 1 月学报第 14 卷第 1 期在南京出版，并恢复为季刊；1948 年 8 月在南京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举行了我会第七届年会。回顾从 1934 到 1949 年，我们学会经过了初创的三年时期，随后就由于抗日战争而经历了八年困难时期；从 1947 年到 1948 年由于国内进行着革命战争，学会工作还不能正常发展。1949 年 10 月 1 日，我国人民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地理学会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了第一个国庆，不仅推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开创了光明灿烂的学术文化大发展时期。

尤其可喜的是，解放后竺可桢先生继续领导学会达二十多年，使会务得到了飞跃发展，学会分会遍于各地，全国设立地理研究机构几十处，地理学的各个分支也都得到充分发展。抚今思昔，真有天壤之别，我自己是当年学会发起人之一，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能亲自看到并参与我国地理科学与地理学会蓬勃开展的活动，衷心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限的欢畅！敬祝中国地理学会前途无量！敬祝祖国的四化工作早日胜利完成！

我和商务印书馆*

胡焕庸

商务印书馆在过去是国内最大的出版社，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看到报上登载《辞源》出版了，什么需要知道的东西，在《辞源》里都会找到，因此我立刻买了一本，作为我的良师益友，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部书。

1922年我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主任竺可桢先生介绍了担任过美国威尔逊总统参加巴黎和会的顾问团成员鲍曼，他根据会上国际争论的各项资料，写成一本名叫《新世界》的新书。我们几个同学分译这本书，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名叫《战后新世界》。卅年代时，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通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写了几本书在商务出版，一本是《气象学名辞》（这在当时中国还是第一本）；其次是黄河志编纂会的《黄河志·气象篇》。我在大学教气候学，广泛介绍世界各家的学说，特别详细介绍了当时最有名的德国气候学家柯本的《气候分类法》。我写的在当时国内还是首次介绍柯本学说的《气候学》，也交商务出版。但全书排印完成之后，就遇到“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侵略中国，淞沪战火继起，幸而还保存这本《气候学》原稿，以后把它

* 原载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986年3月。

在香港重排出版。当时我还为大、中学校编制了几套地理教学挂图，全部制成了版，也一并为战火烧成灰烬，这项地图编制计划，因此没有能够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调来上海华东师大工作，在八十年代初，另有两本书是在商务出版的。一本叫《世界海陆演化》，那是根据世界最新板块构造、大洋扩展以及大陆漂移等学说，综合所成的世界构造学说写的。我从地理学的角度，分别说明大陆与海洋在这漫长的自然历史中，如何发生、发展，最后会归于消亡的过程。这一新的理论，现在已被全世界各国学者所接受，我们中国虽然已介绍过这些新理论、新学说，但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广泛应用。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欧洲自然地理》，这是我通过几十年教学过程，广泛收集资料，包括最新的板块资料在内。我用这本书作为大学教材，经过多次修改，还约同两位同志帮我一同修订，最后定稿于 1983 年，在商务出版的。现在商务正在筹备成立九十周年的纪念大庆，要我写几句我和商务的关系，我回忆过去，我是 1901 年出生的，比商务印书馆的年龄要少四岁，已头童齿豁，但我希望还能尽我余生，再为国家四化工作，勉尽一点余力。

回忆“中国科学社”*

胡焕庸

中国科学社是20世纪初期中国一批海外学子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学术团体，于1914年6月29日成立于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依萨卡城，旨在科学救国，向国内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最初的事业是创办《科学》杂志（月刊），《科学》的创刊号于1915年1月出版。这一学术团体的原名为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正式改名为中国科学社，同时选出任鸿隽为社长，胡明复为会计，杨杏佛为编辑部长，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等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先师竺可桢先生时在哈佛大学读书，也是中国科学社的初期社员之一，他在《科学》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他最早的科学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分析了中国的雨量与风暴的关系。

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发展很快，1914年仅有社员35人，1924年就增至648人，1949年时已达3776人。中国科学社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许多社员以后成了各专门学科的创始人或学科带头人，成为著名的科学家。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扩建为东南大学，当时许多科学社社员也已

---

* 原载于《科学》1987年第3期。

学成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科学社社员有竺可桢、茅以升、邹秉文、杨杏佛、钱崇渤、过探先、周仁、胡先骕、王城、孙洪芬、胡刚复等20多人。20年代初期，我在"南高""东大"读书，竺可桢先生当时任地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东南大学创办之初，图书设备很少，许多社员老师都把自己的图书用具存放在学校，供全校师生公用。我经常从图书馆借书，往往借阅的都是各位老师的书籍，阅读之余，深为老师们的热心办学精神所感动，这大大激发了我认真学习的决心。

我在"南高""东大"学习5年，以后又在中央大学任教20年，深受各位前辈老师的教诲，尤其是受到竺可桢先生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也加入了中国科学社，并在《科学》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当年我曾研究过世界气象变更，广泛参考各种资料，考察气候变更的原因，发现有些受天文原因的影响，有些受地理原因的影响，也有些受人为原因的影响，曾略加整理在《科学》上发表。此外，我还写过《创设地理研究所之需要与计划》一文，刊登在《科学》第20卷第10期。

中国科学社在美期间曾分别于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举行过年会。迁回国内后，1919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年会，以后又在南京、北京、南通、青岛、四川等地举行过22次年会。抗战时期，1943年中国科学社曾与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在四川北储举行联合年会，当时我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即以该身份参加了该次盛会。抗战胜利后，1948年中国科学社又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等在南京举行联合年会，我代表中华自然科学社和中国地理学会参加了此次年会。

中国科学社除创办《科学》月刊外，1933年又创办出版了《科学画报》，先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这是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普刊物，图文并茂，内容包括综合科技知识和国内外创造发明的报道，早期采

用外国资料较多，以后逐渐采用中国资料，介绍中国学者的科学成就。该刊物由当时的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主编。《科学画报》发行后，读者遍及学术界、企业界以及大中学理工科学生，订阅很广。这对中国科学社事业是个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科学社的收入。

当时社内外科学家编写科学著作，常受到印刷出版的限制，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由于销路不好，出书颇感困难。鉴于《科学画报》的畅销，多数社员希望由科学社联合各社员发起成立一个出版机构，于是就成立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既出版科学图书，也经营科学仪器。开办费先定为3万元，后又增为20万元。科学社承担其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股份由社员认购，每股为100元，要求每个社员认购5股，当时我也以社员资格入了股，希望需要时可在该公司出版图书。该公司以提倡科学为目的，并无投资谋利的企图。公司事务由杨孝述与理事周仁（时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共同负责，不取报酬。

70多年过去了，中国科学社于解放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汇入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但它所创办的《科学画报》在解放后仍长期出版，为祖国的科学普及事业继续作出贡献。《科学》杂志虽然二度停刊，但经一些科学社的老社友、著名科学家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的努力，又于1985年复刊，我感到十分欣喜。《科学》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们要我写些回忆文字，特记述上面这些旧闻，以志纪念。

Chapter 08

附录

胡焕庸年表

一、童年及求学时期（1901—1928年）

1901年　11月20日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扶风桥褚母塘。父胡际唐为本县秀才，在芳桥镇当私塾先生，母黄毓文。
1903年	出生二十个月，父亲积劳成疾病逝，随母亲移居宜兴和桥外婆家，靠母缝纫代加工成衣为生。
1907年	6岁进入私塾。
1912年	入鹅山小学读四年级。
1915年	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常州中学。
1919年	常州中学毕业。 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
1920年　9月	师从竺可桢，专攻地理与气候。
1921年　6月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2年	与蒋宝贤女士结婚。
1923年　6月	按高师学制读完规定学分，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应扬州第八中学之聘，担任史地教员，兼任训育主任。

1926 年	2 月	回到南京，补修国立东南大学学分。
	6 月	国立东南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8 月	从上海乘法国邮轮经西贡、科伦坡、埃及、马赛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学习。
1928 年	8 月	乘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到达南京。

二、任教国立中央大学时期（1928—1949 年）

1928 年	8 月	受国立中央大学聘，任地学系副教授。
	9 月	受国立中央研究院聘，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协助竺可桢筹建钦天山气象台。
	12 月	在中国气象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当选理事，并且担任总干事。
1929 年	9 月	原配蒋宝贤女士在南京病逝，生有三子，终年26岁。辞去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专任。
	12 月	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后连任多届。
1930 年	2 月	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理、地质两系，地理学系设地理、气象两个专业，受聘担任地理学系系主任。
1931 年		与桂秀君女士结婚。
	9 月	经江苏省教育厅借用，短期兼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主持苏州中学开学。“九一八事变”后，兼任两校工作。

1933 年　8 月　　辞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系主任。

1934 年　3 月　　与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 40 位知名学者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会址设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任首届理事兼任会计（此后连任三届）。

7 月　　率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考察淮河江苏段水利及沿海地区废盐改垦情况，提出应尽早修建淮河入海专用水道。

9 月　　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地理学报》季刊创刊，编辑部设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

1935 年　6 月　　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创制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提出自黑龙江省暖瑶至云南省腾冲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后被简称为“瑗辉一腾冲线”或“胡焕庸线”。

1935 年　冬　　与张其昀等发起及组建中学地理教育研究会，任会长，出版《地理教育》月刊。

1937 年　4 月　　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年会，当选总干事，翁文灏连任会长。

7 月　　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9 月　　随国立中央大学迁校至四川省重庆沙坪坝。

1939 年　7 月　　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划省委员会工作，设计战后划省方案。

12 月　　兼任重庆市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理事主席。

1940 年　　兼任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长

1941 年	秋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学部，兼任地理学部主任，招收硕士研究生。
1942 年	7 月	组建四川省政府暨国立中央大学川西科学考察团，任团长率中大教师、研究生和四年级学生一百余人参加川西考察。
	8 月	当选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
1943 年	3 月	受聘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
	7 月	在中国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第二任理事长。
1944 年	8 月	卸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职务。
1945 年	8 月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10 月	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利用一年休假时间从重庆去美国考察研究。先后居住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
1946 年	春	参加美国地理学者协会年会；任马里兰大学研究教授，编制《中国气候图集》。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看书研究；先后考察访问一批美国著名大学。
1947 年	2 月	自旧金山乘坐邮轮横渡太平洋回国，经上海抵达南京。 创办《社会公论》杂志，呼吁民主制度、法治精神、重视民生、研究国际关系。
	3 月	当选“国民大会”教员团体东区代表，出席“国民大会”。

8月　　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上，连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三、治理淮河（1949-1953年）

1949年　8月　　前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　8月　　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实地考察定线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提出包括安徽、河南地域内的治理淮河意见，编制《淮河水道志》。

1952年　8月　　担任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教务长，兼任水利工程专修科主任。

四、任教华东师范大学（1953-1965年）

1953年　9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任各洲自然地理教研组主任。

1956年　9月　　主持华东师大首次举办的全国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学员30多位，学制两年。

1957年　9月　　创立中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华东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任主任。研究室一年不到被解散。

1964年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分担有关西欧方面的研究。

五、“文革”时期 (1966—1978 年)

1966 年 5 月　“文革”开始，遭批斗，工作中断。

1968 年 5 月　拘留审查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历时五年一个月。

1973 年 6 月　解除拘留回校，继续接受审查。

1978 年 12 月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撤销以往审查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正式恢复工作。

六、任教华东师范大学（1979—1989 年）

1980 年 1 月　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扩大的第四届代表大会及 1979 年综合学术年会，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对外露面。

12 月　上海市人口学会成立，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顾问，第二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1981 年 2 月　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成立中国人口学会，受邀参会，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连任四届。

3 月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会，任会长。

n 月　华东师范大学恢复人口研究室，任主任。

1983 年 6 月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建立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任首任所长。

1984 年 3 月　　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博士生导师，并在人口所设博士后科研站，担任博士后科研站指导教授。

1985 年 9 月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同意人口研究所列入“中国大学人口学研究与培训”项目资助单位，首批发放价值 38 万美元的资助支持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后又续有资助。

因年事已高，辞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职务，受聘为“人口研究所终身名誉所长”。

1986 年 9 月　　与伍理合作，完成新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两份地图均标注并且用文字说明从黑龙江省黑河（璟辉）至云南省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在说明书中以“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三个经济地带、八大人口区”作为“胡焕庸线”的新表述公开发表。

1989 年 9 月　　正式退休。

七、退休以后（1990—1998 年）

1990 年 3 月　　民政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被推任学术顾问。

4 月　　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选编了有代表性的 29 篇著作。

	10月	中国地理学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人文地理学学术大会，会议宣布胡焕庸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创始人。
1994年	3月	因年事已高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1996年	5月30日	夫人桂秀君女士在上海逝世，生有三子一女，终年93岁。
1998年	4月30日	逝世，享年98岁。 《人民日报》发文称胡焕庸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人口学家、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胡焕庸著述目录*

1921—1937年

1921年

《欧战大事记》	《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
《彗星》	《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
《华府会议之目的与限制军备》，胡焕庸译	《时事月刊》第1卷第10期

1922年

《纪元问题》	《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不列颠帝国》	《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日本之海上政策与殖民政策》	《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
《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	《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

* 因年代久远，胡焕庸部分著述存在不同版本，部分信息也不够完整，该目录为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编者注

1923年

《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续）	《史地学报》第2卷第2、3、5、6期
《美国国民史》（新书介绍）	《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
《新地理》（新书介绍）	《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
《气候之大陆性与海洋性》	《时报》9月13日
《第三次亚洲考古队在蒙古考察之结果》	《科学》第8卷第9期
《将来白人之分布》	《史地学报》第2卷第4期

1924年

《美国国民史》（专著），皮亚特（Beard）、伯格勒（Baghy）合编，胡焕庸译	《史地学报》第3卷第1、2期合刊，第3、4期

1925年

《美国国民史》（专著）（续），皮亚特（Beard）、伯格勒（Baghy）合编，胡焕庸译	《史地学报》第3卷第5、6、7、8期

1926年

《美国国民史》（专著）（续），皮亚特（Beard）、伯格勒（Baghy）合编，胡焕庸译	《史地学报》第4卷第1期

1927年

《战后新世界》，鲍曼（I. Bowman）著，胡焕庸、张其昀等合译	商务印书馆

1928年

《新俄之田制——共产制乎？私产制乎？》	《史学与地学》第3期
《巴黎地理教育》，马东男（Martonne）著，胡焕庸译	《史学与地学》第4期
《约翰·白吕纳之人生地理学》	《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
《法国地球物理学设备述略》，毛恒（Maurain）著，胡焕庸摘译	《地理杂志》第1卷第2期
《法国研究地理学之近况》	《地理杂志》第1卷第3期

1929年

《地理教室之设备》	《地理杂志》第2卷第2期
《大学区与省区》	《地理杂志》第2卷第2期
《钦天山观象台故址重建气象台记》	《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

《鸡笼山观象台故址兴建气象台记》	《地理杂志》第 2 卷第 1 期
《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	《地理杂志》第 2 卷第 2 期
《气候变更说述要》	《地理杂志》第 2 卷第 5 期
《本校地理学系地理门应独立成系建议书》，与黄国璋、张其昀合著	《地理杂志》第 2 卷第 5 期

1930 年

《天气预告法述要》	《地理杂志》第 3 卷第 1 期
《欧西各国之地理学》	《地理杂志》第 3 卷第 4 期

1931 年

《地图绘法举要》	《地理杂志》第 4 卷第 2、3 期
《山岳与河流》	《地理杂志》第 4 卷第 3 期
《反日救国特刊弁言》	《苏中校刊》第 57、58 期合刊
《本校校长胡焕庸先生讲东北铁道问题》	《苏中校刊》第 57、58 期合刊

1932 年

《天气预告法述要》	《地理杂志》第 3 卷第 1 期
《地图绘法举要》	《测量公报》第 27 期
《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	《苏中校刊》第 59 期

《苏州中学教训之合一谈》	《江苏教育》第 1 卷第 io 期
《校长对乡村师范部同学的训词》	《苏中校刊》第 59 期
《1931 年国际地学会议纪略》	《地理杂志》第 5 卷第 2 期
《研究地理的几条途径》	《方志月刊》第 5 卷第 3 期
《忆刘师伯明》	《国风》杂志第 1 卷第 9 期
《西南亟应建造之铁道》	《时代公论》第 3 号
《专科师范文史地科课程之商榷》	《江苏教育》第 1 卷第 7、8 期合刊
《美国哈佛大学气候学教授华德先生讣音》	《地理杂志》第 5 卷第 2 期

1933 年

《历代土地政策》	《国学商兑》第 1 卷第 1 期
《澳洲之气候》	《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2 期
《太平洋问题》	《振华女学校刊》4 月号
《巴黎地理教育》	《新地学》，钟山书局
《丁文江等合编中国分省新图二、胡焕庸先生的批评》	《图书评论》第 2 卷第 6 期
《法国之地理学》	《新地学》，钟山书局
《高中普通科春季第一届毕业纪念号弁言》	《苏中校刊》第 74、75 期合刊
《谈谈中学地理课程》	《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6 期
《区域地理一例——英伦东南区》	《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10 期
《东坝考察记》	《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12 期
《立校卅周年纪念典礼的报告》	《苏中校刊》第 80 期

《紫阳楼记》	《苏州中学校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欧西各国地理学之现状》，约翰生（Douglas Johnson）著，胡焕庸译	《新地学》，钟山书局
《西洋人地学晚近之发展》，沙侯（Carl O. Sauer）著，胡焕庸译	《新地学》，钟山书局

1934 年

《江苏省之农产区域》	《地理学报》第 1 卷第 1 期
《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	《地理学报》第 1 卷第 2 期
《法国地志》	钟山书局
《德国地志》	钟山书局
《俄国地志》	钟山书局
《江宁地志大纲》，与王维屏合著	《方志月刊》第 7 卷第 1 期
《法人谋夺西沙群岛》	《方志月刊》第 7 卷第 n 期
	《外交评论》第 3 卷第 4 期
《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	《外交评论》第 3 卷第 5 期
《两淮水利概论》	《方志月刊》第 7 卷第 11、12 期合刊
《淮南垦务》	《方志月刊》第 7 卷第 11、12 期合刊
《两淮水利盐垦实录》	钟山书局
《两淮盐务志》（日文版）	日本，丰岛海事贸易社
《本会发起旨趣书》，与地学界 40 位学者共同发起	《地理学报》第 1 卷第 1 期

《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	《外交评论》7 月号
《科学的职能》，约翰 •毕理 (John Pilley）著，胡焕庸译述	《世界学术初阶》，南京书店
《科学史》，查尔斯 •辛格（Charles Singer）、多萝西娅 •韦利 • 辛格（Dorothea Waley Singer) 著，胡焕庸译述	《世界学术初阶》，南京书店
《钱江架桥与导淮入海》	《中央日报》11 月 21 日

1935 年

《珂本氏世界气候分类法大要》，与李旭旦合著	《方志月刊》第 8 卷第 1、2 期合刊
《人地学原理》胡序	钟山书局
《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	《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1 期
《中国人口之分布》	《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钟山书局
《救治黄灾亟宜开凿邺城民地》	南京《正论》第 50 期
《近代地学的含义》	南京《科学世界》第 4 卷第 6 期
《两淮盐垦事业之过去与未来》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第 1 卷第 1 期
《吾人对于现办导淮入海工程应有之认识》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第 1 卷第 2 期
《我国人口分布与国内移民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第 1 卷第 3 期
《我国人口疏密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第 1 卷第 4 期
《南欧地志》	钟山书局

《江苏图志》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
《英汉气象学名词》	国立编译馆
《地理之科学基础》	钟山书局
《南高精神》	《国风》杂志第 7 卷第 2 期
《风雨雷电霜露雹雪等怎样发生》	《小学与社会》第 1 卷第 48 期
《英国地志》（不列颠群岛）	钟山书局
《外国地理》上、下册	钟山书局

1936 年

《外国地理》，与张其的合编	钟山书局
《黄河志·第一篇气象》	国立编译馆
《黄河流域之气候》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1 期
《中国之农业区域》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1 期
《中国商业地理大纲》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2 期
《句容县之人口分布》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3 期
《国内交通与等时线图》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4 期
《国防教育与中小学地理课程》	《教与学》第 1 卷第 7 期
《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	《教与学》第 1 卷第 11 期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2 期
《再论大学地理教育》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5 期
《我国地大物博人稠之真相》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1 期
《葛编〈中国地理新志〉》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1 期
《中国农业区域简表》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2 期

《评陈编中学地理教科挂图》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2 期
《国难与地理教育》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3 期
《中学地理教师应备参考书目》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3、5 期
《国界与国防》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4 期
《地图及统计——中国之国内贸易》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4 期
《中国之国内贸易》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5 期,
《创设地理研究所之需要与计划》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6 期 《科学时报》第 3 卷第 10 期 《科学》第 20 卷 10 期
《西伯利亚》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7 期
《对中学生讲学习地理》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7 期 《江苏学生》第 8 卷第 1 期
《自然地理概论》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8、9 期
《中学地理教师应有之认识与准备》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8 期
《绥远战事之严重性》	《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9 期
《日俄交恶声中之西伯利亚》	《外交评论》第 6 卷第 4 期
《黄河堵口之争执》	《国风》杂志第 8 卷第 2 期
《创设地理研究所之需要与计划》	《科学时报》第 3 卷第 10 期 《科学》第 20 卷第 10 期
《国防前线之绥远现状及其前途》	《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1 月 28 日
《本会募集基金启》，与竺可桢、翁文灏、张其的合启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1 期
《吾人对于察绥匪乱应有之认识与决心》	《边疆》第 1 卷第 7、8 期合刊

《中国地理学会收支报告》	《地理学报》第 3 卷第 2 期

1937—1949 年

1937 年

《我们的版图》	正中书局
《经济侵略与土地侵略》	《地理教育》第 2 卷第 2 期
《设立边疆博物馆之需要》	《地理教育》第 2 卷第 3 期
《学地理的出路》	《地理教育》第 2 卷第 7 期
《中学地理教育的实施问题》	《地理教育》第 2 卷第 4 期 《江苏教育》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
《弁言》	《地理教育》第 2 卷第 1 期
《国内公路交通》	《广播周报》第 146 期
《开发边疆与设立边疆博物馆之关系》	《边疆》第 2 卷第 5 期

1938 年

《气候学》	国立编译馆
《四川地理》	正中书局
《国防地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国防后方的四川》	《西南边疆》创刊号
《交通革命中之云南》	《西南边疆》第 3 期
《保卫大武汉之军事形势》	《国是公论》第 4 期

《鄂东抗战形势蠡测》	《国是公论》第 9 期
《川滇黔三省在国防上之地位》	《民族公论》第 1 卷第 2 期 《公论众书》第 2 期
《抗战形势的检讨》	《新民族》第 1 卷第 2 期
《德奥合并以后》	《新民族》第 1 卷第 6 期
《目前战局之地势》	《新民族》第 2 卷第 12 期
《铁路与国防》	《浙光》第 4 卷第 5 期
《今后抗战形势的展望》	《黄埔》第 1 卷第 13 期
《四川亟应举办之生产事业》	《新运导报》第 21 期
《铁路与国防》	《新民族》第 1 卷第 14 期
《中国地理学会会务报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档案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会务报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档案

1939 年

《中国与苏联》	《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
《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	《中国青年》创刊号
《陕甘在国防上的地位》	《教育通讯》第 2 卷第 31 期
《宁青二省在国防上的地位》	《教育通讯》第 2 卷第 32 期
《波兰的国情》	《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3 期
《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	《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4 期
《最近苏联外交的检讨》	《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4 期
《抗战建国与川康建设》	《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5、6 期

《抗战中西康建省的意义》	《青年月刊》第 1 期
《高中地理教育的危机》，与夏开儒合著	《教育通讯》第 2 卷第 39 期
《初中添授乡土地理和省区地志编辑问题》	《教育通讯》第 2 卷第 20、21 期
《初中需否必修英语》	《教育通讯》第 2 卷第 11 期
《世界经济地理》	青年书店
《二次欧战导火线——波兰》	《前线日报》9 月 23 日
《踢踏不安之巴尔干现势》	《世界政治》第 4 卷第 9 期
《钟山外国地理》上、下册，与张其的合编	钟山书局，重庆版
《波罗的海之现势》	《参考材料》洛阳三期
《川西调整行政之商榷》	《总汇报》12 月 31 日
《四川分省与调整行政区之商榷》	《新新新闻每旬增刊》第 2 卷第 14 期
《苏联争霸中波罗的海之现势》	《世界政治》第 4 卷第 8 期
《太平洋形势展望》	《新民族》第 3 卷第 12 期
《新疆在国防上的地位》	《广播周报》第 156 期
《新时代地理教育之改革》	《新政治》第 1 卷第 4 期

1940 年

《世界经济统计》	青年书店
《西部各省地理图》（地图）	国立编译馆
《苏联经济地理》，与袁著合著	青年书店
《重划省区之商榷》	《青年中国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	《青年中国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交通建设》	《抗战与交通》第 48 期
《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	《教育通讯》第 3 卷第 6、7 期
《新疆在国防上的地位》	《教育通讯》第 3 卷第 36、37、38 期
《研究边疆与认识边疆》	《青年月刊》第 6 期
《美日商务关系之检讨》	《世界政治》第 5 卷第 2 期
《与青年谈读地学》	《中国青年》第 3 卷第 1、2 期
《一个地理测验感言》	《新青年》第 3 卷第 12 期
《川康两省在抗战期间应负的使命》	《新四川月刊》第 1 卷第 10、11 期合刊
《缩小省区的具体方案》	《新评论》创刊号
《新地理学之真谛》	《中等教育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现阶段农业推广问题》	《青年书店》

1941 年

《世界地理》	正中书局
《地理与国防》	正中书局
《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动机和动向》	《世界政治》第 6 卷第 9 期
《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	《中国青年》第 4 卷第 3 期
《科学工作与抗战工作之联系》	《科学世界》第 10 卷第 2 期
《外国地理》初级中学上册	正中书局
《中国经济地理》	青年出版社

《日寇对南洋的经济侵略》	《前线日报》2月18日
《南洋物资与国际经济战》	《前线日报》8月4日
《南洋现势》	《革命理论》第4期
《一千年来之欧陆（附图）》	《欧亚文化》第4卷第1期
《美国经济地理》	正中书局
《致信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徐仲年、张江树合写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欢送毕业同学》	《中大周刊》第11期
《地理上之中国与世界》	《中大周刊》第12期
《迎新同学》	《中大周刊》第16期
《胡主任讲世界现势》	《中大周刊》第18期
《两淮地方之盐垦事业》（日文版）	日本新亚院

1942年

《南洋地理》胡序	独立出版社
《峨眉山之气候》	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政府川西科学考察团报告第1号
《印度与越南半岛战区图》（地图）	时与潮社
《建国教科书初中外国地理》	正中书局
《从黄河导向蒙古说起》	《文化先锋》第1卷第16期
《最新国防地理》	国防文化出版社
《文化界总动员》	《中央日报一扫荡报》6月21日
《印度经济地理》	《经济汇报》第6卷第4期

《中央大学员生暑期川西考察计划》	国立中央大学档案
《考察川西神秘之区经过》	《中央日报一扫荡报》10 月 18 日
《在国立中央大学西北建设研究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西北建设研究社两周年纪念刊》

1943 年

《西文新疆书目》，与童承康合著	中央大学地理系
《新疆之气候》	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专刊第 3 号
《缩小省区辖境与命名之商榷》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专刊第 6 号
《历代疆域区分之沿革》，与童承康合著	油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中国青年与中国科学》	《青年与科学》创刊号
《新疆地理》	《文化先锋》第 1 卷第 22 期 福建永安《文选》第 1 卷第 6 期
《科学建设的途径》	《科学世界》第 12 卷第 6 期
《西北地理与水利问题》	《水利委员会季刊》第 2 卷第 2 期
《川康建设与地理研究》	《川康建设》第 1 卷第 1 期
《了解地理与应考地理》	《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期
《创刊词》	《沙坪合作》创刊号
《本社三周年纪念刊序言》	《沙坪坝消费合作社三周年纪念特刊》9 月

《本社信用部开幕致词》	《沙坪合作》第 2 号
《我国盐业地理概况》	《经济论衡》创刊号
《校史述略》	《中央日报》7 月 9 日
《战后我国国都——武汉》	《新中华》复刊第 1 卷第 12 期
《设立新疆研究所计划大纲》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档案
《战后我国国都问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
《大学课程》	国立中央大学档案

1944 年

《德国地理》	京华印书局
《经济地理》	京华印书馆
《实用四川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欧洲第二战场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西太平洋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日本及朝鲜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台湾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中国的地域》	《文化先锋》第 4 卷第 13 期
《台湾收复后之经济价值》	《中国青年》第 11 卷第 5 期
《本社成立四周年箴言》	《沙坪合作》第 4 号
《地球的故事》（上）	《少年学园》第 1 期
《先锋社百年纪念》	《沙坪合作》第 12、13 号合刊
《中国粮食问题与世界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创刊号
《欢送四年级同学征调服役》	国立中央大学档案

1945年

《东部各省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德国及其邻邦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苏联地理》	京华印书馆
《美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法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英国地理》	京华印书馆
《日本地志》	京华印书馆
《朝鲜地理》	京华印书馆
《台湾与琉球》	京华印书馆
《缩小省区草案》	京华印书馆
《南欧地理》	京华印书馆
《中国人口之分布》（英文版）	美国地理学会《地理学评论》
《科学介绍工作的重要》	《青年与科学》第2卷第2期
《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	《民主评论》第1卷第2期
《五十年来的地理学》	《五十年来的中国》，胜利出版社

1946年

《东北四省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外国地理》初级中学下册	正中书局
《美国大水闸之谜视察TVA以后的深刻印象》	《申报》2月11日

《对我国民政府 美应加强援助 美国生活杂志之主张》，范杜生著，胡焕庸译	《申报》9 月 13 日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视察记》	《工程报导》第 8 期

1947 年

《苏北地理概述》（英文版）	美国《地理学评论》杂志第 37 卷第 4 期
《苏北滨海棉区》（英文版）	美国《经济地理》杂志第 23 卷第 1 期
《峨眉山气候简介》（英文版）	《美国气象学》杂志
《东北九省新地图》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两淮水利》	正中书局
《社会公论》	社会公论社
《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中国》	《现实与理想》第 1 卷第 1 期
《酝酿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社会公论》第 1 卷第 1 期
《变乱期中认清时代潮流》	《社会公论》第 1 卷第 2 期
《美国的经济难题与政治危机》	《社会公论》第 1 卷第 3 期
《评魏德迈离华声明》	《社会公论》第 1 卷第 6 期
《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	《社会公论》第 2 卷第 1 期
《苏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社会公论》第 2 卷第 2 期
《蒲立德援华建议》	《社会公论》第 2 卷第 3 期
《公教人员调整待遇》	《问世》第 5 期
《向魏特使告洋状》	《问世》第 5 期

《从“中南半岛”“太平海”讲到中外地名》	《益世报》5月23日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在中国开始了》	《问世》第3期
《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	《问世》第3期
《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	《问世》第7期
《论新共产国际》	《问世》第10期
《从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大同》	《国立政治大学》校刊11月24日
《“耕者有其田”是□□的唯一有效办法》	《社会公论》第1卷第4期

1948年

《缩省裁区原因在减少行政层级》	《社会公论》第3卷第1期
《关于积石山探测》	《中央日报》周刊3月5日
《缩小省区方案之一》	《社会公论》第3卷第2、3期
《怎样考史地》	《大学评论》第1卷第1期
《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	《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
《经济地理》	正中书局
《如何挽救当前的危局》	《现实与理想》第2卷第1期
《历史是否重演关键系于苏联》	《中央周刊》第9期
《中外文化资料供应合作社》	《中央周刊》第42期
《漫谈作图资料与制图读图》	《制图》第1卷第7期
《从西欧联盟展望欧洲大局》	《社会公论》第3卷第6期
《为期不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群言杂志》复刊第10期

《新政府最急迫的新设施：立刻实行耕者有其田》	《地政通讯》第3卷第6期 《中央日报周刊》第4卷第10期 《社会公论》第4卷第4期
《中国的出路》	《中央周刊》第10卷第14期 《社会公论》第4卷第1、2期
《在教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央周刊》第10卷第29期

1949年

《胡焕庸在厦门大学寻得校舍函》	《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

1950—1966年

1950年

《旧我的批判》	《大公报》9月5日

1951年

《祖国的水利》	开明书店

1952年

《淮河》	开明书店
《作者胡焕庸同志的答复》	《光明日报》5月26日

1953年

《淮河志初稿》	治淮委员会
《对〈祖国的水利〉一书的检讨》	《地理知识》杂志第 12 期

1954 年

《淮河的改造》	《地理知识》杂志
《淮河的改造》	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

《苏联自然地理概论》	新知识出版社
《欧亚自然地理》上、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交流教材

1956 年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新知识出版社
《佛子岭水库》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年

《德国地理》	新知识出版社
《从江苏的人口密度看人口问题》	《文汇报》3 月 21 日
《中国各省区面积人口指示图》	《地理知识》9 月号
《各洲自然地理》参考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交流教材
《江苏省的人口密度和农业区域》	《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1 期

1958 年

《常熟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地理学资料》第2期
《江苏省地理》	苏联地理百科全书
《江苏南通专区的人口密度》	《地理学报》第24卷第1期
《法国研究人口地理的近况》	《经济地理集刊》，商务印书馆
《福建省漳州、龙溪、长泰的人口密度》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地理学资料》第3期
《江苏省的人口密度和农业区域》	华东师大《地理集刊》第1期
《宜兴县的人口密度》	华东师大《地理集刊》第1辑
《各洲自然地理》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讲义
《各洲自然地理》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函授讲义

1959年

《亚洲自然地理讲义》	华东师大出版社
《欧洲自然地理讲义》	华东师大出版社
《地中海气候的成因和特征》	《地理教学丛刊》第2辑

1960年

《苏联人民是怎样改造自然的》	《地理教学丛刊》第1辑

1962年

《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L.D.斯丹普著，荷夫（胡焕庸笔名）译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古地理学教程》	华东师大讲义
《世界海流》	《地理教学丛刊》第 1 辑

1964 年

《中学世界地理教学参考图片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法国研究人口地理学的近况》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向》
《非地带性因素在中国自然区划中的意义》	《中国地理学会 1962 年自然区划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65 年

《法国地理图志》	华东师大西欧北美研究室
《英国经济统计辑录》（未刊稿）	华东师大西欧北美研究室
《西德经济统计辑录》（未刊稿）	华东师大西欧北美研究室

1966—1976 年

1971 年

《黄河志·气象篇》	台湾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1988 年

1978 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区差异与地区规划》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会议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从板块构造看大陆漂移》，与刘苍字合著	《自然杂志》第 1 期
《大陆的拼合和漂移》，与刘苍字合著	《新华文摘》第 3 期
《地理工作五十年》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地理工作者应该怎样看待近二十年来的地学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我与淮河》	《上海师大》校报 9 月 21 日

1980 年

《地学革命与地理教育》	《地理教学》第 2 辑
《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	《百科知识》第 11 期
《地带性与非地带性气候的分类》，与康淞万、蔡吉合著	《世界地理集刊》第 1 辑

《人口规划与经济规划——从栾城县看到的问题》	《安徽人口通讯》第 1 期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试谈我国人口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法国大学和研究所设置的人口学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苏联人口的演变》，与严正元合著	《部门经济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论文集》
《我国的人口与粮食》（提纲）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1 年

《世界气候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与康淞万、蔡吉合著	科学出版社
《世界海陆演化》，与陈业裕合著	商务印书馆
《我国的人口与粮食》，与严正元合著	《地理知识》第 3 期
《板块构造与地震》	《地理教学》第 3 辑
《世界和我国粮食供需形势》，与严正元合著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试谈我国人口问题》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口规划和经济规划的重要性》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国各省区人口五十年来演变和地区差异》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国的人口和粮食》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学和研究所开设的人口学课程》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人口和世界粮食》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人口的演变》，与严正元合著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演变》	《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	《世界经济导报》5 月 26 日第 56 期
《西德能源地理》	《世界经济论文集》
《治淮与我》	《中国科技史料》第 1 期
《法国经济地理》，与周之桐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人口》（英文版）	*GeoJournal* 5（2）
《西德的能源经济》，与严正元合著	《世界地理》
《近三十年来地学大革命中新兴的一门生态地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中国人口地理概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口地理概要》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2年

《欧洲自然地理》，与严正元、康淞万合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人口地理概要》（英文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竺可桢先生——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
《地理科学的一个新方向——介绍生态地理学》	《百科知识》第4期
《新兴的生态地理学》	《生态学杂志》第4期
《生态地理学简介》	《经济地理》第3期
《生态地理学》	《地理教学》第2辑
《世界人口地理》，与张善余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人口》	西德《地学杂志》
《我国人口地理分布概述》	《人口研究》第4期
《我和人口地理》	《书林》第3期
《我国八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3年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前言》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过人口密度研究人口政策》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于我国理想人口》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人口地理学》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疆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口史提要》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放前五十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人口的概况》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多地少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与严正元合著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郊区城镇化浅析》，与严正元合著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八大人口区的特征与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自印本
《中国八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英文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论中国人口之分布》	《人口地理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年

《新疆人口地理与人口区划》	《人口研究》第1期
《欢庆〈地理学报〉创刊五十周年——回忆学会早年历史》	《地理学报》第39卷第3期
《新疆三十年来人口增长和未来发展》	《西北人口》第3期
《江苏省常熟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集镇建设》	《人口科学》，上海市人口学会
《中国人口地理》，与张善余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的人口密度与人口规划》，与胡崇庆合著	《人口学刊》第4期
《今后一百三十年内世界各国的人口演变》，与胡崇庆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人口接近零增长的如东县与自然增长率仅为3‰的南通市》，与胡崇庆、许公逸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中国人口史·序》（赵文林，谢淑君著）	人民出版社
《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而贡献晚年》	《华东师范大学》校报6月21日
《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五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八大区的人口经济发展》（英文版）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5年

《中国东部和西部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与严正元合著	《人口》，复旦大学出版社
《如东县和南通市人口与经济》，与胡崇庆合著	《河北人口》（时间待考）
《治淮与我》	《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
《中国八大人口区的特征与展望》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疆的人口地理与人口区划》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云南的民族与人口区划》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昆明市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省的人口密度与人口规划》，与胡崇庆合著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南汇县的人口密度与计划生育》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口目标与人口区划》	《人口研究论文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西北人口》第2期

《青海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第 2 期
《人口发展与小城镇建设——以江苏宜兴为例》，与伍理合著	《西北人口》第 4 期
《南京大学地理系早期二十年的回忆》	《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六十五年纪念》，南京大学地理系
《中国八大区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经济圈规划》	《地理研究》第 4 期，科型版社
《关于开发我国西部的商榷》	《人民日报》5 月 16 日
《我国人口分布的现状与未来移民的可能》	《地理教学》第 3 辑
《谖辉一腾冲线》	《文汇报》3 月 22 日
《怀念柳翼谋先生》（勋堂学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
《坚决杜绝多胎酌量放宽二胎》	胡焕庸手稿 11 月 26 日
《试论四川省国土经济的发展前景》	《国土经济》第 1 期
《我国人口分布的现状与未来移民的可能》	《地理教学》第 3 期
《苏州中学校史》序言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五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八大区的人口经济发展》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东北经济区在最近一百年中人口增长近二十倍》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今后中国人口地区调整的设想》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的人口密度与人口区划》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悼念地理学者李旭旦教授》	《群言》杂志第 7 期
《法国约翰·白吕纳人文地理学的著作思想和研究方法》	《人文地理》第 1 期
《今后一百二十年内世界各国的人口演变》，与胡崇庆合著	《人文地理》第 1 期
《怀念柳师翼谋先生》	《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
《痛悼李旭旦教授》	《国外人文地理》第 2 期
《淮河水道志》	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
《"淮河水利学校"创办历程》	家属自编《梅花香自苦寒来》
《中国人口的发展、分布、迁移和预测》	《中国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
《中国旅游地理·序》	测绘出版社
《我国人口的地区分布与今后发展》，与胡崇庆合著	《人口学刊》第 1 期
《研究人口应该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	《人口研究》第 2 期
《中国人口地理简编》	重庆出版社
《悼念现代地理学者徐近之教授》	《徐近之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地理研究所

《郸县计划生育志·序》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人地学原理·序》	《国外人文地理》第1期
《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带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7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竺可桢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我国人口的现状和未来》	《群言》杂志第2期
《怎样应付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计划生育报》
《建国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的增长和入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讨论会”论文
《新疆木垒县的脱贫致富与人口控制》，与严正元合著	《西北人口》第3期
《50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八大区的人口经济发展》	《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中国人口的地区分布与今后发展》	《国务院中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中国财经出版社
《中国人口的发展、分布、迁移和预测》	《中国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生育情况的差异》	《健康报》2月27日
《上海与全国人口发展的比较和展望》	出处待考

《1982—1987年全国和各省区的人口变动》	出处待考
《人口活动的自然活动与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
《安徽省的人口与国土经济》，与胡崇庆合著	《人口》，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回忆"中国科学社"》	《科学》第3期
《纪念我的老师竺可桢先生》	《我和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序》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口地域分布》	《科学》第2期
《中国人口的地区分布与今后发展》，与胡崇庆合著	《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	《科学的探索与开拓》，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和未来》	《人口与优生》第2期
《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已经来临》	《群言》第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西北人口》第3期
《从水资源看新疆未来的人口》	《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胡焕庸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1989—1998年

1989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营啊范大学出版社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国各省、市、区人口生育情况的差异和问题》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疆的水资源是人口、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一克拉玛依地区经济建设中的水资源和人口问题》，与严正元合著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的生态、人口和经济》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的人口与国土经济》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省的人口和经济》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包头市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口生态类型最多的甘肃省》	《中国人口丛书》总论第7章《人口分布》，中国财经出版社
《人口分布》	《中国人口丛书》，中国财经出版社
《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	《人口科学的探索与开拓》，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与伍理合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与伍理合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序》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年

《怀念业师竺可桢教授（代序）》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具有代表性的欧洲自然地区》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上海与全国人口发展的比较和展望》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世界海陆演化提要》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我国人口与经济地区分布》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我国人口与粮食》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的增长、入迁和未来发展》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徐近之教授的学术贡献》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中国财经出版社
《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	《地理学报》第 2 期
《我国行政区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丁金宏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 期
《人口数量和人口分布》，与胡崇庆合著	《在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40 辑
《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试论我国人口分布的地区调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地理科学专辑》

1991 年

《治学经历述略》	《中国科技史料》第 12 卷第 1 期
《关于市带县的合理范围——地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依据和方法》，与丁金宏合著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缅怀吾师竺可桢先生（代序）》	《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人口发展和生存环境》，与严正元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的人口发展区划》	《齐鲁人口文萃》，中国人口出版社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成才——宜兴籍学者求知发奋集锦》，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人口的重负》	《重负的大地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扬成绩，开拓前进——庆祝〈地理学报〉创刊 60 周年》	《地理学报》第 49 卷第 3 期

1995 年

《树立求是精神》	《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7年

《我国的人口密集区和稀疏区及其地理背景》，与严正元合著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理科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

《黑河—腾冲人口分界线》，与方如康合著

《地球系统科学中国进展·世纪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其他（发表时间和出版单位待考）

《中国人生地理》	新新印书馆
《世界气候讲义》	新新印书馆
《徐州大会战的前后》	出处待考
《湖南省的人口区划与人口规划》人口区划会议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介绍法国三部人口科学名著》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利用北金堤—东平湖蓄洪区使黄河改道行驶是目前防洪治黄的最佳方案》	出处待考
《西藏的人口分布及其制约因素》，与朱宇合著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天山北麓的开发建设与人口容量》，与朱宇合著	出处待考

《中国人口的分布、迁移与区划》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研究报告之二
《五十年来我国各省、区人口的 华东师范大学自印本
演变》（提纲）

后记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情分界线：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终于得以面世。

1935 年，我的祖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他的名作《中国人口之分布》，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分布的“瑷群一腾冲线”，即“胡焕庸线”。胡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分界线，也是现今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基线。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本书得以在“胡焕庸线”提出 90 周年之际出版，既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也是对祖父一生中最重要标志性成就的纪念。

1919 年以后，除了在扬州中学任教、留学法国以及在国立中央大学因抗日战争西迁重庆期间外，祖父长期在南京求学和任教。1953 年以后，他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而我则居住在祖父抗战前建造的南京卫巷旧居中。幼时，我见到祖父母的次数并不多。随着 1976 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激动人心的进步，家中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看到老人们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我也深受感染。遗憾的是，祖父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从不与我谈及他的过往。只是在他辞世以后，随着“胡焕庸线”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祖父的经历了解得太少太少。已不再年轻

的我，决心要排除万难，对这位杰出的前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祖父的求学之路和第一份教职，都与南京高师一国立东南大学一国立中央大学紧密相连。他在南京四牌楼和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园里，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离开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校园他的旧居。但无论是我在他晚年的多次看望中，还是在他发表的文章里，都能感受到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南京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他时常会提到南京的“成贤街”“四牌楼”“北极阁”“大石桥”“鸡鸣寺”“玄武湖”，这些都是他生前时常去到的地方。祖父工作多年的中大四牌楼校园，是我自小就经常踏入的学术圣地。祖父每天上班走过的进香河路，同样也是我上学读书的必经之路。他曾经工作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更是我登高望远的第一去处。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他曾经多次回忆祖父的经历，也谈到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参加训练，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往事。亲临祖父早年学习、工作的故地，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他的身影和气息，感受到他那深邃的学术生命还远远没有得到挖掘和传承。我深感要用我的全部晚年去弥补这个时代的遗憾，这是我无法用任何理由推却的使命。感谢时代赋予我机会，感谢生命给予我时间。

近 20 年来，资讯行业的进步飞速。我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了解到祖父的一生，了解到他的各种著作、文献、贡献以及各界的研究。感谢中国的社会进步，使国人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

六年前，我开始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部分开放的民国档案。1949 年之前，祖父承担了相当多的社会工作，在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设立的临时机构，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史馆、经济部、内政部、社会部、资源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和军委会政治部等相关机构的案卷里，都留下了他珍贵的历史记载。我经常

为新的发现而备受鼓舞和激动。在祖父“一份精神，一份事业”，“要把事情办好，要准备同他拼命”的精神感召下，历经数年，我研读了数以千万计的民国档案，对祖父的认识也逐渐丰满起来。这种发现和研究的激情，是一种无以替代的享受，值得我用未来所有的时光去珍藏和回味，我也愿意将其分享给关心祖父和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读者朋友。

这些年，我和许多地区对祖父和“胡焕庸线”有兴趣的你友有过交流。新一代学者对祖父的经历和贡献了解并不多，但是在我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对早年和祖父同时期的科学大师给予社会的贡献，怀有高度的景仰和骄傲。我不仅屡屡感受到他们对祖父的敬重，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对中国的科学事业进步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和祖父晚年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他们对祖父各方面的支持、关心和帮助，使他在晚年得以实现新的学术升华，他的名字和“胡焕庸线”一样，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这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中学等机构、学校或其前身，都是祖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及资深学者为这本纪念集贡献了他们的文稿。他们对前辈的回忆，让我又一次走进无可替代的历史长川。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其前身是祖父工作多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我第一次看到祖父 1935 年发表在《地理学报》第 2 卷第 2 期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原文，以及文章附加的中国人口分布图、中国人口密度图，便是在该学院的图书馆。我也与地海院的领导和许多专家学者有过多次交流，感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对本纪念集出版工作的支持。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历时多年，对校内名师的各方面资料进行了广泛搜集，并在数字化处理后将大部分公开。本书的组稿，华师大图书馆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感谢所有为之贡献的老师。

本书的序言部分，除选用吴传钧先生的回忆文章作为代序之外，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专门撰写的推荐序。葛老师在序言中回顾了与我祖父同为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以及他本人与我祖父生前的几段交往，非常令人感动，感谢葛老师的支持。

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前所长丁金宏教授，在 2021 年 6 月组织了一次人口研究所老同事的小型座谈会。听到这些不再年轻的学者充满深情地讲述祖父，特别是祖父晚年历尽坎坷创办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往事，我深深地感受到，已经辞世多年的祖父，曾经以自己的坚持给与会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与此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在祖父主持人口研究所工作的那个时期，所有学者都充满了高度的工作激情。如今，虽然部分前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直到今天，那份精神力量依旧深深震撼着我，让我长久地沉浸在那份难以言表的深厚情感之中。

多年来，在我学习和研究祖父的过程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沈卫威教授给予了我多方面的指导。他的博士研究生团队中的许多年轻学者，也曾经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感谢沈教授和他的团队，祝福"沈家军"所有的朋友事业有成。

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晓江教授对本书有重要的贡献。胡晓江教授的祖父胡先骕是 1948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植物学奠基人。我的祖父在南京高师读书时，胡先院就是学校的教授，后来他们既是朋友更是"学衡派"的同人。感谢胡晓江教授对我的支持，感恩前辈之间的情谊得以传递。

在本纪念集的组稿期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正高级编审姜爱萍老师多次给予过重要的意见，感谢她的支持和帮助。

北京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先生，先知书店的创办人李治华先生，是本书问世的重要推手，本书在“胡焕庸线”发表90周年得以奉献给读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对中国科学家早年贡献的弘扬。感谢二位先生和本书的策划姚恋女士、责任编辑杨磊先生、装帧设计张军先生及其工作团队、东方出版社等所有相关朋友对前辈的破意、担当和贡献。

这些年，许多亲属和各行各业的朋友曾经给予我无数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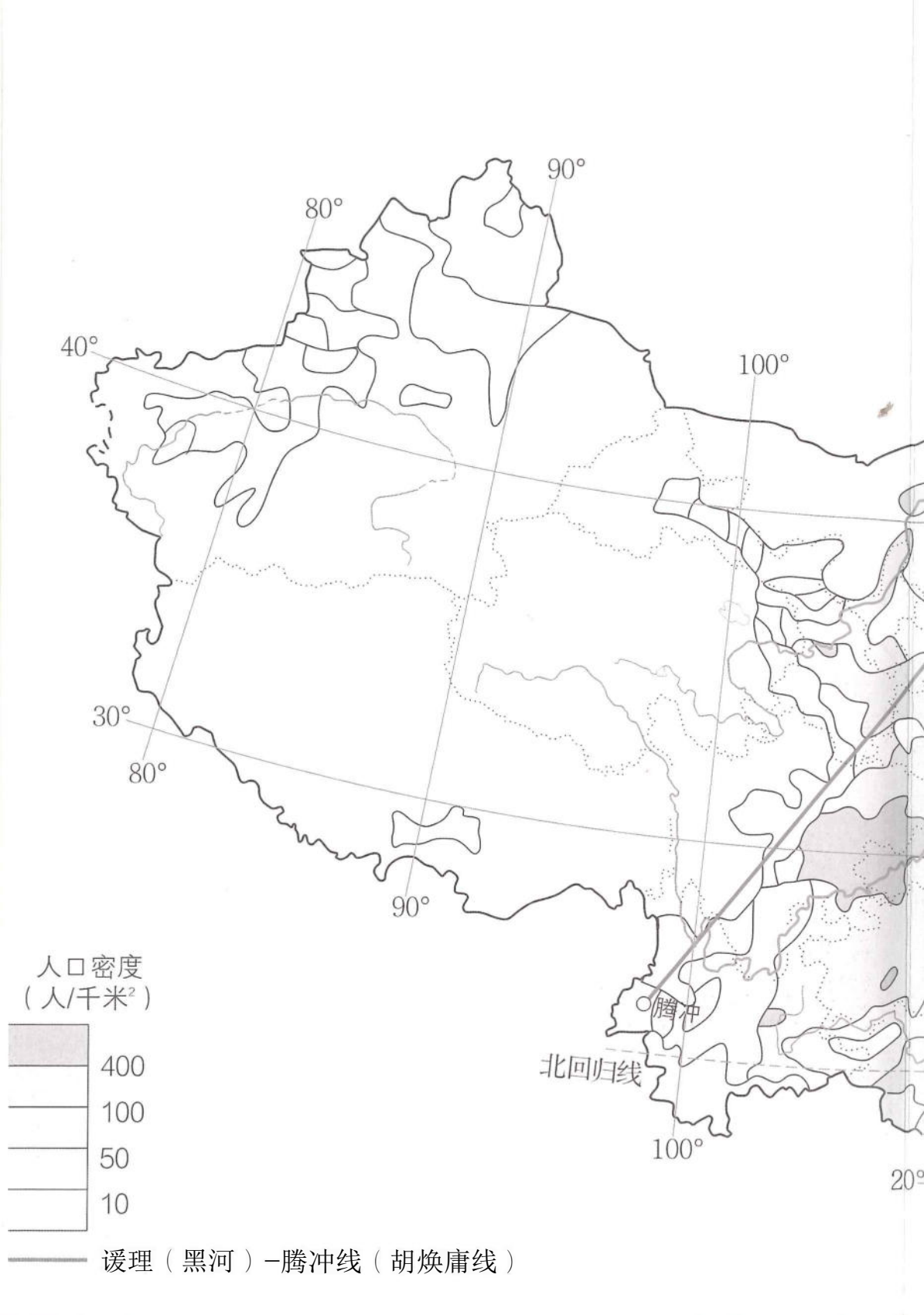
祖父是一位长寿的科学家，他历经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能够彻底了解他的全部学术思想和生活经历，也不能够完全公开所有已知的珍贵历史记载。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更多尚未公开的历史档案，并将相关的内容公开发表。

人的生命只有短短几十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祖父在动乱年代送给学生的嘱咐，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今天，老一代科学家“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治学精神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更是当今的社会依然迫切需要的。世界进化的历史既有不变的真理，也有美丽的谎言，而一个进步的民族必然离不开客观地面对历史。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40多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是当今国人不可缺少的社会责任，追求科学和民主更是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魂。我也是共和国历史动荡的见证者，希望世界和平、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人民富裕、安居乐业，希望国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建设一个科学、民主、法治、包容和平等的新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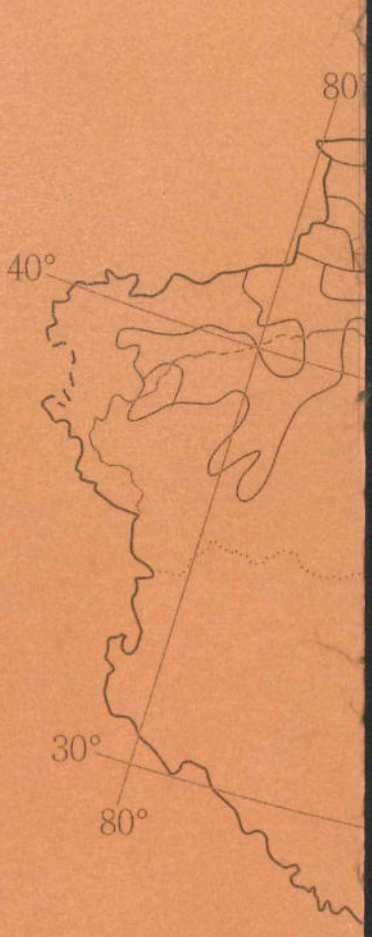
胡焕庸和“胡焕庸线”，已经随着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国人熟知，许多朋友都有深度的解读。限于篇幅，本纪念集只能选用祖父和他人极少部分的文稿。在组稿和核实史料的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和早期语言习惯及印刷质量的差异，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补充和完善。所有不足之处，敬请朋友们指正。

胡复孙

2025 年 3 月 2 日


90°
80°
40°
100°
30°
80°
90°
人口密度
（人/千米²）
400
100
50
10
腾冲
北回归线
100°
20°
瑷理（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

120°
130°
50°
黑河
50°
110°
130°
北京
40°
30°
北回归线
20°
20°
110°
120°
110°
120°
北回归线
香港
澳门
海口
20°
10°
南海诸岛



胡焕庸

1901 年 11 月—1998 年 4 月

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人口学家、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创始人。他以提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璟辉一腾冲线（胡焕庸线）”而为世人所熟知和铭记。2009 年，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胡焕庸线”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地理最重要发现之一，其影响已经超出了人文地理甚至地理学的范围，成为广为人知的中国国情分界线。

胡复孙

1954 年 ^ 月 一

胡焕庸长房孙子，专注研究胡焕庸的学术与生平二十多年，在多所高等学校、政府机构及市级图书馆等开设讲座，并且发表多篇研究文章，如《胡焕庸与淮河治理》《淮水安澜胡焕庸》《胡焕庸：刻在谖辉一腾冲线上的学者人生》《复员前后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建系前后的往事摘录》等。

赵豪辛叶 002

踏飞一国

族：